

| | |
|--------|---------|
| 申 报 | 系列：教学系列 |
| | 专业：社会学 |
| | 职称：教授 |

业绩成果材料

（申报人的业绩成果材料包括论文、科研项目、获奖以及其他成果等）

单 位（二级单位）：公共管理学院

姓 名：陈玉生

材料核对人：

单位盖章：

核对时间：

华南农业大学制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112/t20211220_588536.html

华南农业 百度 全国新闻

Language 教育新闻 友情链接 搜索 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当前位置: 首页 > 教育新闻 > 通知公告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2021年第二批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教高司函〔2021〕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高等学校，有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和《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程院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 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高〔2018〕3号）要求，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我部组织有关企业和高校持续深入实施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根据《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现公布2021年第二批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见附件）。有关高校要加强项目的指导和管理，项目负责人要与相关企业加强联系，按照要求高质量高效推进项目实施。有关企业要保证资金及软硬件投入按时到位，切实加强项目管理，严禁要求高校额外购买配套设备或软件，支付培训费等违规行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附件：1.2021年第二批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按企业排序）
2.2021年第二批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按高校排序）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1年12月14日



扫一扫分享本页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112/t20211220_588536.html

| G11950 | | | | | | |
|--------|--------------|--------|----------------|-------------------|---------------------------------|-----|
| | A | B | C | D | E | F |
| 11938 | 202102191066 | 华南农业大学 | 广东泰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 农业院校经营类专业大数据分析课程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 陈有华 |
| 11939 | 202102195004 | 华南农业大学 | 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 师资培训 | 产学研合作背景下《药用植物病理学实验》课程的师资培训探索与实践 | 毛子锺 |
| 11940 | 202102195005 | 华南农业大学 | 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 师资培训 | 后疫情时代农药主要病虫害产学研合作研究与示范 | 单体江 |
| 11941 | 202102197002 | 华南农业大学 | 广州迪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 产教融合背景下统计类课程金课建设与教学改革研究 | 周燕 |
| 11942 | 202102199032 | 华南农业大学 | 广州冠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 产品设计专业计辅类课程线上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 陈哲 |
| 11943 | 202102391025 | 华南农业大学 | 厦门建发高科有限公司 |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 新农科背景下基因工程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 | 陈亮 |
| 11944 | 202102456049 | 华南农业大学 | 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 整合式商业分析实践课程建设 | 陈艳艳 |
| 11945 | 202102458044 | 华南农业大学 | 上海积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 社会工作产教融合与智慧融合实训基地建设 | 陈玉生 |
| 11946 | 202102596026 | 华南农业大学 |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 师资培训 | 面向人工智能专业的协同育人师资培训 | 张晓鹏 |
| 11947 | 202102022069 | 广东海洋大学 | 北京晨星创投科技有限公司 |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 基于“互联网+”大创赛的新工科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研究 | 梁秀娟 |
| 11948 | 202102057005 | 广东海洋大学 | 北京聚源悦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开发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 杜军 |
| 11949 | 202102058005 | 广东海洋大学 | 北京凯瑞赢科技有限公司 |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 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产教融合 | 李小立 |

合作协议

本合作协议（“协议”）由以下双方签订：华南农业大学，一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高等院校（以下称“大学”）；以及上海积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本协议将从公司在下面签署的日期起开始生效（“生效日期”）。

背景信息

大学情况介绍：

华南农业大学（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简称“华农”，位于广州市，是一所以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优势，以热带亚热带区域农业研究为特色的全国重点大学，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农业农村部共建的省部共建大学，为广东省“211工程”、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入选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建设高校、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教育部首批”三全育人“改革试点高校、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国家“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国家“111计划”，粤港澳高校联盟、CDIO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单位。

公司情况介绍：

上海积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面向高等教育的科技公司，陆由是公司旗下专业的新型在线教育品牌。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实践教学和学习的效率，成为中国领先的教育科技公司。

我们通过长期用户数据的沉淀、分析和研究，研发了全新一代 SaaS 在线教育云端大数据智能反馈平台——陆由云。陆由云支持随时随地在电脑端和移动端同步使用。通过运营陆由云平台，聚焦“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我们向高校提供兼具多元化和个性化，具备虚拟仿真实

训和云端大数据智能反馈特质的优秀互联网教育产品及服务。

本公司 2021 年拟在新社会工作、新法学、新行政管理与新思想政治专业领域内与新文科建设、师资培训、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方面与高校紧密合作，支持高校课程创新、资源共享、人才培养改革、推进教学的信息化和实验室建设、实现实践教学的项目实训和仿真实训等。

公司期望通过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实施，与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的合作共赢。

公司与大学合作，实施《社会工作产教融合与智慧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从协议签署之日起执行。

协议

一、公司的承诺

1. 在受本协议约束的前提下，公司同意向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产教融合与智慧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提供价值人民币 20 万元（大写：贰拾万元）软件技术支持，用于本项目的建设。

2. 公司不承诺负责除本协议规定之外的任何开支、技术援助或品牌宣传。

二、大学的承诺

1. 自本协议生效日起，大学将委派一名教职人员专门负责本项目的协调工作。

2. 大学将根据附件《2021 年上海积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请书》中的方案执行此项目。

3. 大学将根据公司提出的要求向公司提供项目状态，尤其是年中

与年末的项目执行报告，包括资金使用情况。

三、保密

1. “保密信息”是指一方根据本协议向另一方披露的、标记为保密信息或在相应情况下通常会被视作披露方保密信息的信息。保密信息不包括接收方已知的信息、非接收方错误而公开的信息、接收方独立开发的信息，或其他方通过合法途径提供给接收方的信息。

2. 除了需要知晓该信息且已书面同意对该信息保密的关联公司、员工和代理，接受方不得向其他人披露保密信息。接收方及其关联公司、员工和代理只能出于根据本协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目的而使用保密信息，同时须采取合理的谨慎态度来保护这些信息。接收方还可在法律要求时披露保密信息，但须先向披露方提供合理的通知。

四、公开

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就本协议所赋予的关系发表任何公开声明，除非法律有此要求，并且已向另一方提供了合理通知。

五、生效、期限和终止，其他规定

1. 期限：本协议的生效日期为公司签名的日期，本协议的有效期为 2 年。

2. 终止

(1) 在下列情况下，任何一方均可在书面通知另一方后立即终止本协议：如果另一方实质性违反了本协议，并在收到首先发现其违约的一方的通知后的 30 天内未对此类违约进行补救。

(2) 在下列情况下，任何一方均可在书面通知另一方后立即终止本协议：如果另一方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履行本协议所规定义务的时间超过 30 天。

3. 修订内容。任何修改都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且明确说明修

有
哈
业
用章
13695

改了本协议之内容。

4. 管辖法律。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本协议履行中出现纠纷，双方应尽力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附件：（可包含项目申报书，经费支付方式、支付时间，项目成果约定，验收方式，其他约定等）

双方已于生效日期由合法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上海积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姓名：

周连明

合同专用章

职称：

日期：

2021.8.30

华南农业大学

姓名：

王海燕

合同专用章

职称：

日期：

2021.8.31

获奖成果：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获奖者：陈玉生、张兴杰、
卓彩琴、廖慧卿、
马林芳、李颖奕、
曾永辉

获奖等级：二等奖

证书编号：JXCG2104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暨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项目立项通知书

陈玉生 同志：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您申请的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项目_____

中国乡村变革研究：翟城村百年变迁

获准立项，项目类别为_____一般项目_____，批准
号_____20FSHB028_____，资助总额_____25_____万元，第一次拨款_____24_____

万元，预留经费_____1_____万元。

本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项目
立项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立项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申请书》《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项目申
请书》即成为有约束力的协议，您及责任单位要按照《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承担相应责任并执行以下规定：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项目研究
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研究导向，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创

新意识和精品意识,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水准的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要严把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扎实开展研究工作,努力维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

2. 请按照 2016 年修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直接费用的开支范围,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编制项目预算。请登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在线填写(平台登录网址:<https://xm.npopss-cn.gov.cn/>),请按照平台页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预算在线填报手册(项目负责人用户使用)》进行登录和填写。项目经费预算在线填报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0 日,逾期未填写经费预算的,视为放弃资助。项目经费不再追加,对于资助经费低于申请资助额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可选择不接受资助。一经接受,不得以资助金额不足为由,擅自变更申请书所填内容。

3. 后期资助项目负责人要参照评审专家意见对申报成果作出修改、完善。最终成果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需向省区市社科规划(工作)办、在京委托管理机构或单列学科规划办提交结项材料,鉴定合格后由我办安排出版事宜。结项材料按照《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2019 年 10 月修订版)要求提交。**重点项目与一般项目结项成果由我办指定出版社出版**,出版具体事宜由项目负责人与指定出版社

洽谈。成果应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结项公示后再出版,对于违反规定的项目,我办将视情况作出相应处理。凡研究成果中存在侵犯知识产权、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或观点结论有违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刊发后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或在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科研诚信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视情节轻重作出终止研究或撤项处理并上网通报批评。凡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名义发表成果或向有关部门报送材料,或以项目负责人、参加者等名义接受媒体采访时,若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事前须征得我办同意。**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由我办安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次年集中出版。**

4. 后期资助项目和优秀博士论文项目资金直接拨到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账户,其使用和管理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项目成果出版费用由项目负责人按照我办确定的统一标准(每10万字1.7万元),向成果出版机构支付。**

5. 后期资助项目原则上要按计划完成时间申请结项,按时完成项目且成果优秀的负责人在申请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予以适当政策倾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定期清理制,本年度立项的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清理截止日为2023年10月31日,能够在此之前完成的项目不再需要申请延期。如发生延长完成期限、管理单位变动、终止项目等重要事项,

需在我办管理平台在线填写申请,由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经省区市社科规划(工作)办、在京委托管理机构或单列学科规划办报我办审批。

以上规定,项目负责人及责任单位应严格遵守。如有异议,可以不接受资助(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立项协议自行废止。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0年10月23日

抄送:项目责任单位

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优秀学术著作再版项目立项结果公布

2025年01月17日 16:59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优秀学术著作再版项目已完成网上公示，在公示的拟立项课题中，有2项需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现将正式立项课题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5年1月17日

附件：1. 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

2. 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项目立项名单

3. 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学术著作再版项目立项名单

| | | | | |
|-----|----------------------------|-----|---------------|-----|
| 479 |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社群表现与干预机制研究 | 刘鑫桥 | 天津大学 | 社会学 |
| 480 | 陕西地域代表性传统村落研究 | 李慧娟 | 西安交通大学 | 社会学 |
| 481 | 心理学视域下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 | 刘超 |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社会学 |
| 482 | 城市产业移民社区的代际流动实践：“浙江村”追踪研究 | 刘艺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社会学 |
| 483 | 蓝绿空间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邻里影响研究 | 陈玉洁 | 南京邮电大学 | 社会学 |
| 484 | 老龄化社会的城市老年人居家生活行为与空间应对机制研究 | 蔡泉源 | 韶关学院 | 社会学 |
| 485 | 德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功能研究 | 刘芳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社会学 |
| 486 | 名分、样子与社会：中国古代群学思想研究 | 陈玉生 | 华南农业大学 | 社会学 |
| 487 | 现代政治与人格塑造：韦伯政治思想研究 | 刘涛 | 河南农业大学 | 社会学 |
| 488 | 城市社区工作者身份建构与认同机制研究 | 王学梦 | 浙江中医药大学 | 社会学 |
| 489 | 跨越城乡界限：“城乡社区”公共性重塑问题研究 | 高飞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社会学 |
| 490 | 嵌入三维结构的农地流转研究 | 贺林波 | 湖南农业大学 | 社会学 |
| 491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陈然 | 安徽大学 | 社会学 |
| 492 | 村社再造：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转型研究 | 王海娟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 社会学 |

广东省财政厅

粤财办函〔2021〕13号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公布 2021 年广东省财政 科研课题（第一批）非财政系统类 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课题组单位：

根据广东省财政科研课题管理规定，省财政科学研究所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广东省财政科研课题（第一批）非财政系统类的立项评审，确定立项 74 个，现予以公布（附件 1）。请各课题组单位按照以下要求，做好课题研究工作：

一、请做好课题相关管理工作，确保课题研究按计划进行，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课题研究工作，并按要求报送课题结项材料。

二、结项材料包括课题研究成果报告和结项申请书。课题研究成果报告原则上不得少于 1 万字，并按要求（附件 2）排版；结项申请书请按模板（附件 3）所列相关要求填列。

三、课题研究成果报告及结项申请书请按要求打印（各一式一份）装订，由课题负责人签字并加盖课题组所在单位公章后，寄交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广州市北京路 376 号），电子版 word

文档发送至指定邮箱: cztt_kysyj2s@gd.gov.cn。

四、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将组织专家对结项材料进行验收评审，并从通过验收评审的课题当中择优评出一、二、三等次若干名，发放相应等次的课题成本补助及证书。

五、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将对通过验收评审的课题予以结项批复，未通过验收评审的课题不再结项批复。

附件: 1. 2021 年广东省财政科研课题（第一批）非财政系统
类立项名单

2. 广东省财政科研课题（第一批）研究成果报告排版
要求

3. 广东省财政科研课题（第一批）结项申请书（模板）



（联系人及电话：谢易和，020-83170973）

| 编号 | 课题组单位 | 课题名称 | 课题负责人 |
|----------|------------------------------|------------------------------------|------------|
| Z2021110 |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 财政引导资金参股高新技术企业运行机制研究 | 郑毅 |
| Z2021114 | 广东省教育厅政务服务中心 广东工业大学 | 完善省级教育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研究 | 李洁雯 陈伟晓 |
| Z2021116 | 广东省南方民营企业发展研究院 | “双区”建设背景下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 张文辉 |
| Z2021117 |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 广东省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成效与优化措施 | 曾小波 |
| Z2021118 | 华南农业大学 | 广东省购买社工服务财政支出绩效评估研究 | 陈玉生 |
| Z2021119 |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财税政策对广东省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张雁 |
| Z2021121 |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德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 深化涉农资金管控、夯实河源农村会计管理基础的探索与研究 | 伍伟林尧 |
| Z2021122 |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 基于多层次模糊评判法的财政风险测算与预判机制研究 | 许金玲 |
| Z2021123 | 东莞理工学院 |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跨境主体地方财政监督模式研究 | 韩开军 |
| Z2021130 | 广东财经大学 | 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研究 | 黄文浩 |
| Z2021131 | 华南农业大学 | 广东省财政公共卫生预算绩效优化研究：基于结果链模型 | 方敏 |
| Z2021134 | 广州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 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中的财政政策：财税支持、绩效测度与政策优化 | 张文龙 |
| Z2021141 |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 基于 PCA 方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管理研究 | 林慧涓 |
| Z2021143 |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 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助推广东农业高质量发展应用研究 | 黄途倩 |

合同编号:

项目合同书

项目名称: 广东省湖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
与社区营造模式创新研究

委托方 (甲方): 广东省湖光农场

受托方 (乙方): 华南农业大学

签订时间: 2018 年 2 月

签订地点: 广东省农垦总局

执行期限: 2018.2-2019.3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广东省湖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与社区营造模式创新研究”项目进行的专项项目，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项目服务的内容

1、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实施方案》有关精神和工作部署，广东省农垦总局全面实施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并对广东省湖光农场进行改革创新试点。乙方受甲方委托，对广东省湖光农场改革创新试点工作进行专业指导，并跟踪调查，总结经验，提炼工作模式，甄别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项目由乙方合理组织熟悉业务的专业团队，并由双方形成协助调研团队，具体开展实施。乙方采取科学方式收集和分析资料，最终形成“广东省湖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与社区营造模式创新研究报告”。

2、对广东省湖光农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专业咨询、督导和培训服务。

3、对广东省湖光农场开展社区服务管理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第二条 项目内容

通过研究，对农场分离办社会职能改革过程中，社区党组织、管委会、农场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情况；对办社会职能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的措施进行研究；对农场社区营造过程中，社区凝聚社会共

识、推进公众参与、整合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区服务管理和社区营造的体制机制和模式创新进行提炼总结，总结几点启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并对办社会职能改革后如何提升农场社会治理和服务水平提出对策建议。

第三条 具体项目方案

（一）调研方法：文献法、小组访谈法、访谈法、参与式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法等多元调研方法。

（二）社区社会组织调研与资料收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组织或队伍、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活动队伍、社会工作组织、慈善志愿者队伍等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主体及有关人员座谈会。访谈各组织和部门具体负责人在完成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和社区营造时所使用的办法，如组建社区社会组织、商议社区重大事件、组织居民会议、发动居民公益活动等，并记录上述工作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哪些做法最有效果，哪些做法很有效，落实工作时的困难，社会发动的策略；研究改革创新活动中的组织队伍和过程备案资料（包括组织架构或队伍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及其他重要制度）、最近几年的年度工作总结或报告、能反映资源链接整合和居民参与情况等的资料、典型社会活动的工作方案、典型案例、媒体报道及其他宣传资料，社区改革和创新过程中的工作思路、意见和建议；采取访谈方式收集社区文化生活和居民生活状况等资料。

（三）社区居民调查：采取访谈法和个案法，走访居民群众、

社区领袖人物，了解社情民意，重点了解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处理的一些典型事件，调查了解居民的自我组织和社区参与情况，了解居民参与的方式方法、途径渠道，了解居民邻里互助、社区参与、社区共融的连接点和动力模式。要求访员做好访谈笔录和整理个案资料。

第四条 项目合作团队

1. 统筹指导：

江 英：广东省农垦总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处长

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2. 乙方专业人员：

主持人：

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理事、研究专员

参加人：

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易钢：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书记、教授

李锦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王权典：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教授/农村法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

张开云：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副理事长

杜金沛：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姜国兵：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行政管理学博士/
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会长、研究专员

谢向阳：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

李 开：东莞惠普舍官培训讲师、MSW硕士/东莞上合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督导

3. 协作研究人员：

协作研究指导：

冯人利：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处长

陈小宁：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副处长

梁文彩：广东省湖光农场党委书记

研究助理：

胡文辉、许亚柯、黄嘉颖、黎倩欣：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硕士研究生

广东省湖光农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专职人员

第五条 工作进度安排

2018.2.15前，准备阶段：召开调查座谈会，收集前期工作资料，
拟定调查访谈提纲，确定调查对象，组织调研队伍，拟定工作计划
等。必要时可召开座谈会交流讨论。（由课题组完成）

2018.2.16-3.31，摸底阶段：初步开展社区调查；由广东省湖
光农场社区服务中心召集社区服务管理队伍负责人或骨干，布置座
谈会，座谈交流。（由广东省湖光农场组织安排，课题组具体执行

完成)

2018.4.1-4.30, 调查准备阶段: 根据摸底情况, 由课题组设计访谈提纲、调查问卷, 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调查方案, 并征求项目委托方意见确定。(由课题组完成)

2018.5.1-10.31, 深入调查阶段: 根据访谈提纲和问卷, 课题组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组织或队伍、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活动队伍、社会工作组织、慈善志愿者队伍、社区居民等主体进行调查。采取访谈和发放问卷调查方式。并提交中期报告(由广东省湖光农场组织安排, 课题组具体执行完成)

2018.11.1-12.31, 报告撰写阶段: 整理调查资料, 录入问卷数据, 初步分析数据资料, 召开课题组专家座谈会, 明确调查报告写作框架与主要内容, 补充调查, 撰写调查报告等, 完成初稿。(课题组完成)

2019.1.1-3.31, 成果修改提交阶段: 组织有关人员召开调查报告等相关成果咨询研讨会(广东省农垦总局主办, 广东省湛江农垦局、广东省湖光农场、课题组); 根据调查报告和研讨会意见, 在广东省湛江农垦局开展调研报告一场(课题做报告, 报告会由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筹备)。根据各方意见修改完善研究报告, 向广东省农垦总局和广东省湖光农场提交成果电子版和纸质版10份, 纸质等调查资料由课题组保存(课题组完成)。广东省湖光农场收到成果后一个月内, 向乙方和课题组出具结题证明, 结题。

第六条 主要工作成果

《广东省湖光农场创新社区服务管理与社会工作运行方案》

《广东省湖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与社区营造模式创新研究报告》（含对策建议）

第七条 项目经费及支付方式

1. 研究经费人民币拾贰万元（¥12万元），分三次支付完成：合同签定后15天内支付8万元，提交中期报告后支付1万元，项目结题后支付3万元。

2.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户名和专户帐号为：

开户银行： 广州工行五山支行

户名： 华南农业大学

帐号： 3602002609000310520

第八条 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及其它约定

1、前述项目工作经费一经拨付至乙方指定帐户后，纳入乙方项目经费管理范畴，在乙方秘书财务处监管下，项目主持人按计划与规定开支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2、项目工作组利用项目经费购置与项目工作有关的设备、物件、资料等财产，归乙方所有，项目组成员根据工作需要按规定领用。

3、前述项目工作经费不包括甲方另行组织的项目论证评审会议、相关规范指引或辅导文件汇编正式文本的印刷或出版等费用开支，由甲方根据其实际工作需要另外作出安排。

第九条 双方协作事项

1、根据乙方进度工作需要，甲方应向乙方研究人员尽可能全面提供相关文献、数据等资料，具体方式由双方根据资料性质商定。

2、甲方协助联络农场、社区社会组织及有关机构和相关人员，以及提供其他便利，支持及派员参与乙方研究人员的研究论证工作。

3、乙方全力支持本项目研究工作，提供研究工作所必需的服务保障及便利条件，督促其研究人员如期按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第十条 知识产权保护

1、本项目成果版权归甲乙双方共有，未经对方同意，双方无权将成果版权转交付给任何第三人，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依据课题成果进行学术研究并出版。

2、甲方有权自主采纳或授权广东省农垦总局使用乙方依约提供的成果文件或参考建议，仅可用于其改制文件制作及管理运作，不得擅自用于其他目的等。

3、乙方承诺甲方可使用的项目成果文件免受第三方依法提出侵权指控；否则由乙方自行交涉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

第十一条 违约处理

1、乙方对研究成果与合同要求不相符负有责任。若甲方不接受不合格的工作成果，乙方应返还甲方已付部分经费，除了视乙方有效工作由甲方认可的合理开支外，其他损失概由乙方自行承担。

2、若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时提交预期的工作成果，延误达45天以上，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追回已支付的经费。

3、若甲方未能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支付给乙方工作经费，则乙方有权主张合同延期执行或暂缓提交工作成果。

4、若甲方在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工作任务的同时，又另行

委托第三人或自行承担实施工作，并不影响本合同的实际履行。

第十二条 其他特别约定

1. 乙方向甲方交付主要工作成果的形式：以书面材料及其电子版为主向甲方提交工作报告、设计方案、法律意见书及相关文件。

2、乙方工作人员严格保守所知悉甲方的秘密及其它信息。

3、本项目合同书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乙方完成项目任务提供工作成果和甲方完全支付工作经费后，合同自然终止。

甲方：广东省湖光农场（盖章）



签约代表（签名）：

陈悦

2018年2月1日

乙方：华南农业大学（盖章）

签约代表（签名）：

李国杰



2018年2月2日

合同编号：

项目合同书

项目名称：广东省南华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
与创新社会工作模式研究

委托方（甲方）：广东省南华农场

受托方（乙方）：华南农业大学

签订时间：2018年2月

签订地点：广东省农垦总局

执行期限：2018.2-2019.3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广东省南华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与创新社会工作模式研究”项目进行的专项项目，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项目服务的内容

1、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实施方案》有关精神和工作部署，广东省农垦总局全面实施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并对广东省南华农场进行改革创新试点。乙方受甲方委托，对广东省南华农场改革创新试点工作进行专业指导，并跟踪调查，总结经验，提炼工作模式，甄别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项目由乙方合理组织熟悉业务的专业团队，并由双方形成协助调研团队，具体开展实施。乙方采取科学方式收集和分析资料，最终形成“广东省南华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与创新社会工作模式研究报告”。

2、对广东省南华农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专业咨询、督导和培训服务。

3、对广东省南华农场开展社区服务管理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第二条 项目内容

对广东省南华农场分离办社会职能改革过程中，社区党组织、管委会、农场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情况进行研究；对办社会职能改革存

在的问题及应对的措施进行研究；对南华农场社会工作服务体制机制、社工服务模式、社工服务开展情况、社工服务的社会效应，以及社工服务存在的困境和问题进行研究；并对社区服务管理和社工服务的体制机制和模式创新进行提炼总结，总结几点启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办社会职能改革后如何提升农场社会治理和服务水平提出对策建议。

第三条 具体项目方案

（一）调研方法：文献法、访谈法、行动研究、参与式研究、文本分析法等多元调研方法。

（二）社区社会组织调研与资料收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组织或队伍、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活动队伍、社会工作队伍、慈善志愿者队伍等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主体及有关人员座谈会。访谈各组织和部门具体负责人在完成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和社会工作服务时所使用的的工作办法，如组建社区社会组织、商议社区重大事件、组织居民会议、发动居民公益活动等，并记录上述工作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哪些做法最有效果，哪些做法很有效，落实工作时的困难，社会发动的策略；研究改革创新活动中的组织队伍和过程备案资料（包括组织架构或队伍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及其他重要制度）、最近几年的年度工作总结或报告、能反映资源链接整合和居民参与情况等的资料、典型社会活动的工作方案、典型案例、媒体报道及其他宣传资料，社区改革和创新过程中的工作思路、意见和建议；对社会工作者进行访谈，并收集整理社会工作服务个案、小组活动、社区活动等文献内容，对其进行文本

分析；采取访谈方式收集社区文化生活和居民生活状况等资料。

（三）社区居民调查：采取访谈法和个案法，走访居民群众、社区领袖人物，了解社情民意，重点了解公共服务和接受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一些典型事件，调查了解居民的自我组织和社区参与情况，了解居民参与的方式方法、途径渠道，了解居民邻里互助、社区参与、社区共融的连接点和动力模式，调查了解社会工作服务对居民社区参与等方面的影响和效应。要求访员做好访谈笔录和整理个案资料。

第四条 项目合作团队

1. 统筹指导

江 英：广东省农垦总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处长

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2. 乙方专业人员：

主持人

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理事、研究专员

参加人

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李锦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易钢：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书记、教授

王权典：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教授/农村法治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副会长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

张开云：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理事长

杜金沛：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姜国兵：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行政管理学博士/
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会长、研究专员

谢向阳：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

李 开：东莞惠普舍官培训讲师、MSW硕士/东莞上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督导

3. 协作研究人员

协作研究指导

冯人利：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处长

陈小宁：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副处长

梁平：广东省南华农场党委书记

研究助理

胡文辉、许亚柯、黄嘉颖、黎倩欣：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广东省南华农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专职人员

第五条 工作进度安排

2018.2.15前，准备阶段：召开调查座谈会，收集前期工作资料，拟定调查访谈提纲，确定调查对象，组织调研队伍，拟定工作计划等。必要时可召开座谈会交流讨论。（由课题组完成）

2018.2.16-3.31, 摸底阶段: 初步开展社区调查; 由广东省南华农场社区服务中心召集社区服务管理队伍负责人或骨干, 布置座谈会, 座谈交流。(由南华农场组织安排, 课题组具体执行完成)

2018.4.1-4.30, 调查准备阶段: 根据摸底情况, 由课题组设计访谈提纲、调查问卷, 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调查方案, 并征求项目委托方意见确定。(由课题组完成)

2018.5.1-10.31, 深入调查阶段: 根据访谈提纲和问卷, 课题组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组织或队伍、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活动队伍、社会工作组织、慈善志愿者队伍、社区居民等主体进行调查。采取访谈和发放问卷调查方式。并提交中期报告(由广东省南华农场组织安排, 课题组具体执行完成)

2018.11.1-12.31, 报告撰写阶段: 整理调查资料, 录入问卷数据, 初步分析数据资料, 召开课题组专家座谈会, 明确调查报告写作框架与主要内容, 补充调查, 撰写调查报告等, 完成初稿。(课题组完成)

2019.1.1-3.31, 成果修改提交阶段: 组织有关人员召开调查报告等相关成果咨询研讨会(广东省农垦总局主办, 广东省湛江农垦局、广东省南华农场、课题组); 根据调查报告和研讨会意见, 在广东省湛江农垦局开展调研报告一场(课题做报告, 报告会由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筹备)。根据各方意见修改完善研究报告, 向广东省农垦总局和广东省南华农场提交成果电子版和纸质版10份, 纸质等调查资料由课题组保存(课题组完成)。广东省农垦总局收到成果后一个月内, 向乙方和课题组出具结题证明, 结题。

第六条 主要工作成果

《广东省南华农场创新社区服务管理与社会工作运行方案》

《广东省南华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与创新社会工作模式研究报告》(含对策建议)

第七条 项目经费及支付方式

1. 研究经费人民币拾叁万元(¥13万元)，分三次支付完成，其中于合同签订后15天内支付8万元，提交中期报告后支付2万元，项目结题后支付3万元。

2、乙方开户银行名称、户名和专户帐号为：

开户银行： 广州工行五山支行

户名： 华南农业大学

帐号： 3602002609000310520

第八条 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及其它约定

1、前述项目工作经费一经拨付至乙方指定帐户后，纳入乙方项目经费管理范畴，在乙方秘书财务处监管下，项目主持人按计划与规定开支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2、项目工作组利用项目经费购置与项目工作有关的设备、物件、资料等财产，归乙方所有，项目组成员根据工作需要按规定领用。

3、前述项目工作经费不包括甲方另行组织的项目论证评审会议、相关规范指引或辅导文件汇编正式文本的印刷或出版等费用开支，由甲方根据其实际工作需要另外作出安排。

第九条 双方协作事项

1、根据乙方进度工作需要，甲方应向乙方研究人员尽可能全面提供相关文献、数据等资料，具体方式由双方根据资料性质商定。

2、甲方协助联络农场、社区社会组织及有关机构和相关人员，以及提供其他便利，支持及派员参与乙方研究人员的研究论证工作。

3、乙方全力支持本项目研究工作，提供研究工作所必需的服务保障及便利条件，督促其研究人员如期按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第十条 知识产权保护

1、本项目成果版权归甲乙双方共有，未经对方同意，双方无权将成果版权转交付给任何第三人，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依据课题成果进行学术研究并出版。

2、甲方有权或授权广东省农垦总局自主采纳使用乙方依约提供的成果文件或参考建议，仅可用于其改制文件制作及管理运作等。

3、乙方承诺甲方可使用的项目成果文件免受第三方依法提出侵权指控；否则由乙方自行交涉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

第十一条 违约处理

1、乙方对研究成果与合同要求不相符负有责任。若甲方不接受不合格的工作成果，乙方应返还甲方已付部分经费，除了视乙方有效工作由甲方认可的合理开支外，其他损失概由乙方自行承担。

2、若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时提交预期的工作成果，延误达45天以上，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追回已支付的经费。

3、若甲方未能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支付给乙方工作经费，则乙方有权主张合同延期执行或暂缓提交工作成果。

4、若甲方在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工作任务的同时，又另行委托第三人或自行承担实施工作，并不影响本合同的实际履行。

第十二条 其他特别约定

1. 乙方向甲方交付主要工作成果的形式：以书面材料及其电子版为主向甲方提交工作报告、设计方案、法律意见书及相关文件。

2、乙方工作人员严格保守所知悉甲方的秘密及其它信息。

3、本项目合同书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乙方完成项目任务提供工作成果和甲方完全支付工作经费后，合同自然终止。

甲方：广东省南华农场（盖章）

签约代表（签名）：



2018年2月1日

乙方：华南农业大学（盖章）

签约代表（签名）：



2018年2月1日

合同编号：

项目合同书

项目名称：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委托方（甲方）：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华南农业大学

签订时间：2018年2月

签订地点：广东省农垦总局

执行期限：2018.2-2019.3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研究”项目进行的专项项目，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项目服务的内容

1、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实施方案》有关精神和工作部署，广东省农垦总局全面实施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并对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改革创新试点。乙方受甲方委托，对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改革创新试点工作进行专业指导，并跟踪调查，总结经验，提炼工作模式，甄别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项目由乙方合理组织熟悉业务的专业团队，并由双方形成协助研究团队，具体开展实施。乙方采取科学方式收集和分析资料，最终形成“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研究报告”。

2、对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专业咨询、督导和培训服务。

3、对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社区服务管理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第二条 项目内容

对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分离办社会职能改革过程中，社区党组织、管委会、农场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组织、

志愿者队伍等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情况；对办社会职能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的措施进行研究；对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建设、管理与运营情况；对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改革中，加强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情况，进行了解和分析，总结经验、研究问题、提出对策；并对办社会职能改革后如何提升农场社会治理和服务水平提出对策建议。

第三条 具体项目方案

（一）调研方法：文献法、访谈法、口述史、视觉资料收集方法、参与式研究、个案研究等多元调研方法。

（二）社区社会组织调研与资料收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组织或队伍、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活动队伍、社会工作队伍、慈善志愿者队伍等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主体及有关人员座谈会。访谈各组织和部门具体负责人在完成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和社会工作服务时所使用的工作办法，如组建社区社会组织、商议社区重大事件、组织居民会议、发动居民公益活动等，并记录上述工作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哪些做法最有效果，哪些做法很有效，落实工作时的困难，社会发动的策略；研究改革创新活动中的组织队伍和过程备案资料（包括组织架构或队伍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及其他重要制度）、最近几年的年度工作总结或报告、能反映资源链接整合和居民参与情况等的资料、典型社会活动的工作方案、典型案例、媒体报道及其他宣传资料，社区改革和创新过程中的工作思路、意见和建议；对社会工作者进行访谈，并收集整理社会工作服务个案、小组活动、社区活动等文献内容，对其进行文本

分析；采取访谈方式收集社区文化生活和居民生活状况等资料。

（三）社区居民调查：采取访谈法和个案法，走访居民群众、社区领袖人物，了解社情民意，重点了解公共服务和接受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一些典型事件，调查了解居民的自我组织和社区参与情况，了解居民参与的方式方法、途径渠道，了解居民邻里互助、社区参与、社区共融的连接点和动力模式，调查了解社会工作服务对居民社区参与等方面的影响和效应。要求访员做好访谈笔录和整理个案资料。

第四条 项目合作团队

1. 统筹指导：

江 英：广东省农垦总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处长

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2. 乙方专业人员：

主持人：

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理事、研究专员

参加人：

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易钢：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书记、教授

李锦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王权典：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教授/农村法治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

张开云：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理事长

杜金沛：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姜国兵：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行政管理学博士/
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会长、研究专员

谢向阳：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

李 开：东莞惠普舍官培训讲师、MSW硕士/东莞上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督导

3. 协作研究人员：

协作研究指导：

冯人利：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处长

陈小宁：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副处长

林国坚：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研究助理：

胡文辉、许亚柯、黄嘉颖、黎倩欣：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专职人员

第五条 工作进度安排

2018.2.15前，准备阶段：召开调查座谈会，收集前期工作资料，拟定调查访谈提纲，确定调查对象，组织研究队伍，拟定工作计划等。必要时可召开座谈会交流讨论。（由课题组完成）

2018.2.16-3.31, 摸底阶段: 初步开展社区调查; 由丰收公司社区服务中心召集社区服务管理队伍负责人或骨干, 布置座谈会, 座谈交流。(由丰收公司组织安排, 课题组具体执行完成)

2018.4.1-4.30, 调查准备阶段: 根据摸底情况, 由课题组设计访谈提纲、调查问卷, 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调查方案, 并征求项目委托方意见确定。(由课题组完成)

2018.5.1-10.31, 深入调查阶段: 根据访谈提纲和问卷, 课题组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组织或队伍、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活动队伍、社会工作组织、慈善志愿者队伍、社区居民等主体进行调查。采取访谈和发放问卷调查方式。并提交中期报告(由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安排, 课题组具体执行完成)

2018.11.1-12.31, 报告撰写阶段: 整理调查资料, 录入问卷数据, 初步分析数据资料, 召开课题组专家座谈会, 明确调查报告写作框架与主要内容, 补充调查, 撰写调查报告等, 完成初稿。(课题组完成)

2019.1.1-3.31, 成果修改提交阶段: 组织有关人员召开调查报告等相关成果咨询研讨会(广东省农垦总局主办, 广东省湛江农垦局、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课题组); 根据调查报告和研讨会意见, 在广东省湛江农垦局开展研究报告一场(课题做报告, 报告会由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筹备)。根据各方意见修改完善研究报告, 向广东省农垦总局提供成果纸质版10份和电子版, 纸质等调查资料由课题组保存(课题组完成)。广东省农垦总局收到成果后一个月内, 向乙方和课题组出具结题证明, 结题。

第六条 主要工作成果

《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创新社区服务管理与社会工作运行方案》

《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研究报告》(含对策建议)

第七条 项目经费及支付方式

1. 研究经费人民币拾叁万元(¥13万元)，分三次支付完成：合同签订后15天内支付8万元，提交中期报告后支付2万元，项目结题后支付3万元。

2.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户名和专户帐号为：

开户银行： 广州工行五山支行

户名： 华南农业大学

帐号： 3602002609000310520

第八条 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及其它约定

1、前述项目工作经费一经拨付至乙方指定帐户后，纳入乙方项目经费管理范畴，在乙方秘书财务处监管下，项目主持人按计划与规定开支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2、项目工作组利用项目经费购置与项目工作有关的设备、物件、资料等财产，归乙方所有，项目组成员根据工作需要按规定领用。

3、前述项目工作经费不包括甲方另行组织的项目论证评审会议、相关规范指引或辅导文件汇编正式文本的印刷或出版等费用开支，由甲方根据其实际工作需要另外作出安排。

第九条 双方协作事项

1、根据乙方进度工作需要，甲方应向乙方研究人员尽可能全面提供相关文献、数据等资料，具体方式由双方根据资料性质商定。

2、甲方协助联络农场、社区社会组织及有关机构和相关人员，以及提供其他便利，支持及派员参与乙方研究人员的研究论证工作。

3、乙方全力支持本项目研究工作，提供研究工作所必需的服务保障及便利条件，督促其研究人员如期按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第十条 知识产权保护

1、本项目成果版权归甲乙双方共有，未经对方同意，双方无权将成果版权转交付给任何第三人，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依据课题成果进行学术研究并出版。

2、甲方有权自主采纳或授权广东省农垦总局使用乙方依约提供的成果文件或参考建议，仅可用于其改制文件制作及管理运作，不得擅自用于其他目的等。

3、乙方承诺甲方可使用的项目成果文件免受第三方依法提出侵权指控；否则由乙方自行交涉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

第十一条 违约处理

1、乙方对研究成果与合同要求不相符负有责任。若甲方不接受不合格的工作成果，乙方应返还甲方已付部分经费，除了视乙方有效工作由甲方认可的合理开支外，其他损失概由乙方自行承担。

2、若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时提交预期的工作成果，延误达 45 天以上，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追回已支付的经费。

3、若甲方未能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支付给乙方工作经费，则乙方有权主张合同延期执行或暂缓提交工作成果。

4、若甲方在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工作任务的同时，又另行委托第三人或自行承担实施工作，并不影响本合同的实际履行。

第十二条 其他特别约定

1. 乙方向甲方交付主要工作成果的形式：以书面材料及其电子版为主向甲方提交工作报告、设计方案、法律意见书及相关文件。

2、乙方工作人员严格保守所知悉甲方的秘密及其它信息。

3、本项目合同书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乙方完成项目任务提供工作成果和甲方完全支付工作经费后，合同自然终止。

甲方：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签约代表（签名）：

 2018年2月1日



乙方：华南农业大学（盖章）

签约代表（签名）：

 2018年2月1日



合同编号：

项目合同书

项目名称：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与社区服务品牌建设研究

委托方（甲方）：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华南农业大学

签订时间：2018年2月

签订地点：广东省农垦总局

执行期限：2018.2-2019.3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与社区服务品牌建设研究”项目进行的专项项目，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项目服务的内容

1、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实施方案》有关精神和工作部署，广东省农垦总局全面实施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并对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改革创新试点。乙方受甲方委托，对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改革创新试点工作进行专业指导，并跟踪调查，总结经验，提炼工作模式，甄别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项目由乙方合理组织熟悉业务的专业团队，并由双方形成协助调研团队，具体开展实施。乙方采取科学方式收集和分析资料，最终形成“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与社区服务品牌建设研究报告”。

2、对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专业咨询、督导和培训服务。

3、对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社区服务管理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第二条 项目内容

通过研究，对农场分离办社会职能改革过程中，社区党组织、

管委会、农场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情况；对办社会职能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的措施进行研究；对农场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建设、管理与运营情况；对农场社会管理管理创新及其特色亮点，尤其是品牌建设，进行了解和分析，总结经验、研究问题、提出对策；并对办社会职能改革后如何提升农场社会治理和服务水平提出对策建议。

第三条 具体项目方案

（一）调研方法：文献法、访谈法、口述史、视觉资料收集方法、参与式研究、个案研究等多元调研方法。

（二）社区社会组织调研与资料收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组织或队伍、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活动队伍、社会工作队伍、慈善志愿者队伍等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主体及有关人员座谈会。访谈各组织和部门具体负责人在完成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和社会工作服务时所使用的工作办法，如组建社区社会组织、商议社区重大事件、组织居民会议、发动居民公益活动等，并记录上述工作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哪些做法最有效果，哪些做法很有效，落实工作时的困难，社会发动的策略；研究改革创新活动中的组织队伍和过程备案资料（包括组织架构或队伍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及其他重要制度）、最近几年的年度工作总结或报告、能反映资源链接整合和居民参与情况等的资料、典型社会活动的工作方案、典型案例、媒体报道及其他宣传资料，社区改革和创新过程中的工作思路、意见和建议；对社会工作者进行访谈，并收集整理社会工作服务个案、小组活动、社区活动等文献内容，对其进行文本

分析；采取访谈方式收集社区文化生活和居民生活状况等资料。

（三）社区居民调查：采取访谈法和个案法，走访居民群众、社区领袖人物，了解社情民意，重点了解公共服务和接受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一些典型事件，调查了解居民自我组织和社区参与情况，了解居民参与的方式方法、途径渠道，了解居民邻里互助、社区参与、社区共融的连接点和动力模式，调查了解社会工作服务对居民社区参与等方面的影响和效应。要求访员做好访谈笔录和整理个案资料。

第四条 项目合作团队

1. 统筹指导：

江 英：广东省农垦总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处长

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2. 乙方专业人员：

主持人：

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理事、研究专员

参加人：

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易钢：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书记、教授

李锦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王权典：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教授/农村法治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

张开云：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理事长

杜金沛：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姜国兵：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行政管理学博士/
广东省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会长、研究专员

谢向阳：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

李 开：东莞惠普舍官培训讲师、MSW硕士/东莞上合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督导

3. 协作研究人员：

协作研究指导：

冯人利：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处长

陈小宁：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社会事业管理处副处长

吴登孟：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研究助理：

胡文辉、许亚柯、黄嘉颖、黎倩欣：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专职人员

第五条 工作进度安排

2018.2.15前，准备阶段：召开调查座谈会，收集前期工作资料，拟定调查访谈提纲，确定调查对象，组织调研队伍，拟定工作计划等。必要时可召开座谈会交流讨论。（由课题组完成）

2018.2.16-3.31, 摸底阶段: 初步开展社区调查; 由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中心召集社区服务管理队伍负责人或骨干, 布置座谈会, 座谈交流。(由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安排, 课题组具体执行完成)

2018.4.1-4.30, 调查准备阶段: 根据摸底情况, 由课题组设计访谈提纲、调查问卷, 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调查方案, 并征求项目委托方意见确定。(由课题组完成)

2018.5.1-10.31, 深入调查阶段: 根据访谈提纲和问卷, 课题组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组织或队伍、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活动队伍、社会工作组织、慈善志愿者队伍、社区居民等主体进行调查。采取访谈和发放问卷调查方式。并提交中期报告(由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安排, 课题组具体执行完成)

2018.11.1-12.31, 报告撰写阶段: 整理调查资料, 录入问卷数据, 初步分析数据资料, 召开课题组专家座谈会, 明确调查报告写作框架与主要内容, 补充调查, 撰写调查报告等, 完成初稿。(课题组完成)

2019.1.1-3.31, 成果修改提交阶段: 组织有关人员召开调查报告等相关成果咨询研讨会(广东省农垦总局主办, 广东省湛江农垦局、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课题组); 根据调查报告和研讨会意见, 在广东省湛江农垦局开展调研报告一场(课题做报告, 报告会由广东省湛江农垦局筹备)。根据各方意见修改完善研究报告, 向广东省农垦总局提供成果纸质版10份和电子版, 纸质等调查资料由课题组保存(课题组完成)。广东省农垦总局收到成果后一个月内,

向乙方和课题组出具结题证明，结题。

第六条 主要工作成果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创新社区服务管理与社会工作运行方案》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社区服务管理平台体系与社区服务品牌建设研究报告》（含对策建议）

第七条 项目经费及支付方式

1. 研究经费人民币拾叁万元（¥13万元），分三次支付完成：合同签定后15天内支付8万元，提交中期报告后支付2万元，项目结题后支付3万元。

2、乙方开户银行名称、户名和专户帐号为：

开户银行： 广州工行五山支行

户名： 华南农业大学

帐号： 3602002609000310520

第八条 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及其它约定

1、前述项目工作经费一经拨付至乙方指定帐户后，纳入乙方项目经费管理范畴，在乙方秘书财务处监管下，项目主持人按计划与规定开支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2、项目工作组利用项目经费购置与项目工作有关的设备、物件、资料等财产，归乙方所有，项目组成员根据工作需要按规定领用。

3、前述项目工作经费不包括甲方另行组织的项目论证评审会议、相关规范指引或辅导文件汇编正式文本的印刷或出版等费用开

支，由甲方根据其实际工作需要另外作出安排。

第九条 双方协作事项

1、根据乙方进度工作需要，甲方应向乙方研究人员尽可能全面提供相关文献、数据等资料，具体方式由双方根据资料性质商定。

2、甲方协助联络农场、社区社会组织及有关机构和相关人员，以及提供其他便利，支持及派员参与乙方研究人员的研究论证工作。

3、乙方全力支持本项目研究工作，提供研究工作所必需的服务保障及便利条件，督促其研究人员如期按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第十条 知识产权保护

1、本项目成果版权归甲乙双方共有，未经对方同意，双方无权将成果版权转交付给任何第三人，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依据课题成果进行学术研究并出版。

2、甲方有权自主采纳或授权广东省农垦总局使用乙方依约提供的成果文件或参考建议，仅可用于其改制文件制作及管理运作，不得擅自用于其他目的等。

3、乙方承诺甲方可使用的项目成果文件免受第三方依法提出侵权指控；否则由乙方自行交涉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

第十一条 违约处理

1、乙方对研究成果与合同要求不相符负有责任。若甲方不接受不合格的工作成果，乙方应返还甲方已付部分经费，除了视乙方有效工作由甲方认可的合理开支外，其他损失概由乙方自行承担。

2、若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时提交预期的工作成果，延误达 45

天以上，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追回已支付的经费。

3、若甲方未能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支付给乙方工作经费，则乙方有权主张合同延期执行或暂缓提交工作成果。

4、若甲方在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工作任务的同时，又另行委托第三人或自行承担实施工作，并不影响本合同的实际履行。

第十二条 其他特别约定

1. 乙方向甲方交付主要工作成果的形式：以书面材料及其电子版为主向甲方提交工作报告、设计方案、法律意见书及相关文件。

2、乙方工作人员严格保守所知悉甲方的秘密及其它信息。

3、本项目合同书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乙方完成项目任务提供工作成果和甲方完全支付工作经费后，合同自然终止。

甲方：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签约代表（签名）：



2018年2月1日



乙方：华南农业大学（盖章）

签约代表（签名）：



2018年2月1日



100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论文材料，委托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陈玉生 7 篇论文收录情况如下表。

| 序号 | 论文名称 | 发表刊物及发表的年月卷期/页码等 | 作者排名 | 论文等级 | 作者文中单位 | 收录情况 | 影响因子 | 中科院大类分区 |
|----|---------------------------------|--|-------------|------|---------------------------|---------------------|------|---------|
| 1 | 理论自觉的思想资源、本体创新与价值关怀——以社会运行理论为例 | 学习与实践 出版年：2020 卷期： 页码： - 文献号： 文献类型： | 1 | B 类 |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系 | CSSCI, 北大核心 | 无 | 无 |
| 2 | “民-群”视角下的社会参与层次:社区公共活动场所的集群效应研究 | 社会科学 出版年：2020 卷期： 页码： - 文献号： 文献类型： | 1 | A 类 |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系 | CSSCI, 北大核心 | 无 | 无 |
| 3 | 细事细治——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 公共行政评论 出版年：2021 卷期： 页码： - 文献号： 文献类型： | 1 | A 类 |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 CSSCI, 北大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 无 | 无 |
| 4 | 过渡社会：“民一群”视角下的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研究 |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出版年：2021 卷期： 页码： - | 1 60 | B 类 |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 CSSCI, 北大核心 | 无 | 无 |

| | | | | | | | | |
|---|----------------------|---|---|------|------------------|----------------------------|---|---|
| | | 文献号: 文献类型: | | | | | | |
| 5 | 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 | 社会科学 出版年: 2022 卷期: 页码: - 文献号: 文献类型: | 1 | A 类 |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 CSSCI, 北大核心 | 无 | 无 |
| 6 | 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根本属性与操作性定义 | 社会学评论 出版年: 2023 卷期: 页码: 文献号: 文献类型: | 1 | T2 类 |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 CSSCI, 北大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转载 | 无 | 无 |
| 7 |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农户家庭联结 | 中国农村观察 出版年: 2023 卷期: 页码: - 文献号: 文献类型: | 1 | A 类 |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 CSSCI, 北大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 | 无 | 无 |

说明: 论文等级和中科院大类分区按《华南农业大学学术论文评价方案(试行)》划分。

报告免责声明: 如未盖章, 报告无效



SRC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2023 年 3 月 -

第 2 期

第 11 卷 · 总第 62 期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专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根本属性与操作性定义

陈玉生 (5)

专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方法论危机下的问卷调查:挑战、变革与改进路径

臧雷振、徐 榕 (26)

专题:人大社会学传统

李景汉“社会调查”的现代国家想象

何钧力 (49)

我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先驱与雏形

——戴世光与呈贡人口普查试验 唐丽娜、潘 月、申艳芳 (70)

专题:基层治理

农村基层选举中的宗族博弈与社区治理

——基于全国村庄抽样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

毕向阳、肖 林、许亚敏 (91)

社会组织驱动的基层治理创新:案例观察与模式比较 付建军 (114)

权力再生产的行动伦理基础

——以北方某市幸福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为例

田志鹏、刘爱玉 (133)

论文

传统文化观念、资源交换与社会团结:一项社会学的经验考察

胡安宁 (149)

情感与秩序:以儒家情礼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向 维 (171)

“物”缘何行动?

——拉图尔的“物之社会学”考察

戴宇辰 (191)

艺术乡建:基于“利益-规范”双重目标的群体互动分析

严 俊、许北辰 (212)

“昌公道”与“励自强”:潘光旦论妇女运动及其启示

马冬玲 (237)

【专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 根本属性与操作性定义

陈玉生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现代化，但现实中人们对“社会治理是什么”缺乏共识且专门研究较少。本文对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根本属性和操作性定义进行理论研究，发现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形态可概括为“对社会的治理”“通过社会的治理”和“为了社会的治理”三种主要模式；社会治理之社会兼具目的性社会、手段性社会 and 对象性社会之特征；“社会性”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规定了社会治理的逻辑边界，并将社会治理与其他管理活动区分开来。本文认为，社会治理是指为了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的活动过程，包括目标制定、能力建设与计划实施三大治理环节。社会治理研究必须通过阐明三大治理环节中的治理主体、治理职能、治理对象的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揭示社会治理活动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为了社会；过渡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环节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为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工作明确了目标任务和行动方向，也为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理念、新视角和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习近平，2014）。龚维斌（2020）认为，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治理的内涵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也为创新社

作者简介：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史、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方法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ZDA078）。

会治理理论提出了明确要求。社会治理科学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既然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且意义重大,那么,就要科学地阐明社会治理范畴,以便科学地发现社会治理规律。但是,对于社会治理到底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冯仕政(2021)认为学术界专门讨论社会治理概念的文章数量甚少,始终缺乏能起到纲举目张地引领和指导实践作用的、具有统摄性和简约性的理论阐述。显然,具有重大政策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社会治理范畴亟须辨析清楚,否则,“无论干部还是群众在认识上仍然普遍存在困惑,因而在行动上常常陷入茫然无措甚至治丝益棼的窘境”(冯仕政,2021:1)。如果社会治理概念不清,我们就无法分辨哪些行为活动属于社会治理,无法评判社会治理的效果,无法阐明影响社会治理的因素,无法有效推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实践。概言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实践呼唤更加深入的学理支撑(洪大用,2019)。那么,如何澄明“社会治理是什么”呢?

为了解一个概念覆盖哪些经验现象,首先要对概念进行知识考古。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建设”,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三个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本质上都是要求重视以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受到忽视的‘社会’领域,因此基本可以交换使用”(冯仕政,2021:2)。在宽泛意义上,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乃至与社区营造、参与式治理、协同治理、社会政策等相关概念具有家族相似性。据此,本文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管理、欧美国家的新公共管理和中国社会治理均纳入社会治理范畴进行历史实践考察。

通过对历史实践的梳理,可勾勒出社会治理范畴能覆盖到哪些经验现象。但是,概念界定还要遵循种加属差原则,只有辨析清楚社会治理的上级范畴与邻近范畴才能明白其内涵与外延。从广义上说,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必不可少的理性活动都可以称为社会治理。因为,从个人印象管理到全球社会治理,一切针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都必然具有社会性。从狭义上说,社会治理与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家庭管理、政党统治等人类社会管理活动之间有明显区别,即社会性固然是所有管理活动的属性,但只有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

不过,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的“社会性”,可能比“社会治理”本身还

难以理解。当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属性难以理解,难以明确其覆盖到哪些具体经验现象时,操作性定义是一种解决办法。操作性定义是相对于抽象定义而言的,最早由美国物理学家布里奇曼提出。他认为科学概念不能用属性界定,只能根据作为方法的一整套有序操作来定义。操作性定义提出的目的在于解决抽象概念难以达成共识,以及难以直观地指涉科学研究对象的问题(高剑婷,2010)。基于此,本文建构了社会治理的操作性定义和分析框架,认为“社会治理是指为了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的活动过程”。

综上,本文从历史实践、根本属性和操作性定义三个层面阐述“社会治理”,旨在建构能用于描述和分析历史经验现象,能指导理论分析和实践实务的操作性概念。

二、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及其理论探究

本文考察了国外社会治理历史实践与理论成果,发现存在“对社会的治理”和“通过社会的治理”两种模式,前者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管理为典型,后者以欧美国家的新公共管理和第三条道路为典型。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综合了前两者的一些特点,其模式可以被称为“为了社会的治理”。

(一)对社会的治理:以苏东历史实践为典型

社会管理最早起源于苏联。苏联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实施社会管理,管理范围包括生产管理和劳动管理;30年代形成了狭义的社会管理理论体系,管理范围覆盖到行政管理;到六七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开始利用社会、技术、经济和法律等管理手段,对国家与社会生活等一切重要方面系统性地施加影响和进行管理(王思斌,2012;波波夫,1986:178)。

苏联提出的社会管理,实际上暗含着道路问题。第一,在有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之后,为何还要某种社会管理理论;第二,这种社会管理理论与资本主义的有何区别。马尔科夫指出,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的社会管理理论实质上是一门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其次,社会管理问题的广度和特点决定了需要设立一门独立的能进行一般社会管理理论研究的学科(奥马罗夫,1987:20)。那么,社会管理到底管理什么呢?理论研究上有

两大取向。

第一,以“社会”为取向。奥马罗夫(1987:27)强调了人作为社会管理的“第一对象”,并因此指出管理具有阶级性。波波夫(1986:176)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列举了7类社会管理对象:整个社会;社会的主要领域;最重要的一些社会过程,它们既具有综合的性质(如城市与乡村接近),也在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发生;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国家领土;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社会共同体——人民、阶级、民族、少数民族、阶层和集体。

第二,以“管理”为取向。克托夫认为,社会管理科学应该研究管理关系、管理过程、管理机制和管理行为;揭示管理社会的特殊组织和结构;研究和制定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社会管理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奥马罗夫,1987:28)。奥马罗夫(1987:27)认为,社会管理是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具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社会系统实现它的目标和任务。马尔科夫(1988:6)认为,社会管理理论可以分成若干单独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揭示了管理理论的对象和功能,主要内容是:管理的社会关系;管理的客体和主体;领导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管理的方法和方式;管理技术;管理决策的实质和结构;大系统的管理和组织。

总体而言,苏联东欧模式试图找到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规律,强调国家机关、社会机构或人民政权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强调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作为管理目的,同时强调学科研究追求科学性和客观规律性。苏东国家的社会管理是一项国家工程,体现了国家对全社会进行系统筹划。可以说,该模式是“对社会的治理”的典型代表。

(二)通过社会的治理: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典型

众所周知,二战后数十年,欧美国家实施高福利政策,负担越来越重。为此,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政府实施一系列改革举措,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断从政府剥离,交给市场与社会。这时期的“治理”至少有六种不同的含义:作为最小政府的治理、公司治理的治理、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善治”的治理、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自组织网络的治理(罗茨,2000)。

那么,如何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呢?对此,学术界形成了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威权主义三大理论范式。多元主义主张国家、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国家治理,各主体通过自由竞争方式进行谈判、

获得资源和供给公共物品,国家主要扮演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角色。该理论致力于阐明社会治理从“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的转变。法团主义批判多元主义导致了“多元”治理主体过度竞争,强调社会组织之间的联通和有序合作,主张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整合和引领作用。该理论致力于阐明多元治理主体从“分化”治理向“合作”治理的转变。威权主义批判法团主义的合作因主张多元主体“议价”与“谈判”而可能引致“不稳定性”风险,倡导多元主体充分融合与合作,主张“把国家找回来”及发挥国家在治理中的能动作用。该理论致力于阐明多元治理主体从“合作”治理到“融合”治理的转变。

概言之,三大理论范式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理论渊源,但彼此间具有非常明显的逻辑关系。多元主义主张多元社会治理主体自由竞争,但对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整合无能为力;法团主义主张各主体高度合作与融合发展,因此促进了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联通;威权主义则进一步强调国家在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组织联通、融合、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逻辑关系看,从多元主义到法团主义再到威权主义治理模式,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之间的组织化程度和体制化程度不断增强。

但是,三大理论范式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是本质上都是国家治理事务社会化的理论方案,均强调通过整合社会力量来供给公共物品,以满足越来越多元的社会需求。二是在动力上均为国家主动推进国家自身与非国家主体之间合作,实施逆向管理,从而克服国家一元治理困境。三是承认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存在,并致力于培育社会组织。四是培育的社会组织既是“民”集聚成“群”的模式,也是供给公共物品的路径。与苏联东欧模式不同,欧美模式的出现并非源于道路问题,主要是源于现实问题,即政府一元主体回应社会需求能力不足的问题。该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将公共事务通过外包等方式从政府部门剥离出去,交给企业或者社会组织,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这些由第三条道路和新公共管理等理论阐明的社会治理,是典型的“通过社会的治理”。

(三)为了社会的治理:以中国历史经验为典型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和理论体系日臻成熟,当前社会治理正在迈向更加“完善”的高水平发展阶段。杨光斌(2015)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治国理政时从中华文明基体论出发,以改革为方法、以公正价值为导向,努力将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相适应,以使以民主集中制为内核的中国模式成为更具竞争力的政治思想体系。

那么,如何从理论上阐明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治理理论兴起后,学术界围绕中国经验,参照西方理论,展开了深入持久的理论研究。徐勇、吕楠(2014)认为,应该在特定的背景下去理解“治理”的含义,提出治理是政治主体运用公共权力及相应方式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推进过程。这一概念包括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成效如何三个维度的内容,从概念所含内容结构来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关于社会治理的含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概括而言,大致形成了三种理论取向。

第一,管理取向的社会治理。该取向主要体现在早期社会治理研究阶段,主要特点是对社会治理概念的界定带有非常明显的公共管理理论底色。比如,肖文涛(2007)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来论述社会治理的政策选择;杨雪冬(2007)从社会风险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来谈风险应对的治理体制;刘旺洪(2011)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来谈社会治理的法制化路径;张康之(2004)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王浦劬(2014)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角度阐释了各自的含义,认为社会治理即“治理社会”,指的是特定治理主体对社会实施的管理。

第二,合作取向的社会治理。该取向主张在原先以党政单一主体为主导的管理格局下,更加重视党政、市场、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郑杭生,2014)。李培林(2014)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共治局面,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杨敏(2011)从“政府-企业-社会”合作的角度论述了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范如国(2014)从复杂系统的视角阐释了协同社会治理创新的范式转型;张康之(2016)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角度阐述了合作行动与合作治理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历史逻辑。

第三,权利/服务取向的社会治理。姜晓萍(2014)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审视社会治理的内涵及其价值,认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活力、安定

有序是社会治理的本质诉求,社会治理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众的权利为核心;陈振明(2014)从社会服务、激发社会活力等方面阐释社会治理的内涵;王思斌(2014)从服务型治理的角度阐释了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机制。

不难看出,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既强调“对社会的治理”,也强调“通过社会的治理”,结合了苏东与欧美两种模式的相关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些内容是中国社会治理主题的高度概括和特色的鲜明体现。“共建共治共享”是中国社会治理的特色之一,其中,共建是基础,共治是保障,共享是目的,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既兼顾社会发展、社会秩序、社会分享,又倡导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相对而言,中国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建设”理念,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出发点是社会建设,支撑点是社会安全,落脚点是人民福祉,所以,可称为“为了社会”的治理。

(四)经验覆盖:社会治理的历史建构

综上,三种治理模式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首先,差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治理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对社会的治理”模式旨在解决国家对社会的管理问题,强调科学系统地规划设计社会,从而实现社会的整合与秩序;“通过社会的治理”模式旨在解决国家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强调社会力量承接政府剥离出来的公共职能;“为了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时包含着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双重价值取向,强调社会建设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所不同,“对社会的治理”模式中,国家力量相对强大,社会力量相对较弱;“通过社会的治理”模式中,国家力量相对较弱,社会力量相对较强;“为了社会的治理”模式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体现了协同共治和具体事务中的优势主导作用。比较而言,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分别体现了对象性社会、手段性社会、目的性社会的特点。

其次,三种治理模式在背景、目的、方式等方面有相似的逻辑。(1)适应社会发展: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治理受到挑战,难以回应社会保障和社会需求,因此,社会问题国家化成为历史必然。(2)激发社会活力:现代国家的建立赋予政府回应社会大众需求的使命,但随着社会需求

和社会问题逐渐增多,一元政府越来越难以应对,故三种社会治理模式都力图激发社会活力,以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参与,供给更多公共物品。(3)体制机制创新:三种社会治理模式均创新了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如系统论的运用、政府购买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等。与此同时,三种治理模式相关理论研究基本围绕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等展开,讨论了一元主体治理还是多元主体治理、党政主导治理还是协同/合作治理、管理为主还是服务为主等治理模式的取舍问题。

但是,从本研究主题看,人们对“社会治理是什么”的问题仍然缺乏共识。一是对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阐述不明,导致其内涵、外延不清晰。二是对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指代不清,以致在“社会”是治理客体还是治理主体这一问题上出现理论争议。三是对社会治理中“治理”内涵的分析不清楚,使得对作为一项人类活动的社会治理,始终难以形成科学的认识。四是对为何实施社会治理的理论阐述侧重宏观社会,缺乏对中微社会治理的价值分析,以致难以指导具体的治理实践。因此,历史实践虽然为认识社会治理的内涵外延提供了经验基础,但就概念界定而言,不同实践模式因侧重社会治理的某些维度而偏废了另一些维度,均预留了“剩余范畴”,需要进一步从逻辑上进行分析。

三、社会性: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

从逻辑上看,概念界定要遵循种加属差原则。从“种加”角度看,社会治理属于管理活动,这在逻辑上比较容易理解,易达成共识。但是,从“属差”角度看,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其他管理活动有哪些,社会治理与这些管理活动相比有哪些根本属性上的差别,目前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一些研究在逻辑上比较难以理解,也难以形成共识。本研究认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为何说“社会性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呢?如何认识社会治理的社会性呢?

(一)所有管理活动都具有社会性

随着管理学的发展,管理活动中的社会性因素不断被发现。第一,管理效率关涉社会性,如霍桑实验中,参加实验的光荣感、成员间良好的社会关

系、非正式群体等社会因素对工作效率有重要影响。第二,管理内容具有社会性,如直销管理中,直销员通常将产品组织到社会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亲属关系中构建有效的营销网络。第三,管理主体具有社会性,如资本主义生产管理向社会化发展,出现“自我管理的工作班组”,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管理活动。第四,管理产物关涉社会性,如治水管理孕育国家说认为,治水活动不断形成治水管理组织,这些组织进而演化成部落联盟和国家。第五,管理背景关涉社会性,如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第六,管理中的隐性资源关涉社会性,如人的社会性和构成社会底蕴的道德文化资源等日益成为管理学的研究重心,并成为管理活动关注的焦点,虽然那些如企业生产管理导致的工人精神焦虑、人际关系恶化或社会认同感丧失等通常会被忽视。

管理学通常被当作自然科学,尤其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那时管理活动中的社会性因素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和深入考察。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几乎所有管理活动皆与社会日常生活相关,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活动;管理学实为社会科学,是有关管理活动与社会的知识。实际上,从生产管理到营销管理,从微观的车间工人管理到宏观国家经济管理,从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到全球人类生存环境发展战略规划,无不包含着社会性。广义而言,以管理活动的社会性和管理活动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为管理社会学。

(二)既有社会治理研究均强调社会性

社会治理在逻辑上属于管理社会学范畴,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性。从上述历史实践看,社会治理是近现代国家治理由代理人治理向参与式治理演进的表现形式,是国家治理社会化的产物。社会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和处理国家溢出的公共事务或社会事务。从这个角度考察既有研究,可概括出社会治理中的三种社会性。

(1)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性——国家溢出的事务由谁处理。人们强调不同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强调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事务乃至人类共同事务参与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协同共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权状态(包括分工状态)下的协同共治,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在基层社区居委会体制等制

度设计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责权利有明确的区分或不均等性,该制度设计强调不同治理主体在职能分工和角色互补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另一种是平权状态(包括混沌状态)下的协同共治,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以及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制度设计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责权利边界模糊,该制度设计强调不同治理主体在价值共享和权责共担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但是,不管哪种社会治理体制设计,都是有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协作方式的构建。

(2)社会治理内容的社会性——国家溢出了哪些事务给社会。这里形成了“仅政府未能妥善处理的公共事务归社会治理”及“凡是社会能自我处理的公共事务皆归社会治理”两种价值取向。当然,国家溢出的公共事务显然不是静态的,社会治理事务在实务中可能不断被发现和生产,承接溢出事务的主体也不是机械地应对这些事务。

(3)社会治理方式的社会性——国家溢出的事务怎么处理。社会治理首先涉及治理手段的理性原则,这需要遵循管理学的一般原则和理论基础;其次涉及治理手段选择的价值原则,如强调柔性管理还是刚性管理,强调服务还是管控等。从社会性角度看,社会治理方式区别于“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监督”等一般管理职能,包含社会调查、社会规划、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社会参与、社会慈善、社会互助、社会服务、社会营销、社会企业、社会监督、社会控制等。因此,社会治理方式的社会性体现在日常社会这一微观层面。

正因为国家溢出事务的治理行为具有社会性,所以社会治理被大多数人界定为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系统进行干预的社会行动过程。但仅限于如此理解,社会治理理论则会陷入像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和威权主义理论范式一样的困境:一是过度强调社会治理的体制问题,局限于多元治理主体治理关系的模式建构;二是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局限于从国家权力角度探讨社会治理到底是服务、管理还是治理。总体而言,人们给予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更多关注,而对社会治理的内容、目标和职能问题的研究则不够。

(三)社会性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

那么,如何治理国家溢出的事务?答案显然是多元社会主体来应对国家溢出的事务,于是就有了社会治理。那么,多元社会主体如何治理呢?从

上述分析可见,以往社会治理研究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一是致力于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治理在整个人类治理活动中的地位正名;二是致力于讨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如何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提供模式和体制框架。这些研究工作对治理主体嵌入社会开展治理活动提供理论支撑,但因过度关注治理的“社会”端而忽略了其“治理”端,导致当前社会治理理论存在逻辑漏洞。

为填补这些逻辑漏洞,理论研究需要同时从“社会”和“治理”两端入手,并且要强化对“治理”端的认知。具体办法就是将“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三个问题中的“怎么治理”进一步细分为“为何治理、凭何治理、如何治理”三个问题。“怎么治理”实属治理职能问题,细化后,“为何治理”对应诊断和规划社会职能,“凭何治理”对应发展和发动社会资源职能,“如何治理”对应服务、监管、建设社会职能。通过把社会治理细化为“谁来治理、为何治理、凭何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什么”五大问题,笔者在“社会”和“治理”两端建立起分析范畴(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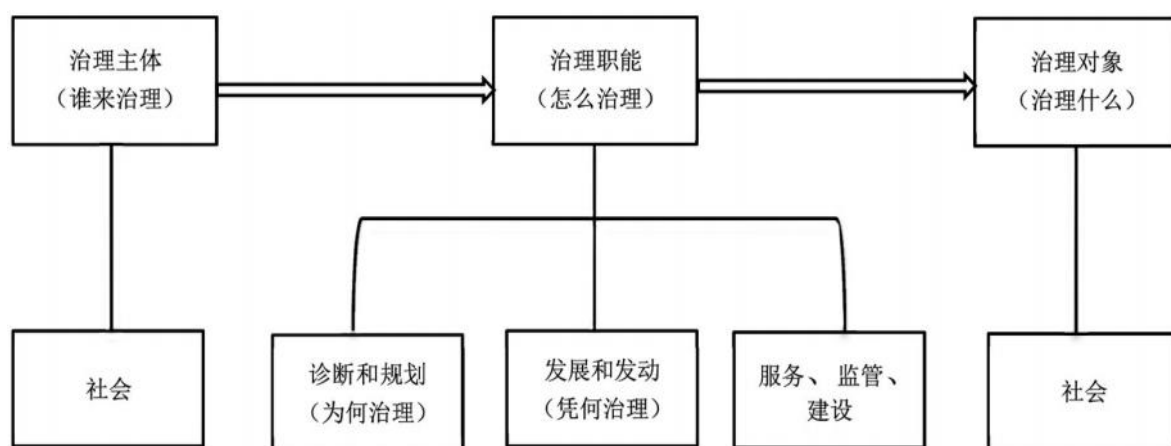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治理主体、治理职能与治理对象结构图

接下来,笔者以该图为基础,首先探讨社会治理的社会性,然后探讨社会治理的操作性定义和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的三大职能均关联“社会”。广义而言,“所有管理活动都具有社会性”,但狭义而言,行政管理、工商管理、家计管理、政党统治等管理活动,其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并不必然关联“社会”。比如,行政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工商管理的主体主要是经理人,家计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家庭成员,政党统治的主体主要是党魁、统治集团或利益集团,这些管理活动的主

体有资格限制,并非多元主体。然而,社会治理蕴含着“多元治理主体”,其治理的目标、对象、资源条件等均关联“社会”。社会治理涉及“谁来治理、为何治理、凭何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等问题的不同维度,其均具有社会性。

社会性虽然不是社会治理的独有属性,但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首先,社会治理理论普遍宣称社会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比如,政府可以监督企业,企业员工则享有民主监督和管理的权利,但少有耳闻“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企业管理。我们很少宣称行政管理、工商管理、家计管理、政党统治是多元社会主体实施的管理。其次,社会治理理论非常关切社会公平和个人权益,其宣称的治理目标指向特定社会,而其治理手段则指向不确定的社会。社会治理职能具有非常明显的“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特点。最后,从“社会治理”的语义看,治理是中心词,社会是限定词,社会治理之“社会”规定了社会治理之“治理”的特性。概言之,社会治理因“社会性”而与行政管理、工商管理、家计管理、政党统治等其他管理活动区别开来。

那么,社会性是指什么呢?首先,这里的“社会”可以认为是民集聚成群的形态与过程(陈玉生,2020a,2020b)。它可以是具有一定空间区域的群众生活领域,像社区、城郊接合部、农村;可以是某种不限于特定空间区域的社会系统或领域,如全国社会组织领域、广州市中小学校、广州市各执法部门和机构、秘密会社;还可以是特定区域中的全体人口、老年人口、黑社会犯罪群体、流动人口、流浪儿童等具有某种类属身份的群体。因此,社会性表征为社会个体的联结性和集群性,是相对于个体性和自然性而言的。其次,这里的“社会”可更具体地表征为与政治和经济领域相对应的生活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政治和经济领域属于系统性整合,生活领域属于社会性整合(杨礼银,2019)。社会性既指涉社会领域,区别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又指涉沟通理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区别于权力与货币媒介联结的系统世界。社会治理主体和对象在政治和经济系统世界之外。因此,社会性是既相对公共性,又相对系统性而言的。

为什么针对国家溢出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具有社会性呢?从历史实践看,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继政府和市场之后成为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这个过程可称为“公共性的社会化”。西方国家实施福利制度,对社会个体“从摇篮到坟墓”都保障起来。我

们将这个过程称为“社会性的公共化”。正是在“社会性的公共化”历史实践陷入困境之后,“社会”在“公共性的社会化”历史实践中,重新承接国家溢出的原本属于社会自治领域的事务。但是,在“社会性的公共化”向“公共性的社会化”转变之后,支撑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系统性的权力媒介和货币媒介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延伸到社会领域和生活领域,发挥着撬动志愿服务、社会慈善、企业社会责任等社会力量的杠杆作用,成为刺激社会自身组织起来回应自身需求的重要手段。最终,“社会”成为“诊断规划、发展发动、服务监管建设”自身的主体和力量,社会自身兼具对象性社会、手段性社会、目的性社会之特性,社会治理之社会性同时体现在治理之对象、治理之手段、治理之目的三方面。

社会治理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各治理职能,还体现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之“社会”的多元性。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如果从目标设定、能力建设到计划实施的治理主体均为政府部门,即使其以社会作为治理对象,我们也不能称其为社会治理,而只能界定为国家治理或公共管理。任何缺失社会主体而由政府或者市场主体提供公共物品的治理活动,都不具有社会性之根本属性,故不属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主体具有非常明显的多元性特征。从社会治理过程看,社会治理主体包括诊断和规划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之主体。不同社会治理环节和职能可以由单一主体实施或多元主体协同实施;同一社会治理环节和职能也可以由单一主体或多元主体协同实施。对特定社会区域的社会群体,或者特定身份的社会群体实施社会治理,因治理目标复杂多样,通常由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

那么,多元治理主体如何集群,又会形成怎样的集群形态呢?多元治理主体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实施社会治理,按照职能分工形成相对稳定的治理关系时,社会治理格局就形成了。当多元治理主体不仅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而且能够使彼此的治理行为和权利义务关系不断规范化、制度化,使治理活动不断组织化、常规化时,社会治理体制就形成了。多元治理主体不仅通过外在的制度规范集结在一起,参与治理的多元组织相互联通,参与治理的成员之间彼此联结;而且他们共享有关社会治理之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参与治理的成员由内在的共同信念集结在一起时,他们就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当治理共同体成员不仅包括治理主体的成员,还包括治理对象之社会成员,并且他们都能够互相联通并共享价值观念,为

“为了社会”之理想凝聚共识、为各治理职能协调行动之时,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便形成了。协同共治的多元治理主体拥有相对稳定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如治理活动有法律保障,治理行为有信息技术支撑,治理决策有民主参与机制,治理实践有平台阵地,从而保障了社会治理合理开展,社会治理体系便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主体、制度、机制、手段、平台等多元治理要素的结构综合和功能综合。

综上,社会治理是市场和政治系统不能处理现代公共事务的后果,社会治理之“社会性”是公共事务处理去“系统性”的产物。社会性融贯在社会治理活动的全过程,体现在“对社会的治理、通过社会的治理、为了社会的治理”三大实践模式中,贯穿了“谁来治理、为何治理、凭何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五大问题,覆盖了治理主体、治理职能和治理对象三个层次,故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

四、治理环节:社会治理的操作性定义

从实践来看,社会治理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它既不是有关社会整体的管理活动,也不是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替补,而是社会的自我治理。从逻辑上讲,在社会治理中,社会自身要组织起来回应自身需求,既要同时扮演对象之社会、手段之社会、目的之社会三种角色,又要同时解决“谁来治理、为何治理、凭何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五大问题。那么,如何从这些复杂范畴中发展出一个描述“社会治理”现象的操作性定义和分析框架呢?

笔者结合自身十余年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经验,认为社会治理是指为了社会,(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的活动过程(陈玉生,2019)。笔者发展这个概念的最初目的是帮助学生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者更好地理解社会治理。这个概念是对社会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职能、治理对象三个治理维度,以及“谁来治理、为何治理、凭何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五大治理问题的逻辑综合,内涵较丰富。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将社会治理分解为三个环节来阐明,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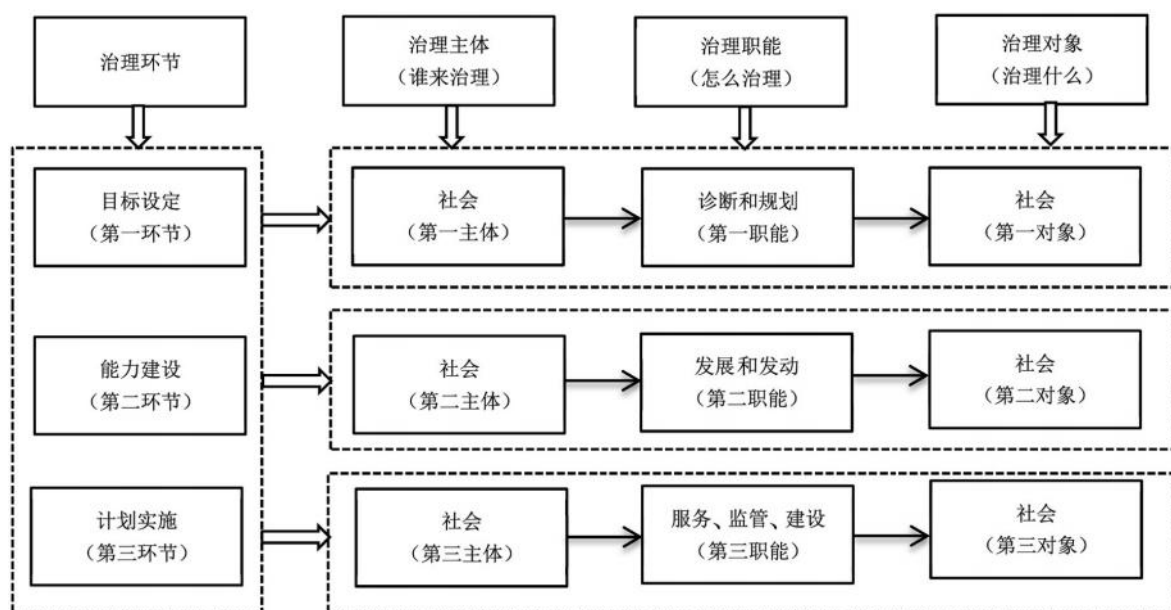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一）第一治理环节：目标设定

“目标设定”环节对应社会治理概念中的“为了社会”，涵括第一治理主体“社会”、第一治理职能“诊断和规划”和第一治理对象“社会”三个维度。

与其他管理活动一样，社会治理也是一项理性的社会活动，其目的可表达为“为了一种社会状态的实现”。这里的“社会”可以是诊断规划社会的设计者、策划者、规划者等第一治理主体明确意识到或阐明的，也可以是未曾意识或言明的，但可以转化为某种社会想象，如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社会想象是一种期望的社会状态，是针对具体的现实社会而言的。这里的“为了”，由第一治理主体阐明，它可以是明确以公共秩序或群众利益为目的，也可以是具有私人目的之名却有公共目的之实。

“为了社会”承载着人类的梦想，可以是某种社会标准或具体理念，如将基尼系数控制在0.4以下、获得“文明社区”荣誉称号、“让捐赠变得便利”。它表达的是社会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的蓝图，是社会治理的动力和方向。因此，第一治理对象虽然指向现实社会，但最终指向的是与现实社会相对应的想象社会和镜像社会。想象社会是由第一治理主体建构出来的，镜像社会是由现实社会映射出来的。想象社会和镜像社会在逻辑上包含五种类型：(1)继续维持现有社会；(2)接受一种新型社会；(3)拒绝某种潜在社会；(4)改善目前社会状态；(5)变革现有社会。社会治理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将现实社会建设成想象社会和镜像社会。因此，“为了社会”涵括诊断

现实社会,想象、设计、规划出目标社会,维护、改良、创新或变革现实社会状态,对应“为何治理”问题。

(二)第二治理环节: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环节对应社会治理概念中的“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包括第二治理主体“社会”、第二治理职能“发展和发动”和第二治理对象“社会”三个维度。

在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中,计划制定后即进入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监督等计划实施环节,很少涉及实现管理目标的人财物等资源的获取问题。因为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为公共管理提供了资源保障;工商企业本身就是价值创造主体,其管理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现有资源手段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典型的系统性整合。然而,以社会组织为主的社会治理主体既无营利能力,又无强制征纳资源的权力,因此需要“能力建设”环节,通过“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解决“凭何治理”问题。这是典型的社会性整合。并且,社会治理主体只能通过如社会动员、社会游说、社会商谈、社会营销等方式,利用道德、宗教、伦理、舆论等手段,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从社会获取资源的具体方式主要有发展社会力量和发动社会力量两种。发展社会力量是指社会资源的增量培育,发动社会力量是指社会资源的存量整合。

社会力量中的“社会”通常指相对于政府的其他社会主体或社会设置,如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市场等;社会力量中的“力量”通常指社会主体或社会设置所拥有和所能支配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力量的总称(吴宗宪,2008;任文启、杨容城,2021)。有形力量包括人力(村/居委会干部、社工、志愿者、选民、示威者等)、财力(私人捐款、政府补助、企业赞助、会员费、慈善组织捐款等)、物力(场地、机械设备、家具和用品等)等;无形力量包括制度、道德、宗教信仰、民意、社会舆论等精神力量。因此,此处社会力量指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所拥有或所能支配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

履行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职能的社会治理主体,可以是任何社会主体,如个体、企业、政府、政党、社会组织、非正式群体、临时组建的社会治理团队等。社会治理不限于单个社会主体对管理权限的垄断,因此区别于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政党治理、独裁统治;也不限于单个社会主体对管理活动的主导性,因此区别于新公共管理思想阐述的政府主导多元社会组织进行的社

会治理。此外,组织化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的典型特征,在社会治理中,非正式社会组织也可以成为治理主体。社会治理主体也不限定为常设组织,可以是临时组织——可以因特定社会治理事项而设立或解散。仅此可见,社会治理有非常明显的集群性和非系统性。

社会力量整合之后,通过第三治理职能“服务、监管、建设”社会的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使其最终回归社会。所以,社会治理之社会力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然,也需要对社会力量进行疏导和防范,面对丰富的社会力量,需要采取冷静和谨慎的态度,不可随便发动。某些社会治理主体怀着某种“为了社会”信念,不顾后果地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可能导致各社会力量失衡,导致社会失序。社会治理需要确立一个原则: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必须以人道的方式,必须优先考虑大多数人“为了社会”之理想,必须维护社会生活本身。

(三)第三治理环节:计划实施

“计划实施”环节对应社会治理概念中的“服务、监管、建设社会”,包括第三治理主体“社会”、第三治理职能“服务、监管、建设”和第三治理对象“社会”三个维度。

目标设定和能力建设之后是实施环节,三个环节相互呼应、互相关联。首先,第一环节中的第一治理对象与第三环节中的第三治理对象相互呼应。从时间轴上看,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服务、监管、建设的“社会”是“现在时”的社会,为了社会中的“现实社会”是“过去时”的社会,“想象社会与镜像社会”是“未来时”的社会。因此,此处社会是向想象社会和镜像社会转变的社会,实为“过渡社会”;相应地,人为干预的、过渡中的社会运行过程,实为“过渡社会治理”。由此逻辑可推定,社会治理一旦启动,实为过渡社会治理。通过“服务、监管、建设”社会,创建出与“为了社会”中想象、设计、规划出来的目标社会相对应的现实社会——一种在理性的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其次,第二环节中的第二治理对象社会力量与第三环节的第三治理主体相互呼应。计划实施环节将能力建设环节中发展和发动的“社会力量”直接施加于现实的目标社会,从而促成目标设定环节中“为了社会”之理想的达成;其行为活动通常直接面对社会大众,是社会治理中社会想象实现的过程。“服务、监管、建设”社会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在结构上匹配。社会治理对象的目标,可以是某个需要公共服务或社会服务的群体——需要“服务”和“共享”;可以是某个需要培育社会资本和社区——需要“建设”和“共建”;可以是某个需要加强安全建设和秩序规范的区域——需要“监管”和“共治”。社会治理除了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活力”外,还要建设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

但是,并不是所有服务、监管、建设社会的行为活动都属于社会治理。比如,家庭养老,它只有在比家庭更大的群体中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模式选择时,才具有社会治理的意义,否则只是某个家庭特有的赡养行为;当企业为员工存储养老年金,或要求员工做职业生涯规划,即使这个企业规模很大,但如果该类行为没有超出其范围,在更普遍情况下作为解决社会养老金问题的模式选择,或作为解决社会个体管理问题的模式选择时,就不能被称为社会治理。

综上,社会治理之“治理”自有其独特的环节和职能。那么,如何评价社会治理职能的实现程度呢?社会治理旨在实现“为了社会”目标,然而,一项社会治理活动,既可能投入很小,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撬动巨大的社会力量,促成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并形成蝴蝶效应,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可能不断投入资源,耗费巨大社会力量,导致沉默成本和负外部性增加,却没能达成“为了社会”之治理目标。社会治理主体履行社会治理职能,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环节和社会治理全过程的有效管理,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诸要素的效用,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实现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的目标。社会治理主体的履职能力,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从社会治理环节角度看,社会治理能力是指社会治理主体在履行诊断规划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之社会治理职能过程中,能够协调控制社会治理过程,促成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并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五、结 论

本文综合运用知识考古学、理论分析和操作性定义三种方法考察社会治理实践与理论,建构社会治理概念和分析框架。从历史实践看,社会治理是近现代国家治理职能社会化的表现,是国家治理中融入参与式治理的结果,目的在于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应对不断增多的社会事务或公共事务,至

今产生了以苏东国家为典型的“对社会的治理”、以欧美国家为典型的“通过社会的治理”和以中国为典型的“为了社会的治理”三种主要治理模式。三种治理模式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差异。从理论分析看,社会性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表现为个体的集群性,是相对于个体性、自然性、公共性和系统性而言的。社会治理中的治理主体、治理职能及治理对象三个维度,以及诊断和规划、发展和发动及服务、监管、建设社会三大职能,都充分体现了社会性,社会性贯穿于社会治理活动的全过程。社会性将社会治理与其他管理活动区分开来,为社会治理勾勒了清晰的边界。从操作性定义看,社会治理是指为了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的活动过程。在此概念基础上,本文建构了目标设定、能力建设、计划实施三大社会治理环节及其构成的分析框架,并将治理主体、治理职能、治理对象涵括其中。建构该分析框架的目的在于阐明社会治理概念所覆盖的经验现象的内在构成元素及其逻辑关系,使社会治理经验现象显现出来,为科学评判社会治理现象提供理论工具。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治理科学化。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治理旨在考察一个个想象社会或镜像社会的实现过程。社会治理实为推动社会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治理,即过渡社会治理。为了实现“为了社会”、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目的,人们以集体良知、社会秩序和美好社会生活构筑社会治理学的理论追求,将社会化育结合到管理艺术中。人们将想象社会与现实社会加以对比,从而诊断社会、规划社会;通过合理有效地聚集具有无限资源的社会的社会力量并将其注入现实社会,最后建构出想象社会。社会治理过程可分为诊断规划社会、发展发动社会、服务监管建设社会三大治理环节。三个治理环节中的社会分别体现了对象性社会、手段性社会、目的性社会之特性。社会治理要研究的,就是这种社会资源的合理采集与合理利用,以及以之弥合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差距的社会行动过程。社会治理学本质上是以人类为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进行的行为活动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客观规律的一门学科。它要求我们始终看到,一边是社会力量的输出,一边是社会力量的输入,以及在其间忙碌的人们、困惑的群众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由此而实现的合理化的社会力量的生产、聚集和转移。

参考文献:

奥马罗夫, A.M., 1987, 《社会管理——某些理论与实践问题》, 王思斌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波波夫, С.И., 休休卡洛夫, В.Й., 1986, 《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 赵承先、蔡林海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陈玉生, 2019, 《社会治理社会化: 桂城社区治理的精神气质》, 谭建光、麦绍强编著《关爱十年》,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 2020a, 《理论自觉的思想资源、本体创新与价值关怀——以社会运行理论为例》, 《学习与实践》第3期。

——, 2020b, 《“民-群”视角下的社会参与层次: 社区公共活动场所的集群效应研究》, 《社会科学》第12期。

——, 2022, 《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 《社会科学》第11期。

陈振明, 2014, 《社会控制、社会服务与激发社会活力——社会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范如国, 2014, 《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冯仕政, 2021, 《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 从连接到团结》, 《社会学研究》第1期。

高剑婷, 2010, 《操作主义可操作吗? ——对操作性定义理论的历史梳理与个案分析》,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龚维斌, 2020, 《多维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现代化》, 《行政管理改革》第10期。

洪大用, 2019, 《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更加深入的学理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1期。

姜晓萍, 2014,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中国行政管理》第2期。

李培林, 2014, 《社会治理与社会体制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刘旺洪, 2011, 《社会管理创新: 概念界定、总体思路和体系建构》, 《江海学刊》第5期。

罗茨, 罗伯特, 2000, 《新的治理》,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尔科夫, M., 1988, 《社会管理学》, 俞仲文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任文启、杨容城, 2021, 《社会力量如何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从立法、实践和社会工作介入策略角度解读》, 《中国社会工作》第13期。

王浦劬, 2014,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 《社会学评论》第3期。

王思斌, 2012, 《论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的协同作用》, 《东岳论丛》第1期。

——, 2014, 《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吴宗宪, 2008,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法学评论》第3期。

习近平, 2014,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 《群众》第8期。

肖文涛, 2007, 《社会治理创新: 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 《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

徐勇、吕楠, 2014,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

杨光斌, 2015,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延续》, 《行政科学论坛》第2期。

杨礼银, 2019, 《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中共同体的三个基本层面》, 《哲学研究》第10期。

杨敏, 2011,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河北学刊》第2期。

- 杨雪冬,2007,《改革路径、风险状态与和谐社会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
- 张康之,2004,《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2016,《论社会治理从民主到合作的转型》,《学习论坛》第1期。
- 郑杭生,2014,《“理想类型”与本土特质——对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学分析》,《社会学评论》第3期。

The Practical Pattern, Fundamental Attribute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HEN Yu-sheng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 issue of “what is social governance” lacks consensus, and specialized research is rare.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fundamental attribute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social governance can be summarized as three main modes: “governance to society”, “governance by society”, and “governance for society”. “Society” in social governance activiti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urposive, instrumental, and targeted society. “Sociality” is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 of social governance, drawing the logical boundaries between social governance and other governance practices. Social governance refers to the activity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d mobilizing social forces, serving, supervising, building society, and finally building an ideal society through “society”. Social governance includes three parts: target setting, capacity building and plan implementation. In such three parts, we can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nternal logic links of the governance subject, governance function, and governance object to explain the objectiv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activities.

Keywords: for the society, interim-society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link

(责任编辑:张小菲)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双月刊 2023年第2期(总第62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编辑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心主任：徐拥军
总编辑：高自龙

主编：冯仕政
副主编：陆益龙 王水雄 谢桂华 闻翔
特约审稿：顾海娥

编辑部地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社会学评论》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872
编辑部电话：010-82502956、82502950
电子信箱：src2013@vip.sina.com
网址：http://src.ruc.edu.cn

出版日期：2023年3月20日
印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80-91
订购：全国各地邮局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市场部
订购电话：010-82503412、82503029、82503438、82503439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人大支行
户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账号：3441 5603 1742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际书店号码：CP181

广告热线：010-62514919
广告发布登记证：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128号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59号文化大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网址：http://zlzx.ruc.edu.cn

国内定价：58.00元
国外定价：30.00美元

微信服务



ISSN 2095-5154



新华文摘

【半月刊】



14 2023
ISSN 1001-6651

**新时代十年我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重大创新与成就** (魏礼群)

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新制度文明 (郑功成)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李 扬)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 (赵义良)

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 (王昌林 等)

论明清时期的早期市场经济 (张明富)

九重葛 (邵 丽)

毛泽东的诗词观——读书札记 (梅 岱)

永远陪着我——回忆母亲段晴教授 (石 头)

**成就与预警：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
思考** (邬大光)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新范式：
从 AI4S 到智能科学** (王飞跃 等)

加速社会与群聚传播：信息现代性的张力 (隋 岩 等)

爱的生理学 (史蒂文·费尔普斯 等)

作为社会思想与记录社会变迁的社会调查 (王天夫)

新华文摘

半月刊

2023·14
创刊/1979年1月

【总第 770 期 · 2023 年 7 月 20 日出版】



微信公众号

主管单位：国家新闻出版署
主办单位：人民出版社
编辑出版：新华文摘杂志社

社长：李春生
总编辑：喻阳
副总编辑：王善超
副社长：刘仲翔

编辑部电话：(010)65132880
传真：(010)65132880
市场部电话：(010)65170515

邮购热线：(010)65170515
地址：北京隆福寺街99号金隆基大厦
邮编：100706
网址：<http://www.xinhawz.com>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2-244（小字本：2-243）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政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00044 北京车公庄西路35号）
国外代号：SM7
国内统一刊号：CN 11-1187/Z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1-6651
广告登记：京东市监广登字20200028号
定价：19.00元（小字本：16.00元）

政治

新时代十年我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创新
与成就

魏礼群 1

关于强化预警响应做好应急准备的几点思考

黄明 4

基层治理中的群团组织：组织社会的
嵌入型桥接

褚松燕 11

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新制度文明

郑功成 15

迈向人民的田野调查

麻国庆 20

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根本属性与
操作性定义

陈玉生 22

新华观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理论逻辑与
实践路径

李扬 25

中国基金业现状、主要问题与
改进措施

俞彬 金雪军 钱美芬 29

ChatGPT：强人工智能时代的里程碑

史爱武 34

新华文摘 · 2023 | 14

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根本属性与操作性定义

陈玉生

本文从历史实践、根本属性和操作性定义三个层面阐述“社会治理”，旨在建构能用于描述和分析历史经验现象，能指导理论分析和实践实务的操作性概念。

一、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及其理论探究

本文考察了国外社会治理历史实践与理论成果，发现存在“对社会的治理”和“通过社会的治理”两种模式，前者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管理为典型，后者以欧美国家的新公共管理和第三条道路为典型。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综合了前两者的一些特点，其模式可以被称为“为了社会的治理”。

（一）对社会的治理：以苏东历史实践为典型

社会管理最早起源于苏联。苏联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实施社会管理，管理范围包括生产管理和劳动管理；30年代形成了狭义的社会管理理论体系，管理范围覆盖到行政管理；到六七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开始利用社会、技术、经济和法律等管理手段，对国家与社会生活等一切重要方面系统性地施加影响和进行管理。

那么，社会管理到底管理什么呢？理论研究上有两大取向。第一，以“社会”为取向；第二，以“管理”为取向。总体而言，苏联东欧模式试图找到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规律，强调国家机关、社会机构或人民政权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强调人

民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作为管理目的，同时强调学科研究追求科学性和客观规律性。苏东国家的社会管理是一项国家工程，体现了国家对全社会进行系统筹划。可以说，该模式是“对社会的治理”的典型代表。

（二）通过社会的治理：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典型

众所周知，二战后数十年，欧美国家实施高福利政策，负担越来越重。为此，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政府实施一系列改革举措，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断从政府剥离，交给市场与社会。这时期的“治理”至少有六种不同的含义：作为最小政府的治理、公司治理的治理、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善治”的治理、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自组织网络的治理。

那么，如何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呢？对此，学术界形成了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威权主义三大理论范式。三大理论范式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理论渊源，但彼此间具有非常明显的逻辑关系。多元主义主张多元社会治理主体自由竞争，但对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整合无能为力；法团主义主张各主体高度合作与融合发展，因此促进了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联通；威权主义则进一步强调国家在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组织联通、融合、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逻辑关系看，从多元主义到法团主义再到威权主义治理模式，参与社会治理

的多元主体之间的组织化程度和体制化程度不断增强。

与苏联东欧模式不同，欧美模式的出现并非源于道路问题，主要是源于现实问题，即政府一元主体回应社会需求能力不足的问题。该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将公共事务通过外包等方式从政府部门剥离出去，交给企业或者社会组织，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这些由第三条道路和新公共管理等理论阐明的社会治理，是典型的“通过社会的治理”。

（三）为了社会的治理：以中国历史经验为典型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和理论体系日臻成熟，当前社会治理正在迈向更加“完善”的高水平发展阶段。

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既强调“对社会的治理”，也强调“通过社会的治理”，结合了苏东与欧美两种模式的相关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些内容是中国社会治理主题的高度概括和特色的鲜明体现。“共建共治共享”是中国社会治理的特色之一，

于田野、来自于人民群众，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学以致用”，以调查所得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群众。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这些方法会成为以从事

田野调查见长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论研究重要的方法论。✱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2023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其中,共建是基础,共治是保障,共享是目的,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既兼顾社会发展、社会秩序、社会分享,又倡导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相对而言,中国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建设”理念,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出发点是社会建设,支撑点是社会安全,落脚点是人民福祉,所以,可称为“为了社会”的治理。

(四) 经验覆盖: 社会治理的历史建构

综上,三种治理模式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首先,差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治理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对社会的治理”模式旨在解决国家对社会的治理问题,强调科学系统地规划设计社会,从而实现社会的整合与秩序;“通过社会的治理”模式旨在解决国家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强调社会力量承接政府剥离出来的公共职能;“为了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时包含着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双重价值取向,强调社会建设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所不同,“对社会的治理”模式中,国家力量相对强大,社会力量相对较弱;“通过社会的治理”模式中,国家力量相对较弱,社会力量相对较强;“为了社会的治理”模式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体现了协同共治和具体事务中的优势主导作用。比较而言,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分别体现了对象性社会、手段性社会、目的性社会的特点。

其次,三种治理模式在背景、目的、方式等方面有相似的逻辑。(1) 适应社会发展: 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治理受到挑战,难以回应社会保障和社会需求,因此,社会问题国家化成为历史必然。(2) 激发社会活力: 现代国家的建立赋予政府回应社会大众需求的使命,但随着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逐渐增多,一元政府越来越难以应对,故三种社会治理模式都力图激发社会活力,以调动多元社会

主体协同参与,供给更多公共物品。(3) 体制机制创新: 三种社会治理模式均创新了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如系统论的运用、政府购买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等。与此同时,三种治理模式相关理论研究基本围绕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等展开,讨论了一元主体治理还是多元主体治理、党政主导治理还是协同/合作治理、管理为主还是服务为主等治理模式的取舍问题。

但是,从本研究主题看,人们对“社会治理是什么”的问题仍然缺乏共识。一是对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阐述不明,导致其内涵、外延不清晰。二是对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指代不清,以致在“社会”是治理客体还是治理主体这一问题上出现理论争议。三是对社会治理中“治理”内涵的分析不清楚,使得对作为一项人类活动的社会治理,始终难以形成科学的认识。四是对为何实施社会治理的理论阐述侧重宏观社会,缺乏对中微社会治理的价值分析,以致难以指导具体的治理实践。因此,历史实践虽然为认识社会治理的内涵外延提供了经验基础,但就概念界定而言,不同实践模式因侧重社会治理的某些维度而偏废了另一些维度,均预留了“剩余范畴”,需要进一步从逻辑上进行分析。

二、社会性: 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

本研究认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为何说“社会性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呢? 如何认识社会治理的社会性呢?

(一) 所有管理活动都具有社会性

管理学通常被当作自然科学,尤其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那时管理活动中的社会性因素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和深入考察。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几乎所有管理活动皆与社会日常生活相关,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活动;管理学实为社会科学,是有关管理活动与社会的知识。实际上,从

生产管理到营销管理,从微观的车间工人管理到宏观国家经济管理,从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到全球人类生存环境发展战略规划,无不包含着社会性。广义而言,以管理活动的社会性和管理活动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为管理社会学。

(二) 既有社会治理研究均强调社会性

社会治理在逻辑上属于管理社会学范畴,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性。从上述历史实践看,社会治理是近现代国家治理由代理人治理向参与式治理演进的表现形式,是国家治理社会化的产物。社会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和处理国家溢出的公共事务或社会事务。从这个角度考察既有研究,可概括出社会治理中的三种社会性。

(1) 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性——国家溢出的事务由谁处理。人们强调不同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强调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事务乃至人类共同事务参与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协同共治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分权状态(包括分工状态)下的协同共治;另一种是平权状态(包括混沌状态)下的协同共治。但是,不管哪种社会治理体制设计,都是有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协作方式的构建。

(2) 社会治理内容的社会性——国家溢出了哪些事务给社会。这里形成了“仅政府未能妥善处理的公共事务归社会治理”及“凡是社会能自我处理的公共事务皆归社会治理”两种价值取向。当然,国家溢出的公共事务显然不是静态的,社会治理事务在实务中可能不断被发现和生产,承接溢出事务的主体也不是机械地应对这些事务。

(3) 社会治理方式的社会性——国家溢出的事务怎么处理。从社会性角度看,社会治理方式区别于“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监督”等一般管理职能,包含社会调查、社会规划、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社会参与、社会慈善、社会互助、社会服务、社会营销、社会企业、社会监督、社会控制等。因此,社会

治理方式的社会性体现在日常社会这一微观层面。

正因为国家溢出事务的治理行为具有社会性,所以社会治理被大多数人界定为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系统进行干预的社会行动过程。总体而言,人们给予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更多关注,而对社会治理的内容、目标和职能问题的研究则不够。

(三) 社会性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

社会治理蕴含着“多元治理主体”,其治理的目标、对象、资源条件等均关联“社会”。社会治理涉及“谁来治理、为何治理、凭什么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等问题的不同维度,其均具有社会性。

社会性虽然不是社会治理的独有属性,但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社会治理因“社会性”而与行政管理、工商管理、家计管理、政党统治等其他管理活动区别开来。

那么,社会性是指什么呢?首先,这里的“社会”可以认为是民集聚成群的形态与过程。它可以是具有一定空间区域的群众生活领域,像社区、城郊接合部、农村;可以是某种不限于特定空间区域的社会系统或领域。社会性表征为社会个体的联结性和集群性,是相对于个体性和自然性而言的。其次,这里的“社会”可更具体地表征为与政治和经济领域相对应的生活领域。社会性既指涉社会领域,区别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又指涉沟通理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区别于权力与货币媒介联结的系统世界。社会治理主体和对象在政治和经济系统世界之外。因此,社会性是既相对公共性,又相对系统性而言的。

社会治理是市场和政治系统不能处理现代公共事务的后果,社会治理之“社会性”是公共事务处理去“系统性”的产物。社会性融贯在社会治理活动的全过程,体现在“对社会的治理、通过社会的治理、为了社会的治理”三大实践模式

中,贯穿了“谁来治理、为何治理、凭什么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五大问题,覆盖了治理主体、治理职能和治理对象三个层次,故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

三、治理环节:社会治理的操作性定义

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将社会治理分解为三个环节来阐明,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一) 第一治理环节:目标设定

“目标设定”环节对应社会治理概念中的“为了社会”,涵括第一治理主体“社会”、第一治理职能“诊断和规划”和第一治理对象“社会”三个维度。

(二) 第二治理环节: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环节对应社会治理概念中的“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包括第二治理主体“社会”、第二治理职能“发展和发动”和第二治理对象“社会”三个维度。

(三) 第三治理环节:计划实施

“计划实施”环节对应社会治理概念中的“服务、监管、建设社会”,包括第三治理主体“社会”、第三治理职能“服务、监管、建设”和第三治理对象“社会”三个维度。

目标设定和能力建设之后是实施环节,三个环节相互呼应、互相关联。首先,第一环节中的第一治理对象与第三环节中的第三治理对象相互呼应。从时间轴上看,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服务、监管、建设的“社会”是“现在时”的社会,为了社会中的“现实社会”是“过去时”的社会,“想象社会与镜像社会”是“未来时”的社会。因此,此处社会是向想象社会和镜像社会转变的社会,实为“过渡社会”;相应地,人为干预的、过渡中的社会运行过程,实为“过渡社会治理”。由此逻辑可推定,社会治理一旦启动,实为过渡社会治理。通过“服务、监管、建设”社会,创建出与“为了社会”中想象、设计、规划出来的目标社会相对应的现实社会——一种在理性的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其次,第二环节中的第二治

理对象社会力量与第三环节的第三治理主体相互呼应。计划实施环节将能力建设环节中发展和发动的“社会力量”直接施加于现实的目标社会,从而促成目标设定环节中“为了社会”之理想的达成;其行为活动通常直接面对社会大众,是社会治理中社会想象实现的过程。“服务、监管、建设”社会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在结构上匹配。社会治理对象的目标,可以是某个需要公共服务或社会服务的群体——需要“服务”和“共享”;可以是某个需要培育社会资本和社区——需要“建设”和“共建”;可以是某个需要加强安全建设和秩序规范的区域——需要“监管”和“共治”。社会治理除了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活力”外,还要建设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

综上,社会治理之“治理”自有其独特的环节和职能。那么,如何评价社会治理职能的实现程度呢?社会治理旨在实现“为了社会”目标,然而,一项社会治理活动,既可能投入很小,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撬动巨大的社会力量,促成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并形成蝴蝶效应,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可能不断投入资源,耗费巨大社会力量,导致沉默成本和负外部性增加,却没能达成“为了社会”之治理目标。社会治理主体履行社会治理职能,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环节和社会治理全过程的有效管理,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诸要素的效用,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实现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的目标。社会治理主体的履职能力,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从社会治理环节角度看,社会治理能力是指社会治理主体在履行诊断规划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之社会治理职能过程中,能够协调控制社会治理过程,促成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并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自《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2期,原文约18000字)



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RUC

作品转载通知

陈玉生 同志：

您发表在《社会学评论》 2023 年第 02 期的
文章 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根本属性与操作性定义 被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C4 《社会学》

2023 年第 08 期全文转载，特此函告，并致以衷心感谢！

由于复印报刊资料是二次文献，我们需再次核实您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准确地为您提供相应服务。敬请您认真阅读《作者俱乐部启事》，并将《作者俱乐部会员表》填好后，通过拍照发电子邮箱、邮寄或传真返回，我们将按照您的意愿和确认的联系方式为您提供相应的服务。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理论界·教育部在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资助项目

2021. 1
VOL. 14 NO. 1

公共行政评论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月15日出版

2021年第1期 总第79期

●专栏：政党与社会治理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

——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 张 晨 刘育宛 2

有组织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 徐选国 吴佳峻 杨威威 23

●论文

如何科学评估公共政策？

——政策评估中的反事实框架及匹配方法的应用

..... 刘玮辰 郭俊华 史冬波 46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 陈玉生 74

| | | |
|---|-----------------|-----|
| 中间层级何以保障政府运转? ——政府过程中的副职领导研究 | 包涵川 | 95 |
| 政务舆情回应策略对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 ——情绪认知视角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 唐雪梅 袁 燧 朱利丽 | 114 |
| 理事会能够提升社会组织绩效? ——基于全国 691 家社会服务类组织的实证研究 | 叶士华 何雪松 | 132 |
|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绩效偏差从何而来? ——基于甘肃 10 个试点县(区)的实证研究 | 何文盛 杜丽娜 杜晓林 黄雪松 | 151 |
| 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如何实现横向协同? ——基于 13 个流域生态补偿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 朱仁显 李佩姿 | 170 |
| 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了吗?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 王凡凡 | 191 |
| ●英文目录与摘要 | | 217 |
| ●关于采用结构化摘要和政策之窗的启事 | | 216 |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陈玉生*

摘要: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

【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 2013 年 1—3 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 2091 起事件进行研究。

【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

【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基层治理 简约治理 科层化精细治理 社会修复 网格化服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 (2021) 01-0074-21

【政策之窗】

- ❖ 国家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治理的领域、范围和程度，既考验国家治理体系，也考验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从“治理什么”角度评估国家治理（服务型政府）能力和效能。
- ❖ 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以应对海量基层日常社会事务是创新基层治理的当务之急。

* 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ZDA078），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发展规划 2017 年度广州市服务型政府绩效管理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广州市社会治理大数据开发应用研究”（2017GZJD11）。

一、引言

基层日常社会事务是如何治理的，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理论提供了考察该问题的思路。黄宗智（2008）指出：“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一个近乎自我管理的道德社会”，“国家制度将‘细事’当作应由社会自己解决的事务”。从逻辑上看，日常社会事务具有琐碎性和日常性，前者要求治理的精细、精准化，后者要求治理的常规、常态化。本文采取“谁在治理”“如何治理”“治理什么”三重视角考察广州市某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经验现象后发现，国家通过创新网格员服务形式和建立精致的科层组织，直接介入基层治理体系和社会领域，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一些“细事”进行处理。这些“细事”比黄宗智所述“细事”更微不足道，包括大量非人为的自然损毁现象，大大超出了规范秩序和文化整合的范畴，属于“社会修复”的范畴。

本文围绕两个经验问题展开研究：一是国家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特征是什么？从“谁在治理”“如何治理”“治理什么”视角来看，其特征为“科层化精细治理”。二是国家基层治理为何采取“科层化精细治理”？从“谁在治理”“如何治理”视角看，其原因是为了改革基层“官进民退”治理体制；从“治理什么”视角来看，其原因是为了应对“日常社会修复”能力不足。两个问题探究形成本文中心命题：具有“科层化精细治理”特征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国家改革基层“官进民退”治理体制以及弥补“日常社会修复”能力不足的一项制度安排。该命题表明，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现了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双重逻辑效应。反过来看，本文正是通过“治理什么”视角，才观察到社会发展逻辑与国家治理逻辑的交互作用之处，才探究到该命题。因为，追问“治理什么”既要讲说治理，又要讲说社会，必然关联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

本文在内容安排上，首先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当前国家治理研究具有明显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取向，即侧重“谁在治理”“如何治理”两大视域，从而疏忽了对“治理什么”的探究。其次，通过转换视角，本文考察国家基层治理体制、国家与社会关系这类治理体系问题的同时，还考察国家嵌入社会的程度和领域。这有助于认识到我国当前基层治理重心下移，不仅是治理体系下移，更是治理事务延伸，进而更好地剖析清楚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文献综述

当前，不少有影响力的国家治理研究侧重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试图构建一种形式逻辑来定义和描述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形态。例如，狄金华、钟涨宝（2014）认为，对中国传统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从注重“谁在治理”转向凸显“如何治理”，形成从研究主体到研究规则的转向。这种“治理体系”研究取向难免疏忽对“治理什么”的研究，导致丰富性的国家治理经验与取向性的研究视域同时并存。总体而言，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经验视域和四种理论范式。

第一种经验视域是国家行政体制。该视域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领域为国家行政权力运行和公共事务处理，试图探究国家治理的组织结构和权力逻辑，当然也包括关切其间的自然人、部门、单位、非正式群体等主体的行为逻辑和策略。这些领域和主题及其相应的经验现象研究，形成了两大主要理论范式，韦伯的科层制是其中之一。像锦标赛体制（周飞舟，2009）、官吏分途、层级分流（周黎安，2016）、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曹正汉，2011）等理论范畴，虽然看起来与韦伯的科层制有些大异其趣，但彼此间具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实为科层制理想类型的演绎与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现象的抽象共同作用的产物。不过，许多研究者不满足于此，他们研究发现了国家治理中包含着运动式治理（冯仕政，2011；周雪光，2012）、项目制（渠敬东，2012）、行政发包制（周黎安，2014）等治理体制和逻辑。这类理论范畴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科层制概念痕迹，但对其偏离也非常明显，包括从组织体系偏向运行机制，侧重强调治理手段和方式，具有非常明显的技术治理（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理论取向。技术治理由于具有很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和福柯思想渊源，其标签功能似乎不是那么明显。

第二种经验视域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第一种视域侧重国家行政体制不同，该视域研究者关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于居民行为模式的构建和社会秩序的生产作用，以及关切社会活力和国家嵌入社会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包括关切其间的自然人、部门、单位、非正式群体等主体的行为逻辑和策略。该视域研究形成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参与”两种分析范式。前者侧重国家对社会的作为，形成了汲取型和悬浮型政权（周飞舟，2006）、维控型政权（欧阳静，2011）等理论范畴；后者侧重社会力量介入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形成了参与式治理（Pateman，1970；王敬尧，2006）、第三领域和简约治理（黄宗

智, 2008、2019) 等理论范畴。虽然社会整合范式触及到“治理什么”, 例如, “吸纳型治理”范畴强调国家对社会人财物力的汲取, 但其分析的重心仍然放在国家治理能力上, 并没有对治理(吸纳)内容的属性进行本体创新。

显然, 上述理论范畴每一个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 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的话语效力, 奠定了认识中国国家治理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 对此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如何融贯两大视域和四大范式, 以便更加系统地描绘国家治理体制; 体制分析偏好忽略了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和趋势, 在辨析清楚既有国家治理的组织形式的同时容易忽略研究的经验现象本身、历史的发展逻辑和国家治理的目标旨趣; 诸多研究范式背后的认识论和价值论之间存在差异。很显然, 切割出来的历史个体所处的历史处境及其发展趋势, 与通过该历史个体抽象出的理想类型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别。如果假定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与社会发展的逻辑趋势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那么这种关联性是什么呢? 本文就此做一个尝试, 将治理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联结起来研究。

三、经验证据与理论范式

一般而言, 研究基层治理是准确地认识基层社会变迁的关键, 是理解国家治理形态的基础。当前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已普遍适用且常规运作,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究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广州市某区 2013 年 1—3 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 2091 起事件进行研究。这些信息资料非常清晰地记载了网格员登记处理事务的事件名称、事件发生的详细地址、事件处理等级、事件来源、事件分类、事件级别、事件紧急程度、事件描述、事件涉及人、事件登记机构、事件发生时间、登记时间、预计完成时间、调度时间、处理时间、回访时间等信息。首先, 本文采取定量内容分析法, 对这些信息内容进行编码和统计分析, 将事件分为三大类。一是行为秩序修复类, 包括非法经营类(走鬼、乱摆卖、占道经营、非法加工作坊), 乱停放类(乱堆放、乱摆放、乱挂), 乱张贴类, 宠物管理类, 纠纷调处类(邻里纠纷、租赁纠纷、家庭纠纷); 二是特殊群体服务类, 包括计生服务管理, 老年人服务管理, 残疾人服务管理, 青少年服务管理, 流浪乞讨人员服务管理, 咨询代办心理辅导; 三是物理空间维护类, 包括乱张贴清理类(乱张贴、乱贴广告), 卫生环境类(环卫保洁、乱扔垃圾、垃圾清理), 物业维修类, 市政工程和管理类, 安全管理类。其次, 本文采取定性内容分析法, 对上述信息资料的具体内容, 以及相关政策内容、2012 年广州市萝岗区某街道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 论文

基层治理调查资料等进行研究。

那么，如何分析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资料，并将治理的逻辑和社会的逻辑结合起来研究呢？黄宗智的理论为此准备了分析框架。黄宗智（2008）通过历史档案资料研究指称，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的行政方法，并将其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黄宗智的理论表明，集权的简约治理支撑了中国庞大的第三领域。第三领域“既非简单的国家正式体系，也非简单的社会/民间非正式体系，而是在两者互动合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中间领域，具有其特殊的逻辑和形式”（黄宗智，2019）。黄宗智提供了分析治理体系的三大范式：国家正式体系、第三领域、民间非正式体系。集权的简约治理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央高度集权，二是基层治理极其“简约”。国家将村社的大部分事务，包括纠纷，认定为“细事”。县政府除了征收一定的税额之外，尽可能避免介入村庄事务（黄宗智，2019）。在这里，国家、第三领域、民间等概念表达的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对应“谁来治理”；正式体系、非正式体系、集权、简约等概念表达的是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对应“怎么治理”；简约、细事等概念表达的是治理的对象和内容特征，对应“治理什么”。

需要提及的是，黄宗智引入“细事”概念，并非要给事关“治理什么”的治理内容予以定性和本体创新，而是以之作为描述“简约”范畴的一个维度或特征。同样，“简约”概念主要在于表征国家治理和正式治理的简约：如国家不介入民间纠纷等细事，皇权止于县，国家通过第三领域（士绅、幕友、长随、保甲等）治理民间社会，第三领域主体不领国家俸禄、由民间推举产生等。但是，黄宗智引入的“细事”概念为本文研究“治理什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分析线索。本文重要的工作就是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线索，表征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中的“细事”以及围绕这些细事展开的治理逻辑。

四、基层治理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特征描述

这部分从“谁在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三大视角，以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为理论范式，研究广州市某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经验现象及其特征。

（一）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处理事务的特征分析

资料显示，网格化服务管理所处理的事务比黄宗智简约治理所处理的“细事”还要细微。那么，什么是基层治理中的“细事”？黄宗智提出了两项关键表

述，一是指称“有关土地、债务、继承和婚姻（以及老人赡养）的纠纷都是‘细’微的、相对不重要的事情”（黄宗智，2008）；二是指称“国家将村社的大部分事务，包括纠纷，认定为‘细事’。县政府除了征收一定的税额之外，尽可能避免介入村庄事务”（黄宗智，2019）。可见，除刑事、赋役这类事务外，基层民间事务大部分都是细事。本文以此为标准，评判网格化服务管理处理事务的特性。

这些“细事”在网格化服务管理中怎么定性的呢？在2091起事件中，事件级别被定为“一般事件”占83.8%，“普通事件”占15.6%，“重大事件”只占0.6%；“一般”紧急事件占总体的76.1%，“不紧急”事件占21.8%，“紧急”事件只占2.1%。

这些“细事”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对此，通过一些样本信息定性分析可直观表明。比如，“惠福西路18-20号下水道堵塞，居民出入十分不方便”被定为重大事件和紧急事件，“仓库未配置灭火器”被定为紧急事件，但属于一般事件，“巡查时发现内街道凹凸不平，对行人和老人家造成不便”；“群众反映路灯不亮”则被定为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皆为一般事件。此外，如“垃圾桶乱摆放”“天气寒冷，社区探望独居老人”“自行车乱停放占道”“居民衣服乱挂，影响市容环境”“楼道有积水，影响居民出行”等非常日常的琐事也被登记。

这些“细事”包括哪些类型呢？在2091起事件中，卫生环境管理占25.01%，乱堆乱停、乱拉乱挂占18.13%，乱摆卖、占道经营占9.95%，物业维修占9.33%，乱张贴及清理占8.8%，邻里、租赁、家庭、邻居纠纷占4.4%，特殊群体服务和计生服务占4.16%，安全管理占2.87%，宠物管理占1.96%，剩下的其他类型事件约占6.93%。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宗智所述简约治理中被界定为“细事”的纠纷事件，在样本中不仅占比小，而且是一些更细微的纠纷。

这些“细事”总体规模如何呢？据报道，自2014年7月至2017年2月，广州市1494个社区全覆盖开展了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网格员共上报网格事件520.5万件，办结502.8万件，办结率达到了96.6%。^①

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事件相比黄宗智所述“细事”还更为细微和不重要。这些事件总量巨大，涉及日常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可谓随时随地发生，具有日常性、多元性、非规则性。其中，只有极少部分是重大事件和紧急事件，绝大部分为一般事件；而且环境卫生事件占比最大，达到1/4。相对而言，这些事

① 张伟涛：广州打造居民满意的网格化服务治理体系，中国社会的报，2017-3-1（A01）。

◆ 论文

件与政治制度、法律秩序等宏大叙事很难联系在一起，但是已经被纳入到国家治理的范畴。可见，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深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基层社会失序部分、脆弱部分和风险部分，已经形成了非常精细的管理和国家权力渗透，其日常生活事务处理呈现国家化。我们将这类治理称为精细治理。

（二）科层化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组织结构特征分析

“谁在治理”基层社会中的“细事”？黄宗智（2008）非常明确地指出，简约治理中民事纠纷这类“细事”国家不管，由诸如乡保、乡地、村长等“准官员”构成的第三领域管理。但是，国家不给“准官员”发薪水，不委任，由社区提名，县令确认，避免将村政权科层化。此外，县令，作为正式科层制的代表，只有在不介入便无法解决纠纷时，或者遇到针对吏役滥用权力的控诉时，才会介入。一旦介入，县令接下来便按照他处理细事案件的方式，解决纠纷，处理控告。这同样也是简约主义的行政。可见，“简约治理”中民间社会“细事”的主要处理者是第三领域主体，他们因为“国家不发薪水，也不委任，由社区提名”而被认为在正式科层制之外。

网格化服务管理中的“细事”谁在治理？在2091起公共事件中，网格处理、社区处理、街道处理、区市处理的分别占73.6%、19.5%、6.4%、0.5%。可见，绝大部分事件在网格和社区层面办结，许多事务实际上由网格员直接处理，尤其是大量环境卫生事件。

网格工作人员结构如何呢？根据《花都区全面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整合到网格员队伍的各类人员包括社区工作人员、村委会干部、经济社社长、村民小组组长以及出租屋管理员、计生协管员、城管协管员、食药监协管员、治安管理员等。这些被整合的网格员，许多为基层治理的老班底，有本职工作要承担。但是，广州市按照“1+X、1格1长、1格多员”的模式，采取专职和兼职两种方式，要求在每个基础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人数不够的则公开招聘人员补充。截至2020年，广州市组建成3万名网格员队伍。

网格员如何组织的呢？2014年10月出台的《广州市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规定，“原则上按照每200户划分一个基础网格，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基础网格，实现社区无缝对接”，并要求将出租屋管理、消防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治安管理等事务纳入网格。广州市某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提出了这样的网格设置模式：做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楼、楼进格、格进社区”，将公共服务延伸到网格，将任务落实在网

格，将问题尽量解决在网格，形成“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上、事在格中”的服务管理模式。该区政府在2011年6月的工作报告中称，“把社区办理老人证、计生证、失业证等10大项78小项社会服务内容，以及公共设施、市容环境等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共12大项121小项管理事务全部入‘格’”；此后，在2013年7月的工作总结中称，“把智慧党建、电子政府、居民自治、机团共建、家庭服务等工作纳入网格，探索出‘五位一体’的网格化模式”。至2020年，广州全市划分了19500多个网格。总体而言，网格比楼大，比社区小，几乎覆盖到全部基层公共空间。

为了规范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2015年以来，广州市以市政府、市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先后出台《广州市城市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入格事项管理试行办法》《广州市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专项工作会议制度》《广州市关于整合街（镇）聘用人员队伍组建专职网格员队伍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此外，还出台了《社区基础网格划分工作指引》《社区基础网格信息册》《社区基础网格图册》等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明确了网格化管理的组织结构、薪酬制度、劳动分工、工作流程、工作纪律等。

可见，与黄宗智阐述的简约治理避免将村政权科层化模式不同，一是网格员基本都是政府聘用的授薪人员，包括街镇聘用的老班底和新聘人员；二是网格员虽然不是政府公务员，但均按照正式制度规定代理行使国家基层治理职权；三是网格化服务管理既是基层治理体制，又是治理机制，具有非常明显的层级控制和职能分工等“科层制”特征。我们将这类治理称为科层化治理。

综上所述，网格化服务管理最少有两个特征：一是国家介入基层社会从事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一些“细事”，实为精细治理；二是国家建立了精致的科层组织，直接介入基层治理体系和日常生活领域开展精细治理，实为科层化治理。综合而言，网格化服务管理属于科层化精细治理。

实际上，基层治理单元并不止步于以楼、街、巷等单位构成的基础网格，出租屋管理能说明这点。对于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传统户籍管理制度作用越来越有限。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被广泛运用：以屋管人。以屋管人采取属地管理模式，首先要管住住屋，通过管理不动的房屋来管住流动的人。基层政府直接聘用大量出租屋管理员从事这项工作。这形成了与户籍管理制度相对应的出租屋管理制度。以屋管人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对辖区内房屋进行编号，登记屋主姓名、联系电话等信息资料；通过屋主反映和出租屋管理员巡逻等方式，登记居住者的职业、电话等信息资料，将房屋信息与人口信息紧密联系起来。出租屋管理是精细化的，对于减少治安犯罪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体现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了国家权力对社会存在隐患和风险的地方加强了渗透。可见，出租屋管理比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基础单位更为细密，同样属于科层化精细治理。

五、基层治理中的“官进民退”：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治理逻辑分析

那么，国家基层治理为何走向科层化精细治理呢？下文以广州市基层治理的一些重要改革为线索展开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区制替代单位制，人们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国家通过社区制来整合社会、重塑社会秩序的努力越发明显。各职能部门越来越倚重社区，社区制也因此越发受国家重视。随着国家职能不断延伸到社区，“进”社区的事务名目繁多且层出不穷，诸如“法制进社区”“科技进社区”“安全文明进社区”等，基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以下统称为“村居委”）工作人员甚至因此出现“新政策忧虑症”。村居委对上级政府部门颁布新法规、实施新政策、增加新部门等举动，非常敏感和忧虑，因为这意味着又有新的事务或新的职能延伸到社区。基层村居委被认为承担了过多行政职能而偏离了服务居民的本职职能。

为此，两个基层治理问题被提上议程：一是村居委自治功能受到行政职能的挤压，二是基层条块分离导致基层治理出现越位错位缺位。为应对这两大问题，基层治理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如政社分离、政经分离、权力清单制度、议行分设、大部制、“一大队三中心”等，其主要目的是为基层村居委减负，为基层行政体制瘦身。这些改革，在意图上要推进基层简约治理，但在事实上却导致“官进民退”。

（一）村居委体制与职能分离的改革

2000年前后，人们依据村居委组织法，提出基层村居委要加强自治功能。大概有三项改革举措：一是体制上搞“议行分设”，即基层设立社区工作站，专门承办行政事务，村居委剥离行政职能，专务自治事务，以便在体制上彻底解决村居委政社不分的问题。二是机制上搞政府向村居委“购买服务”，即各部门的行政性事务要通过村居委进社区，就要付费。三是利益关系上将股份合作社从村居委剥离出去，实现“政经分离”，让村居委少受集体利益牵制，安心搞自治，搞社区服务。三种改革举措的原初目的是限制国家权力和经济利益对村居委的影响，但在改革手段上通过创新基层科层制组织体系，使得国家权力直接插入到社会肌体中，结果导致基层治理“官进民退”。

三项措施其实没有抓住问题本质，显得有点为村居委自治而自治。比如，“政经分离”后，村居委手里没了自己的钱，办事更难，加上清水衙门，缺乏激励，办事动力下降，以致有些村居委没人参选。“议行分设”后，大部分社区公共事务由国家处理，让村居委找自治性事务，留下空间很小，加上积极性又不高，村居委加强自治职能更是难上加难。“购买服务”后，村居委往往盯着政府部门的项目，更不能安心搞自治服务。

为何村居民选举产生的村居委不能专心搞自治服务呢？经济社会发展导致选民与村居委之间的利益关系弱化，村居委选举成立变成传统，变成法定任务，居民重视不够，民主和选举的本意难以真正实现，居民参与也陷入困境。结果，基层选举中国家干预加强，居民实质参与减弱，最后只能走走过场，搞搞形式。村居委自治搞不好，居民有事还是找政府，政府最后也只好管起来，把底兜好。但是，政府职能部门要回应居民需求，最后还是找村居委，村居委也就只好承接政府职能，自治职能逐渐丧失。这形成一个困局。当前，基层治理提出并实施党支部、村居委、经济合作社等基层组织领导一肩挑的方案，基层村居委体制职能分离改革被扬弃。

（二）条块体制与职能综合的改革

为解决基层治理条块分割问题，各地探索基层大部制改革，走治理职能“综合”的道路。2011年6月，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街道、社区管理服务改革创新的意见》，提出要在基层街镇搞“一队三中心”建设，将街道各职能部门重新调整，分别纳入综合执法队、政务服务中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从名称可知，“一队三中心”四大部门按照功能主义原则设置，综合了原来分散于各部门的约54个职能或机构，分别归口到执法、治安、政务服务、社会服务四大综合治部门。为此，广州市某区委2011年6月作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创新工作情况汇报时指出，“探索推行‘大民生’‘大综治’‘大城管’的管理模式和‘前店后厂’的服务模式，实现了多个部门的资源整合和数十项业务的归整办理，街道编外人员精简幅度达32%，较好化解了基层社区管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弊端”。为此，该区计划下一步工作要“全面清理优化编外人员队伍，核定编制外合同制人员配备标准，解决编外人员管理中存在的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力量分散、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改革直面条块体制的弊端，但遇到许多阻力。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论文

第一，基层人员编制不足。在上述街道承担公共事务的岗位编制人员中，有公务员编制的街道办 21 人、执法队 11 人，事业编 19 人，雇员（含党建）46 人，临聘人员 331 人，此外还有派出所辅警、社区联防队员和治安员、企业保安等。政府通过购买岗位服务方式聘用的编外人员是行政事业编制人员的许多倍。即使如此，不管是街道部门工作人员还是村居委工作人员，受访时普遍强烈反映工作量大，认为上级政府只下沉事务和责任，执法权、行政权、经费、人员编制却没下沉。

第二，上级条线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抓手不足。如上，基层对上级政府只下沉事务和责任意见很大，但又难以推托，惯用手法就是找各种理由拖延办理，比如人手不够。有些理由是实情，有些是借口。对基层推托、拖延现象，政府各职能部门惯用的手段就是在基层安排自己的办事人员，搞平台建设，搞阵地建设，采取的具体办法主要就是购买岗位服务。对上级政府部门而言，在下面安排了自己的人员，工作才有“抓手”。公务员编制的压力指向编制办，由于国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公务员编制很难增加，各职能部门只好退而求其次，购买岗位服务，这样压力就转向了财政部门。基层治理遇到体制障碍时，通过财政资金解决问题是管用的手段。可见，上级部门控制权力的逻辑和下级条块反控制权力的逻辑强化了基层治理中对权力和财政的需求。

第三，综合治理能力不足。尚且不说各职能部门对综合职能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单就改革后，招聘到具有基层综合治理能力的岗位制人员，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大难题。比如，综合执法人才问题，原来基层执法队伍最少包括计划生育执法、安全生产监督执法、城市管理执法、劳动监察执法等队伍，各队伍下面还有更为细致的分类，如城管执法包括违法建设执法、国土资源执法、无证经营执法、食品卫生执法、环境卫生执法、文化稽查执法等。以前执法专业分工很明细，每个人从事一小块业务，现在搞综合治理了，但在业务上能够开展各种执法活动，能够胜任如此综合执法工作的人才非常少。广州市某街道调查资料显示，综合执法只能在管理上搞执法队伍整合，也就是搞搞合署办公，而执法职能难以综合。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时代，综合治理面临困境。岗位制也一样面临困境，比如，临聘人员本身没有行政权力，也没有执法权力，只能在政府授权范围内行事，而基层政府并不能随意授予他人行政权力，即国家权力不能私相授受。临聘人员处理事情时，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公务人员参与，临聘人员权能受限导致困境。所以，岗位制和综合治理，还要解决人力资源和

职权关系问题。

从为解决基层治理条块分割问题的职能综合改革看，不管基层政府职能部门还是村居委，伴随着事权下沉，均表现出对人力、财力、权力下沉的需求。这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治理中的“官进民退”。

（三）“一治于网”体制与空间地理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

继村居委体制改革和基层治理职能综合改革之后，广州市创新实施网格化服务管理。网格化服务管理被认为恰好可用于克服公共服务体制中层级控制太多、职能交叉和管理过于碎片化等弊端（竺乾威，2012）。网格化服务管理在内容上细致化，机制上精致化，追求“精”“细”治理。“精”要求在服务管理的组织、队伍、信息、制度、区划上统一，打破分割分化、多头投入等粗放式管理状态，瞄准的是公共服务效率。“细”体现在服务管理的具体事务要满足多元社会需求，无缝隙社会管理。以“精”为导向，促成“一治于网”体制；以“细”为导向，促成甄别基层治理事务的空间地理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

首先，关于“一治于网”体制，《方案》中确定的广州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总体目标做了最好的说明“按照‘一个组织架构、一张基础网格、一支网格队伍、一套信息系统、一套管理制度’的基本构架和‘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基本思路，以网格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依托，以制度为保障，打破条块分割，消除信息孤岛，推动城市治理架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重塑城市服务管理体制，再造业务流程，形成‘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的‘大城市、小网格’服务管理网络，打造好联络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米’。”

其次，关于信息技术对于职能综合与事务综合的运用，《方案》将“建立一套共享的信息系统”“建立全市统一的网格化服务应用系统”“整合全市现有的信息应用系统”作为推动工作的主要任务。也即，创新实施网格化服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合各级、各部门分割的信息网络，建立“一套信息系统”。《方案》要求打破信息孤岛，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互联互通、融合共享的基础信息数据库，网格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基础信息要求统一采集、动态管理，各级各部门不得重复采集；对各级各部门现有的分散分割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

可见，“一治于网”首先是基层治理的人、财、物力等重新“织网”。一是空间织网，将大城市空间划分为若干网格，网格中发生的事情，即将那些“细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 论文

事”纳入到信息系统。二是处理空间事务的主体织网，对于网格员提交了信息但没能处理的事务，由信息平台整合的相关责任主体跟进处理。三是从事空间治理事务的人员织网，将原基层治理中的村居委工作人员、出租屋管理人员、新聘用人员等，充实到网格中，并在网格中收集信息和处理事务。四是对网格员无能无权处理的事务，通过网格员提交信息指令，让有权能者处理，这就解决了上述综合治理的权能难题。

那么，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否超越了科层制呢？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网格地理技术划分网格，将各政府职能集聚到网格地理空间；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打破各部门隔阂；通过建立纵向的监督和指挥层级结构，从而实现层级控制。这貌似打破了层级与部门壁垒，但其本质是将无缝隙的政府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的衔接）和无空隙的空间治理模式（治理区域的衔接）在更为强大的科层制组织下得以实现。与生产工人在车间流水线上从事产品生产一样，网格员在整个城市空间的某个网格中，按流程提供公共服务产品，采集信息、提供服务、执行政策等，从事规则性劳动。倘若没有强大的科层制加以保障，网格化服务管理提出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精细治理不可想象。

网格化服务管理反映了基层治理体制科层化趋势加强。“一治于网”体制是典型的国家科层制权力网络，取代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第三领域、权力的动员网络，超越了单位制、社区工作站、“一大队三中心”等体制，实现了国家科层组织体系向下延伸并直插基层的社会肌体，直接面对和回应基层社会事务与居民个体需求。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并没有超越科层制，而是国家科层制在城市空间网格中的延伸和适用。李强、葛天任（2013）指出，议行分设的制度设计和网格化管理方式，从本质上看，是向传统总体性社会管理模式的某种程度上的复归。时至今日，国家已经发展出能够直接回应公众个人或社会群体诉求的责任体系，发展出直接回应居民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服务管理机制，而不需要像以往那样透过保甲制、单位制、社区制等权力的文化网络或第三领域这些中间环节。

综上，议行分设、基层大部制、网格化服务管理在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同时，强化了基层治理中的“官进民退”，强化了基层治理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一方面，基层治理事务远远超出了以纠纷解决为主的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事务范围，像专业化的社工服务都已经被纳入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领域，还有更为细致的老人照料服务等，这类事务在传统中国社会，基本是社会自治的事情；另一方面，像网格和“一队三中心”组织体系，不管作为正式官僚体系或非正式官僚体系，都不再简约，而是相当庞大的组织体系。

六、基层治理中的“社会修复”：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社会逻辑分析

从上可见，从“治理什么”角度看，科层化精细治理直面基层社会发生的“细事”。那么，国家为何要建立精致的科层制组织直接介入基层社会的“细事”？下面将治理逻辑与社会逻辑结合起来分析。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并形成了两大理论分析范式，一是秩序模式，关注行为关系，试图通过规范来调节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实现教义、道德或者法律规范下的社会有序化；二是整合模式，关注社会系统的基本组织机制，怀着对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想象，试图在现代社会重新建设凝聚群体生活的家园，以应对越来越强大的社会分化力量，防止社会碎片化。张静提出的公共制度设计，是典型的秩序模式；李强提出的职业共同体设计，是典型的整合模式。但是，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的主要特征既不是规范行为，也不是凝聚群体，而在于处理“细事”。郑杭生、郭星华（1992）认为，中国是一个成熟度很高的传统社会，其中一个成熟性标志就是良好的调节功能和修复机制。也即，成熟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良好的修复机制，社会修复能力强。本文将这种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秩序模式定义为“社会修复模式”。本文发现，国家建立精致的科层制组织直接介入基层社会的“细事”，就是在基层直接从事“社会修复”。

（一）社会秩序模式

以张静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张静（1999）研究了“在低度稳定的结构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为什么仍然得到延续”这一问题。张静认为，掌握田地和人丁资料的团体或组织便担当起了记录的重任，而这种任务显然非基层莫属，这使得国家依靠基层。同时，基层通过“报户”而控制税、赋、役、捐、免的权力，所以，“掌握户口及其实际意义者，基层是也”。在理论上，公共领域的法规存在并适用的范围更大，但在乡村实践中，不存在一种超越乡规民约范围之外的公共领域，因为前者通常不能废除后者，也不能取代后者的执行组织自行发挥作用。乡规民约准则是首先或至上的，在村庄建制之内，甚至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文书也难以越过乡规民约以及起到个体所需的保护作用。进而，乡规民约所代表的社会建制又反过来强化村庄组织的权威（张静，2000）。张静从乡规民约等村庄秩序具有至上性而免遭国家权力和法律秩序渗透来说明其得以延续的原因。

那么，如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呢？张静（2013）认为“这些问题源于结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 论文

构、信息和职能的分割体系，它们在效果上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了公众对公共制度的依靠、使用 and 有效连接，造成的后果是政治性的：公共组织的内聚力弱，其获得社会认同的中心地位建立不起来，因为它和人们的切身利益缺少关系。”一个衡量治理品质的重要指标，就是社会成员与公共组织之间是否存在便易及有效之连接渠道。张静因此提出链接个体与公共制度，用公共制度来解决公民个体需求问题的方案。

（二）社会整合模式

以李强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李强（2006）指出，仅自1979年起至1999年8月底止，除新宪法外，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审议通过了253件法律、106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800多件行政法规，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批准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还发布了3万多件规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最高立法机关平均每13天就“生产”出一部法律，国务院平均每6天就制定出一部行政法规。面对如此多的法律法规，普通老百姓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够全面了解和适应。从如此大量的立法到这些法律法规变为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之间，当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社会失范”得以滋生和泛滥。这段话可以证明，李强并不赞同公共制度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或者起码认为当前中国还不是时候。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制度不可谓不多，但短时间内普通百姓难以了解，也就很难以公共制度团结与整合社会。谢遐龄（2014）也认为当前中国“理性的制度、治理体系不适合于伦理性的社会结构”。

李强用社区碎片化、社会解组等概念描述我国社会秩序的状况，并且在考察了涂尔干的职业共同体思想后，提出培养职业共同体来推进中国新的社会整合基础。涂尔干指出，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格鲁斯基与索伦森同意涂尔干所说的，职业共同体的思路可以成为社会分析、阶级分析中的第三条道路（李强，2006；李强、葛天任，2013）。渠敬东（2014）分析了涂尔干职业群体理论，提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决现代社会失范问题的路径，将国家政治安置在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相结合的基础上。李强同时强调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像家庭等“小圈子社会”是最具生命力的社会共同体，而中国社会的职业共同体的特征也是这种小圈子、熟人关系，符合小圈子社会的原理。也就是说，在中国新建职业共同体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是有文化传统基础的。

综上，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有两种，一种主张建立普遍意义的公共制度关系，强调利益整合和社会制度秩序重建，这属于韦伯主义；另一种主张建立具

有时代特征但仍然保留传统文化基础的职业共同体，强调文化整合和重塑社会整合系统，这属于涂尔干主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主张社会秩序的重建，在制度和组织体系层面解决问题，从事社会秩序的理论规划工程，皆追求普遍治理逻辑。

（三）社会修复模式

倘若一个国家公共制度和社会团结机制都难以真正奏效，是否存在隐秘的第三种机制发挥作用呢？网格化服务管理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

首先，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否有利于建立起公共制度，是否有助于共同体的产生？网格化虽然建立了居民与政府的连接渠道，以及在比社区更小的范围划分网格，但是，从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资料看到，这种治理主要是网格员对社会信息的收集及部分社会问题的处理，既没有以建立公共制度为目的，也没有以重塑新的社会团结模式为目的。通过统计 2091 起公共事件的来源发现，日常巡查的事件数量有 1642 起，占样本的 78.5%；群众反映和信访的事件数量分别是 351 起和 15 起，分别占样本的 16.8% 和 0.7%；其他来源的事件有 83 起，占样本的 4%。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中的公共事件大部分产生于日常巡查，群众反映和信访只占很少部分。可见，公共事务的来源渠道主要是公共组织本身，而非与国家相对应的居民个体。这说明，要么公共制度渠道仍然不畅通，要么居民对公共事务比较冷漠。笔者查看处理级别最高的 10 起事件后发现，7 起事件是“树木生长旺盛影响生活”“白蚁蛀树”等非人为事件，剩下的 3 起是“出租屋布置成宗教场所”和“店铺经营不当”事件。这类事件都是日常生活事件。网格化服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日常生活秩序，但并没有直接重塑社会公共关系和文化模式。同时，划分网格的依据主要是楼、街巷等管理空间单位，不是文化单位，与共同体没有直接关联。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不在于秩序模式和整合模式所强调的重建社会秩序。

网格化服务管理主要在于修复社会秩序。研究结果表明，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可以分为制度规范、社会支持网络、物理空间秩序三类，其相应的修复机制包括适用规范社会行为的管理机制、满足个体需求的服务机制及清除错乱现象的维护机制。社会支持网络在于满足特殊群体的需要，强调的是提供多元化的专业服务，因此其适用满足个体需求的服务机制；制度规范在于纠正制止失范行为，减少越轨行为发生，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其适用规范社会行为的管理机制；物理空间秩序不是针对特定人的行为纠正和服务需求，而是满足某些公共事务的需求和物理世界的维护，因此其适用清除错乱现象的维护机制。这些机制都是社会修复机制。比如，样本数据中事关社会支持网络方面的事件，来源于日常巡查的事件有 140 起，占比为 40.7%；来源于群众反映的有 131 起，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 论文

占比为 38.1%，两者占的比例大致相当，因为这些事件主要是提供服务方面的，满足特定个体的需求。网格化处理事件涉及的制度规范、社会支持网络、物理空间秩序破坏都属于日常生活内容。显然，国家单方面介入基层公共领域，甄别公共事务，其精细化程度甚至超出了居民的需求，许多居民需要的、想到的，政府提供了；许多居民不需要的、没想到的，政府也提供了。综上可见，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应对基层社会秩序自我修复的制度设计。

那么，何为社会修复？社会修复是指有意识地对被破坏了、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秩序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修补恢复以满足人们正常生活需要的社会活动过程。调查资料显示，社会秩序的日常破坏包括矛盾纠纷、特殊群体需求得不到满足、非法经营行为、乱停乱放行为、宠物伤人、宠物随地大小便、乱张贴行为、乱扔垃圾、公共设施 and 楼宇设施损坏、消防安全隐患等。从内涵上看，修复模式与秩序模式、整合模式一样，属于社会秩序范畴。但是，从概念外延而言，社会修复范围既包括秩序模式中规范出问题，以及整合模式中社会支持出问题的地方，如矛盾纠纷、特殊群体需求等；还包括物理空间损毁，如道路老化破坏、绿化带杂草丛生等。秩序模式与整合模式主要侧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修复模式还包括非社会关系层次，如社会脆弱部分、灾害应急部分、风险社会部分等。毫无疑问，规范再完美、文化凝聚力再强，每天仍然有大量社会破坏现象需要加以修复处理。因此，除了社会秩序的制度规范维护、文化团结机制维护之外，还需要日常社会修复。当然，修复模式与秩序模式、整合模式必然存在关联性。

综上，秩序模式和整合模式共同点就是重建社会秩序。修复模式不同，它不以重建社会秩序为目的，不考虑公共制度和社会整合组织体系重建问题，而是以具体的日常生活问题为导向，关注社会即时失序问题，包括社会脆弱、社会错乱、社会风险等问题，致力于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污点、亏损、薄弱部分，是一种人为恢复模式。修复模式实际上采取一种日常的积极姿态，在社会秩序重建和社会整合模式重塑之前，为社会秩序做点什么，但它不是过渡机制，而是常态机制。网格化服务管理属于修复模式，但本文提炼修复模式并不是要鼓吹网格化服务管理，而是希望社会修复的理念能够扎根社会，让人们知道哪些行为及如何行为是修复社会的，以利于形成保卫社会的日常行为机制。

七、结论与讨论

为探究基层日常社会事务如何治理，对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一方面，网格化服务管理所处理的基层日常社会事务比黄宗智提

出的“细事”更加微不足道，国家介入基层社会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社会修复”，社会出现非理性化破坏和失序时，国家以理性化方式努力修补；另一方面，网格化服务管理和“一队三中心”体制创新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需要改革自身各职能部门对基层社会的多头管理，试图通过整合资源，搞“综合”治理来节约行政资源，适应社会发展和居民需求，是国家“权力自我修正”的努力。分析足以证明，在基层治理中，国家花费大量精力用于修复社会和适应社会，以便保障社会发展和跟上社会变化；而变革社会秩序和整合社会在精力和效果两方面都越来越弱。可见，基层治理超越了“集权的简约治理”（黄宗智，2008、2019），开启了国家主导的“科层化精细治理”时代和“社会修复”时代。

有研究认为，网格化服务管理会导致社会“麦当劳化”和基层政权“内卷化”（田毅鹏、薛文龙，2012）等问题。随着我国公共关系多元化，人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将降低，自由度将增加，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干预也将减弱，为何又出现国家直接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呢？在今天的城市社会，社区制显然难以像单位制那样保障所辖区域居民的社会生活秩序，社会自身逐渐丧失“日常社会修复”功能。社区制与单位制相比，社区村居委作为公共关系的代理人角色相对退化，也没能担当管理居民个体的家长角色，其重要功能恰好是保障社区成为自由个体的松散结合体，居民个体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实际上，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降低了人们对社区的依赖性，社区制难以胜任社会需要，国家介入社会修复成为必然。但是，科层化精细治理下的社会修复模式只是在少数经济发达的区域得到实践，简约治理仍然是重要选择。同时，国家直接在基层社会开展精细治理，并没有给其聘用人员赋予更多的政治权力，但却赋予他们更重要的服务管理和秩序维护职责。这表明国家回归社会，扮演了服务社会的后勤基础保障的角色，表现了国家权力积极的一面，同时，不可避免导致日常生活“殖民化”。国家权力介入日常社会是社会自我失守的后果，是自由的代价。但是，国家权力过于侵入社会基层，长此以往，社会的“殖民化”会越来越严重，社会自我修复能力日渐式微，反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此，需要综合研究治理的简约与否与治理事务的简约与否之间的逻辑关系，倡导社会自我的“日常社会修复”。任剑涛（2010）指出：“复杂的现代国家结构需要简约的治理机制。”黄宗智（2009）认为：“新时代对福利国家的需求当然会使旧有的简约治理传统的部分内涵成为过时，但是简约主义中的半正式行政方法以及国家发起结合社会参与的模式，也许仍然可能在中国起一定的作用，在其追求自身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个角色。”如何将简约治理落到实处呢？“日常社会修复”模式是对秩序模式和整合模式的一种必要的和主要的补

©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 论文

充,是动态的常规性社会秩序维护机制,尤其是对社会脆弱部分,对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社会机能都会衰弱,比如,社会规范跟不上社会发展而出现社会失序,社会公共物理空间出现损毁老化,部分社会群体生活生存出现困境,等等,都需要一种力量来补充和养护,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当前一种社会治理理念追求依法治理,这当然非常重要,但依法治理也是一种秩序模式,秩序模式就会出现秩序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人们又怀念传统文化整合模式,陷入了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非此即彼的二元范式(狄金华、钟涨宝,2014;黄宗智2019)。并不是所有社会问题都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法律规范建制、系统机制整合来应对和解决;而恰好相反,社会每时每刻的运转会产生大量社会问题,通常的应对办法是即时处理,采取一种日常社会修复模式。日常社会修复模式与秩序模式、整合模式一样,是以社会良性运行为取向,是避免社会恶性运行的机制。日常社会修复是理解社会运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重要范畴,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模式。

综上,国家权力越来越深入到基层治理体系和社会领域,国家建立了精致的科层组织,直接介入人们日常生活领域。本文因此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网格化服务管理的主要特征为“科层化精细治理”,国家购买网格员服务直接介入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细事”;二是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细事”原本属于社会自治领域,而当前国家在基层实施“科层化精细治理”表明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官进民退”现象,也表明社会自身的传统“日常社会修复”功能出现了衰退。总而言之,国家在基层实施“科层化精细治理”是改革基层“官进民退”治理体制,以及弥补“日常社会修复”能力不足的一项制度安排。如何治理基层日常社会事务,既要反思借助制度的社会秩序模式和借助文化的社会整合模式,也要反思国家直接介入日常生活的“社会修复”模式,重视和激发“日常社会修复”模式的功能发挥。

参考文献

曹正汉(2011).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 社会学研究, 1: 1-40.

Cao, Z. H. (2011). The Vertic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1: 1-40. (in Chinese)

狄金华、钟涨宝(2014). 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 社会研究, 5: 73-97.

Di, J. H., & Zhong, Z. B. (2014). From Subjects to Rules: Study 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of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5: 73-97. (in Chinese)

冯仕政(2011).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 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 开放时代, 1: 73-97.

Feng, S. Z. (2011). The Formation and Vari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Movement: A Holistic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Regime. *Open Times*, 1: 73-97. (in Chinese)

- 黄宗智 (2008).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开放时代, 2: 10 – 29.
- Huang, P. C. C. (2008). Centralized Minimalism: Semiformal Governance by Quasi-Official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Open Times* 2: 10 – 29. (in Chinese)
- 黄宗智 (2019). 重新思考“第三领域”: 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开放时代, 3: 12 – 36.
- Huang, P. C. C. (2019). Rethinking “The Third Sphere”: The Dualistic Unity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Open Times* 3: 12 – 36. (in Chinese)
- 李强 (2006). 职业共同体: 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 学术界, 3: 36 – 53.
- Li, Q. (2006). Professional Community: The Basi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oday's China: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Durkheimism”. *Academics*, 3: 36 – 53. (in Chinese)
- 李强、葛天任 (2013). 社区的碎片化——Y 市社区建设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 12: 40 – 50.
- Li, Q., & Ge, T. R. (2013). Fragmentation of Community: A Positive Study 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in Y City. *Academics*, 12: 40 – 50. (in Chinese)
- 欧阳静 (2011). “维控型”政权: 多重结构中的乡镇政权特性. 社会, 3: 42 – 67.
- Ou, Y. J. (2011). The Maintenance/Control Type of Political Power: Characteristics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in the Web of Multiple Structures. *Society* 3: 42 – 67. (in Chinese)
- 渠敬东 (2012).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 5: 113 – 130.
- Qu, J. D. (2012). The Project System: A New System of State Governa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113 – 130. (in Chinese)
- 渠敬东 (2014).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 社会学研究, 4: 110 – 131.
- Qu, J. D. (2014).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l Morals: Durkheim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ety and the State. *Sociological Studies* 4: 110 – 131. (in Chinese)
-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2009).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 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6: 104 – 127.
- Qu, J. D., Zhou, F. Z., & Ying, X. (2009). From Macromanagement to Micromanagement—Reflections on Thirty Years of Reform from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 104 – 127. (in Chinese)
- 任剑涛 (2010). 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 开放时代, 7: 73 – 86.
- Ren, J. T. (2010). Simplicity in State Governance. *Open Times* 7: 73 – 86. (in Chinese)
- 田毅鹏、薛文龙 (2012). 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 学海, 3: 24 – 30.
- Tian, Y. P., & Xue, W. L. (2012).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id” Mode of Urban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Autonomy. *Academia Bimestrie*, 3: 24 – 30. (in Chinese)
- 王敬尧 (2006). 参与式治理: 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Wang, J. R. (2006). *A Positive Study on Urban Community Building in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in Chinese)
- 谢遐龄 (2014). 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启示——从中国可能建立什么样的治理体系角度看.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4: 17 – 25.

◆ 论文

- Xie, X. L. (2014).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at Kind of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May Establish. *Journal of Zhejiang Party School of C. P. C*, 4: 17-25. (in Chinese)
- 张静 (1999). 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 北大法学评论, 1: 4-48.
- Zhang, J. (1999). Village Governance Power Embodied in Rur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1: 4-48. (in Chinese)
- 张静 (2000).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Zhang J. (2000).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Problems on Rural System*.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张静 (2013). 公众怎样依靠公共制度?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 14-18.
- Zhang J. (2013). How Does the Public Rely on the Public System?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4-18. (in Chinese)
- 郑杭生、郭星华 (1992).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几点思考. 浙江学刊, 4: 51-57.
- Zheng, H. S., & Guo, X. H.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formation: Some Thoughts on the Social Changes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4: 51-57. (in Chinese)
- 周飞舟 (2009). 锦标赛体制. 社会学研究, 3: 54-77.
- Zhou, F. Z. (2009). The Tournament System. *Sociological Studies*, 3: 54-77. (in Chinese)
- 周飞舟 (2006).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 社会学研究, 3: 1-38.
- Zhou, F. Z. (2006). Rural Fee Reform 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Peasant. *Sociological Studies*, 3: 1-38. (in Chinese)
- 周黎安 (2014). 行政发包制. 社会, 6: 1-38.
- Zhou, L. A. (2014). Administrative Subcontract, *Society*, 6: 1-38. (in Chinese)
- 周黎安 (2016).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 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社会, 1: 34-64.
- Zhou, L. A. (2016).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of Administrative Subcontracting: An Analysis of “the Separation of Officials and Local Staff” and Stratified Mobility, *Society*, 1: 34-64. (in Chinese)
- 周雪光 (2012). 运动型治理机制: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开放时代, 9: 105-125.
- Zhou, X. G. (2012).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Mechanism: Rethink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Open Times*, 9: 105-125. (in Chinese)
- 竺乾威 (2012). 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 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 公共行政评论, 2: 1-21.
- Zhu, Q. W. (2012). Public Service Process Re-engineering: From “Seamless Government” to “Grid Manage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1-21. (in Chinese)
- Pateman, C.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黄冬娅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ARTICLES

How to Evaluate Public Policies Scientifically? ——The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of Policy Evaluation Studies and Matching Methods

..... Weichen Liu , Junhua Guo & Dongbo Shi

Abstract: The scientification of the public decision-making depends on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Foreign researchers are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causal inference methods , and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begun to make their preliminary attempts. However , the application of causal inference methods still need a systematic review.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of public policy evaluation and defines the causaleffects of public policies. Each matching method contains two steps: distance measurement and pair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pares the principles of covariate matching ,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 Mahalanobis-metric matching ,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 and entropy balancing matching. Combined with cutting-edge empirical research , this paper shows how the matching method can be used in policy evaluation research.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recautions of matching methods in application , includ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atching method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ching and regression , the requirement of sample size , and whether it is allowed to put samples back.

Key Words Public Policy Evaluation; Causal inference;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Matching

Fine Affairs , Fine Governance: Bureaucratic Fine Governance and Social Repair in Grassroots Grid

..... Yusheng Chen

Motiv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requires improvement of the micro-governance mechanism. Although Grid is an importa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chanism , fundamental questions—who governs , how do they govern , and what do they govern , what are the Grid’ s governance logic and consequences , remain unknown. Previous studies provide no systematic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Methodology: Taking 2091 events registered in grid serv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n a district of Guangzhou from January to March 2013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m using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governance subject , governance mode , and governance content.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Findings: Firstly , regarding bureaucratic fine governance , by setting up the grid and purchasing grid member services , grid service management extended the national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system into the grassroots. And , it dealt directly with the “details ” of daily life. Secondly , in terms of social repair effect , grid service management became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by which the state could reform the governance system. It was able to implement a “government promotion and civilian retirement” with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 This allowed for social rehabilitation despite the insufficiency of societal self-repair. Therefore , 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state intervention in grassroots social affairs , society must improve its ability to affect “daily social repair”.

Contribu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ogic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observing the conten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expands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at to govern ”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ow to make the social order possible ” within the category of “social repair”.

Key Wor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Simple Governance; Bureaucratic Fine Management; Social Repair; Grid Service Management

How Can the Intermediate Tier Guarantee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 Study on Deputy Leaders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 Hanchuan Bao

Motivation: In which ways do China ’ s deputy leaders intervene in government processes? As the intermediate-tiered government group , how do the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al goals and the executive capacity in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What i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deputy leaders in understanding government governance?

Methodology: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 the paper focuses on interactive “events” in government. It presents 19 cases according to the dimensions of “tiao-kuai” , “upper level-lower level” and “important events-daily events” , and makes grounded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these materials.

Findings: China ’ s deputy leaders as a group have become a “Supportable Coupling Hub”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organizational goals and capabilities. They operate three mechanisms. The Schem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formulates the action plan

公共行政评论

双月刊, 2008年创刊
第14卷, 第1期(总第79期)
2021年2月15日出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imonthly, Since 2008
Vol.14 No.1
Published in February 2021

主管单位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

社 长 肖 滨
主 编 刘军强

联系电话 020-84113029 020-84038746

电子邮件 jpa china@163.com

编辑出版 《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
(广州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印 刷 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传 真 020-84111478

网 址 <http://jpa.sysu.edu.cn>

Administrator Southern Publishing and Media

Sponsors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upporters Centre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resident: Bin Xiao

Editor in Chief: Junqiang Liu

Tel: 86 20 84113029 86 20 84038746

Fax: 86 20 84111478

Email: jpa china@163.com

Website: <http://jpa.sysu.edu.cn>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135 Xin Gang Xi Road, Guangzhou, China. 510275)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China)



刊号 ISSN1674-2486
CN44-1648/D

邮发 国内46-364
代号 国外BM8839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 20.00元

ISSN 1674-2486



9 771674 248210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ISSN 1006 — 4583

CN 11 — 3586/F

中国农村观察

ZHONGGUO NONGCUN GUANCHA

2023 2

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百年乡村建设

——基于政府治理的视角

.....吴理财 李佳莹 (2)

互动、信任与整合：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机制

——杭州市涝湖村案例研究

.....徐旭初 朱梅婕 吴 彬 (16)

从高音喇叭到低声微信群：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

——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

.....吴振其 郭诚诚 (34)

“本质意志”还是“本质力量”：中国村落共同体思维起点再探讨

.....刘 骏 闫楚涵 梁清云 (53)

“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机制解释

.....苏毅清 邱亚彪 方 平 (72)

制度逻辑与组织策略：对农村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执行偏差的一种新解释

.....高端阳 李 睿 王道勇 (90)

村规民约对农村养老福利的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浙江省衢州市 28 个村的观察

.....卢瑶玥 章 诚 方向明 (109)

家庭核心成员健康状况对农户农业生产性资产投资的影响

.....黄毅祥 廖 芮 赵敏娟 (126)

从“效率”到“公平”：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

.....王 轶 刘 蕾 (144)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农户家庭联结

.....陈玉生 (165)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 ★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A)
- ★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 英国《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文摘》(CABI) 收录期刊
- ★ “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外文版数字出版工程”首批精选期刊

第六届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 | |
|-----|-----|
| 尹成杰 | 刘振伟 |
| 江泽林 | 李春生 |
| 李培林 | 陈晓华 |
| 陈锡文 | 高培勇 |
| 韩俊 | 蔡昉 |

编委会主任

张晓山

编委

| | | |
|--------------------------------|-----------------|-------------|
| 万广华 | 王亚华 | 王延中 |
| 王曙光 | 叶敬忠 | 朱玲 |
| 朱晶 | 刘尚希 | 刘彦随 |
| 闫坤 | 孙宪忠 | 杜志雄 |
| 李连江 (Lianjiang Li) | 李周 | |
| 李翠霞 | 肖唐镖 | 吴国宝 |
| 何梦笔 (Carsten Herrmann-Pillath) | | |
| 辛贤 | 张永生 | 张晓山 |
| 张越杰 | 张翼 | 陈光金 |
| 青平 | 苑鹏 | 郁建兴 |
| 罗斯高 (Scott Rozelle) | 周飞舟 | |
| 郑筱筠 | 房宁 | 赵敏娟 |
| 胡武阳 (Wuyang Hu) | 党国英 | |
| 徐勇 | 温铁军 | 温涛 |
| 谭秋成 | 潘劲 | 魏后凯 |
| Louis Swanson | Rigoberto Lopez | Wim Heijman |

创刊时间: 1980 年

主管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出版: 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

主编: 魏后凯

副主编: 陈秋红

副社长: 陈秋红

编辑部副主任: 陈秋红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 100732

电话: (010) 85195649

投稿网址: <http://crecrs.ajcass.org/>

电子邮箱: ruralsurvey@cass.org.cn

印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6-4583
CN 11-3586/F

国内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内邮发代号: 82-995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邮发代号: BM4476

刊期: 双月刊 (单月 20 日出版)

国内定价: 50.00 元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农户家庭联结*

陈玉生

摘要：本文在“农地视角”的基础上叠加“农户视角”，建立家庭联结和户际关系两大理论范畴，以此研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户家庭联结现象及其变革。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受农户家庭联结形态的影响，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则受土地制度的影响。伴随中国农业集体化、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三权分置”等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从土地依附中摆脱出来，农村土地经营主体更加多元，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出现了从国家规制性联结向市场协议性联结的转变以及从直接联结向间接联结的转变，产生了“农户+”多元联结形态。“三权分置”顺应并增强了农民流动趋势，回应了新时代“地怎么种”问题，但没有回应如何规范农户多元联结的现实问题，因而存在制度缺口。

“土地联结”基础上的“合约联结”是当前农户多元联结形态的共性特征，“家庭联结合约制”在逻辑上可作为未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建设的基础，可以作为对“三权分置”的必要补充。

关键词：土地制度 农户家庭联结 户际关系 “三权分置” 家庭联结合约制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农户和土地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和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了中国农业经营形式和组织模式的变革（周其仁，1985）。那么，作为农业基本经营单位的成千上万的“农户”如何联结起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变革对农户间的联结形态有何影响？

本文认为，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农户与农户之间的联结，笔者将这种联结称为“农户家庭联结”。2022年9月26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村党组织+新型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各类经营主体通过领办、订单生产、流转入股等多种方式，与庭院经济经营户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实现庭院经济与产业链有效联结”“组织动员工业企业、帮扶车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编号：2019-01-07-00-02-E00047）以及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州农村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的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感谢陈风波、刘小流、唐斌和杜金沛4位老师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间将适合分散加工的产品延伸到庭院经济经营户”^①等有助于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该文件所提到的一些农业经营主体联结带动庭院经济经营户的现象便是本文所说的“农户家庭联结”。这说明，农户家庭联结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农户家庭联结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数量不断减少，跨地域、跨行业、跨城乡从事经济活动的农户数量则不断增多，农户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三权分置”制度实施以来，农村土地在原来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基础上又进一步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肖卫东和梁春梅，2016）。一些土地承包户“离土又离村”，一些农村土地经营户则“租地进村”，农地的经营主体越来越多元。原本相对一致的农户群体分化为从事农业和不从事农业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户，以及耕作自有承包地、在本村租地耕作和跨村租地耕作的土地经营户等类别。为使这些分散的农户适应大市场并与大市场相衔接，“公司+农户”“村党组织+新型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的“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不断涌现。当前，农民不断流动、农户日益分化，将农户组织起来的模式也不断更新，农户家庭联结形态越来越多元。为保障农户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将承包经营权用于抵押、担保等权利，为规范各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政府出台了许多规范性文件，力争打好制度补丁。不过，这些文件比较零散，无法系统调整和规范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虽然“三权分置”政策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有创新性规定，但其内容更侧重“农地”权属关系。它回应了“地怎么种”的问题，但对农户和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则缺乏系统规定，没能回应“农户怎么办”的问题。这留下一个制度缺口。“地怎么种”问题的焦点在生产力，“农户怎么办”问题的焦点在生产关系。笔者认为，这个制度缺口是关于生产关系的。“三权分置”创设了土地经营权，允许村集体和土地承包户之外的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经营土地，但是并没有创新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为此，本文尝试在“农地视角”基础上叠加“农户视角”，系统研究“农户+”这一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现象。为深入理解农户家庭联结现象，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变革及其相应的农户家庭联结情况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农业集体化、家庭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等不同时期所出现的农户与农户及农户与其他群体的联结形态。通过研究农户家庭联结的联结纽带有什么特征、联结关系如何、是直接联结还是间接联结等问题，本文将揭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农户间的联结形态和集群逻辑，以期为系统性调整和规范农业产业集群中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理论方案。

二、家庭联结的研究及其不足

社会科学绕不开“家庭”这一研究主题。在中国知网中以“家庭”为词条在篇名中检索发现，家庭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其一，对家庭内部系统的研究。这类研究将家庭视为由家庭成员组成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考察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和结构，以及家庭对内部成员的功能和

^①参见《国家乡村振兴局 农业农村部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见》，http://www.nrra.gov.cn/art/2022/9/30/art_50_196921.html。

作用,研究主题包括家庭关系、家庭照料、家庭教育、家庭结构以及家庭资产等(例如冯小茫,2018)。其二,对家庭外部环境的研究。这类研究将家庭视为一个实体,进而考察外部环境与家庭实体的关联状况,研究主题包括家庭政策、家政服务、家庭工业、家庭现代化、家庭变迁以及家庭迁移等(范芝芬,2013;韩央迪,2014)。其三,对家庭组织形式的研究。这类研究将家庭作为集结个人(家庭成员)的社会设置,并视家庭为初级群体和自然共同体的典型形式,考察家庭作为基本单元如何构成更大的社会整体,例如对家国关系、家庭主义、家户主义以及社群主义等的研究(赵汀阳,2003;肖瑛,2020)。

作为本文研究主题的农户家庭联结属于上述“家庭组织形式”研究范畴。为方便讨论,本文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联结形态与联通过程定义为“家庭联结”,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主体关系与关系网络界定为“户际关系”,将农户与农户之间的联结简称为“农户家庭联结”或“农户户际关系”。不过,通过中国知网以“家庭联结”或“户际关系”为词条在篇名中检索发现,没有相关文献。可见,现有的家庭研究缺乏户际关系这一观察视角。当然,关于家庭与家庭之间联结形态的研究文献很多。这些文献将家庭视为人类生活集群的基本单元(李猛,2015;肖瑛,2020)。那么,作为人类集群的基本单元,家庭与家庭之间有哪些联结形态?韦伯将“家户”视为构成家庭的诸‘自然关系’的前提;涂尔干也指出,“家”首先是经济共同体,无此即无“亲缘关系”(肖瑛,2020)。此外,研究表明,家庭也是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单位(李猛,2015)。可见,既有研究主要阐明了三类家庭联结形态:家庭社会共同体、家庭政治共同体和家庭经济共同体。

尽管被视为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共同体,但是,“家”在西方社会仍会受到宗教和政治的冲击。其一,奥古斯丁将个体从包括家庭在内的世俗共同体中抽离出来并将个体作为基督教的社会模式基点,家庭共同体因此以一种“去自然”的方式被解构(冯小茫,2018);其二,霍布斯等人从自然状态出发重构家庭,将家庭视为个体建立支配关系的环节,在此,家庭共同体以一种“自然”状态被纳入能够真正摆脱自然状态的国家政体之中(李猛,2015)。有研究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过程,现代社会科学也表现出远离“家”而拥抱个人主义的倾向(肖瑛,2020)。远离“家”似乎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魔咒。不过,宗教和政治虽然在解构和重构家庭并促成了个人主义,但并没有消灭家庭,而是产生了“宗教家庭主义”和“国家家庭主义”(韩央迪,2014)。家庭成为宗教教权和国家权力与个体自由权利之间的中间环节与汇聚交点。可见,虽然西方社会非常强调个人主义,而且家庭在宗教和政治两个维度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家庭对社会个体而言仍然具有很大的粘性,宗教和政治组织在集结社会大众时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家庭来实现。

相比西方社会,中国社会中的家庭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家天下”思想根深蒂固。儒家思想提倡个人经由修身养性的修己过程,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家庭义务和家庭组织观念被用以创造“家庭国家主义”(冯小茫,2018)。家庭在具有明显集体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发挥着明显的集群效应。赵汀阳(2003)依托中国传统思想,从家庭主义推导出天下主义。实际上,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并予以之隐喻天下的做法在中国历史实践中非常明显。徐勇(2013)因此认为,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家户制的社会结构,“家”是社会单位,“户”则是国家组织民众的政治单位,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

例如，基层社会体制中的保甲制、什伍制、连坐制等，均以家户制为基础。此外，一些经济学研究分析了家庭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合约关系（例如万江红和杨柳，2018）。肖瑛（2020）甚至提出：“以‘家’作为方法，就是透过‘家’这面多棱镜来理解各种社会组织以及民情的构成和变迁轨迹，洞悉‘家’建构社会的机制和效果。”

综上所述，家庭社会共同体、家庭政治共同体相关研究更加关注家庭在社会体制中的纵向联结，家庭经济共同体相关研究虽然关注家庭在经济体制中的横向联结，但它们均没有考察横向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联结关系和户际关系。由于缺乏家庭联结和户际关系视角，学界很难从学理上深刻理解一些问题。比如，当前各种“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中的农户家庭联结存在哪些模式？各种联结模式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如何统合这些农户家庭联结模式？这必然会影响到对“农户怎么办”这一现实问题的回答和处理。

三、理论视角、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对农户家庭联结的研究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因其关系到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基础。那么，如何阐明农户家庭联结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引入“民-群”视角予以考察。

（一）“民-群”视角

“民-群”视角是在融贯了中国古代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思想的“社会运行论”基础上提出的。从“民-群”视角看，可以将社会视为“民集聚成群”的形态与过程（陈玉生，2022）。民是群的基本构成单位，民个体通过集群和分群形成不同形态的群实体。冯仕政（2021）认为，每个人无论出于何种需要都必须与他人发生接触和交往这样一种属性就是社会性，一个人与他人的连结越多、越丰富，其社会性就越强。社会是由民构成的形态各异、相互嵌套的民群，若干农民的集群构成农户，若干农户的集群构成农村，若干农村的集群构成乡镇。基于此，本文以“民-群”视角阐明家庭、家庭联结、户际关系等概念，将家庭视为家庭成员集聚成群的一种集群形态，将家庭联结视为一个个家庭相互联络、相互结合从而形成群实体的过程，并以户际关系作为描述家庭联结结果的结构形态。

“民-群”视角以民集聚成群的时间过程与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不同民个体在群实体之中的化育、互动和结构化过程以及不同群实体之间的互构性、过渡性和系统性，研判社会运行过程和社会发展逻辑。那么，民集聚成群服从什么逻辑？《荀子·王制》讲，“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其原因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张觉，2006a）。荀子非常简明地阐述了民集聚成群的逻辑，这就是“名分使群”（陈玉生，2022）。“名分使群”思想在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表述。比如，《商君书·定分》讲：“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张觉，2006b）商鞅敏锐地注意到，在野外的兔子因为“名分”未定，可能引来许多人围捕。相反，在集市的兔子因为“名分”已定，连盗贼都不敢盗取。因此，“名分使群”包含集群与分群双重逻辑。农地犹如这只兔子，不同的土地制度形成不同的土地名分，不同名分引发农户间差异化的集群与分群状态，由此形成各种农户集群形态。

在传统农耕社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农户基本上依附于土地，他们往往通过集群

成村落进而形成乡土社会。这个时期，作为经济要素的土地和作为社会要素的农户在时空上彼此重叠。但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农户不断流动和分化，农户间的组织模式也不断更新，土地和农户在时空上开始重构。本文试图通过“民-群”视角考察农户家庭联结现象，进而阐明农户与农户之间因土地制度的变迁而产生的集群与分群过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多样化的农户集群形态，从而将“农地”视角和“农户”视角有机连接起来。

（二）家庭、家庭联结与户际关系

以“民-群”视角观之，家庭无非若干成员的集群形态。对“家庭”这一概念的理解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从构成单位看，“家庭”概念界定了其成员范围，即哪些人是家庭成员；从构成形态看，“家庭”概念明确了哪些“集群”形态可被称为“家庭”。王跃生（2016）区分了家庭、家户和家三个概念：家庭强调亲属关系及其成员之间的抚育、赡养、继承等权利义务关系，家户强调成员之间的共同居住和生活，家则包括家族之家和家人之家两种类型。王跃生所述家族之家超出了本文分析的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范畴，其所述家户也与徐勇（2013）所述家户有一定差别。徐勇（2013）认为，家户在中国是一种基本的经营组织体制，“家”是社会单位，“户”是政治单位。当前，“家户”还是一个有待学术界进一步阐明的概念，在政策法规中则普遍使用“家庭”称谓，例如家庭承包责任制、家庭经营等，本文因此也使用“家庭”概念，并参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中的做法，将家庭、家庭户和户统称为“家庭”。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其成员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家庭成员之间既有婚姻、血缘等基本关系，也有经济、居住等联系。家庭人口不仅包括居住在本户的家庭成员，也包括外出的家庭成员。与“集体户”相对，家庭户成员主要包括依据亲属关系而共同居住和生活的人。户与家庭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作为一户的首要条件是共同居住和生活（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2015）。因此，本文所述农户指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或经营权的家庭、家庭户和户。

家庭联结无非家庭与家庭之间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是一个个家庭集群的过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因血缘、业缘、交往行为、共同信仰、合约等因素而联结在一起，形成家庭之间相互作用的联结网络的过程，就是本文分析意义上的家庭联结。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村社会中，超越家庭的公共事务需要通过家庭联结来解决（吕传振和李华胤，2017）。家庭联结形成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家庭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联结主要基于社会自然演化所形成的社会归属感纽带，例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家庭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联结主要基于由政治体制与国家政策法规促成的国家规制性纽带，例如保甲制、什伍制等；家庭在经济共同体中的联结主要基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市场协议性纽带，例如“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等。根据联结纽带来划分，家庭联结有社会归属感联结、国家规制性联结和市场协议性联结三大类。在这三类联结形式中，有些家庭互为中介彼此直接互动，有些家庭则通过中间环节、中间媒介才发生联结。从联结是否有中间环节看，家庭联结可分为无中间环节的直接联结以及有中间环节的间接联结。

在三类联结形式中，当家庭与家庭之间形成较稳定的互动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时，就形成了“户际关系”。“户际关系”是家庭与家庭之间、住户与住户之间关系的简称，其具体含义类似人与人之

间的人际关系、村与村之间的村际关系。有些家庭虽有名义上的联结，但彼此之间没有实际的互动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则这些家庭之间便不存在户际关系。根据关系维系是否受正式制度或文件的约束来划分，户际关系可分为正式户际关系和非正式户际关系。基于家庭成员相互熟悉和了解的程度，以情感为纽带、通过非正式制度（例如邻里、联姻等）所形成的户际关系是典型的非正式户际关系。正式户际关系是指不同家庭因某种特定的目标集结，以明确的合约或正式制度为纽带形成的户际关系。例如，一个小区的住户因购房合同等协议的约定所形成的、在业主权利义务关系约束下的彼此联结，属于正式户际关系；成为邻里的住户之间在感情基础上所展开的往来互动，则形成非正式户际关系。

（三）农户、农户家庭联结与户际关系

农户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基本单位（陈风波和丁士军，2007）。费孝通（2009a）将以农户为单位从事农林牧副渔业活动形成的农村工副业称为“庭院经济”，并将其视为从农业到现代工业的一个中间形态。在费孝通看来，发展农村工副业的关键在于激活“家庭”活力。“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脚下是乡土性的小农经济。我们摸的石头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家庭。”（费孝通，2009b）

根据上文对家庭的界定，可将拥有农村土地承包权的家庭、家庭户和户统称为土地承包户，将经营自有土地或租赁土地的家庭、家庭户和户统称为土地经营户。辨别一个家庭是否为农户的前提是看其是否拥有某项土地权利，本文将拥有土地承包权或经营权的家庭称为农户。因此，应将不直接经营土地而只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家庭和整合了多个农户土地的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也视为农户。由于农业企业、国有农场、涉农社会组织等主体不具有家庭属性，因而不能将其作为农户看待。不过，由于地主、种粮大户、农业公司、国有农场、涉农社会组织等主体通常会联结多个农户，是形成农户家庭联结网络或农户户际关系网络的重要联结点，发挥着农户集群的枢纽作用，因而，可将其作为农户家庭联结的中间环节。农户家庭联结既包括多个土地承包户、土地经营户彼此发生的直接联结，也包括由涉农主体作为中间环节而形成的间接联结。

综上，本文采取“民-群”视角，建构了“农户家庭联结”和“农户户际关系”分析框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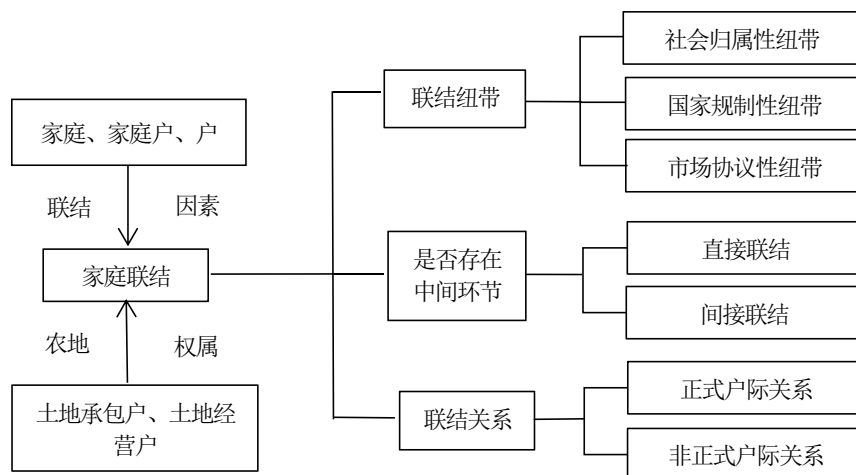


图1 家庭与家庭联结分析框架

四、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及其变迁

农耕文明和乡土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户在乡土社会中通常世居一处，形成了土地租赁制度下的地主与佃农等联结方式，又因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形成了村社、世族、家族等超越家庭的集群形态。传统农业以小农经营为主，农户组织化程度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家庭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等几次大的政策调整；农村土地经营形式则经历了从家庭经营到集体经营再由集体经营到家庭经营的转变过程。那么，在不同类型的土地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中，农户家庭联结形态有何变化？

（一）从集体合作到家庭经营

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村土地实行农民个体所有制。与此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也逐步启动。据杜润生（2005）回忆，1953年时中央领导人提出了“计划在10至20年之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的设想。至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7.8%（项继权，2014），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转变。随着合作内容和规模的扩大，农业合作化实际上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四个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集体经营阶段宣告结束。

农业合作化孕育了农户家庭联结的新形态。徐勇（2013）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有大量农户互助合作。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实行集体劳动和共同分配政策，超越并背离了农户制的互助合作。但是，从家庭联结角度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户家庭联结程度因土地集体化而不断加深。农户家庭联结形式从少数家庭联结发展为整村联结和整个公社的联结，农户的合作形式则从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合作发展为大部分生活资料的合作，合作程度不断提高。当然，农户并没有因此解体，家庭生活仍然存在，家庭的大部分功能（例如共同居住、子女教育、婚育、继承、赡养等）仍然被保留。总体而言，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范围内的农户家庭联结程度不断加深，农村形成了高度融合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农户之间则形成了非常紧密的直接联结，农户家庭联结的正式户际关系特征更加明显。

从“民-群”视角看，村集体通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加强了农户之间的家庭联结。在集体化运动中，土地所有权主体由农户转变为村集体，农户的生产经营功能和部分生活功能也被整合到村集体中。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不得不面临农户和村集体双层集群所形成的困境。例如，在工分制中就出现了劳动工分到底记在农民名义下还是记在农户名义下的问题。农民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难以像工厂工人一样将家庭和工作单位区分开来，陷入既是家庭成员又是村集体成员的角色扮演和身份选择困境中。

不过，土地家庭经营是数千年社会演化的结果，集体化时期的农民始终没有忘记一家一户经营土地的日子，单干诉求始终存在。实际上，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以户为生产经营单位的现象（例如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局部地区阶段性出现，农户作为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始终在发挥作用。周其

仁（1985）认为，在社会主义合作经济中引入农民家庭经营的做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合作化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但这一做法在 1978 年以前受到了打压和抑制。周其仁（1985）认为，联产承包开启后，有不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把生产队的规模划小，以作业组为单位承包土地。有的公社和生产队甚至将作业组划小到仅包括两三户人家，但农民还是不接受这一做法，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二锅饭”。这些事实表明，家庭经营之所以在农业领域具有普遍使用性，根本依据并不在于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人员的多少，而在于成员之间的特殊联系（周其仁，1985）。不过，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前后，农民高度依赖土地，农民流动和农户迁移现象均较少，作为农民集群形态的农户和村庄没有变，变的只是农户在村庄中互相联结的纽带和形态。

（二）从联产承包到经济合作

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实施。1978 年底，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分田到户为起点，以 1982 年发布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为标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土地制度逐步形成。

在这一时期，以土地为基础，农户之间形成了三重重要联结：其一，土地权利联结。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没有变，农户必须从享有土地所有权的村集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之间仍然通过土地集体所有权互相联结；其二，集体责任共担。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业集体化时期集体对国家的责任并未因此而取消。将集体的责任分解开来便是农户的责任，因而，农户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共同承担承包经营责任，共同向集体和国家负责，具体表现为农业税费的责任共担；其三，农村公共治理。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为扩大生产、提高收益，农户会采用各种策略，例如开荒垦荒、施用化肥、拖欠税费、增加劳动力、压缩子女受教育时间、精耕细作等。农户因第一种联结而与村集体内其他农户博弈，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更多更好的承包地，因第二种联结与基层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博弈，主要目的在于少交农业税费。由于农户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胜于对村集体和公共利益的关注，导致农业公共设施遭到破坏，农地因开发过度而地力下降，农村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加，其他农村公共问题也不断出现，农户之间不得不互相协作，共同应对这些问题。农村公共治理或社会治理成为新的家庭联结维度。总体而言，在农村土地“两权分离”基础上，农户因土地权利、集体责任和公共治理等方面的因素而相互联结。此时的农户家庭联结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规制性联结和直接联结特征，农户户际关系受土地制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约束，因而，正式户际关系特征非常明显。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农户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产品支配权的扩大，家庭经营的范围已经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流通领域，而且，家庭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由提篮小卖发展到大卖大买。“家庭经营同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联结起来……以适应更大规模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徐允权，1988）随之，农户又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将各种生产要素组织在家庭内部，由此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与此同时，农户类型也不断增加，专业户、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户等不断涌现。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在农村的深入推进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其中，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徐健和汪旭晖，2009）。农户在应对市场和公共关系时面临诸多风

险，驾驭市场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分享市场化红利。“分散生产的小农户受理性和能力局限难以驾驭市场交易伴生的风险”，例如，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他们“难免遭遇农产品‘卖难’问题”（万俊毅，2009）。因此，分散的小农户只有联结起来才能更好应对大市场的挑战。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大量惠农政策，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国家推进了新农村建设战略，取消了农业税，实施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措施。随着大量惠农惠民政策涌向乡村，农户成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分配的基本单位。许多惠民政策的落实均需要农户的参与和支持，需要将农户集结起来，这在客观上为农户之间的联结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不过，这些惠农政策虽然推动了农户家庭联结，但难以形成稳定的正式户际关系，对农户的组织也缺乏制度层面的设计，所以仍然难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万俊毅，2009）。小农经济因缺乏必要的规模和必要的组织，故未能引导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王剑锋和邓宏图，2014）。为此，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成为理论和实践领域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衔接困境的重要出路。实践中，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户开始单干，而在应对大市场时，农户之间又开始联结起来。以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例，农户通过集体所有的房地产或其他产业以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相互联结在一起，合作组织成员身份通常与村集体成员身份相重叠。农户在合作社的股份配置、红利分配、经营权管理权分配等事务中形成联结。这种农户合作组织是农户家庭联结方式的创新，对这一组织形态的研究不仅加深了学术界对农民组织化和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理解，也推动形成了新乡村建设学派、农民专业合作社理论流派和综合性农业合作社理论流派三大派别（魏丽莉，2013），而且还衍生出农民合作组织的两大发展思路：一是通过水平协同实现农户之间的协作，以增强农户的实力和市场地位；二是通过垂直协同加强农户与涉农企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徐健和汪旭晖，2009）。

从“民-群”视角看，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农户家庭联结仍然是农村土地“两权分离”基础上的联结。不过，这一时期的农户家庭联结呈现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农户集群领域超越了单纯的农地生产经营范畴，农户因土地经营、集体责任共担、农村公共治理、市场竞争、惠农政策、村集体经济等多种因素而彼此形成联结；第二，农户集群范围超越了区域边界清晰的村庄，形成了跨村镇、跨区域、跨行业、跨产业的广泛联结。

（三）从离土离乡到租地经营

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户生产经营形式的变革奠定了制度基础。2014 年 12 月，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开启，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随之，“三权分置”制度正式实施。农村土地确权、土地整理等工作不断推进，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不断提升。以“确份”“确四（四至边界）”等方式，政府进一步明晰了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归属，并在中央层面明确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的政策规定，确保了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因此，“三权分置”是使农户走出土地依附状态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随着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农户依托土地进行联结的方式更加多样，涌现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农户”、订单农业、家庭农场等多种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此时，一方面，部分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不再实际经营承包地，另一方面，部分具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农业主体却不享有土地承包权，农地出现了供需矛盾。为应对这种矛盾，土地经营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出现了农地的实际经营主体并非该土地承包户的现象，农村土地经营主体越来越多元。

这一现象指向一个新的农户家庭联结维度，即土地经营权基础上的联结。土地经营权进入交易市场，并不断从土地承包户转移到土地经营户手中。随着土地流转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新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对农地的实际经营和使用。新主体的进村，不仅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发生变动从而影响集体所有权的行使，还对耕作者经营权的设权、赋权和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刘守英，2022）。农村土地经营户以合约形式与多个承包户签订协议，农户家庭联结的中间环节越来越多。因此，在当前阶段的农户家庭联结中，合约联结和间接联结现象不断增多。可以预见，随着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的逐渐降低，农户家庭联结的对象将大大超出“乡土社会”范围，联结方式也会越来越多元。不过，这与欧洲工业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经济活动逐步脱离家庭的情况不同，家庭经营的韧性深刻体现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转型的独特路径（付伟，2021）。例如，虽然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服务对象、成员范围、组建模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别，但均以农户家庭联结为基础。又如，大部分家庭工厂以自有住宅为厂房，以家庭为单位购置机器、核计成本收益，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生产基础，生活生产不分离（付伟，2021）。从农户家庭联结看，“公司+农户”、“大农户+小农户”、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种农业组织形式，无不以农户为基本组成单位。在这些联结模式中，农户之间的协议性联结和间接联结以及农户户际关系的非正式关系特征均十分明显。

从“民-群”视角看，此时的农户家庭联结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土地经营主体通过租地进入农村，形成了以土地经营权为基础的农户家庭联结；其二，跨村庄、跨区域、跨行业、跨产业的联结主体更为多元，联结方式不断创新。参与集群的农户来源大大超出中国传统互助式家户联结的农村社区范围（徐勇，2013；吕传振和李华胤，2017）。可见，农户既更加独立，开始不断摆脱对土地的依附和对村庄的依赖，又具有与其他农户和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相互联结的现实需要，由此导致农户家庭联结形式更加多元。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经营权是建立在土地承包权基础上的，而土地承包权的基本单位就是农户，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必然是以农户为基础的集群。在这些新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中，土地承包户与经营户开始分离，农业经营户作为农户家庭联结主体的现象更加普遍，可将这种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形式称为“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综上所述，土地是农户家庭联结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历经农业合作化、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三权分置”三次重要改革。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农户家庭联结形态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如表1）。土地制度改革中农户家庭联结形态的变化印证了“名分使群”观点。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农地归集体所有，农户集群到村集体，经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过程，农户集群规模不断扩大，合作程度不断加深，这一时期的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具有明显的国家规制性联结和直接联结特征。在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户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农户从村集体约束和土地依附状态中脱离出来，农户集群领域超越了单纯的农地经营，集群范围超越了区域边界清晰的村庄，农户家庭联结由国家规制性联结和直接联结逐渐向市场协议性联结和间接联结转变。在“三

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进一步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联结的农户已经超出了村庄范围，拓展到村庄之外的多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随着“承包户离村”和“经营户进村”的不断进行，农户集群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复杂，农户家庭联结的市场协议性和间接联结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表 1 当代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变迁

| 时间节点 | 土地制度改革 | 土地权属创新 | 联结模式 | 联结形态 | 联结基础形式变迁趋势 | 具体联结形式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农业合作化 ^a | 集体所有权 | 生产生活资料合作 | 国家规制性联结；直接联结 | 从集体合作到家庭经营 | 从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
| 改革开放后 | 家庭承包责任制 | 土地承包经营权 | 土地生产经营；集体责任；公共治理 | 国家规制性联结+市场协议性联结；直接联结+间接联结 | 从联产承包到经济合作 | 从分散的农民组织到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 党的十八大后 | “三权分置” | 土地经营权 | “农户+”模式 | 市场协议性联结；间接联结 | 从离土离乡到租地经营 | 专业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农户、订单农业、家庭工厂、家庭农场等 |

注：a.笔者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的实现方式，可以将其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组成部分。

从土地作为经济要素的集群和农户作为社会实体的集群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和农户家庭联结的社会化程度均不断提高。一块农地的实际经营者不再固定，一个农户所联结的群体不再固化，农地和农户的流动性越来越强。然而，农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在农地“确权”之后更加清晰，走进村庄的土地经营户或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得与村集体和土地承包户发生联结，走出村庄的土地承包户同样不得与走进村庄的土地经营户或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生联结，这就产生了土地承包户和土地经营户的多元家庭联结。因此，虽然农地和农户的“颗粒度”更强了，但农户之间仍因农地经营活动而联结在一起，土地制度仍然会影响农户家庭联结的形态。

从土地制度变迁看，农村土地集体化和农业合作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同样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这两次土地制度改革是国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出的选择。“三权分置”则主要是根据农地实际经营现实状况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对社会变迁的背书。从家庭联结形态的变革看，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由家庭经营向集体经营快速变迁，农户也因此实现了快速合作化，农户因农业集体化而紧密联结在一起。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由集体经营快速向家庭经营调整，之前高度依赖村庄和土地组带的农户家庭联结开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松绑，农户从土地依附中逐渐摆脱出来，农户家庭联结形式越来越多元。

五、中国农户多元联结的共性与制度创新路径

随着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出现了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和租地进村等多种情况，农户分化成从事农业和不从事农业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户，以及耕作自有承包地、在本村租地耕作和跨村租地耕作的土地经营户。这些农户的联结表现出跨区域、跨行业、跨城乡等特点，农户除了彼此之间相互联结外，还与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互相联结，多种新的农户家庭联结方式不断涌现，呈现出“农户+”多元联结形态。

（一）“农户+”多元联结：当前中国农户家庭联结的趋势

农户是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行动主体，是中国许多地区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县域产业体系的重要经营主体（陈锡文，2012；王春光，2019）。农户走出村庄，参与到乡镇企业、县域经济、城市工商业等经济领域中。在乡镇企业的多种发展模式，苏南模式以村办、镇办集体企业为主，浙江模式以家庭经营为主。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浙江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县域块状产业集群。块状产业集群离不开家家户户的广泛参与，是家庭经营发挥作用的典型模式。可见，在产业集群演化、升级过程中，家庭经营始终是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付伟，2021）。县域内的块状产业集群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形态，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内涵。作为块状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经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本土社会现象。在工业生产中，家庭始终是一个独立、理性的经营决策单位，将积累的财富持续投入产业发展中。家庭工业推动中国工业化在基础薄弱的农村迅速发展、不断升级，是中国奇迹的重要精神因素（付伟，2021）。

农户走出村庄，融入城市社会空间。随着城镇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户迁居城镇。这些农户除保留原农村邻里之间的基本联结外，在居住空间上则形成了新的街区邻里联结或商品住宅小区的业主联结。此外，还有大量进城务工人员，他们较少将家庭迁移到工作所在的城镇，相当一部分人员还有家庭成员留守农村老家，这些农民工家庭的原有社会归属感联结纽带得以存续。许多农户虽离土离村，但他们因拥有农村土地权属而与其他农户或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仍然有所联结。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农户的家庭联结形态也在变化。本文以空心村和城中村这两类典型村庄为例展开说明。其一，“空心村”的农户向城镇迁移，原有的农户家庭联结受到影响。同一空心村的农户除在少数情况下集体迁居某处外，大多数农户所迁往的居住地是分散的。农户分散迁移后，原来维系农户家庭联结的传统乡土社会的邻里关系已经不在。那么，空心村的农户迁移后有哪些新的联结纽带？集体所有的土地仍是联结农户的纽带，但其作用必然逐渐弱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的实施为农户家庭联结提供了契机。村“两委”和其他社会组织将发挥中介作用以推动农户家庭联结，虽然空心村的农户家庭联结会因土地、惠农政策、社会组织等的纽带作用而继续维持，但这一现象必然不断减少。其二，“城中村”农民已基本实现就地城镇化，他们与“空心村”农民不同，由邻里关系维系的农户家庭联结依然存在，惠农政策和社会组织等联结纽带同样在发挥作用。“城中村”土地的主要用途发生了转变，土地不再用于农业耕种，而多被用于房地产。村民通常通过组建经济合作组织的方式来经营这些房地产。这种依据村民身份配置股份的合作社，既是村民个人的联结载体，也是农户的联结载体。集体土地基

础上的合作经济组织（例如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济联社）强化了农户家庭联结。“人口城镇化使得人地关系发生实质性松动，农地对农民的经济重要性下降，农村集体土地的成员权逐渐从侧重于占有和使用等权能的财产权变成侧重于流转和收益等权能的身份财产权。”（刘守英，2022）对离村离土的农户而言，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能的重要性下降，流转和收益权能的重要性则不断上升。

综上，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不深入，农户相继集结到乡土社会、村集体、大市场中。“三权分置”进一步赋予了农户更多的自由，但农户间的联结纽带也因此开始松动，农户之间形成了土地集群基础上的“农户+”多元联结形态。农户因工业化和城镇化而不断离土离村，并在非农业领域和非农村区域形成新的集群。农户逐渐分化为两种类型：离土离村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农户既因自身经营土地或者流转土地而与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生联结，也因自身离村离土融入工商业领域和城市社会空间而与其他群体发生联结，农户家庭联结出现了农村集体土地基础上的“农户+”多元联结的发展趋势，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集群基础上的“农户+”多元联结发展趋势。在这两种趋势下，农户家庭联结面临一些困境。一方面，尽管对农地联结基础上的各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均有相关制度加以规范，但是，这些制度侧重规范农地权属，较少规范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没能系统调整农户与其他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使得组织农户集约化流转土地、组织农户参与市场竞争缺乏系统的规范。另一方面，农户集群到工业领域和城镇区域之后，又难以平等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些农户在逻辑上只能逐渐融入工商业系统和城市社会。两种趋势交织在一起，构成当前中国农户家庭联结的现实图景。

总之，农户家庭联结的深层基础并没有变，这个基础就是乡土社会中的村庄以及当前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家庭承包责任制及其基础上的“三权分置”将农户从依赖村集体和依附土地的状态中释放出来，农户不再局限于乡土社会空间内部。但是，农户在摆脱土地依附后，又进入“农户+”的多元联结形态中。农户之所以为农户，其前提条件就是拥有农村集体土地的某项权利（承包权或经营权）。家庭承包责任制及其基础上的“三权分置”制度将农户从依赖村集体和依附土地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农户不再局限于乡土社会空间、不再依附于农村土地，土地也不再局限于只由其所在村集体的农户来经营。在摆脱土地依附后，农户进入“农户+”多元联结形态中。那么，如何统合“农户+”多元联结形态？如何实现系统化联结和制度化联结？实践经验没有给出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因而必须通过理论分析来寻找。

（二）合约联结：中国农户多元联结形态的共性特征

解决农户多元联结后的统合问题，首先需要找到统合的基础。寻找统合基础，就要厘清各种农户家庭联结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关系，厘清普遍关系，明确共性特征。只有认识清楚事物之间的共性，才能把握矛盾，找到统合的基础。那么，“农户+”多元联结形态是否具有共性特征？如果有，共性特征到底是什么？共性特征是否具有统合“农户+”多元联结形态的可能？不同土地制度下有不同农户家庭联结形态。虽然当前的家庭联结形态复杂多样，但仍然有迹可循，一些联结脉络便渗透于各种联结形态之中，其中之一就是“合约”。那么，将农户家庭联结起来的“合约”到底是什么？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合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大概形成了两大视角：

第一，将国家政治制度和政策规范视为“合约”。有研究认为，“三提五统”可以视作乡、村两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费用合约。因此，无论是农业合作化还是家庭承包责任制，都可以从合约角度去分析。而且，随着土地制度的变迁，签约主体以及合约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徐宝亮和邓宏图，2018）。另有研究指出，在“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农户”阶梯型农地合约结构下，土地承包户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利益得以实现，农地经营权得到保障，农业绩效得以提升（刘守英等，2021）。这类研究将规制农户及多元主体之间关系的制度规范视为合约。

第二，将“合约”视为市场主体之间的私人协议。这些合约主要是私人之间签订的，例如土地流转合约、农产品订单合约等。以“公司+农户”为例，在这一模式中，公司和农户双方订立购销合同，由公司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实际上就是以公司为中心、通过合约将多个家庭组织起来的联结模式。“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中的订单合约便属于这类私人协议（聂辉华，2008；黄梦思和孙剑，2016）。

不同农户的缔约方式有所差别。在进城后，土地承包户被整合到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诸多群体中。这些农户家庭联结的实现，主要通过国家规制性联结和市场协议性联结两种方式。自己经营承包地的农户主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农户”“订单农业”等中间环节联结在一起，农户与中间环节主体签订的协议主要是私人协议。土地经营户的家庭联结主要受市场机制调节，一方面，他们要与土地承包户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进而成为土地承包户之间家庭联结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签订农产品订单合约等方式，与规模更大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形成联结。

总之，将农户家庭联结起来的“合约”既可以是私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也可以是国家法规政策制度。农户家庭联结形式可概括为以下类型：农村邻里关系联结、农村土地制度联结、农业经济合作联结、农村公共服务联结、农村公共治理联结、农村社会组织联结。然而，无论是哪种形态，农户都经由各类合约达成联结关系。上文提及的各种农户家庭联结模式，均内含“合约”因素。通常情况下，这些由合约联结起来的农户彼此拥有非常相近或对等的权利和义务。笔者将这种通过“合约”方式来形成家庭联结定义为“家庭联结合约制”。家庭联结合约制是指家庭之间或者家庭与处于平等地位的自然人和法人等主体，通过签订协议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形式。

（三）家庭联结合约制：中国农户家庭联结的制度创新路径

“家庭联结合约制”有何理论和实践价值？从土地制度变革时期看，从农业集体化到“三权分置”，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基础上衍生出承包权和经营权，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家庭农场、家庭承包经营均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这类农户又在土地纽带下形成了多种联结形态。“三权分置”虽然顺应了家庭联结的多元化发展形势，但是并没有为多元家庭联结与海量户际合约提供制度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户集群到城市社区生活。农户在离土离乡后，既需要理顺原农村农户之间因土地关系所形成的家庭联结关系，又需要理顺在新居住地形成的新的家庭联结关系。当前，近3亿农民工进城^①。在如此规模的农民逐渐向城市集群的背景下，没有理由不对数量庞大的农村土地承包

^①数据来源于杨梦帆（2021）。

户、农业经营户彼此之间的联结关系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系统的规范和调整。例如，到底将农村土地流转补贴发放给转出土地的承包户，还是发放给转入土地的经营户？这不仅会影响农地的收益分配情况，还会影响补贴效果（张建等，2017）。从国家相关制度建设情况看，当前大量针对“农户+”多元联结模式的政策都是在被动适应社会变迁，往往是作为制度补丁不断被提出来，比较零散，与实践需要相比相对滞后。因此，从现实需要和政策优化角度看，亟需出台制度来战略性、系统性、全局性地调整和规范农业产业集群中农户家庭联结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那么，如何创新农户家庭联结的制度？如前所述，“农户+”多元联结形态均包含“合约”因素。这些合约既包括国家的正式制度规范，也包括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各种主体同家庭签订的协议。虽然这些合约非常分散，但将其统合起来的可能线索就是本文所发现的“家庭联结合约制”。本文认为，“家庭联结合约制”可作为规范调整多元农户家庭联结关系中农户与其他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创新路径。笔者认为，创新“家庭联结合约制”需要以家庭为视角充分考察家庭所面临的处境：第一，家庭联结合约制作为新选择，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趋。在信息化背景下，打通跨区域、跨城乡、跨领域、跨产业的家庭联结合作通道，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第二，当前的多元农户家庭联结模式以组织联结为主，但企业组织联结和社会组织联结相互分离，城市社区和工厂企业联结与乡村土地联结相互分离，由此导致规范和调整各种联结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政策制度碎片化，难以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需要。第三，家庭联结合约制的制度建设方案，需要将家庭的发展提升到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战略高度；需要以当前税制改革和鼓励生育政策为契机，强化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需要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经济社会制度建设中有关家庭联结的模式，用家庭联结合约制来全部进行整合；需要充分整合以家庭为单位的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充分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潜功能，积极利用财政政策促进家庭发展和家庭联结，确保每个家庭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两方面均有签约机会和合约保障。第四，可以预期，家庭联结合约制将有利于促进构建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家庭互助和家庭社会责任，调动家庭成员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

本文重点分析的是农村土地经营过程中和农业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农户家庭联结。那么，“家庭联结合约制”能否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创新方案？如果以之为创新方案，又当如何实践？

从逻辑看，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家庭联结合约制”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基本形式，小农经济、农业合作化、家庭承包制等都以农户为基本单位，都是农户家庭联结形态的表达。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千万个农户与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如何组织起来？对此，笔者认为需要转换思考方式，从农村土地集群和农业产业集群转换到农户集群。农村土地集群和农业产业集群通常关注农业生产要素（例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的集合形态，农户集群考察的则是农户之间以及农户与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联结过程与关系网络。从逻辑上看，应在农户集群基础上构建农业产业集群，即在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效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安排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因此，从理论推演看，本文认为“家庭联结合约制”是可行的。

从形势看,伴随“农户+”多元联结趋势的出现,农地流转从村社内部熟人之间的流转向非熟人之间的市场化流转转变。从法律社会学角度看,熟人之间的交易更倾向于诉诸非正式社会规范,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则更倾向于诉诸正式社会规范。那么,国家如何应对这种转变趋势?随着农户家庭联结形态的多元化以及联结方式的日趋“合约化”,国家必然要规范管理联结主体之间的合约关系。围绕土地权益所形成的有关农户之间的契约化联结本质上表达的就是家庭之间彼此联结的合约过程。耿鹏鹏和罗必良(2022)的研究认为,农村治理样态发生了变化,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关系型”传统乡村治理秩序正在向契约化、正式化、法制化的“契约型”现代村庄治理体系转变。可见,逐渐以合约方式调整乡村社会秩序是形势所趋,“家庭联结合约制”则顺应了这种趋势。

从实践看,可以从“土地承包户”和“土地经营户”两类农户入手,将联结这两类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方式及其相关制度规范进行合并立法或立法协调,以便系统调整两类农户及其相关主体的行为规范和权利义务关系。例如,可以对现有联结多个土地承包户或土地经营户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家庭农场等多元农户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的有关规定进行合并立法或立法协调。当前,推进工作可从两方面开始:其一,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和农业农村实际情况,明确农业生产经营目标,甄别清楚哪些农户家庭联结模式应该阻断,哪些应该维持,哪些应该创新,进而描绘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蓝图。其二,进行区域试点,先试点后推广,具体试点内容要从农户家庭联结角度出发,整合“农户+”相关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中的各项制度规范,以便形成更加宏观的调整农户家庭联结中各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文本。

综上,如图2所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制度历经三次重大改革,农地和农户流动性不断加强,土地承包户离土离村和土地经营户租地进村现象同时发生,集结土地承包户和经营户的农户家庭联结模式不断创新,“农户+”多元联结趋势越发明显。从“民-群”视角看,三次重大土地制度改革均蕴含着集群和分群逻辑,农业集体化促成农户之间的规制性联结,但农户通过包产到户方式实现单干的愿望始终存在。最终,家庭承包责任制顺应了农户的单干意愿,农户从土地依附中被释放出来,并很快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然而,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为应对这一矛盾,将农户组织起来的制度和政策纷纷得以出台。农户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离土离乡不断集聚到工业领域和城镇区域,多地出现农地撂荒和空心村现象,对此,国家适时出台“三权分置”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进一步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这一制度促进了土地经营户和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村租地,促使农地集聚了更加多元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土地承包户离土离村和土地经营户租地进村背景下,农村出现了“农户+”多元联结形态。虽然“三权分置”制度回应了土地集群问题,但没能回应农户分群现状和农户集群需要。在农户多元联结后,如何将各种“农户+”联结形态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统合起来,成为现实问题。本文提供的解决方案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在农户家庭联结的共性特征(合约性)基础上,创新家庭联结合约制,从而解决“三权分置”制度留下的“农户怎么办”问题和农户统合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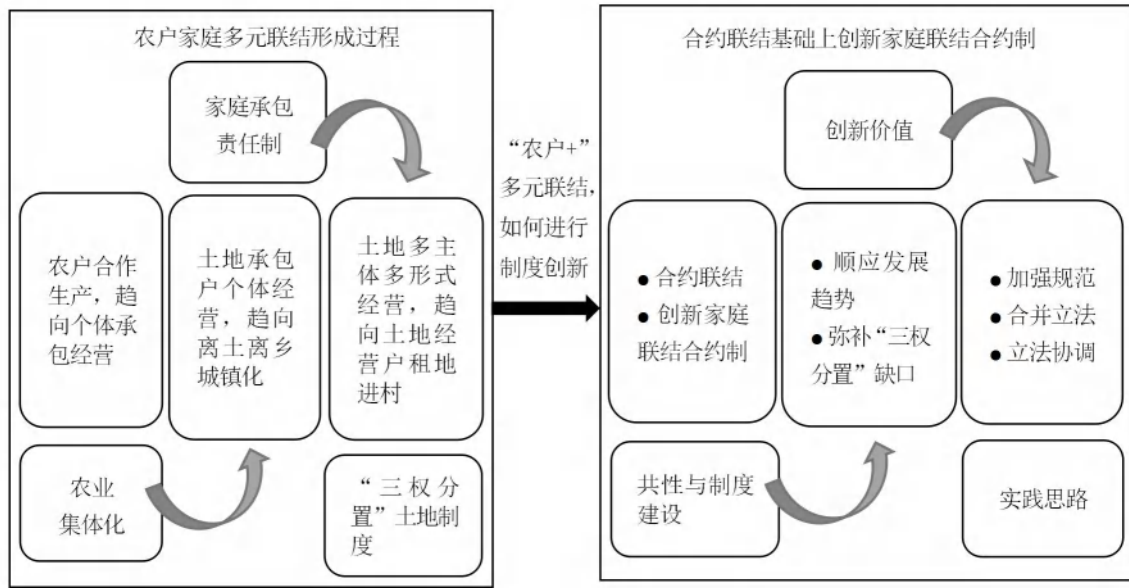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变迁与家庭联结合约制创新思路

六、结论

本文是从“民-群”视角研究农户集群现象的一次尝试。通过建立考察农户家庭联结现象的分析框架，本文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农户家庭联结形态。研究发现：土地是农户家庭联结的基础。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农户家庭联结形态也不断变化。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户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不断加强合作，农户家庭联结形态主要为国家规制性联结，所形成的户际关系以正式户际关系为主，但这一时期出现了农地家庭经营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后，国家顺应历史趋势，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户生产经营自由度和自主性大大提升，农户家庭联结出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土地分户承包和共担责任的联结维度，并因此形成了农户间的公共治理联结。不过，家庭承包制下的小农户在大市场环境下仍处于弱势地位，各种将农户有效组织起来的联结方式纷纷出现。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农户不断离土离村。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顺应历史趋势，制定“三权分置”制度，农户从土地依附中摆脱出来，土地经营户租地进村，农户家庭联结形式更加多元。此时，农户之间的间接联结程度有所加强，并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农户家庭联结在三次土地制度改革中均服从“名分使群”逻辑，始终包含集群和分群两种力量。将小农户组织起来以应对大市场，始终受到农户集群和土地集群中的“统”和“分”两股力量的作用。农业集体化运动促成了农户集群，但农户单干的分群趋势始终存在。包干到户促成了村集体的分群，但因小农户难以应对大市场，又产生了大量的“农户+”集群。然而，这样的“农户+”集群模式是多元的，农地流转和农户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为解决农地利用问题，国家实施了“三权分置”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进一步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农户+”集群模式的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强化。当前，土地仍然是农户家庭联结的基础性媒介，未来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将趋向多元联结、市场协议性联结和间接联结。在这一背景下，多元农户家庭联结形态的统合与规制成为现实问题。家庭联结合约制是多

元农户家庭联结形态的共性特征，在逻辑上可以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建设的基础。当前，既需要进一步规范农户之间的私人合约，以便保障农户利益，又需要在农户规制性联结的各类合约制度方面加强立法协调或合并立法。

总之，从土地集群和农户集群角度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合作化为农户家庭联结提供了规制。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责任制同样起到约束农户家庭联结的作用。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土地承包户离村与多元土地经营主体进村现象不断产生，并出现了多元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如何将各种“农户+”联结形态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统合起来，成为现实问题。从农户视角看，这是一个相对于“地怎么种”而言的“农户怎么办”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家庭联结合约制”，并将其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路径。

参考文献

- 1.陈风波、丁士军，2007：《农户行为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对民国以来江汉平原的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第3页。
- 2.陈锡文，2012：《把握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变迁的脉搏》，《开放时代》第3期，第112-115页。
- 3.陈玉生，2022：《意象互动、文质世运与样子使群研究》，《社会理论学报》春季刊，第75-114页。
- 4.杜润生，2005：《杜润生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9页。
- 5.范芝芬，2013：《流动中国：迁移、国家和家庭》，邱幼云、黄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15页。
- 6.费孝通，2009a：《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费孝通全集》（第1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24页。
- 7.费孝通，2009b：《豫中行》，《费孝通全集》（第1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55-71页。
- 8.冯仕政，2021：《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从连结到团结》，《社会学研究》第1期，第1-22页、第226页。
- 9.冯小芒，2018：《古典家庭的解构与婚姻的圣化：奥古斯丁对社会基本单元的新构建》，《社会》第3期，第136-169页。
- 10.付伟，2021：《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以浙江省H市潮镇块状产业集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146-165页、第207页。
- 11.耿鹏鹏、罗必良，2022：《农地确权是否推进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管理世界》第12期，第59-76页。
- 12.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2015：《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第5-6页。
- 13.韩央迪，2014：《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21-28页。
- 14.黄梦思、孙剑，2016：《复合治理“挤出效应”对农产品营销渠道绩效的影响——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第17-30页、第54页。
- 15.李猛，2015：《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48-160页。
- 16.刘守英，202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三权分置》，《经济研究》第2期，第18-26页。
- 17.刘守英、颜嘉楠、冀县卿，2021：《集体地权制度下农地合约选择与经营体制变迁——松江集体村社型家庭农场

的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第19-41页。

18. 吕传振、李华胤，2017：《家户联结：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社会因素》，《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69-75页。

19. 聂辉华，2008：《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一个带有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经济研究》第2期，第132-143页。

20. 万江红、杨柳，2018：《补充与补偿：以合约治理合约的双层机制——基于鄂中楚香家庭农场农业经营合约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第53-69页。

21. 万俊毅，2009：《“公司+农户”的组织制度变迁：诱致抑或强制》，《改革》第1期，第91-96页。

22. 王春光，2019：《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第86-103页、第206页。

23. 王剑锋、邓宏图，201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效、影响与变迁机制辨析》，《探索与争鸣》第1期，第31-37页。

24. 王跃生，2016：《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分”与“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91-110页、第207页。

25. 魏丽莉，20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理论流派及其比较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

26. 肖卫东、梁春梅，2016：《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基本要义及权利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第17-29页。

27. 项继权，2014：《我国农地产权的法律主体与实践载体的变迁》，《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5-14页、第22页。

28. 肖瑛，2020：《“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第172-191页、第208页。

29. 徐宝亮、邓宏图，2018：《农地制度变迁的机理与合约分析：生产队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110-118页、第166页。

30. 徐健、汪旭晖，2009：《订单农业及其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第39-47页。

31. 徐勇，2013：《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第102-123页、第207页。

32. 徐允权，1988：《一个新概念：发达的家庭经营》，《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29-36页。

33. 杨梦帆，2021：《全国1亿多各类市场主体承载近3亿农民工就业》，《农民日报》9月7日第002版。

34. 张建、冯淑怡、诸培新，2017：《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市场会加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基于江苏省四个县的调研》，《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第104-116页、第159页。

35. 张觉，2006a：《荀子校注》，长沙：岳麓书社，第95页。

36. 张觉，2006b：《商君书校注》，长沙：岳麓书社，第189页。

37. 赵汀阳，2003：《“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第5期，第2-33页。

38.周其仁, 1985: 《家庭经营的再发现——论联产承包制引起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第31-47页。

(作者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马太超)

Pattern of Rural Household Bonding During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CHEN Yushe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ehold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attern of rural household bonding and constructs a framework of household bonding and inter-household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land system reform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e find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re influenced by the form of rural household bonding, which is affected by the land system. During the reform of China's land system with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Types of Rights, rural households have been liberated from the dependence on land, and rural land operator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Moreover, the pattern of rural household bonding has changed from the state-mandatory and direct bonding to the market-oriented and indirect bonding, where the "rural household +" pattern of multi-party bonding has appeared. The land system of Separation of Three Types of Rights adapts to and accelerates the migration flow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addresses "how to plant the land" in the new era. However, it does not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regulate the diversified bonding of rural households, leading to an institutional gap. The "contract bonding" based on the "land bonding" is the common feature of the current multi-party bonding of rural households. The "household contract bonding system" can logically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utur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as an innovative path to fill the gap of the land system of Separation of Three Types of Rights.

Key Words: Land System; Rural Households Bonding; Inter-household Relationship; Land System of Separation of Three Types of Rights; Household Contract Bonding System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扩版及征文启事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简称“两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 AMI 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FMS 管理科学高质量期刊和“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外文版数字出版工程”首批精选期刊等。《中国农村经济》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首批重点资助期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重要学术期刊等。2022 年，《中国农村经济》复合影响因子为 14.046、综合影响因子为 10.264，在 488 种经济类学术期刊中排名第三（排前两位的分别为《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研究》）。《中国农村观察》复合影响因子为 8.833，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5.972，在 488 种经济类学术期刊中排名第九。

为适应新时代学术研究发展需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构建，《中国农村经济》于 2023 年第一期、《中国农村观察》于 2022 年第一期开始扩版至 184 页。

《中国农村经济》除刊发经济学、管理学“三农”研究领域优质成果外，从 2023 年 1 月扩版开始，还刊发经济学、管理学其他研究领域为实践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新知识的学术论文，注重论文的学术性和政策指导性。

《中国农村观察》刊文领域包括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法治、文化、教育等“三农”研究的各个领域，注重论文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来稿应突出原创性、思想性、前瞻性与方向性，既可是计量研究，也可是案例研究，尤其欢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辨性、观点性文章。

两刊坚持以质取文，实行双向匿名审稿，不以任何形式收取审稿费或版面费。稿件一经录用，即付稿酬 1000 元；被选为带头稿（每期首篇），则付稿酬 2000 元。

欢迎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踊跃投稿！

两刊有独立的在线投稿系统，同一稿件请不要同时投稿。

《中国农村经济》在线投稿网址：<http://crecrs.ajcass.org/> 或 <http://crecrs-zgncjj.ajcass.org/>

《中国农村观察》在线投稿网址：<http://crecrs.ajcass.org/> 或 <http://crecrs-zgncgc.ajcass.org/>

咨询电话：010-85195649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农村观察
二维码



官方订阅微店

ISSN 1006-4583



9 771006 458232



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RUC

作品转载通知

陈玉生 同志：

您发表在《中国农村观察》 2023 年第 02 期的
文章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农户家庭联结 被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F13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23 年第 07 期全文转载，特此函告，并致以衷心感谢！

由于复印报刊资料是二次文献，我们需再次核实您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准确地为您提供相应服务。敬请您认真阅读《作者俱乐部启事》，并将《作者俱乐部会员表》填好后，通过拍照发电子邮箱、邮寄或传真返回，我们将按照您的意愿和确认的联系方式为您提供相应的服务。



ISSN 0257-5833
CN 31-1112/Z

社会科学

总第507期
1979年创刊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投稿须知

第一, 来稿须系作者独立研究完成的原创性作品, 且从未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包括期刊、报纸、专著、论文集、学术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并确认不存在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重复发表、违背研究伦理, 以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文中引文、注释和其他资料, 应逐一核对原文, 确保准确无误; 如使用了转引资料, 应实事求是注明转引出处; 如本刊确认需要, 作者有责任将相关资料内容的纸质复印件或PDF等格式的电子文件提交给编辑部备查。

第二, 单篇来稿以15 000字左右为宜, 附带中文摘要(300~500字)、关键词(3~5个), 英文题目、摘要与关键词, 格式请遵照“《社会科学》编辑体例规范”(可在本刊微信公众号下载), 并提供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技术职称、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基本信息。

第三, 本刊对来稿执行编辑部三审与专家匿名审稿相结合的审稿制度, 稿件正文中请勿出现作者个人信息。自投稿之日起一个月内, 未接到编辑部明确通知“初审通过”的稿件, 即可自行处理。

第四,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3098272。

第五, 本刊有权对来稿做文字性删改, 有特殊要求者请在来稿时注明。

第六, 作者向本刊投稿, 即为授权许可本刊对稿件享有长期使用权, 包括本刊享有发表、出版、复制及发行等权利, 且本刊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作者稿件及本刊全文。如未注明非专有许可, 视为专有许可。

第七, 来稿一经刊用, 即付稿酬, 并寄送样刊。包括纸版和数字化使用在内的著作权授权使用费, 包含在编辑部一次性支付给作者的稿酬中。

第八, 本刊不再接受纸质打印邮寄投稿, 来稿请将电子文本发送到相应学科的信箱: 哲学(shkxzhx@126.com); 历史学(shkxls@126.com); 文学(shkxwx@126.com); 政治学(shkxzz@126.com); 经济学(shkxjj@126.com); 社会学(shkxsh@126.com); 法学(shkxfx@126.com); 综合(shhkxzh@126.com)。

社会科学

2022年第11期 总第507期

主编: 姜佑福

副主编: 周小玲

编辑部: 周小玲(主任) 薛立勇 陈炜祺 李亦婷 罗燕(执行编辑)
束赟(兼职) 张广婷(兼职) 刘芳(兼职)

出版发行: 纪敏 特约校读: 王瑞祥 英译校订: 杜磊 美术编辑: 孙京

目次

方法、体系与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

- 5 分析方法的视角缘起、限制与超越之路 郭台辉
- 16 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 陈玉生

30 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

——兼议哲学话语的内涵与意义 杨国荣

36 从“何以可能”到“如何实现”

——论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黑格尔辩证法原型 王时中

45 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展望 李乾坤

54 “朱门白屋，转眼变迁”：晚明士大夫的成长及家族发展

——以万历二年进士支大纶及其家族为中心 冯贤亮

68 投鸣解纷：清代民间纠纷化解的实践及法律意义

——以徽州投状文书为中心 郑小春 陶良琴

79 13—14 世纪的知识谱系与元代文人的书写 邱江宁

90 绅界变迁与四川近代“社会”的兴起

——重读李劫人“大河小说”的一种视野 袁红涛

102 天下文明的重建：孟子儒学的仁义政教论 张广生

113 测量抑或规训：对政治评估指数的评估 张萌萌 杨雪冬

129 数字金融提升我国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研究 张宗新 张 帅

140 碳排放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回报 沈红波 李逸君 王霖野

15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社会政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李迎生

160 医疗暴力事件如何影响医患信任

——基于认知与归因的视角 池上新

174 变法思想家的“制度认知落差”：康有为与韦伯论德国宪制 章永乐

方法、体系与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

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

陈玉生

摘要：如何研究社会世界，是哲学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议题，国内外学界对此争论不休，需要凝聚共识。社会科学统一于“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包括有关社会世界“是什么”的本体创新、“为什么”的解释创新、“怎么办”的技术创新。社会科学方法服从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包括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导赏社会世界服从“以名责实”策略；表征社会世界服从“循证考据”策略；评判社会世界服从“对标研究”策略；干预社会世界服从“技术检验”策略。其中，“对标研究”是指研究者通过理念和经验互相参照的方式评判社会世界的过程。根据对理念和经验两端的确信程度不同，评判社会世界包括“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社会科学；创新发现；本体创新；对标研究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22) 11-0016-14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2.11.002

作者简介：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引言

如何认识社会世界？哲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展开了历久弥新的理论对话，^①体现于唯理论与经验论两种认识论，本质主义与表象主义两种科学观，符合论、融贯论、冗余论、约定论、实用论、语义论等多种真理观，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思维，实证主义、解释学、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四大理论流派，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证实与证伪两种科学检验方式，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两种科学态度，等等。韦伯曾指出：“‘抽象的’一理论的方法与经验的一历史的研究处在一种无法调和、明显无法消除的对立之中。”^②近年来，国内学者试图克服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困境，比如，洪大用在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和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基础上提出实践自觉，指出学术研究要直面中国社会的事件巨变，创造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③黄宗智倡导实践社会科学，并以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④赵鼎新基于中国道家思想等建构对西方社会科学具有挑战性和突破性的方法论，如道家时间、本体创新等理论。^⑤但是，国内方法论研究同样面临二元对立困境与论战。渠敬东立场鲜明地批

① 郭台辉：《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② 转引自王楠：《价值的科学：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再探》，《社会》2014年第6期。更多论述可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Max Weber, *Collected Methodological Writing*, translated by Hans Bruu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③ 洪大用：《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④ 黄宗智、罗雯、聂锐：《基于中国现实的社会科学探索》，《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⑤ 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

判“方法主义”，倡导社会研究要有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①可见，任何哲学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无法调和、无法消除”的二元对立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正视社会科学中的诸多论战并发现其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为应对多元理论之争，哈贝马斯提出商谈理论，布迪厄提出生成结构主义，吉登斯提出行动—结构二重性理论，他们共同致力于走向综合的社会科学，即使结果未必如其所愿。对此，谢立中认为，许多意见分歧实际上是“话语之争”。^②实际上，各种主义越是主张世界统一于其阐明的主义之中，越是证明世界可从不同角度观察从而达成其自身的整体性。故而，社会科学研究不过是不断探索发现社会世界的过程，我们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回到产生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科学活动本身，阐明社会科学行动的逻辑。

本文主要勘察哲学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进一步阐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如何发现和报告社会世界。主要观点为：社会科学统一于“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创新发现服从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四种方法；其中，评判社会世界服从“对标研究”策略，包括“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求真、求全、求新：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

社会科学往往有“客观有效性”和“普遍代表性”两大追求。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免不了会受两个基本问题的“诱惑”：一是求“真”——探寻生活中真实的社会存在；二是求“全”——生活的真实若不能说明社会全体的脉络和逻辑，自然就难说是“社会”科学的。^③但是，求真求全只指向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即手段取向，而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断求“新”，发现社会世界，即目标取向。

1. 求“真”

哲学认识论对到底什么是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形成了符合论、约定论等诸多真理观。这些真理观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科学并形成了诸多实现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研究方法，如价值中立、悬置前见、反思社会学等。

第一，“价值中立”防线。为确保社会世界研究的科学性，韦伯提出了价值中立的观点。随后，许多研究者以此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要求。但是，韦伯将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实际上分为四个步骤，只有其中的第三个步骤，即以“理想类型”评判和解释“历史个体”时才在科学研究行为本身逻辑上可实现价值中立。^④这个过程就是“范畴整理实在”，也就是以理念评判经验的“对标研究”（下文将阐述的概念）过程。其他三个步骤，包括基于先验前提确立文化现象、基于文化意义和科学兴趣确立研究对象和理想类型、基于价值中立和责任伦理为科学结论的适用立法，均包含着文化意义、科学兴趣、价值选择、责任伦理等。

第二，“悬而不论”策略。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常采取“悬置”方法。“悬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排除了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和观念之后对访谈对象所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和认识。应该说，它与研究者感受被访人、访谈内容和访谈现场这样的“材料”是基本同步的。所以，悬置是感知的前提条件。^⑤但是，“人类能够感受、能够思考、能够言说的那个实在世界是经过了我们的符号系统和话语系统过滤的，因此也是由我们特定的话语系统所建构的，不再是纯粹自然的。……比如，我们对于‘残疾人’的话语就不是对作为纯粹自然的、客观实在的残疾人的再现”。^⑥在定量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悬而不论”的研究思维。比如，赵鼎新认

① 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2016年第4期。

② 谢立中：《当代中国的自杀率：话语之争的一个案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③ 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

④ 更多论述可参见陈玉生：《“人文科学”知识的技术实现与德性规范——韦伯人文科学学说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⑤ 杨善华：《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社会》2009年第1期。

⑥ 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为：“科学其实只是一种片面而深入地看问题的方法。面面俱到的观点一般都不科学，由科学试验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定正确。特别是，科学结论都是特定条件下的结论，离开这些条件，科学结论往往就不正确。”^①可见，科学在对复杂经验现象进行解释时，都会用“加括号”的方式设置条件，明确声言只对“加括号”内的经验现象才具有解释力，从而将限定条件之外的社会世界不予置评。

第三，“反思社会学”倡导。布迪厄提出社会科学要采取三重反思：研究者对调查过程中被访人提供的信息的反思，对研究者自身理论前见的反思，对适用的他人理论的反思。^②经由三重反思，以克服研究中的各种前见，从而保障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客观性。

2. 求“全”

求“全”包括经验通向理论和理论通向经验双向度的求全。在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中，有许多求“全”的研究策略，如定量研究中以“样本”信息推论“总体”状况，大数据应用为跨过“样本”直接研究“总体”提供了可能，扎根理论中在“范畴饱和”“理论饱和”指引和约束下对文本信息内容的充分发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潘绥铭及其团队提出“信息饱和”法，指出为研究新现象及现象内部类属，经验调查中如果再也收集不到新的信息，则在理论上达到了“信息饱和”。^③渠敬东更是对个案研究如何迈向社会全体进行了系统梳理，阐述了各种求“全”的方法。^④

此外，还有理论对世界的解释能力的“覆盖性”问题。赵鼎新引入“覆盖性”作为评价研究者建立的科学的解释机制的重要维度。他指出：“一个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解释或者解读的经验现象的广度。”^⑤为此，赵鼎新建立了社会权力的取值概念：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并以此阐述社会变迁。在此之后，赵鼎新又提出了“道家时间观”，并以之突破西方社会理论中的没有时间的横向比较、固定时间下的纵向比较、进步时间、循环时间、无规律多样时间等时间叙事观。^⑥

社会变迁的解释机制的覆盖性应该建立在社会变迁的本体覆盖性基础之上。不管社会变迁还是结构，都必须创新社会本体，阐明社会到底是什么。谢立中认为：“从这些特殊性或地方性知识当中归纳出来的普遍性知识不仅不比这些特殊性或地方性知识更具优越性，而且还不如后者有价值、有意义，因为在这种归纳过程中有许多细节性的知识都被抽象掉、过滤掉了，而对我们了解和理解事物具有关键意义的可能正是这些细节性的知识。”^⑦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建立具有覆盖性的本体范畴和解释机制，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应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其结果是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理论与经验双向求“全”无法回应社会世界的无限性问题。

3. 求“新”

社会科学研究除求“真”和求“全”，更在求“新”。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创新发现，为人类认识社会世界的无限性贡献新知识。那么，科学研究为何要创新发现？

创新发现是学术价值追求和学术规范要求。科学研究在于揭示未知世界，对前人尚未述说或尚未述说清楚的现象即剩余范畴作进一步探究。正因如此，学术论文发表通常被要求综述文献和阐明创新，学位论文对此更是有明确的规范要求。研究者必须通过综述前人研究来自证创新发现。但是，科学研究“不是阐明某一现有理论或意识形态”，而是要“创立或推进适合新证据的新概括”，“最终目的是最好地认识真实世界”。^⑧

创新发现是社会本土化的重要旨趣和必然效应。谢立中将那些从本土语境出发补充、修正和革新西方社会学的概念与理论称为“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⑨我国社会学界提出的差序格局、

① 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②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55—375页。

③ 鲍雨、潘绥铭：《定性研究中的求异法及其理论依据》，《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2期。

④ 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

⑤ 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⑥ 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

⑦ 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⑧ 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⑨ 谢立中：《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2期。

伦理本位、一本一体、单位、面子、关系、名分、气等学术概念，所阐述的结构社会学、社会运行理论、社会互构论、“民-群”视角、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多元话语分析、后社会学、结构-制度分析、感性选择理论、道家时间、过程-事件分析等理论范式，均属于本土化的创新发现。

创新发现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创新发现取得明显成就，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求，国内学者就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洪大用指出：“能否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完整的话语体系是社会学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并认为“所谓话语体系，至少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基础上的，包含有研究范式、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话语组合，这些话语内容丰富但又有共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逻辑自洽但又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①

总之，求真和求全是科学活动的规范要求，其形式上鼓励研究者尽情发挥“想象力”，实质上要求研究者不被情感左右，保持冷静。哲学认识论致力阐明“真”是什么，形成了符合论、融贯论、约定论、基础论等多种真理观。这些真理观有一个共同点，即研究者探究世界须超越自我，以符合客观世界或融通符号世界等。求全逻辑上是通过研究者借助已知“世界”走向社会“全体”或世界“整体”。科学研究者通常被要求还原日常生活，以便描述和阐明的社会存在的真实性和社会整体的覆盖性符合生存体验。超强想象力的研究者可以根据很少的证据洞察世界，实现求真和求全双重目标。

二、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创新发现的路径

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发现。创新发现包括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分别对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彭玉生认为：“理论创新既包括创造新理论、新概念，也包括有创意地应用一般理论，扩展或整合现有理论。”^②

1. 发现现象与创新本体

社会世界“是什么”指向“社会”的存在 (being)，也就是社会世界的本体。赵鼎新认为：一个社会科学范式得以确立的最大关键在于本体创新。^③ 社会世界的本体创新相当于生物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博物学，它是社会世界的“博物学”。比如斯科特发现“日常抗争”，就是对社会世界之社会运动或社会抗争类型的新发现，它定义了此前尚未得到学术研究的社会现象。本体创新是社会世界“是什么”的澄清，服从“名分秩序”逻辑，即研究者创造学术概念，以学术概念照亮、表征、分异社会世界，使社会世界清晰可见。谢宇指出，刻画总体异质性唯一可靠的工具就是统计学，刻画的方式就是简化研究总体，采用社会分组。分组的依据来自社会结果 (social outcomes)，即社会分组要有利于研究结果以差异的形式呈现。^④ 显然，科学研究均服务于社会世界异质性的描述与解释。韦伯提出的方法论是“范畴整理实在”，知识的增量就在于世界的范畴化成就。

本体创新所照亮的社会世界逻辑上包括：(1) 常人熟知但尚未被学术论证的社会现象；(2) 常人日用而不自知且尚未被学术论证的社会现象；(3) 已有学术论证但仍然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社会现象；(4) 已有学术论证但需要重新论证的社会现象。研究者要对这四类社会现象分别采取转义说、显现说、继续说、重新说四种策略，以便创新性地描述和定义本体。

社会研究者通过本体创新，构建了非常复杂多元的范畴来描述和表征社会世界，如社会团结、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系统等。创新的本体通常被表达为社会世界的取值，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犯罪率、大学生师比、总和生育率等指标。取值指标分为定比、定距、定序、定类四类，既是对测量指标的描述，更是对本体的描述。

本体描述形成科学研究中的本体性论断。本体论断主要指对本体类属的判断。“天鹅是白色的”

① 洪大用：《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与方向》，《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②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③ 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④ 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第 41—43 页。

和“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均属于本体论断。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研究涉及到社会世界的本体论断。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的人际关系模式描述为“差序格局”,相对应的西方人际关系模式是“团体格局”,两个概念既是人际关系模式的取值,^①也是对中西人际关系模式的论断。

2. 走出本体与创新解释

本体创新后需要“走出本体”,联结到其他本体。比如,研究“残疾人”不仅要依据“残疾人”定义考察个体或群体状况,更要探讨“残疾人”如何被话语系统建构,探讨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形成的“残疾人”体制机制及其实践效应。对其他如“自杀”“阶级”“家庭”“农民工”“吸毒”等现象的考察也应如此。^②

社会科学本体创新依赖“社会”整体来建构自身,因此,新本体通常表达为关联本体体系的范畴。这种建构,内含研究者对社会的想象。社会想象中,除了本体描绘,还有本体间性描述,阐明各社会本体间的逻辑关系。赵鼎新认为,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是能够联通本体性命题和机制性命题的。一个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需要遵从的四个方法论条件:第一,该范式的本体命题能被定义为互相独立的理想形态,并且每一命题都具有很强的经验上的不证自明性;第二,任何其他相关命题都是该范式本体命题的推论或组合,即范式具有完备性;第三,其他范式很容易被吸纳为该范式的一部分,即范式具有包容性;第四,该范式中的每一本体命题都应当指向一些重要的社会机制,即与社会机制有直接连接。^③那么,新本体能否以及如何关联社会世界的其他本体呢?我们以个案研究为例阐明。

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个案置身于社会全体,必然具有通达社会全体的可能。渠敬东认为个案研究可经由“人文地理志、制图术、人口志、历史编纂学、传记学、语词编纂学等各类民族志方法,通过‘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呈现出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④科研活动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个案迈向社会全体,即使这个过程不可能那么完美。新本体是可以走出本体联结到其他本体,并与其他本体形成逻辑关系的:一方面,研究者创新发现了这些逻辑关系,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变迁,这是解释;另一方面,新的本体为何如是及为何有如此属性,同样需要将新本体安置在包含其他本体的环境系统中才能得到解释。

个案内含无限意义和无限价值,为个案走出本体提供可能。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定义现象,研究者将个案分解为一个个“分析单元”,并对应构建一个个“取值概念”,以便描述依托个案阐述的社会世界。当若干本体共同阐明一个个案时,通常表达为某种逻辑关系。如果通过个案定义的某个现象具有特殊性和新颖性,则因其构建的“概念”意味着本体创新;如果通过个案定义的逻辑关系具有特殊性和新颖性,则因其构建的“概念体系”意味着解释创新。比如,梯利等学者发现,由零散的个体事件发展为群体性的暴力活动,需要经过一系列中层机制才能实现:连接贯通、广为扩散、协同行动、社会采用、边界激活、证实确认和身份认同转换。^⑤这些以本体形式表达的中层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个体事件向群体性事件转化的逻辑机制,若其具有新颖性则属于解释创新。社区公共服务空间中,居民集群服从“空间参与—活动参与—组织参与—政治参与”梯次展开的参与层次模型。^⑥这四个参与层次分别对应四个本体,其本体间性的逻辑关系表达为解释创新。

概括起来,如何“走出本体”要经由以下逻辑关系:

新本体的生产逻辑和机制是什么,即其他本体如何孕育新本体?(因变量)

新本体将导致怎么样的社会效应,即对其他本体产生什么影响?(自变量)

新本体变迁的协变因素是什么,即与其他本体时空变迁有什么逻辑关系?(协变量)

①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② 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③ 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④ 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

⑤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该案例援引自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⑥ 陈玉生:《“民—群”视角下的社会参与层次:社区公共活动场所的集群效应研究》,《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所以,“走出本体”意味着创新发现新本体与其他本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即意味着解释。社会科学的定量和定性方法都重视相关关系发现,因果机制的探寻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因果关系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线性稳定的关联,更是一种动态力量。^①“走出本体”实际工作是循着新本体走向其他本体,从而迈向更加广阔的社会世界。按照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要“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因而对原因和结果做出因果说明”。王小章认为,理解意指要领悟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也即行动者的动机、目的;解释则意指要对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真实的、客观的联系做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说明,也即要对具体社会行动发生的事理逻辑做出经得起检验的因果性说明。^②

那么,“走出本体”要将新本体安置到何处呢?笔者研究网格化服务管理,一是将其定义为科层化精细治理,区别于黄宗智阐明的中国历史经验中的简约治理,二是赋予其应对基层治理中“官进民退”的行动意义,三是阐明其孕育于社区保障居民个体自由与自我修复能力下降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效应,四是警示其虽然弥补社会自我修复不能的缺陷,但可能强化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③因此,“走出本体”不只是理解、解释和因果说明,还包括其自身的话语过程即存在之存在本身,以及其文化效应和社会化效应。由此,本体的属性特征,以及该本体与其他本体的逻辑关系、它的社会意义、它的建构过程、它的未来价值等方面,都能得到阐明。总体而言,走出本体必然将新本体安置到社会世界,包括“实在界、意义界、话语界、想象界”,以确定其经验逻辑,赋予其行动意义,阐明其文化效应,分析其社会影响。

“走出本体”会产生不同的学术效应。第一,当“走出本体”取得丰富的理论成果时,它可能形成一种理论范式,比如“社会资本”“社会转型”“现代化”“符号互动”“社会冲突”“场域”等本体范畴及其相关理论。第二,当“走出本体”建立了该本体与其他本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且该逻辑关系能够解释特定社会现象时,就形成了相对可靠的、具有解释力的逻辑机制,如“价格规律”“公地悲剧”“同构效应”“择偶梯次效应”“社会参与层次”等。理论和机制均表达为不同本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走出本体”的结果。

逻辑关系与本体一样,对应具体的社会世界,是社会世界内在诸本体之间的关系的表征和阐明。本体实际上是对混沌世界的概念化,勾勒出世界的名分秩序。在这个名分体系中,自古至今的学者思想家都在建构一种能够覆盖整个世界的概念,如老子将其定义为“道”或“自然”,现代西方哲学将其定义为“对象”或“存在”,等等。包括机制在内的逻辑关系也一样,在于阐释世界诸要素的深层关系。不同的逻辑关系及其理论对社会世界现象的解释范围和解释能力有所不同。赵鼎新根据深层逻辑所能覆盖性解释的自然世界或社会世界的范围为标准,认为可以分为机制解释(mechanism)、法则解释(law)和覆盖性法则解释(covering law)三种方法。比如,价格规律是机制,牛顿定理属法则,进化论为覆盖性法则。^④不过,“走出本体”虽然产生理论和机制,但理论和机制的生产不一定需要“本体创新”,发现诸多已知本体存在新的逻辑关系也属于解释创新。

3. 革新利用与创新技术

社会世界的本体创新与解释创新,通常表现为对社会群体及其生活状况的“取值”概念与“价值”评判,形成名分秩序,并最终激发人们的“理想”追求。为此,人们创新改变生活状况的管理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技术知识。比如,社会工作研究侧重技术创新,探索和验证社工实务方法。技术创新的目的在于干预社会世界,使其符合人类生活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

如何干预社会世界呢?自然律不因社会变化而变化,比如万有引力。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律,但不能改变它。社会却不同,社会一直包含着人类的创造知识,即上述有关社会现象的本体创新和解释创新,并且受这些创新的约束和指引。福柯将这种知识话语的历史效应称为话语事件。比

① 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② 王小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打通实证与理解的藩篱》,《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

③ 陈玉生:《细事细治——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1期。

④ 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

如,在“精神病学话语”的约束和引导下,社会甄别出了“疯子”群体,并导致“疯子”的社会隔离、监禁、治疗现象。再如,人们在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话语系统的指引下,会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人均预期寿命”“城市化比重”等指标作为政策方向;在帕森斯的现代化话语系统的指引下,实践工作和政策促进的方向就会发生重大变化。^①所以,技术创新通常建立在本体创新和解释创新基础之上。

“技术创新”主要以某技术的具体实现程度和效果为经验现象,以某技术设定的目标为理念,通过描述实际效果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解释造成该差距的原因,提出改进技术的办法。针对技术创新的方案研究和行动研究需要理论支撑,需要运用理论来解释某技术的效果。但是,“技术创新”为主的研究,可以侧重技术的改进,而不必强调科学逻辑机制的发现和创造,故可以运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甚至综合利用他人研究成果。循证研究就是如此。所以,此类研究是理论回到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描述、解释、建构: 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我们需要统一“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三个社会世界创新发现维度。哈贝马斯将认知旨趣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解放旨趣”,对应“经验—分析的科学”“历史—解释的科学”“批判性的社会科学”三种知识类型。^②可以说,哈贝马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对科学研究旨趣的分类,就是有关社会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根本问题的类型化。但是,解放旨趣不仅仅是批判,更主要的是建设性反思批判。^③对应“怎么办”的知识类型主要是“建构”。我们可以将社会科学旨趣分为“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三类,分别对应社会世界本体的“描述”“解释”“建构”三种知识类型。

实际上,批判反思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问题上均可体现。张静认为,知识来源于两种途径:其一,经验现象的证明、归纳、演绎和推论;其二,反思,通过考量一种潜在性——评估确定和已知的事实,将其与人类的经验、信仰和追求联系起来。^④按照张静的知识论,知识要么来自经验现象,要么来自理念。众所周知,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提出“我思故我在”著名论断。知识来自于经验或理念,均表现为对经验或理念的“怀疑”,即问题意识。正是对社会世界的追问,对经验和理念的批判反思,才成就科学追问。米尔斯在阐述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指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三重问题:个人问题、公共问题、学术问题。但是,并非所有个人困扰问题都是公共问题,即具有公共价值;并非所有公共问题都是学术问题,即未被学术界研究或未被研究清楚。研究者只有对已知经验或理念提出质疑,并证明该质疑对象具有公共性且尚未被学术界研究或未被研究清楚时,才将其设置为可研究的学术问题。^⑤因此,学术问题本身一方面意味着研究者对经验和理念的批判反思,另一方面意味着对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由此推断,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是有关社会世界的经验或理念的批判反思,批判反思贯穿于描述、解释、建构三种社会世界知识形成的过程,最终皆统一于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

我们还需要严格区分“是什么”的描述、“为什么”的解释、“怎么办”的建构这三个领域。赵鼎新认为:“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范式还有一个其他许多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它很容易就能把本体性论述转化为机制性论述,从而打通了本体和认知/方法层面的联系。”他举例说,涂尔干的著述甚多,但是他的大量工作是建立在“人是规范动物,规范性的礼仪是社会活动最为重要的基础”这一本体性假设之上的。该本体性论断具有很大的公理性和完备性。^⑥按照本文上述分析逻辑,“人是规范动物”的有关“人”的种类和属性的描述,属于本体性论断;“规范性的礼仪

① 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②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③ 郑杭生:《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④ 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⑤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12页。

⑥ 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是社会活动最为重要的基础”，并非“礼仪”的种类或属性的描述，而是其与社会活动之间关系的判断，因此属于机制解释；本体的描述、解释、建构的边界实际上非常清晰。

但是，本体性论述和机制性论述（解释）是联通的，对社会世界的描述、解释、建构均统一于本体，其中，本体描述是基础。比如，“天鹅是白色的”，是有关本体的特征的经验概括。当追问“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吗”时，其研究结果触及本体特征的概括，类似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属于本体创新，其借助的方法是描述。当追问“为何天鹅是白色的”“为何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天鹅的白色对天鹅的生存有哪些功能”时，其研究结果触及解释创新，需要以某种因果分析来表明。当追问“如何将白天鹅改造为黑天鹅”“如何利用天鹅的白色保护天鹅”时，其研究结果触及技术创新，其借助的方法是因果解释和本体建构。由此可见，诸多追问均蕴含“天鹅是白色的”本体描述，故本体的解释和建构必须以本体的描述为前提，本体创新是基础性的。

由上可推断另一个结论：侧重假设检验和因果解释的定量研究，必须以侧重本体描述的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为基础。因为测量首先要将本体范畴化、概念化，进而指标化、操作化，这就涉及到本体描述。本体所属种类和所具属性描述不准确，则很难保证测量指标的效度。因此，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当然，定量研究中的频次分析，实质上也属于本体描述，是本体内涵属性或类型的数量分布状态。故而，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最终统一到社会世界的本体创新和本体描述。

三、创新发现过程：导赏、表征和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

那么，如何抵达并报道本体从而创新发现社会世界呢？任何本体创新，都需要研究者进入社会世界，在逻辑上必然历经导赏社会世界、表征社会世界、评判社会世界、干预社会世界的过程。这就需要社会研究方法。

1. 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

社会研究方法到底是什么？彭玉生认为：“方法论范式指学术界通用的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基本规则和方法，其存在为形形色色的经验研究和大大小小的理论讨论提供了平台。”^①社会研究方法除了作为连接理论与经验的规范性媒介外，还是使经验现象表征出来的视角取向与策略手段。研究方法同时具有创新性地表征经验现象的视域性，以及约束学术共同体适当表征该经验现象的规范性双重性质。说视域性，是指研究方法是打开世界的方式。比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人们透视知识构境的图景打开了一扇窗；格尔茨的深描，为人们探究主观意义指明了方向；加芬克尔的破坏实验，指引人们探究显而易见的社会秩序的底蕴，将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社会秩序展示出来；会话分析引领人们关注谈话内容之外的谈话形式。对于社会认知而言，新的研究方法能引领人们发现新的社会世界，并使其表征出来。说规范性，是指研究者对其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规则和程序必须做出说明，以便读者知晓其所用方法是否符合对该方法的一般共识。科学方法是研究者通向、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路径、程序和规则。因此，到底用什么方法，取决于研究者研究的社会世界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先简略分析导赏、表征、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然后另起一节再详细阐述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

2. 以名责实：“导赏”社会世界的方法

研究社会世界，需要通向社会世界的路径指引。通向不同的社会世界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这类方法如同导游一样，引领研究者和读者赏析不同社会世界：实证主义指引研究者通向实在世界，解释学指引研究者通向意义世界，建构主义引导研究者通向话语世界，批判理论引导研究者通向价值世界。

传统研究中，人们关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及其关系；语言学转向后人们开始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现象学转向后人们开始研究人类生活的原初形态；身体现象学出现后人们开始研究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谢立中认为：实证主义、古典诠释学和传统的批判理论都属于现代主义的分析模式，

^①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尽管它们之间有很多差别,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概括地说就是“传统的实在论”。它有五个基本特征:给定实在论,表现主义,相符真理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传统的实证主义、诠释学和传统的批判理论虽然存在着各种差别和分歧,但在上述五个方面还是有一致性的。^①随着新的导赏社会世界方法的出现,客观实在世界、主观意义世界、语言符号领域(列维-斯特劳斯)、知识布展世界(福柯)、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此在世界(海德格尔)、身体世界(梅洛-庞蒂)相继打开。

导赏社会世界的各种方法指引和规范了研究者所研究的社会之实。个案法指引和规范研究者观察社会世界中的一个分析单元,会话分析指引和规范研究者研究轮流对话的秩序和逻辑,定量内容分析法指引和规范研究者将文献资料数据化并分析相关内容的分布情况,拓展个案法指引和规范研究者将分析的社会单元联结到更广阔的实在世界、意义世界等社会世界,破坏实验方法则采取人为因素,干预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世界,并通过这种干预,将那些日用而不自知的社会表征出来,如此等等。

总之,以方法之名打开和导赏社会世界之实的方法遵循“以名责实”策略。我们具体看看话语分析。“话语分析”是最近几十年西方学术界首先从语言学、常人方法学、传播学和教育学等领域中形成发展起来并扩散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方法、研究模式。所谓“话语分析”就是要对那些已经说出来的“话”到底以怎样的方式以及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被说出和被传播的过程加以分析。按照福柯的说法就是已经被说出来的话是怎么被生产、被流通、被分配的,支配着“已经被说出来的话”以这种方式被说出来的规则是什么,这就是话语分析要做的工作。^②可见,话语分析实际上指引和规范研究者进入知识布展的历史图景。

3. 循证考据:“表征”社会世界的方法

当研究者通达社会世界后,需要将社会世界的现象表征出来,因此需要表征的方法。其中,实验法通过人为实验干预和创造社会世界,文献法通过二手资料表征社会世界,调查法通过访谈等方法讲说社会世界,实地法通过参与观察等体验社会世界。

社会学家在对一项社会现实加以研究时,第一步就是要去观察经验,其方法包括深入观察、问卷调查、访谈、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等,通过这些观察得到一些关于这一现实的经验资料。^③表征社会世界需要证据化的经验资料,对社会世界进行测量取值并以数据化表征时用问卷法,进行眼见为实的记录表征时用观察法,采取主观事实描述或观点表述表征时用访谈法,采取实物证据表征时用档案和物证法,采取文字档案表征时用文献法,采取图像视频表征时则用影视社会学方法。社会世界以“证据”的形式进入学术论文。比如,彭玉生认为:“操作化是将概念层次和经验层次联系起来的认识论过程。概念是思维的抽象,不可观察。我们看不到性别,却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我们看不到智商,却可以看到 IQ 分数或学生回答问题的速度。”^④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收集到能够表征所要研究的社会世界的证据资料,这个过程遵循“循证考据”策略。

社会世界以话语形式表征,这些话语形式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言论、新闻报道、政府文件、书刊文章、日记、书信、广告、电影、电视节目、音乐、时装、建筑等”。^⑤研究者最终采取各种陈述方式将这些话语表达为文本,如访谈记录、文献资料、数据表格、影视图像、符号公式、概念模型、个案故事、观察笔记、情景记录等。不同的社会世界,可以采取不同的陈述方式表达,此外,不同陈述方式可以同时表达同一社会世界。比如,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忍程度,可以通过日军军事力量投入数量、战争覆盖的区域、炸弹覆盖的区域、屠杀人数、破坏程度等多元证据来评判,也可以通过影像记录、日记、档案、回忆录等多种方式表征。

① 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② 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③ 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④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⑤ 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4. 技术检验：“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

在政策研究、国家与社会治理研究、企业经营管理研究、行动计划研究等以具体实践为对象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采取政策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发展导向等建立理念，并以此评判实践经验现象，研究阐明针对现实状况的需要变革的维度方向和目标理想，以及变革现实的路径策略、体制机制、行为模式等。这类研究可统称为“技术研究”。

有些研究者不仅仅提供行动方案，还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和引领实践者共同解决问题。为此，学术界发明了许多具体的指引和规范学者直接采取实际行动变革社会的研究方法。参与式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过参与的方式来改变被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社会世界。与此类似，循证研究通过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获得最佳证据以认识和干预被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社会世界。行动研究通过引导和组织实践者共同采取行动，协同采取“问题—研讨—计划—实施—检讨—问题”不断循环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行动社会学则倡导研究者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在其中，研究者采取干预式和反思式研究方法，以实际行动变革社会世界。

研究者不管只提供变革社会的方案，还是将研究行为直接结合到社会变革之中，其主要目的都是变革社会，干预社会世界的发展。方案研究和行动研究发展出来的变革社会的知识体系，类似于自然世界研究中的工程技术，其知识体系包括管理学、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社会营销、新闻学等。这类知识主要为解决问题的行动和方案知识，属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某技术具体的实现程度和效果为经验现象，以某技术设定的目标为理念，通过描述实际效果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解释造成该差距的原因，提出改进技术的办法。因此，方案研究和行动研究需要理论支撑，需要运用理论来解释某技术的效果。这种方法遵循“技术检验”策略。

四、对标研究：“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

韦伯提出的“范畴整理实在”表明，当研究者建立明确的概念范畴或者理论假设（即理念），以及阐明明确的经验现象（即经验）之后，用理念评判经验，或者用经验检验理念（假设）之时，应尽最大可能做到价值中立。这种采取“理念”与“经验”互相印证的研究策略，就是“对标研究”。

1. 证据化、文本化、理论化：对标研究的前提条件

研究者进入社会世界后，通常带着研究工具开始观察，收集能够表征社会世界的信息。这包括能够建构过往历史的访谈、档案、考古、文献、文化物质载体等资料，能够呈现现场信息的观察记录、录音录像、照片等资料，能够反映人们主观理论和观点的访谈、对话、评论、笔记、录音录像等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者而言，相当于“证据”之于法官。研究者进入社会世界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收集表征社会世界的“证据”。这可称为社会世界的“证据化”。

社会世界“证据化”之后需要研究者将其制作成能够阅读的“文本”，即“证据文本化”。这包括访谈记录、文献摘引、录音录像对话的文字稿、实物人物场景的图片、数据表格和数据图示等陈述方式。“证据文本化”最终体现为某种有关社会世界的陈述方式——讲说世界信息的记号形式，传递作者意图的媒介工具。

“证据文本”以陈述方式讲说社会世界，但研究者不只是讲故事的人，还要通过证据文本的分析来“评判”社会世界。谢立中认为：作为社会研究人员在对观察得来的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得出结论并最终将研究发现诉诸文字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脑海里既有的某些话语系统的约束和指引。处于不同话语系统（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主义、社会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等）约束和引导下的研究人员，面对同一批观察资料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解读和取舍，因而也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研究成果。^①这个过程就是“文本理论化”。它包括使用已经形成的理念、价值观、道德伦理、学术观点、科学命题

^① 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等评价表征社会世界的证据及其文本,得出评判结果;或者反之,使用表征社会世界的证据及其文本,检验研究者通过演绎、逻辑推理、价值判断、预言等方式形成的理论假设或理论问题,得出检验结果。

“文本理论化”过程包括用理念评判经验和用经验检验理念两种方式,但不管哪种方式,研究者都必须固定一端并对其持守信念。以理念整理经验,以经验证成理念。被固定的一端,我们可称之为科学研究中的“标准”。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是持守某种“标准”来阐释有待分析的现象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对标研究”。

2. 对标研究的特征

与“对标研究”相类似的人类活动非常普遍,如考试中用标准答案或参考答案评判考生答卷,项目评估中用评估指标测评某个项目,法官将案件事实纳入到法律条文中解读并作出判决,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行为及其结果纳入到法律依据中并作出裁判,基督教徒将自己行为和心理活动对照圣经教义作出分析并向神父忏悔,领导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到基层检查工作并当场作出评价和指示,儿童依据逐渐形成的有关好人或坏人的认识对某具体的人作出评价,等等。上述现象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均为论断行为,二是均有论断之对象,三是均有论断之参照,四是参照多为理念而对象多为经验。综合而言,论断行为表现为论断者以理念评判经验,或以经验检验理念,服从理念与经验之间的互相印证。印证过程先要确信一端,然后以之表征、检验或评判需要评判的另一端,并做出判断。

社会科学同样是基于对经验和理念的对应建立起来的。张静认为:“社会科学的假定之一,是生活世界和分析世界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二者的联系在于,分析世界必须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根据来源;二者的不同在于,分析工作是一项人类智力活动,须以专业的逻辑对资料进行取舍、排列、比较、计算、推论,找出其中的关键影响关系。这两个世界并不相互否定,只是目标有别。”^①所以,科学论断和日常论断一样服从“对标研究”逻辑。

3. 科学判断中的对标研究

“对标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证有许多阐述。运用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思维开展的研究,服从“对标研究”逻辑。归纳法中,人们信从具体经验,随后在其基础上逐渐删减信息,抽象提炼出理念范畴或命题;演绎法中,人们信从抽象理念,随后从其出发,检讨和评价具体的经验现象,得出评判结论。“三段论”同样是“对标研究”,其经典例子:“人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在这个例子中,“人是会死的”是人们信从的理念或观念,人们以之评判一个具体的经验中的人,得出论断。韦伯提出的“范畴整理实在”更是典型的“对标研究”。韦伯并没有明确到底范畴优先还是实在优先,但不管是从其所阐明的历史个体中抽象出理想类型的过程,还是以理想类型定义历史个体的过程,都属于“对标研究”的过程。吴肃然的研究显示: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涂尔干的主张体现了基础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经验论观点,即社会学家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观念/理论世界,另一个是经验世界。这两个世界是相互对应的,观念/理论世界无法被科学考察,人们必须在经验世界中找寻理论概念所对应的可测量的范畴,以此来检验理论命题的真假。因此,“测量一个概念时必须架通概念层次和经验层次的桥梁,找出一个经验地测量概念的方法,即在经验层次为这个概念找到一组指标或一个量表。操作化就是这种沟通概念层次和经验层次的过程”。^②

“操作化”主要有古典理论、扎根理论和操作主义三种理论,同样服从“对标研究”逻辑。“古典理论从概念层出发,然后设计经验测量。这种理论的关注点是如何保证经验测量准确反映抽象概念,即测量效度问题。扎根理论则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从经验观察开始,然后过渡到抽象的概念层。操作主义合并概念层和观察层:在经验主义者的世界中只有感官观察,抽象概念不过是概括某一类经验观察的标签。这样,测量效度的问题就不存在了。”^③操作化的变量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概念层面和操作层面。其中,概念层面的变量连接要测量的理念,操作层面的变量连接要观察的经验。操

① 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② 吴肃然:《论操作化: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启示》,《社会》2013年第5期。

③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作化实际上在理念和经验之间增加了一个测量的环节。

综上,“判断”服从“对标研究”逻辑。不管是日常生活中的判断,还是科学判断,都在理念和经验之间“执其一端”,以一端之信念为基础和出发点,形成另一端之评判或验证之结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题的缘起、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学术问题之后,应该在研究设计中通过阐释研究对象、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研究策略、概念界定、理论视角、分析框架、理论范式等,将欲展开的对标研究作出详尽的说明,坦陈自己所确定的一端并为此作出一定的论述,指示说明清楚所评判或检验的一端。

4. 对标研究的思维逻辑

在思维方式上,“对标研究”因“执其一端”之“一端”的确定性不同而又可区分出不同的思维方式。皮尔斯将凭借经验证据作出判断的思维方式分为三种:设定的条件下,是无可置疑的经验判断,属于演绎推理;有一定程度(概率)的可信性,并且可以经过反复实验的经验判断,属于归纳;难以根据经验证据演绎和归纳,但可根据经验线索作出合理推理的,属于猜测。^①研究思维方式可以根据理念和经验两者确定性程度做更多的区分,但为简化类型,可对“确定性”只作是与否两种取值,由此可区分出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思维方式(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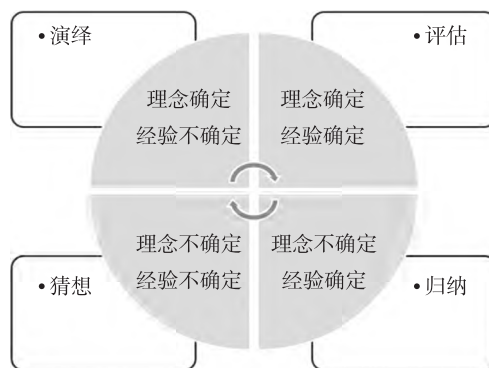


图1 对标研究的思维逻辑方式

我们再次以上文所述经典三段论为例进行说明:“人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人们通常认为该三段论遵循演绎法。但是,根据对标研究,我们会发现多种情况。第一,如果确信“人是会死的”理念,并确信“苏格拉底是人”经验,由此判断“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个过程属于评估。第二,如果确信“人是会死的”理念,但不确信“苏格拉底是人”经验,则可提出假设:假如苏格拉底是人,那么,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个假设过程属于演绎。研究者通过经验调查,确认“苏格拉底是人”,则假设检验通过,否则不通过。这个过程属于演绎假设的经验验证。第三,如果不确信“人是会死的”理念,但确信“苏格拉底是人并已经死了”经验,同时,还确信“和苏格拉底一样的动物,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都是人,且都死了”,则可归纳出一个经验判断命题:只要是人,都会死,即“人是会死的”理念可证实。这个过程属于归纳。第四,倘若只确信“苏格拉底是人并已经死了”,但是,和苏格拉底一样的动物,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虽然知道他们是人,但不知道是否死了,那么,只能以苏格拉底之死的少量信息,推测“人是会死的”这个普遍命题。这个过程属于猜想。

5. 对标研究统一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可能

经验社会科学研究通常由八个部分组成:问题、理论、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结论。彭玉生称之为“新八股”。^②彭玉生所述新八股更适合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很难建立在假设、数据、

^① 转引自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②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测量基础上。因为从上述“对标研究”分析看,定量研究通常建立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之理念的不确定性基础上,但是,建立在概念及其操作化后的指标的确定性基础上,通过对指标的经验测量值之数据资料的确定并以此检验不确定的解释性理念,属于“检验”的逻辑,侧重解释创新;定性研究既可能是检验,也可能是评判,但通常建立在经验的类属的不确定性基础上,通过确信的解釋性理念来评判经验现象,并给经验现象“定性”,侧重本体创新。因此,定性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为:研究主题说明、文献综述与学术问题、经验研究对象与经验资料、整理经验现象的概念与分析框架、评判研究对象的理论视角与范式、评判经验现象的发现、经验现象的定性结论、将定性现象连接既有知识的讨论。不过,不管定量还是定性,均旨在创新科学结论。张静认为:“无论使用什么材料作为证据,都不应偏离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分析逻辑:观察现象、描述特征、建立界定、比较类型、展示过程、分析影响、探索机制、寻求解释、达到证明。”^①

从本体创新角度看,定量研究侧重演绎思维逻辑,测量概念和取值概念先于经验资料;定性研究侧重归纳思维逻辑,现象定义和属性概括后于经验资料。但是,从解释创新角度看,定量研究侧重归纳思维逻辑,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形成数的分布状态和数的拟合状态,并以此对照不确定的假设,以检验假设是否成立,经验现象先于假设检验结果;定性研究侧重演绎思维逻辑,根据明确的具有解释力的概念、理论视角、理论范式乃至价值理念,辨析、评判经验现象,得出评判结论,解释框架先于经验现象。比如,渠敬东认为,“个案研究的科学性,体现为一种社会整体的可能性解释。个案研究的策略,不同于以代表性为基础的假设检验,也不等于社会生活的单纯描述和记述,而是从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出发,发现由具体社会生发的运行机制,在广度和深度上尽可能扩充、延展和融合与外部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②可见,作为定性研究方法的个案研究是可以发展出解释机制的。但是,定量研究的科学目的主要是检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彭玉生认为:“如果从理论演绎出假设是一种艺术,那么从假设到验证的过程则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被称作‘科学’的原因。”^③总之,社会科学服从“对标研究”,定量和定性、归纳和演绎在“对标研究”中得到统一。

结 论

对如何研究社会世界,学术界持久争论,论题聚焦于如何保证某项研究的真理性和推理性,即如何通过有限经验现象的研究实现对外在社会世界的“客观性”描述,实现对无限社会世界的“覆盖性”解释。本文研究社会科学的创新发现过程和方法,获得几点认识(参见图2):第一,“求真”“求全”主要侧重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需要补上“价值性”,“求新”即创新发现社会世界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第二,社会科学研究目的和效应在于创新发现社会世界,包括质疑社会世界“是什么”的本体创新、“为什么”的解释创新、“怎么办”的技术创新,并形成了有关指引和规范研究实在世界的实证主义、意义世界的解释学、话语世界的建构主义、价值世界的批判理论四大理论范式和科学传统。第三,创新发现社会世界现象需要研究者运用科学方法,包括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第四,导赏社会世界的方法服从“以名责实”策略,表征社会世界的方法服从“循证考据”策略,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服从“对标研究”策略,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服从“技术检验”策略。第五,本文侧重研究了“对标研究”,认为评判社会世界首先要在经验和理念中“执其一端”作为确信的基础,然后评判另一端,并以经验和理念确定程度为依据,区分出“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科学思维方式。

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受既有社会理论约束,因此,研究者必须先梳理文献,然后提出学术问题。在文献梳理基础上提出的学术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研究者对社会世界开始了“求新”探索,并意

① 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② 渠敬东:《迈向社会整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

③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味着在站在巨人肩膀上向社会世界“求真”和“求全”。至于报道社会世界创新发现结果的方法，一方面受研究主题和创新发现对象约束，另一方面只是在创新发现中起辅助作用。方法始终是手段，不能用来替代目标。发现社会世界的方法的选择由社会世界本身及创新发现目标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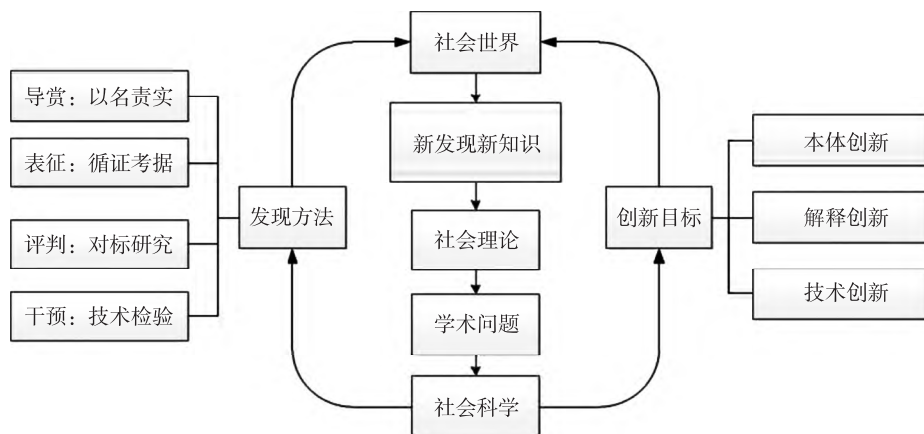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科学的创新发现过程与方法

既往哲学认识论真理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有关议题能否凝聚共识，关键在于明辨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世界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多种主义争论不休，将社会世界描绘为客观经验世界、意义世界、话语世界等，在引入现象学和语言学后，更是发现了深层语言结构、身体现象、日常生活世界等多种社会世界类型和处境。这些世界观的不同，导致哲学真理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差别。反过来说，社会世界研究的价值，正是要不断创新发现各种处境中的“社会世界”，及其表现现象“是什么”，“为什么”如此，为此该“怎么办”。必须承认社会世界多面性，而导赏、表征、评判、干预不同的社会世界必然服从不同的研究方法。当前，归纳与演绎、定量与定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等方面的争论通常没有区分不同社会世界，没有区分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不同阶段，很难达成共识。本研究认为，定量研究必须以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为基础，社会世界的评判服从“理念与经验”之间的“对标研究”逻辑，社会世界评判包括“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思维方式。

(责任编辑：薛立勇)

Innovation Discovery and Benchmark Analysis in Social Sciences

CHEN Yusheng

Abstract: How to study the social world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been arguing about this and need a consensus. The goal of social science lies in “the innovation and discovery of the social world”, including the ontology innovation of “what is”, the explanation innovation of “why” an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how to do” that raise questions for the social world. Social science methods are subject to the innovative discoveries of the social world, including the methods of guiding, representing, judging and interfering of the social world. Guiding the social world obeys the strategy of “symbol sorting reality”, representing the social world obeys the strategy of “collect screening evidence”, judging the social world obeys the strategy of “benchmark analysis”, and intervening the social world obeys the strategy of “technical test”. Among them, “benchmark analysis”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researchers judge the social world through the cross reference of ideas and experiences. Judging the social world includes four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namely “evaluation, deduction, induction and conjecture”,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certainty at both ends of ideas and experience.

Keywords: Social Sciences; Innovation Discovery; Noumenon Innovation; Benchmark Analysi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

2022/11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主管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社会科学》编辑部
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姜佑福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337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165518
传真：021-63841642
印刷单位：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
国内总发行：上海市邮政公司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112/Z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0257-5833
国内邮发代号：4-273
国外发行代号：M256
出版日期：每月10日（月刊）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购零售处：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行部
定价：50.00元





社会科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 1979年创刊 总第484期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20.12

社会科学

SHE HUI KE XUE

月刊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

卷首语 本刊编辑部

论政府间新型互助关系成长:源起、动力和路径 李瑞昌 3

“民一群”视角下的社会参与层次:社区公共活动场所的集群效应研究
..... 陈玉生 13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研究 黄金辉 魏 倩 29

中国大湾区建设的战略运筹 杨枝煌 陈 尧 43

“一带一路”沿线的货币地理与人民币崛起战略 李俊久 55

商品拜物教:一个跨学科理论话语的应用与误用 张敦福 69

超越孤寂:文明进程中的临终关怀及死亡 王树生 79

“预防垄断行为”的理论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刘乃梁 90

中国刑事证据法基本原则再认识 罗维鹏 100

论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建构

——以“实践智慧”为中心 付长珍 郗 平 111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反基础主义转向和反讽概念 王淑娟 118

近代民族工业企业的规模扩张与信用风险

——以大生企业系统为例 王京滨 姜 璐 130

货币、公粮与工商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财政经济的困难与重建

..... 刘诗古 151

近代上海苏北人无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倚重力量吗？

——兼与《上海罢工》作者裴宜礼商榷 张 玲 167

复制与自我复制

——试论中国古代艺术摹仿说视域中的《红楼梦》 王怀义 177

《社会科学》2020 年总目录 184

《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shehuikexuezazhi

《社会科学文摘》微信公众号：SHEHUIKEXUEWENZHAI

“民一群”视角下的社会参与层次： 社区公共活动场所的集群效应研究*

陈玉生

摘要：社会参与研究存在“价值取向上向政治参与收敛”和“解释维度上向生活领域扩散”的困境，那么，社会参与在解释维度上是否存在向下收敛的基础并服从某种一般逻辑？基于“民一群”视角，将社会参与纳入到集群范畴，对凤馨苑社区公共空间——综合楼的集群现象进行经验研究，可以发现，集群服从“空间参与—活动参与—组织参与—政治参与”梯次展开的参与层次模型，其中，空间参与能够在解释维度上对社会参与起到收敛作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参与具有层次性，大众集群服从社会参与层次模型。

关键词：空间参与；社会参与层次；集群现象；“民一群”视角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12-0013-16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0.12.003

作者简介：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 510642）

社会参与是集群的表征。普通大众采取集群行动，聚集和参与到某项活动，这属于日常社会现象，但要阐述清楚却非常困难。柯林斯对此提出两个问题：人群在多大程度上聚集起来，聚集有多频繁和持久^①。霍布斯的利维坦设计、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动员倡导、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模式辨析、勒庞的乌合之众发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分析、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理论呼吁等，无不关涉柯林斯所提到的两个问题，即普通大众集群现象。2016年，笔者带领团队对广州市增城区凤馨苑社区进行调研，意外发现了大众集群的一种模式——大众集群遵循“空间参与—活动参与—组织参与—政治参与”梯次展开的参与层次模型，笔者将其定义为“社会参与层次”^②。本文对该发现及相关理论思考予以研究，为认识大众如何集结成群现象提供一种思路。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研究

社会参与是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一个传统研究课题。学术界为了定义该现象，形成了

收稿日期：2020-09-22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ZDA078）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页。

② 王权典、陈玉生、杜金沛、邓定远：《城镇化进程中村社改制模式与法治实践探索——基于广州实证考察》，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53页。

许多概念,如社会参与、群众参与、公民参与、市民参与、社区参与、工厂参与、公共参与、大众参与等。这些概念虽有不少差别,但具有家族相似性,均表征为集群现象。本文所述社会参与的范围涵括这些概念。笔者据此梳理文献发现,社会参与研究的学术问题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人们到底参与了什么、人们参与程度如何以及人们为什么会参与。

(一)研究“参与什么”:主题上向治理参与扩散和价值上向政治参与收敛

随着近现代国家的创制,公民权利的行使备受关注。总体而言,公民的政治参与随时代发展不断扩大。针对这种趋势,古德诺强调“政治—行政”二分,主张“公民参与是政治领域的适当范畴,应该远离职能化行政官员”。但是,这并没能真正妨碍人们更加深入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治理生活中。1960年,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参与式民主”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民主范畴对公民政治生活的覆盖范围。随后,卡罗兰·佩特曼出版了《参与和民主理论》,这标志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形成,参与研究也拓展到社区治理、工作场所和校园学生运动等领域^①。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兴起,参与式治理逐渐被学界运用^②。当前,群众参与已成为政策目标、治理模式甚至全球治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③。朱德米概括指出,20世纪西方群众“参与什么”经历了以选举为主的政治参与、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参与、制度化的公共政策制定参与三个阶段^④。但从深层逻辑来看,社会参与研究首先存在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政治参与是早期社会参与的主要研究主题,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参与研究主题越来越广泛,包括治理参与、工厂参与、社区参与等(特征1:主题上的扩散)。

第二,政治参与研究并没有因为社会参与研究主题的扩散而边缘化,反而始终是其他领域参与研究的理论收敛焦点。但是,社会参与研究形成了向下不断拓展而向上不断收敛的趋势,其并未形成向下收敛的奠基之处(特征2:价值上的收敛)。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特征?首先,这两者并非互不关联,而是逻辑一致地共同反映了西方社会参与理论的关怀。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犹如福柯所述知识—权力的关系,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将居民的各种社会参与转译为政治参与并非偶然,这不难理解。其次,从科学革命的逻辑或知识的布展来看,政治参与仍旧具有范式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是因为政治参与与近现代国家建制具有同构效应,即政治参与就是国家运作的逻辑。下文我们将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际遇”都蕴含着政治参与的线索和痕迹。

(二)研究“参与程度”:社会参与分层和社会参与评价成为重要研究取向

为了评估社会参与的程度,人们建立了很多分析框架和评估模型。比如,米尔布拉斯区分了较低程度参与(如投票—旁观者的活动)、中等程度参与(如参加政治集会—过渡的活动)、高程度参与(如从事竞选—斗士的活动)等三种选举参与类型^⑤;米尔布拉斯和戈尔随后又将参与行为分成“活动的”“消极支持的”“冷淡的”三大类^⑥;斯诺等人区分了“媒介性渠道—面对面渠道”“私人渠道—公共渠道”两类参与;斯托克建立了分析影响居民参与因素的参与式治理模型(CLEAR),指出主要

① \[美\] 卡罗兰·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剩勇、赵光勇:《“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8期;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

③ \[加\] 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L. Wong and B. Poon, “From Serving Neighbors to Recontrolling Urban Socie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Community Policy”, *China Information*, 2005; G. Williams, “Evaluat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Tyranny, Power and (re) Politicis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5, 2004; T. Li, “Neo-Liberal Strategies of Government Through Communit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rogram of the World Bank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Law & Justice Working Papers*, 2006。

④ 朱德米:《公共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⑤ Lester W. Milbra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pp. 17—22; 肖唐镖、易申波:《当代我国大陆公民政治参与的变迁与类型学特点——基于2002与2011年两波全国抽样调查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5期。

⑥ Milbrath and Goe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7, pp. 10—21。

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即能够做(Can D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 To)和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①;阿恩斯坦提出了包含切实性政治参与、象征性政治参与、不参与三个层次的八种公民参与模式的阶梯理论^②。

这些社会参与程度类型化的理论,普遍期望群众参与“由虚到实、由低到高、由浅到深”地不断提升。遗憾的是社会参与热情并不明显,参与不足几乎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俞可平认为,公民要么没有参与热情,要么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需求,但缺乏畅通的参与渠道;洪大用提出中国环境社会学应重视公众参与类型和过程的研究^③;另有研究指认一些社区参与是“自上而下建构”的参与、“表演性参与”、“参与趋向于个体化”^④。国内外学者普遍担忧社会参与不足,希望通过在基层社区、工作场所和地方政治中广泛、深入地参与,培养政治能力和兴趣,进而为更高层次乃至国家层次的参与作好准备^⑤。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社会参与研究的第三个特征,即对社会参与(意愿)程度的研究主要采取分层的结构性描述(特征3:描述上的分层)。

(三)研究“为什么参与”: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参与现象解释模式

《美国民主的公民参与》一书概括了三种解释公民参与行为的理论模式,分别是社会资本理论(代表人物帕特南)、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菲奥里纳)、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斯科克波)^⑥。笔者基本赞同这一分类,但进一步修正如下:

第一,个体视角下的经济社会模式或理性选择理论。该视角关注个体的收入、能力、地位、性别等社会属性,以及认知、兴趣、效能感、满意度、归属感、信仰等心理属性对社会参与的预测作用。比如,效能感解释模式认为,政治效能感与社会参与呈正相关关系^⑦。然而,塞利格森认为,效能感只能够预测制度化参与,不能预测动员参与^⑧。此外,研究表明,参与行为能提高参与能力和公民意识,激发个人参与潜力,政策精英面对面商谈有利于提高政府信任,富裕的社会拥有更多公民社会特性^⑨;共同身份和角色促成共同信仰和行动^⑩; (宗教)信仰具有预测参与的效应^⑪等。

第二,关系视角下的社会资本理论。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被引入参与研究领域。帕特南强调信任、规范、网络及社团参与对社会合作、社会行动及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⑫。该视角主张参与不是社团组织动员的结果,而是人际关系网络起关键作用,社会成员的强联系能形成基于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身份认同,从而推动参与。例如,莱特论证了个体之间的接触会增加信任,沃克论证了非正式自愿组织参与是正式组织参与的基础^⑬。胡荣等国内学者引入和发展了社会资本理

① \[英\] 格里·斯托克:《新地方主义、参与及网络化社区治理》,游祥斌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② Sherry R. Arnstein,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9.

③ 洪大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与反思》,《思想战线》2014年第4期。

④ \[加\] 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陈福平:《强市场中的“弱参与”:一个公民社会的考察路径》,《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

⑤ 陈尧:《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逻辑与限度》,《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3期。

⑥ Theda Skocpol and Morris P. Fiorina, ed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⑦ 王丽萍、方然:《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基于一项调查的考察与分析》,《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胡荣:《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⑧ Mitchell A. Seligson, “Trust, Efficacy and Mod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Study of Costa Rican Peasan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No. 1, 1980, pp. 75-98.

⑨ 陈福平:《强市场中的“弱参与”:一个公民社会的考察路径》,《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

⑩ Ryan Light, “Like Strangers We Trust: Identity and Generic Affiliation Network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5, pp. 132-144.

⑪ 刘长喜、陈心想:《排他性与联通性: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5期。

⑫ R.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993, pp. 35-36.

⑬ Edward T. Walker, “Contingent Pathways from Joiner to Activis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n Civic Engagement”,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3, No. 1, 2008.

论视角下的社会参与研究^①。不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理论模式也受到了批评,社会资本或信任被认为是难以捉摸的概念,很难与可观察的现实联系起来。但不可否认,该视角以“公民参与和社团活动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为价值取向^②,不断探索社会关系、参与社团活动频率、个体间的接触、组织成员多元化、个体和组织的联通性、组织与外界的联通性等日常生活范畴对社会参与的预测可能,将民主政治参与研究的视域不断往社会底蕴拓展。

第三,结构视角下的制度化(动员)模式。该模式强调制度在塑造公民行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其中,行政动员理论指出,政治体制向基层渗透,重构了城乡行政的神经末梢,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实际上是被体制内的力量动员的结果;资源动员理论指出,“运动企业家”往往通过社团组织来动员和招募参与者,因而,社会运动参与都是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政治行为的产物,而不是组织薄弱的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指出,“人的一生是由规范的、法律的或组织的规则所界定和编制的过程”,年轻人和老年人参与度更低,四五十岁达到高峰;政治合法性理论指出,参与行为会使参与者更了解政治决策的过程,提升对政治制度、价值、规范的认识,从而更能接受行政结果和提高政治满意度。

综上可以发现,相对于“参与什么”和“参与程度”,学者们在“为什么参与”方面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人们采取不同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发掘社会参与逻辑、机制、策略和结构特征,并形成了诸多解释模式,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理论命题。由此,可归纳出社会参与研究的另外两个特征:

其一,许多理论研究的旨趣在于找到政治参与行为更为深层的解释机制,并不断向日常生活领域寻找原因,目前最极端的解释莫过于日常接触(特征4:解释上的扩散)。

其二,理论上不断向日常生活领域寻找“为什么参与”的解释机制,构建接触、关系、联通等理论范式,但几乎所有论断都受到理论挑战(特征5:解释上的挑战)。

总体而言,社会参与研究采取社会个体的社会行动视角,将参与视为某种个体行为,从而追问个体参与了什么、参与程度如何、为何参与等。本文开篇提及普通大众采取集群行动,参与和聚集到某些活动当中,社会参与本质上表征为“群”的生成机制。倘若我们转换视角,不追问“为什么参与”,而是追问“群是怎么形成的”,这就能较好理解上述诸多社会参与理论的特征及其命题间的矛盾之处。

从“群”的角度看,上述理论可能对某些“群”的形成过程更具解释力,而对另一些“群”的形成过程更不具有解释力。比如,社会动员理论更能解释战争参与,因为战争的集群距离日常生活体验较远而且需要快速意识灌输和行为整合;效能感理论更能解释志愿参与,因为志愿活动的集群既不能强制又缺乏经济利益激励,解释机制转换到社会心理范畴就很自然。当学者研究的集群是熟人之间的集结时,自然会引导人们关注社会资本;当研究的集群是关注群体社会结构特征时,自然会在性别、教育、收入、年龄等方面有所强调。社会参与行为的原因解释与其说是因果机制,不如说是表征了不同“群”的不同集结方式。这一观点在下文的经验分析中会更详细地讨论。

(四)反思与问题的提出:社会参与向下收敛的基础与覆盖性更强的分析模型

民主政治参与既是西方参与研究的传统优势,也是瓶颈。西方参与研究在价值取向上始终向民主政治参与回溯和收敛,无法突破(“参与什么”)传统;在理论上则不断向日常生活领域寻找参与

①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各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孙秀林:《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社会》2010年第1期;龚文娟:《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和系统信任》,《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② 陈福平:《强市场中的“弱参与”:一个公民社会的考察路径》,《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

③ Theda Skocpol and Morris P. Fiorina, ed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Sidney Tarrow, “Social Movements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A Review Artic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1996.

行为的解释机制,构建接触、关系、联通等理论范式,比如,沃克论证了非正式自愿组织参与是正式组织参与的基础^①。但是,几乎所有(“为什么参与”)论断都受到理论挑战。

国内参与研究既无传统优势,理论挑战也少,但理论渊源更为复杂,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并稀释了理论积累势能。目前,国内参与研究在学科上以政治学、社会学为主,在理论上融合了西方参与理论、民国时期的国民性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运动(社会动员)研究、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参与理论等多元理论范式。自中央提出“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社会治理大政方针以来,社会治理参与与研究传统初步形成。但是,地方治理中的群众参与形式化、虚化和碎片化现象严重,扩大群众有序参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和突破^②,既有研究难以为“制度化治理参与”的实践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笔者认为,当前社会参与研究面临三大研究难题:

第一,研究取向导致的困境。民主政治参与研究传统限制了研究者的视域,但凡民众参与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框架中进行分析,几乎将任何集群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

第二,研究路径导致的困境。社会参与研究进路是从研究离人们日常生活更远的政治民主参与向研究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治理参与、社区参与推进的。这种研究进路与社会参与行为解释模式的演变结合在一起,导致研究什么对象就产生匹配的解释模式,最终结果必然是理论上的复杂多元和弥散无序。

第三,解释逻辑上的困境。随着现实中群众社会参与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参与程度跟不上现实需求,导致社会参与评估倾向于认定为参与不足。同时,研究取向上仍然停留在民主政治参与方面,导致那些与普通群众日常生活非常贴近的社会参与都诉诸于民主政治范畴,并在解释上能从中发现政治参与的线索。最终结果必然导致任何日常生活都被置于政治权力的关照之下。

综上所述,社会参与理论的根本困境在于“价值取向上向政治参与收敛”和“解释维度上向生活领域扩散”。如何走出上述研究困境?笔者以为,一是需要采取逆向思维,针对当前西方社会参与研究不断向上收敛到政治参与这种取向,需要探索和确立社会参与向下收敛的基础(社会参与向下收敛的基础是什么)。二是需要采取整体分析及现象学思维,既要当前复杂多元的社会参与理论悬而不论,又要将社会参与安置到更大的解释框架中,提出一个覆盖性强的理论解释机制(覆盖性的解释机制是什么)。

二、社会参与层次与空间参与假说:凤馨苑社区调研中的发现

2016年3月至4月,笔者带领团队对凤馨苑社区进行调查,在整理分析资料过程中初步发现了社会参与向下收敛于空间参与,并服从“空间参与—活动参与—组织参与—政治参与”梯次展开的逻辑。

我们设计了《增城区凤馨苑社区居民参与状况调查问卷》,对居民社会参与情况进行调查。其中,有一道多选题是“您参加过社区下列哪些活动(可多选)?①政治活动,如选举;②社区文化娱乐活动;③社区管理活动;④社区公益活动;⑤社区内邻里之间的互动”(见图1),分析得出,大部分居民参与过邻里互助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而社区政治活动和管理活动参与较少。对居民社区活动参与状况进行分析可知,社区活动类型参与度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社区内邻里之间的互动、社区文化娱乐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社区管理活动、社区政治活动。统计数据分布非常直观地服从于金字塔结构,从邻里互动、文化娱乐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社区管理活动到政治活动的参与不断收敛。

① Edward T. Walker, “Contingent Pathways from Joiner to Activis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n Civic Engagement”,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3, No. 1, 2008.

② 张紧跟:《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制度优化》,《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6期;张紧跟:《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那么,这种收敛只是此次调查的偶然结果,还是具有一般性意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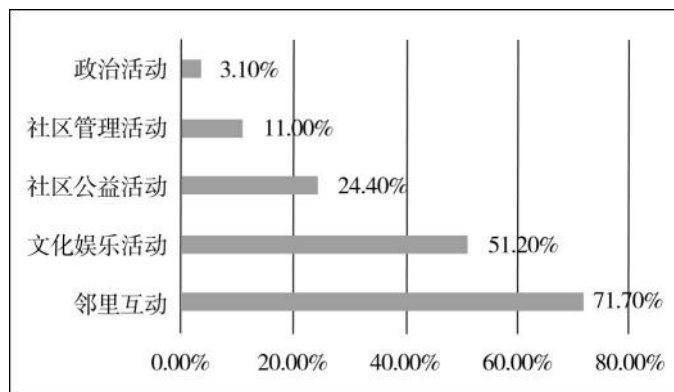


图 1 居民各类社区活动参与行为分布

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循着确立社会参与层次一般模型思路,笔者不断修正该数据分布,采取社会现象学的思考方式,不断地还原,找到现象的底蕴,探索和确立剩余范畴。于是,一连串问题被提出,比如,邻里互动的底蕴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进行邻里互动。在采取悬置和还原的思维方式后,笔者将寻找问题答案的方向瞄准定性资料,对访谈资料进行仔细阅读和甄别,终于发现了非常有意义的线索。

第一个启发笔者的线索是一位退休居民李叔叔的访谈记录。被访人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几个观点:有活动平台居民就会形成一些社团组织,组织把大家凝聚起来,没有平台就没地方玩。平台一词就是笔者要寻找的线索,循着这个线索继续阅读访谈资料,果然有其他两位受访人同样提到了平台。他们所述的平台就是 2011 年至 2012 年新建的一栋大楼,其中,二层的部分和三层全部房间提供给居民用作活动场所,大概有 2100 平米。活动场所以一种公共空间的形式联结居民。所有社会参与都需要在空间中展开,空间提供人们际遇和接触的可能和形式。虽然参与到某空间中的社会个体并不是都能相互际遇和接触,尤其是较大规模的人口集群,但是,所有人际际遇和接触必然以空间参与的形式展开。

当笔者意识到社会参与首先是平台这类空间的参与时,很快反思上述问卷设计中忽略了平台空间。空间为何被忽视?空间对于社会参与研究而言,经常被视为当然的存在,因为人的活动无不在空间中展开。基于此,笔者提出空间参与假说,即“一切社会参与始于空间参与”。

空间参与是社会参与的奠基之处,空间为所有社会参与提供了形式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基于空间参与的其他社会参与形式是空间参与的一种概率现象。假如空间参与概率是 100%,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其他社会参与只是空间参与收敛的结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空间参与之后人群分离机制和其他参与形式是什么?

笔者根据统计数据,重新定义各个指标,认为空间参与后人群分离机制首先是活动,即在空间中际遇后是否展开群体性活动,如果是,那么就产生活动参与,如果不是,那么就只是空间参与。活动参与后人群的分离机制首先是组织,即是否形成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活动形式,以便活动更为持久,如果是,那么就产生组织参与,如果不是,那么就只停留在活动参与。组织参与后人群的分离机制首先是组织外公共事务参与,这是人们在组织利益之外拓展参与的结果,如果是,那么就产生政治参与,如果不是,那么就停留在组织参与。由此,我们建立社会参与层次模型(见图 2),如果这个模型能够成立,逻辑上就能推导出以下两个命题:

第一,社会参与一般按照空间参与、活动参与、组织参与、政治参与依次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排列,参与的人数和频次依层次从低到高不断缩减。通常情况下,社会个体较低层次参与程度越

高,较高层次参与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社会参与规模由低层次参与向高层次参与不断收敛,服从一个结构化模型,即社会个体即使有非常强烈的高层次参与意愿,也会因为高层次参与规模的限制而被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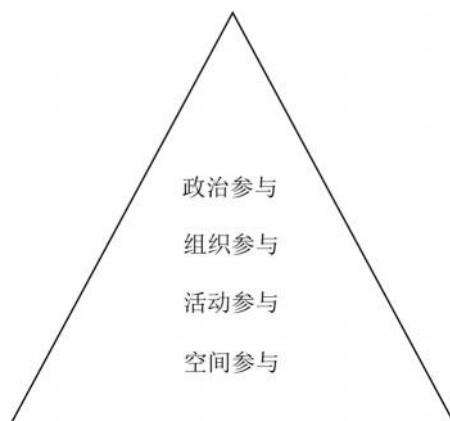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参与层次模型

三、“民一群”视角下的空间集群与空间分群： 以空间作为分析起点的理论梳理与经验研究

从上述文献综述可知,既有社会参与研究主要将社会参与视为个体的社会行动。从行动维度构建理论大厦是社会学的一大传统,韦伯、帕累托、帕森斯、哈贝马斯等人属于该传统的代表人物。社会行动研究传统将行动的结果表述为制度和秩序,因为社会行动分析本身就内含理性、规范等。还有一大传统从社群维度构建理论大厦,涂尔干、西美尔、柯林斯等人属于该传统的代表人物。社群研究传统将社群视为一群人互动后形成团结机制的产物,实际上回到了制度本身。本文采取“民一群”视角,兼顾和融合这两种分析路径,既将社会参与视为“民”的社会行动,又将社会参与视为“群”的实现方式。实际上,集群既蕴含不同的社会参与行为,即不同参与逻辑,也蕴含不同的社会参与结果,即产生不同的“群”。

那么,什么是“民一群”视角呢?笔者对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如何融贯群学与社会学问题展开研究,梳理出其理论中蕴含的“民一群”范式^①。在“民一群”范式的视域中,国家、社区、社会组织等实体被视为“群”,构成其微观的自然人被视为“民”。“民一群”视角便于考察“群”实体与“民”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对社会现象涉及到的实体的主体性及主体构成的实体性进行双重透视,并可以分析实体的层次性。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不同主体在不同实体之中和之间的构成性、转换性和化育性,以及观察不同实体之间的互构性、过渡性和系统性。“民一群”视角可以克服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等范式中难以处理的微观与宏观、时间与空间、行动与结构的对立关系。比如,国家与社会范式将国家与社会两者对立起来,当统一到“群”以及构成“群”的“民”两个范畴后,可观察到国家或社会均充实着各种不同形态的“群”,以及数量不等的“民”。充实于国家或社会的诸种形态的“群”是非常直观的,如家庭、班级、村社、政党、政府部门、社区居委会、企业组织、社会组织等,但抽象化为国家或社会,或抽象化为制度形态,则可能遮蔽充实于其中的诸“群”与“民”的构成状态及其演化过程。为此,“民一群”视角将集群的时间过程与空间形态作为观察对象,以便更为清晰地诊断社会运行状态,探究社会发展逻辑。

假如社会参与层次可以作为社会参与的解释机制或分析模型,那么,社会参与首先是关于空间

^① 陈玉生:《理论自觉的思想资源、本体创新与价值关怀——以社会运行理论为例》,《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3期。

的理论。柯林斯认为，“选择一个分析起点对理论家来说是策略选择的重要方面”^①。那么，空间是否可以作为社会参与理论的分析起点？在许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西方社会理论中，社会参与通常作为社会团结和社会构造的原初形态。在政治哲学史上，“从柏拉图到罗尔斯，都有关于原初状态的理论和假设”^②。在政治学中，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本质而言就是对相互际遇的人们最终参与互动并形成国家等社群的理念设计。在社会学中，同样存在大量将空间视为社会构成的原初形态的理论。涂尔干论证了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互动更加频繁，社会聚集和集体仪式活动越来越多，如夜间的歌舞会，从而促发了强有力的集体兴奋。在这种集体兴奋中，人们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激发强烈情绪的来源。这些来源逐渐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逐渐成为群体的符号，最后被群体赋予灵性，成为圣物，这就是“图腾”^③。按照涂尔干的逻辑，社会参与是人口的空间聚集本身，并因此产生集体团结感而形成群体。同样，埃里克·岗斯提出了“原初场景”和“原初事件”假说，哈贝马斯设想出为达成共识而彼此沟通的照面式互动情境，均蕴含着将空间作为集群的假定。可见，上述所有“原初社会”的理念形态均假定不同个体在某个空间领域际遇后，以不同方式集结成某种形式的社群。可见，本文选择以空间作为出发点来分析社会参与，并不只是研究策略选择，而是基于深厚的理论传统。空间参与是集群的过程，反之，集群从空间聚集开始。

空间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同样可以从柯林斯的情境理论中得到支撑。柯林斯发展了涂尔干的理论传统，提出以“情境”为出发点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个体就是互动仪式链”，“情感和意识通过以前的际遇链而传递”，“际遇制造了其际遇者”^④。柯林斯的情境机制主要用来说明社会团结的基础。当然，空间与情境有不同意涵，总体而言，空间具有更加始基的位置，情境是空间的表现形态之一。柯林斯从情境开始理论分析，这就在于情境是个体际遇的契机。由此可以指认，空间同样是个体际遇的契机。社会参与研究表明，“个体之间的接触会增加信任”^⑤。空间不仅能承载活动、组织，更能促成本能欲望和个人目的，从而成为一个集群的载体。

那么，空间的集群是如何产生的？西美尔认为，“任何一定数目的人成为社会，不是因为在每一个人身上本身都存在着一种由物质所决定的或者推动他个人的生活内容，而是只有当这些内容的活力赢得相互影响的形式时，当一个个人对另一个人——直接地或者通过第三者的媒介——产生影响时，才从人的单纯空间的并存或者也包括时间的先后，变成了一个社会”^⑥。西美尔将“人的单纯空间的并存”与社会区别开来，但从逻辑上看，恰恰是人的单纯空间的并存才成就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形式。人在空间的充实具有逻辑起点的意义。按照柯林斯的研究，充实于空间的个体通过互动仪式激发集体情绪并形成集体情感，从而产生持久维持群体的象征符号等。许多社会参与研究同样阐述了空间参与的逻辑。有研究认为，“网络使得人际互动超越物理空间限制，有共同兴趣和想法的人，能够方便地在网上形成在线社区”^⑦。但是，黄冬娅对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公民参与的研究认为，虚拟社区组织起来的参与力量要转化为影响力和行动力，同样要依赖于线下的联络和动员机制，而开放的城市空间为这种现实的参与行动拓展了影响力^⑧。

在集群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有彼此亲近的动力。为了集群，人们会欢迎各类群体，并互相包容差异。访谈中了解到，凤馨苑社区综合楼刚开放时，不同阶层、身份、职业、年龄的多元主体，凝聚

① [美]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2页。

② 陈建洪：《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及其当代复活形式》，《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③ [法]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④ [美]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2—34页。

⑤ 刘长喜、陈心想：《排他性与联通性：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5期。

⑥ [德]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⑦ 黄少华：《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对天津、长沙、西安、兰州四城市居民的调查分析》，《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3期。

⑧ 黄冬娅：《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基于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公民行动的分析》，《社会》2013年第3期。

到一起,求同存异,相互融合。这个过程似乎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后本体论,人们放弃民族、宗教、地位等文化预设,能够在自觉地将内在偏见清零的情况下参与到公共空间。

当然,空间参与并不全然转化为活动参与等更高层次的参与,即从人的单纯空间并存变成社会。活动参与与否,与一项活动的时间、内容、强度等在多大程度上匹配普通大众需求有关。比如凤馨苑社区音乐社团,虽然只要愿意参与的都受欢迎,但音乐技能要求就已经排除了绝大部分居民的参与。

所以,空间参与具有社会参与分群的功能效应,人群通过空间接触和空间互动而分流。空间作为个体集群的机制、载体和形式,给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提供契机。接触是更基础的现象,如果接触后没有产生互动,就很难跨越到更高层次的参与。此外,同样是凤馨苑社区,综合楼在投放给居民之前,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比较少。这说明空间接触和互动增进了社会交往。

涂尔干提出社会交往的密度问题。在空间参与中,人们的交往密度如果提升,说明空间参与强度越高。空间参与同样可以用交往密度来分类和定义。不过,交往密度表征空间参与程度的同时,也意味着空间承载参与主体的强度问题。每个个体都占据一定的空间,正如西美尔所述,空间充实主体越充分,空间承载力越大。

承载力一词最早来自于生态学,人们用生态足迹来量化城市生态承载力,说明支撑这个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城市人口及其消费需求)所需要的生态上具有生产能力的土地面积^①。依据此定义,从社会参与角度来看,可界定空间承载力为支撑群众人口数量及其生活需求所需要的空间上具有生产能力的场所面积。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并非指粮食、饮用水、食盐等物质要素,而是指满足人们吃喝玩乐、互动沟通、聚会集群所需要的物质设施和制度供给的能力。

一台晚会、一场比赛、一栋楼、一张球台等对于集群而言,空间承载力是有限的。就凤馨苑社区而言,公共空间供给不足非常明显。为了满足空间参与的需求,人们通过在同一间活动室安排更多的活动场次,增加空间使用频率来提高空间效率。但是,即使各个场室 24 小时开放,还是难以满足需求。为此,凤馨苑社区在 2016 年、2018 年等多次调整优化综合楼各个场室的功能。

在此,空间承载力成为社会参与的首要抑制因素。空间对集群活动密度和群体规模具有限制作用。以活动功能为主的公共空间,当承载力有限时,排斥机制就是必然的。我们观察到几种阻断空间参与的形式,人们通过厌恶、冷漠等情感压力排除异己;通过收取活动费、技能竞赛等提高参与门槛的方式,遴选参与者;甚至通过劝退和公开阻扰等方式,挤兑不受欢迎的人。公共空间成了稀缺资源,难以满足所有的参与需求,阻断参与是必然结果。

在集群过程中,从生态承载力而言,可能导致资源的耗竭,公地危机主要就是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理论模型。公地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型就是一块牧场,假设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放牧,牧场会因放牧过度而无法实现牧草的循环生长并最终退化。人类社会是否会发生公地悲剧,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按公地危机理论解释,凤馨苑社区有 n 个居民和一栋综合楼,每位居民都有在综合楼参与活动的自由,综合楼将人满为患。但是,从这个案例分析单元可以看到,人们总是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没有人满为患。

那么,为什么综合楼没有发生公地危机,居民对公共空间的自由参与为什么没有导致空间危机?首先,公地悲剧和公地没有关系,主要是牧草的悲剧。牧草虽说是可再生的,但其有生长周期,可综合楼这类活动空间,一旦建成,人们日常使用并不会使空间资源耗减。草地是耗费性资源,而公共空间是机会性资源。其次,在某个时间节点,公共空间是有承载力限度的,在这个承载力限度下,自由的居民想挤进去都难。最后,在现实生活中,当空间供给不足之时,或者当空间承载力达到某种极限时,人们会采取很多措施,比如逃避、迁移、制度规范、禁止、日常排斥等,规避危机发生。可见,人们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空间自发产生人群分流的机制和结果。

^① 刘小流、陈玉生:《环境社会学视野下的城市社区生态和谐》,《兰州学刊》2008 年第 2 期。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三个经验现象判断:其一,共享空间先于共享价值成为“群”的基础;其二,空间参与包含集群和分群两种逻辑;其三,空间承载力饱和必然产生分群。

四、集群的收敛逻辑:社会参与层次及其经验表征分析

凤馨苑社区综合楼在2012年落成后,居民并不是有组织地参与到该楼宇的相关活动,而是自然而然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了解和认识到该公共场所的存在,并最终普遍知晓和广泛参与。那么,居民参与进去后,综合楼到底形成了一个怎样的空间?作为一个空间,当不断有人参与进去后,到底会形成怎样的集群现象,空间参与后的集群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行为机制或结构模型?

(一)空间参与及其收敛

空间为集群提供了可能性。凤馨苑社区综合大楼落成后,人们因好奇、被邀请等原因而走进大楼,并在此际遇,形成空间参与。际遇是空间参与的原初形态,人们在感官上彼此感知,表现为一种接触性参与。接触性参与是人们在空间上接触的一种自然状态,通过空间的彼此在场而感受彼此,形成感官上的在场。对人们在空间中如何行为有很多理论阐述,比如,布迪厄认为人们对场域采取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从而展开实践,柯林斯认为人们因仪式互动而获得的情感能量影响进一步的互动和集群情况。总之,只有在接触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参与和集群。

空间参与的原初形式就是接触性参与。接触性参与为投入到群体中的人们营造了感官上的在场,人们感到空间群体是一个统一体。但是,这个统一体内部的个体在空间上的接近,彼此形体上的接触,并不导致所有人与所有人的互动,更不导致霍布斯所假定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开战,而只是提供了一种相互建立关系的契机。西美尔论证了人们空间接触的结果,“相遇却不必是一种敌对的遭遇……此时相遇不再意味着一种力量的相互摩擦,而是意味着一种力量的相互补充,因而意味着力量的增加,力量的增加需要并且因此也产生着一个空间的支撑点”^①。可见,接触并不意味着交往,但接触是交往的基础。

空间接触起到群体结晶的作用。各种空间不可能满足所有自然人的需求,因此,人们通过接触空间而作出空间参与选择,以及通过空间接触而作出空间交往选择。一位25岁的受访女性认为,凤馨苑综合楼的那些活动不适合自己的参与,并且没有参与兴趣。当空间并不满足需求时,受访人选择从空间脱域,空间接触并没有产生持久的空间参与。空间参与是群体结晶的过程,它意味着接触性参与向交往性参与收敛。空间使彼此接触的个体通过感官意识到群体的在场和集群的可能。人们创造各种空间以满足需求。比如,集市类似于凤馨苑社区综合大楼,起到群体结晶的作用。施坚雅对中国集市的集群现象作了描述和分析,阐明了集市的规模、数目和集期受到人口等方面的影响^②。当集市区域内的各种空间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成了沟通感情、谈论琐事、缔结姻亲、交易商品等平台时,它就实现了集体的善。空间为实现集体的善提供可能。

但是,接触性参与导致分群。西美尔认为,在人们很接近的情况下,会产生两种极化的情感联结方式:一种是接触刺激的冲动性反应,另一种是因不断接触难以计数的人而产生的麻木不仁^③。空间接触的人们可能彼此吸引而互相交往,也可能彼此排斥而互相隔离。交往与否受到在场感官所产生的初始分群效应的影响。感官上形成一种在场集群和统一体,随着分群效应的作用,其收敛为各种更小的互动群体。

个体之间通过接触增加信任^④,并进而相互交往。在空间提供了接触性参与的契机之后,人们彼此熟悉并建立起联系。自此之后,提供接触契机的原初空间产生了具有持久价值的集群的结晶

① \[德\]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页。

② \[美\]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德\]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页。

④ 刘长喜、陈心想:《排他性与联通性: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5期。

点和关系网络。关系纽带替代空间接触发挥引发人们社会参与的作用,参与行为也将超越原来的空间。这时,人们因为空间接触形成形式上的际遇群体,并转变和升华为实质上的交往群体。人们通过闲聊、打乒乓球、儿童游戏、下象棋、约会、串门等,相互熟悉和建立关系,相约或默契地参与到空间场所,形成关系性参与。可以说,关系性参与是接触性参与发挥分群作用的产物,但逐渐摆脱了空间际遇的偶然性,依靠彼此建立的社会关系来约定和规划集群。人们参与的契机由空间际遇变为社会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空间参与基础,这种遮蔽效应可以解释当前社会参与理论为何没有研究向下收敛到空间参与。

不同接触形态产生不同的关系网络,不同关系网络导致不同的参与形式和集群形式。比如,西美尔区分了完全参与和局部参与两种形式,前者如女仆对主人家庭的参与,后者如临时雇用的家务女工对主人家庭的参与^①。相对于临时女工,女仆与主人家庭成员的接触更为持久和深入,关系相对更为稳定和持久,相应地,参与主人家庭事务等也更为深入,甚至完全参与到主人家庭。在长久的历史时期,女仆通常被视为主人的家庭成员。据此可以认为,传统村落基于世居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性参与和相对完全的参与,但是,现代社会因流动性加快而形成了大量接触性参与和相对局部的参与。

接触的频度是否提升交往的可能性,身份范式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入口。公共场所的参与主要基于大家的居民身份。居民身份的均质性将多元身份的居民联通在一起,比如,高学历和低学历、干部和农民、南方和北方、男性和女性等不同身份的居民。通过接触,居民联通并交往。居民的根本属性不是来自于居住行为,而是来自于居住空间,居住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间房、同一张床可以转译为各种不同的联结或接触方式。空间与社会关系相互建构,或者社会关系是空间的一种形态。不管是垂直关系网络还是横向关系网络,都难以真正阐明人们的参与,唯有空间接触才是奠基之处。

(二)活动参与及其收敛

空间际遇和日常交往虽然是社会参与的基础,但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个体性和随意性。在空间场所,人们因际遇和接触而形成感官的在场空间,并进而通过互动交往形成社会关系的网络空间。空间际遇和关系网络对于社会参与具有非常重要的形式意义,虽然空间有级差,关系有强弱等差的区分,但真正影响集群效应的是密度,即空间际遇的密度和关系网络的密度。涂尔干指出,人口增加导致社会交往密度提升。确实,人口密度增加相应地提高空间际遇的概率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形式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集群分析的基础。

显然,持续的空间参与必然在形式上充实内容。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以后,人们从际遇到相约,并形成群体活动。帕特南认为,“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②。有许多学者在参与研究中都表达了与帕特南相一致的观点,即公民参与和社团活动是公民社会的基础^③。通过活动参与,个人与社会联结起来,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本是社会得以成型和运作的基础。

凤馨苑社区综合楼建成后,形成了十来个活动场所。空间参与因空间的活动场所化而收敛为活动场所参与。但是,活动场所参与者并非均参加活动。在这里,“无事难参与,参与必有活。各活动场所和各组织,经常开展各类活动,如文体活动、社区服务活动、公益活动等。活动成为参与的主要形式和载体”^④。那么,人们为何参与活动?有研究表明,社区认同感对社区参与存在着影响,人

① \[德\]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469页。

② 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

③ 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

④ 王权典、陈玉生、杜金沛、邓定远:《城镇化进程中村社改制模式与法治实践探索——基于广州实证考察》,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

们对社区的认同感越强烈,对小区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①。凤馨苑社区也存在类似现象,比如,受访人杜女士认为,“老年人的活动场所特别活跃”。活动充实了空间参与,活动参与呈现群体异质性。

空间具有复杂性,按照布迪厄的理论,人们通过与生俱来的对世界的信从而展开活动。但是,对于每个个体而言,空间参与和活动参与的原因是具体的。比如,受访人杜女士认为,自己主要是退休后失落和寂寞,所以参与社区活动。此外,“超过八成受访人认同通过参与社区活动能扩大交往范围和促进邻里关系,并且社区活动参与积极性高的人认同度更高”,“年龄越大的居民更多接受亲友邻里邀请去参加社区活动”^②。实际上,居民的兴趣爱好、能力素质、人际网络、年龄、职业等因素都会影响居民的活动参与决策。类似观点在社会行动视角下的社会参与理论中有详尽阐述。

活动参与专业化对社会参与产生分群效应。从凤馨苑社区个案来看,很多娱乐活动参与门槛较低甚至没有门槛,比如,老年大学对老年人几乎没有门槛,乒乓球活动也没有准入规则,几乎只要愿意玩,人们都可以参与。但是,交响乐、武术、模特队等活动要求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门槛高,参与群体的开放程度就相对低很多。可见,相比于非专业性活动参与,专业性活动参与具有更高的收敛效应。这里的活动主要指群体活动,区别于个体或家庭这种私人活动,特别限定于公共活动或群体性活动。活动参与相比其奠基处的空间参与具有更强的群体性、要约性。活动通常有一定目的,人们围绕该目的集结并采取行动,一般需要加以组织。当一些活动经常举行时,其会产生活动文化。

总之,活动场所提供了一个集体善的领域。相对于家而言,公共场所是一个“异托邦”。这个“异托邦”从家中分离出来,赋予了更多人的参与,将部分家庭功能带到更大的群体,实现了人的大部分幸福。当人的基本欲望在某个空间都能够实现,空间参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幸福时,这个空间就是最大的善。居住在小区内的成员因为空间参与而发生关系,这种关系最初始的形态就是接触,比如照面、擦肩而过、鸡犬之声相闻等。接触并不一定产生交往,从接触到交往的过程是收敛的。可以说,活动参与是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指标,甚至是一个社会参与状况的晴雨表。

(三)组织参与及其收敛

在活动参与之上是组织参与。从逻辑上来看,当一些活动或社会参与常态化运作时,会产生人与人之间较稳定的联系系统,促成活动集群的规则化和常规化运作模式,这就是组织。可以说,组织是集群和结社的制度化成就。相对于际遇基于偶然、交往基于情感,活动是空间参与形式的内容充实,组织则是空间参与的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结构化和制度化。

凤馨苑社区形成了不少社区社会组织,推动了相应的组织参与。凤馨苑社区建成后,纷纷入住的居民通过空间际遇、交往、活动而彼此熟悉,一些志同道合的居民开始集群结社,形成成员相对稳定的活动队伍。居民因聚居而在空间上集群,并形成综合楼的空间参与。随着接触、交往和活动的展开,居民进一步组织化。截至2013年,以凤馨苑社区作为成立地址并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或在居委会备案成立的社会组织就有20多个,如凤馨苑名媛女德文化协会、书画协会、凤馨苑武术队、凤馨苑腰鼓队、乒乓球协会、凤馨苑羽毛球协会、凤馨苑合唱团、凤馨舞蹈艺术团等。大部分社会组织事实上拥有相对独立的场所,并制定了准入规则,经常举行活动。从调查研究来看,居民组织参与有几个重要特征,分别是成员权和群体界限、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制度化、参与空间的相对固化、组织人格化并超越成员。

规则化是人们空间参与和活动参与后集群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规则角度看,活动场地一开始主要依靠参与者自身的道德自觉。道德自觉有其非常现实的外在力量,当他人站在台球桌旁等待参与打台球时,自然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产生一种内向要求自律的情感,但是,这种

① 张红霞:《不同居住区居民社区参与的差异性比较——对上海两个社区居民参与情况的调查》,《社会》2004年第5期。

② 王权典、陈玉生、杜金沛、邓定远:《城镇化进程中村社改制模式与法治实践探索——基于广州实证考察》,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

道德难以稳定持续地实现资源利用的协调。比如,有两人占领乒乓球台半小时后觉得并无不妥,但旁边想打球的人觉得他们使用得太久,可是,道德只启示人们不能占有乒乓球台太久,并没有指示多久才是太久。因此,道德启动人们评估使用时间,道德压力转化成评估等理智负担。倘若任何行为都由个体依据内在道德来应对,那么,个体随时感受到道德压力和理智负担,为宽减负担,群体发明习惯、习俗、礼制、法律等外在规范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经济行为最终向企业组织收敛,表明“企业的适度边界不单纯由技术因素决定,而是由技术、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等因素共同决定的”^①。总之,集群给个体带来的道德压力促使参与方式合理化,并最终诉诸规则。

组织参与是空间集群过程中有关群体的心灵界限的合理化和规则化的成就。西美尔指出,“任何的界限都是一种心灵的事件,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社会学的事件……社会学上划分界限的另一个头等大问题在于集体组织的各个成员们参与这些组织的规模的不同”^②。成员参与规则化是空间参与和活动参与的结构化效应,并因此形成明确的集群界限。空间际遇后,人们凭借感官选择交往对象,进而依据兴趣爱好、能力等比较个性化的因素集结活动,并形成组织。类似企业组织蕴含着交易成本的降低,组织参与乃至整个社会参与层次都蕴含着社会复杂性的宽减逻辑。集群界限和复杂性宽减机制决定了组织必然阻断空间参与和活动参与的部分人员,发挥收敛社会参与的作用。

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组织参与?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中指出,尽管美国被认为是具有浓厚的公民参与传统,但是,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公民参与下降了,具体体现为美国人越来越独自活动,参加社团生活的人数与参与频率都大大减少,如保龄球俱乐部、教会、工会或其他志愿组织。帕特南将公民参与的下降归结为社会信任的下降与社会联系的解体^③。可见,在帕特南看来,组织参与受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系的影响。但是,从社会参与层次视角来看,组织参与是空间参与和活动参与向上收敛的结果,倘若集群的奠基处如接触、交往、活动等足够活跃,机会足够大,密度足够高,那么,制度化、结构化的组织参与诉求既可能增强,也可能减弱。比如,通讯技术为人们跨时空联通提供了契机,那么,空间接触和交往这种参与机会就大大加强,既可能强化组织参与,也可能只是强化了活动参与和交往参与。

社会参与层次在社会资本理论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可能。从信任角度分析参与程度,其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确实会遇到挑战,比如,“参与的社团越多,参与社团活动越频繁,普遍信任度也越高”^④这类观点将受到质疑。因为单从组织参与程度来说明社会信任,这容易忽视空间参与和活动参与维度及其内含的普遍信任。比如,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及通过社交媒体促成的约会等集群现象越来越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网络空间实际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际遇和交往契机,从目前阶段来看,它充实的是社会参与层次的底部,而在这个底部,社会参与程度更受际遇、交往、活动密度的影响。当社会参与层次的底部不断强化,也可能阻碍向上层参与的通道。这反过来也论证了组织参与所具有的收敛性。因此,组织参与程度低很可能是底部参与增量的结果,而不必然是社会信任普遍不足的结果,很可能恰恰因为交往或活动的空间而提升了社会资本和信任程度。

很显然,组织一旦成立则具有人格化。组织成员要以组织的宗旨为使命。组织成立需要人们来支持,所以,组织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整合社会,尤其是挖掘人才。比如,凤馨苑社区老年大学这个社团,既从社团内部发掘人才,又通过各种方式发展成员。西美尔区分了两种组织参与的形式,像中世纪的结社主要为完全参与,而现代结社多为局部参与。凤馨苑社区的大部分组织参与属于局部参与,在此基础上才向完全参与收敛。“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⑤通过社会参与,“民”与

① 刘和旺:《西方新产业组织理论述评》,《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7期。

② \[德\]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③ 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④ 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6期。

⑤ R.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l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群”互构共生，由此产生的集群与社会资本是社会得以成型和运作的基础。

(四) 政治参与及其收敛

组织的典范形式要数韦伯提出的科层制。参与科层制组织的成员按职位分级，基于专业技能，依据组织内部确定的规则而非个人情感，分工合作，完成组织目标。韦伯的科层制虽然是理想类型，但其为组织参与分析提供了理论范式。另一个典范要数现代国家，“民”集“群”而成的组织有不同类型，经格劳秀斯、霍布斯等人的设计，创制了现代国家^①。严复将国家视为“群”的一种重要形式^②。国家是一种典型的组织形态，由一群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让渡自然权利，形成公权力和人格权，并将其物化为法律制度、官僚体系、暴力机构等要素。在当前历史阶段，国家是“民”集“群”的最高形式。这种以国家权力展开的各种活动和集群现象是典型的政治现象。在现代社会，指涉或指称国家权力的参与就是政治参与。

如上文所述，社会参与研究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指向政治参与。俞可平是较早涉足公众参与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公民参与又称公共参与、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民生活的一切活动。他所界定的公众参与是广义上的概念，包括投票、竞选、公决、结社、请愿、集会、抗议、游行、示威、反抗、宣传、动员、串联、检举、对话、辩论、协商、游说、听证、上访等^③。贾西津则引用美国学者和《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的观点，把经典意义上的公民参与界定为公民通过政治制度内的渠道，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特别是与投票相关的一系列行为。这类社会参与概念主要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实质为政治参与。亨廷顿指出，政治参与是行动而非态度，排除了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观成分；政治参与是指平民的、非职业化的政治活动^④。

不过，随着新的理论的出现，比如治理参与理论，人们可以绕过政府直接实现公共目的。社会治理参与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那种“为了社会，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建设监管社会的活动过程”^⑤就是社会治理，人们规划社会、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直接面对社会并因此改变他人行为方式的行为均具有公共治理的性质。本文也将其纳入政治参与范畴。麻宝斌和马振清根据政治参与方式的不同，把政治参与划分为四种基本结构形式：一是公民个体的制度化参与，二是公民个体的非制度化参与，三是群体性制度化参与，四是群体性非制度化参与^⑥。

“一直以来，直接参与公共治理是人们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基本上只能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原因在于地理空间的约束以及公民能力的限制。”参与式治理能够有效解决过去政治模式下公民和精英之间委托代理机制产生的困境，能有效粘合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提升服务质量和公共福利。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个人和组织，特别是弱势群体，往往希望参与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决策和治理过程中，包括地方社区、工作场所以及基层治理，其都希望充分和广泛地体现公民参与，并认为公民不仅仅是挑选政治精英的选民和自私自利的消费者，更不是政府过程中的被管理者，而是自治者、共治者和自己命运的主宰者^⑦。尤其是在底层和社区层面，需要将公民带入政策议程、社区项目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的中心地带，需要创造开放的参与机制，以迎接而不是威胁的态度欢迎公民的进入。但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公民的参与依然缺乏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政治参与显然超越了空间参与、活动参与、组织参与那种主要为自我和成员服务的范围，将参与行为结果覆盖到空间际遇、交往、活动和组织范围之外，甚至指涉难以界定具体对象的大众。沃

①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

② 严复：《译余赘语》，载〔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③ 俞可平：《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学习时报》2006 年 12 月 19 日。

④ 〔美〕S. 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汪晓寿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⑤ 陈玉生：《社会治理社会化：桂城社区治理的精神气质》，载谭建光、麦绍强编《关爱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⑥ 麻宝斌、马振清：《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政治参与》，《政治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⑦ 钟伟军、沈荣华：《Web2.0 时代的参与式治理：争议与反思》，《中国行政管理》2014 年第 5 期。

克认为,市民组织参与较低的时期,投票和其他参与形式也降低^①。政治参与“要求个体参加活动并与他人互动”^②。但是,在社区层面,政治秩序逻辑统领管理逻辑与生活逻辑,居民更多地个体生活界面活动,个体往往是在生活受损时才会主张社会、政治权利^③。因此,政治参与的收敛不仅体现在既有社会参与理论的取向上,也体现在上述经验数据上,更体现在从集群为己向集群为他的转变上,即参与旨趣从群内向群外,更低层次社会参与向上集群的效应和表征。

结 论

本文尝试将“民一群”视角应用于经验研究,将社会参与研究转换到更为基础的群学理论上来,并将其表征为集群现象。集群不仅是居民的集聚,还包括分群和群分。“民一群”范式是笔者学习郑杭生先生理论遗产的一个发现,其包含着深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髓,能够很好地透析凤馨苑社区综合楼的集群现象。郑杭生以群学为基础,定义社会学概念并构建社会运行论体系,继承发扬了群学思想。近些年,景天魁对古代群学尤其是荀子群学思想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谢立中等人对此进行了回应^④。这些理论都启发了本文“民一群”范式的运用。在运用该范式具体分析经验现象的同时,本文也回到涂尔干关于社会团结和西美尔关于形式社会学等相关经典理论,以便更好地分析集群现象。

本文创新和论证了集群现象中存在的社会参与层次模型。社会参与层次概念是笔者在一项调研项目中发现的,本文是对该发现展开学术性的探索研究。为了完成该项工作,首先,本文对既有社会参与理论进行梳理并形成了几点认识:一是社会参与理论总是预设了政治参与并以之收敛各种参与现象;二是社会参与知识布展路径不断向日常生活拓展,旨在探寻政治参与的深层逻辑和奠基之处;三是社会参与理论始终没有确定奠基处即向下收敛的基础。其次,本文采取了“民一群”范式对经验现象进行研究,对凤馨苑社区综合楼的集群现象进行研究,建构了社会参与层次模型。从研究结果来看,社会参与层次模型得到了经验现象的支撑,也得到了相关社会参与理论的检验和支持。

呼应本文开篇柯林斯的两个问题,长期情感能量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对于社区居民而言,共享公共空间才是长期情感能量的真正基础。正因为需要长期相处并持续互动,长期情感能量就建立起来了。相对而言,学习教育并不是不能产生情感能量,好的教育可能引发非常强烈的情感能量,但不可能具有日常互动或活动那样的持续性^⑤。观察两种方式,我们很容易发现,人际互动具有日常性和情景性,容易激发人们持续的情感能量,引导人们持续性的社会参与。

综上可得出结论:社会参与具有层次性,大众集群服从“空间参与—活动参与—组织参与—政治参与”梯次展开的层次模型。由此可初步推论,社会参与层次对大众集群具有预测作用,社会参与层次中较低层次的参与程度越高,那么,较高层次的参与程度也越高。进而可以推断,公共空间供给将促进社会参与。公共空间将起到收敛社会参与的作用,其可以通过活动参与、组织参与传递到政治(公共)参与。比如,如果释放公共空间能促进空间参与,如果强化空间参与、活动参与能促进基层治理中居民的组织参与程度和公共参与程度,那么,开发公共场所则有利于实现提升社会参与能力和激发社会活力的政策目标。当然,本文主要是探索性理论研究,社会参与层次范畴还需进

① Edward T. Walker, “Contingent Pathways from Joiner to Activis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n Civic Engagement”,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3, No. 1, 2008.

② 黄少华:《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对天津、长沙、西安、兰州四城市居民的调查分析》,《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3期。

③ 吴晓林:《治权统合、服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复合结构”》,《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7期。

④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谢立中:《“中国本土社会学”辨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⑤ \[美\]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6—209页。

一步实证研究,其理论和实践价值需要进一步分析。

(责任编辑:彤 弓)

On the Hierarchy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on-Group”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Cluster Effect of Community Public Activity Places

Chen Yusheng

Abstract: There is a dilemma between “convergence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value orientation” and “diffusion to life field in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 in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 Then, does social participation have the basis of downward convergence in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 and follow some general logic? Taking the cluster phenomenon in a public activity place (Complex-building) of Fengxinyuan community as the case, based on the “person-group” perspective, and bring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into the cluster fiel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luster follows the hierarchical participation model of “space participation,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hich space participation has the function of convergence in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social participation is hierarchical, and the mass cluster is subject to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Space Participation; Hierarchy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Cluster Phenomenon; “Person-Group” Perspective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第三届全国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重点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2020/12月

社会科学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主管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会科学》编辑部

主编：胡 键

编辑部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337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165518

传真：021-63841642

杂志社网站：<http://www.shkx.org.cn>

印刷单位：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

国内总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112/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0257-5833

国内邮发代号：4-273

国外发行代号：M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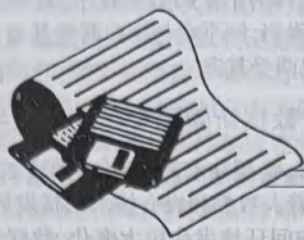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每月10日出版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购零售处：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行部



定价：20.00元



报刊文章篇目辑览

报纸名称后面的数字是文章发表日期;
期刊名称后面的数字是期数。

政 治

- 政治权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袖核心的塑造
(何虎生、雷引杰)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4
- 中国共产党党组的百年实践、模式及趋向
(马宝成、成为杰)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4
-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若干思考
(江必新、马世媛) 科学社会主义 2
- 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路风、何鹏宇) 管理世界 7
-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成就、挑战与深化路径
(叶淑兰) 国际问题探究 4
-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徐坚) 外交评论 4
- 中国共产党百年世界认识的变迁(任晓)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4
- 政党外交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笔谈
(王存刚、刘海彬等) 国际展望 4
- 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与命运共同体建设
(李自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4
- 美国行为的根源(刘小枫) 文化纵横 8
- 拜登政府的对话战略:竞争性共存与新平衡
(王帆) 和平与发展 4
-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刘建飞) 美国研究 4
- 中国新安全观与上合组织二十年安全实践
(许涛) 和平与发展 3

社 会

-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百年演进与经验启示
(赵新国、黎岩)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3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之维(青觉)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4
-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走向
(唐文玉) 学术界 7
- 中国特色互助社会:历史溯源与现代建构
(刘妮娜) 北京社会科学 5

论人口普查信息化:新特征、新挑战与新路径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普查质量评估”课题组)

-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地位对身份认同影响的
异质性分析(刘文博、周皓) 攀登 3
- 中日韩三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
(胡荣、肖和真) 南开学报 4
- 中国老年照护的嬗变、逻辑与制度完善
(郭林、谌基东) 学术研究 7
- 走向“复合型社会”赋能的智慧社区建设
(吴海琳、程茹)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4
- 县域社会治理:问题指向、核心目标与路径实践
(唐惠敏、范和生) 宁夏社会科学 3
- 过渡社会:“民一群”视角下的翟城村百年社会
变迁研究(陈玉生) 福建论坛 6
- 婚姻迁移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
(郝立、王志章) 西北人口 3

哲 学

- 马克思是如何回应对《资本论》的“学术性
指控”的?(聂锦芳) 山东社会科学 7
- 马克思的总体性叙事对辩证法形态的澄清
(尹健、刘同舫) 江汉论坛 6
- 马克思对洛克财产权理论的定义与继承
(段忠桥) 武汉大学学报 3
- 毛泽东论列宁主义的学习运用和发展
(欧阳奇)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3
- 天吏: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
(黄玉顺) 文史哲 3
- 王充的孔子观(余树苹) 广东社会科学 4
- 罗素与金岳霖论真理:一个比较研究
(陈波) 北京大学学报 3
- 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原理的“实践”论证
(廖申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4
- 黑格尔论道德与伦理的关系
(邓晓芒) 哲学分析 3
- 论布伦塔诺对西格瓦特存在性判断和否定性
判断的批评(苏振甲)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4

社會理論學報

第二十五卷 第一期
二〇二二年 春季

專題：紀念蘇國勳教授

略論社會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內在關聯：
紀念蘇國勳老師
應星

一個人和一個學科的四十年：
紀念蘇國勳老師
何蓉

自由主義：理解蘇國勳學術思想的一個視角
肖瑛

韋伯的農業社會學研究及其意義
——以《古代文明的農業社會學》為例
熊春文

從西學研究到文明比較：
蘇國勳先生社會理論轉向的內在理路
孫飛宇

糾葛與矛盾：
再談韋伯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問題
趙冰心

其他論文

意象互動、文質世運與樣子使群研究
陳玉生

重拾主權
——福柯與霍布斯的現代權力研究
龐亮

從“為他者負責”到相互承認：
重思《現代性與大屠殺》
李天朗

保持平衡：激情，責任感，分寸
——韋伯的永恆教誨

185 沃爾夫岡·邵伯樂（原著） 朱磊（譯）

社會理論學報

第二十五卷 第一期 二〇二二年 春季

目錄

編輯及編輯委員會名單 vii

來稿注意事項 ix

專題：紀念蘇國勳教授

略論社會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內在關聯：
紀念蘇國勳老師
應星 1-10

一個人和一個學科的四十年：
紀念蘇國勳老師
何蓉 11-16

自由主義：理解蘇國勳學術思想的一個視角
肖瑛 17-27

韋伯的農業社會學研究及其意義
——以《古代文明的農業社會學》為例
熊春文 29-42

從西學研究到文明比較：
蘇國勳先生社會理論轉向的內在理路
孫飛宇 43-51

糾葛與矛盾：
再談韋伯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問題
趙冰心 53-74

其他論文

- 意象互動、文質世運與樣子使群研究 75-114
陳玉生

- 重拾主權 115-154
——福柯與霍布斯的現代權力研究
龐亮

- 從“為他者負責”到相互承認： 155-169
重思《現代性與大屠殺》
李天朗

- 保持平衡：激情，責任感，分寸 171-185
——韋伯的永恆教誨
沃爾夫岡·邵伯樂（原著）
朱磊（譯）

意象互動、文質世運與樣子使群研究

陳玉生

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摘要 本文引入馮友蘭新理學中闡明的“樣子”概念，構建本然樣子與日常樣子範疇，將中國傳統中的“意會”、“意象”和“文質”思想可以統一到“樣子”範疇，闡明“樣子”表徵社會、互動交往、評價社會、建構社會的深層邏輯，並通過樣子整飭來實踐自身，證明籌畫“樣子”與籌畫自我、籌畫生活或籌畫社會之間具有密切的邏輯關係。

關鍵字 意會、意象互動、樣子使群、文質世運

本文是筆者近年嘗試融貫中國先秦社會思想與西方社會理論的系列文章之一。此前文章，筆者闡明了以下觀點：社會是民集群的形態與過程。¹ 社會世界總是由渾沌向“名分”發展，名分是制度的基礎，社會秩序實為一陰一陽“名分”秩序，社會秩序變遷服從陰陽易變，民集群服從“名分使群”邏輯。² 按邏輯推斷，民集群的形態與過程即社會被認知，則社會從混沌世界走向名分社會。民集群的形態與過程即社會被干預，則社會從自發秩序走向名分秩序。那麼，渾沌的社會世界難道一定要經過“名分”才能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嗎？轉換成後現代理論則是，難道必須經由話語及話語權力才能影響我們的生活嗎？在“話語”或“名分”之前是否仍然存在某種力量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呢？費孝通晚年指出了一種存在於“人和人交往過程中的‘不言而喻’，

‘意在言外’的這種境界”，並將其視為非語言和邏輯可說清楚的“意會”領域。³“名分”社會秩序不經“樣子”這一手，將難以理解。⁴可見，世界不管經由神話傳說、教義神啟、道德規訓、巫術儀式這類世界呈現的方式，還是經由經驗表像、系統功能、符指系統、科學規律這類呈現世界的方式，皆要訴諸於可感知的樣子才能呈現自身。從邏輯上講，名分是對世界樣子的取值或賦值；名分社會通過樣子顯現，名分秩序通過樣子建構。是故，本文要進一步考察一個具體問題：如何通過“樣子”表徵社會、互動交往、評價社會、建構社會？

論證之前，先對“樣子”範疇的含義做個直觀的介紹。“樣子”相當於易經裡面的“卦象”，區別於並映射於“太極”；相當於道教裡面的“道相”，區別於並映射於“道體”；相當於佛教裡面的“色相”，區別於並映射於“空相”。⁵本文將主題確定為“樣子與社會”，嘗試對中國傳統“樣子”文化思想做一項社會學分析，闡明通過“樣子”認識世界和干預世界，積極施為於社會秩序的思想基礎與歷史邏輯。

一 本然樣子與日常樣子：如何通過“樣子”表徵社會？

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是民集聚成群的形態與過程。⁶民集聚成群服從何種邏輯呢？名分使群。⁷名分的邏輯是什麼呢？法像擬容與別物正名。⁸因此，“使群”的邏輯在於“民”的法像擬容與別物正名。那麼，“民”的名分及其促成的“群”是如何通過法像擬容與別物正名實現的呢？為探究該問題，我們引入馮友蘭理學之“本然樣子”思想。

馮友蘭曾以“本然樣子”範疇闡明藝術作品具有的“理”。⁹比如，國畫有成其為國畫的“理”，其“理”區別於油畫等其他

相關類屬的畫所具有的“理”，正因如此，人們能夠針對一幅畫的“具體樣子”評判其屬於那種類型的“畫”。也即，“國畫”就是諸多“具體的國畫”綜合起來的“畫”，但它並不客觀具體地存在，但又被人們知覺並以之審檢和評判具體的畫。可見，處身於“理的國畫”與“具體的國畫”互相映射，使“具體的國畫”有了“理的國畫”之歸屬，反之，“理的國畫”有了“具體的國畫”之表徵。馮友蘭將這類“理的國畫”稱為事物的“本然樣子”，相對應，我們可以將這類“具體的國畫”稱為事物的“具體樣子”。

那麼，民集群的形態與過程是否同樣存在本然樣子和具體樣子之分呢？以馮友蘭例舉的“人”字為例進一步說明。“人”有各種不同語音和文字表達法，但其意指確是本然地，以區別於其它動物的“某性”規定的。馮友蘭認為，任何文字都不是人隨便創造的，而必然依照一定的理，這種理就是本然樣子，它是真正不著文字。¹⁰ 不著文字之意就是說，沒有實際地某種文字寫出，但可以由某種文字寫出，即可出於文字，但不能規定為某種特定的文字，比如，“人”是可以用文字表達出來的，但並不能規定這個表達的文字就必須是“人”或“man”某種具體符號。按照索緒爾的說法，符號是任意性和差異性的。因此，馮友蘭以朱子談倉頡造字為證，說明文字之所以被撰成，必是有其理，也即有文字所表示的“本然樣子”。

馮友蘭列舉“人”字，主要說明本然樣子的一與多的關係，即同一題材可以經由多種類型的符號標記法，因此也就有多種類型的本然樣子。這裡我們引申開來談。

如果單從符號本身而言，各種符號之間相比較，是否存在一種更接近自然事物本來樣子的符號，如象形文字，或者更原始的圖畫文字，它們最接近其所指形象，而表音文字，或電腦語言，則最不接近。那麼，是否意味著形式化程度越高，離本然樣子越

遠呢？馮友蘭顯然不是表達這種意思，而是說，不管形式化還是具象化的，都必然指向某些共同的約定標準，如不管寫實還是寫意的畫，如屬同一題材的畫，它們可以這個題材為標準確定為同類，那麼，它們必然有這種類的本然樣子。因此，本然樣子與符號的樣子（即象形或圖畫文字作為符號與其所意指的事物之間的相似性）無關，因此，只限於符號的標記法進行說明是無法達到本然樣子的理解的。

“人”的本然樣子應該在於人的“某性”，並且是最典型的“某性”。這是否意味著在生物性層面上具有“最典型的人”之說法，就像有“最典型的鳥”一樣。今天看來，這個話題似乎很荒謬，但大量社會事實和社會研究表明，這涉及到約定問題，比如，種族主義偏見，肢體健全人中心主義，男性中心主義等。這些都是人生物性層面上對人的類型化，並因此對具體的人依據類型化的本然樣子進行了層級排列。比如，有健全人的本然樣子這種規定性，以此為標準，對偏離者納入殘疾人範圍，並且依據偏離程度對殘疾分等級。這樣，生物性因素也就轉化成社會性因素。

是否存在社會性層面上“最典型的人”？這是顯然的。我們的話題主要談的就是這個問題。正因為社會存在大量社會性的“人”的“本然樣子”，人與人之間才得以區別開來，比如“聖王”、“好人”。也正因為這種社會性的“人”的本然樣子的存在，使得“看人”和“做人”獲得了藝術創作和評價的標準，或者說腔子、套子，使的“人”本身藝術化和符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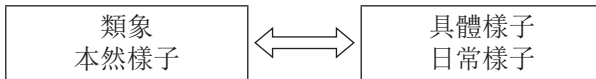
我們延伸馮友蘭關於“人”的一與多的關係，將發現人作為區別於其它動物的本然樣子是一，而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使得人群內部標明“人”的類型化則是多。這種類型化的過程，在東周時期集中表現為“正名”實踐。“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資治通鑒》卷一）在正

名實踐中，人自身的類型化體現為不斷變化的差異化過程。按照馮友蘭的觀點，每一種類都有其理，有其本然樣子。《荀子·榮辱》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如此，地位、年齡、身份、智力、能力等都可以作為“人”的分類標準。每個人也因此受到數量龐大的“名分”的本然樣子的規定。

故，“正名”的基礎是“人”的類型化的“樣子”的取值或賦值。

對具體的個人，有些較為穩定的名分記述方式，如傳記、墓誌銘、個人檔案等，但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每時每刻表現出來的樣子是複雜多變的。這裡各種名分在類上面，都有相應的本然樣子，可謂人與人之間差異性樣子的多性，如“不忠的臣子”、“愚蠢的君王”。具體的人就是由這些多性來規定，使得每一個人都表現為某種“日常樣子”，或者說，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可能被賦予相應的可說明的“日常樣子”。

綜上，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圖示：



按照該圖示，我們只要將馮友蘭闡述的“人”轉換成“民”即可回答前述問題：“民”的名分及其促成的“群”通過法像擬容與別物正名實現，“民”及其集聚而成的“群”通過“樣子”表徵。“名分使群”的深層邏輯為“樣子”分“民”與“樣子”分“群”。“民”的“日常樣子”的複雜性對應著或歸類於“本然樣子”的複雜性。由複雜性規定的每個具體的“民”的“日常樣子”，都能從各種維度對應到該維度所屬類的本然樣子中得到說明或形成意象。

比如，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就是說，有仁心的人，其本然樣子不會是花言巧語、裝出和顏悅

色的樣子。如果一個人的日常樣子表現為巧言令色，那麼，就被歸為不仁者類的本然樣子。一個人所展示出來的某個維度的具體樣子，或者可歸屬為仁者類的本然樣子，或者不仁者的，不能同時屬於仁者和不仁者。這裡強調具體維度，是因為人的複雜性，也許某個維度表現為不仁者，某個維度又表現為仁者。並且還強調，某個具體的維度是否屬於仁或者不仁，是時空性的，因為有上述“情”和“境”因素在。

從“巧言令色”可以看出，具體的“民”的樣子並非如藝術家面對的“遠山”那樣，而是具有自覺自為之性，人們不僅可以關照他人的日常樣子，而且也可對自己的日常樣子進行關照。這種關照表現在，人們可能會積極施為於自身，使其日常樣子趨近本然樣子，如修身養性和裝模作樣。人的日常樣子蘊含著演繹修飾和學習養成的效應。如孟子認為人可以通過修身完善人性，“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荀子雖批評孟子的人性理論，卻也確信，修身是必須而且可欲的，仁以聖人為形式的最高表現是可以獲致的。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對自己的日常樣子進行管理，使其達到由內而外表達出來的良好效果，使日常樣子趨近本然樣子。¹¹

日常樣子的修飾和養成一方面給主體展示自身提供了自覺自為的契機，另一方面使得人與人之間依據以身體為核心展示出來的所有的個體特徵具有一個直觀的形象差異結構。這些修飾養成維度及天賦維度的人的樣子的存在，為社會構造出日常樣子差異的結構效應，為綜合測評樣子分層提供可能。比如，性別、年齡、身高、地位、服飾、髮型、膚色等，都可能作為人群區別的標準；“老年人”、“暴牙哥”、“紅毛怪”、“酷吏”等稱謂，都是因個體具有某種有區別的樣子而獲得的。所謂“樣子分層”就是樣子之間存在的異質性和對比性，比如黑頭髮和紅頭髮、

老年人和年輕人、暴牙和非暴牙。個體的日常樣子，有些是個體自覺修飾演示出來的，有些是個體無意流露出來的，有些是個體天賦自然蘊含的。

因此，具體的“民”的日常樣子有由不同維度確定了類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有由同類的本然樣子確定的層級性，有由情和境所確定的時空差異性，還有由個體進行樣子管理的主體性。故，人的不同“樣子”成就不同的“民”，不同的“民”成就不同的“群”，最終，“樣子”成就“民”的“名分”，“民”分成就“群”的“名分”，是為“名分使群”。名分使群的深層邏輯為樣子使群。

二 意象思維與意象互動：如何通過“樣子”互動交往？

馮友蘭用“不是作品底作品”、“無聲之樂”、“不著一字”之詩、“遠山之畫非‘遠山’”這些短語來形象地說明本然樣子。本然不是實際地存在，而是一種理，是界定藝術作品的類的理，本然樣子是區別出各種具體作品的類與類之間的差異性的樣子，並且是各種類的最好的樣子。本然樣子實際上不可言說，它只蘊含著趨近理的程度，完全趨近理就是本然樣子。

為了顯示本然樣子，人們因此依託、尋求和確立一種媒介，將這種媒介作為最好的樣子，讓人們以此意會到理。《周易·繫辭》載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也就是說，《周易》認為聖人通過確立“象”來理解自然和社會的“理”。這種“象以盡意”作為中國古代的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被大量研究稱為“象思維”。¹² 王樹人將“象思維”作為中國哲學和文化之根，並將“象思維”與“概念思維”進行比較，¹³ 認為“象思維”相對具有詩意聯想、超現實、動態、混沌、比類、體悟等特性。

“象思維”可以通過“觀物取象”、“象以盡意”、“得意忘象”等短語獲得大致理解，表明人們對事物的理解和意義的獲得是通過“象”作為媒介的。它表達了這樣的思維方式，通過觀察事物獲取事物的“象”，如孔明作戰前所夜觀的天象、倉頡造的象形字、周易八卦圖；然後再經由這些“象”獲得意義，如周易卦爻辭；最後人們獲得意義之後而不再專注於替補色彩的“象”本身，比如專注於卦爻辭的意義，因而忘卻了“象”。這思維過程與符號學表述非常相似，¹⁴ 表達了對事物“樣子”的符碼化和意指化的過程。

然《老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這引起了“先物後象”還是“先象後物”的學術爭論，¹⁵ 即“象-物”關係並非明確。如果按馮友蘭“遠山之畫非‘遠山’”的看法，那麼一事物成其為一事物得先有成其為一事物的理，也就是先有其本然樣子，即“先象後物”。但實際上，我們應該將爭論焦點引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上面，這表明道生萬物，且萬物皆變，唯道永恆，而像是道中恍恍惚惚的產物，是流變的、模糊的。象思維實際上是問道，以象趨道。首先需要明確道，才能明確象。然而，《老子》開篇說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如何明道呢？《老子》第十八章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此處提供了一種觀測的辦法，那就是“道”遭到破壞之後能夠看到“道”的面貌，其間就可以顯現和明確“仁義、大偽、孝慈、忠臣”的“象”。¹⁶ 這種“象”最逼近道，逼近道中的物，用馮友蘭的概念，即本然樣子——“仁義者、大偽者、孝慈者、忠臣者”們最好最真實的樣子。但是，這種“象”不僅逼近“本然樣子”，而且具體指向某人的最為真實的“日常樣子”。比如說“國家昏亂，有忠臣”，意思就是國家昏亂之時，每位元臣子對

於君王，都會表現出具體的“日常樣子”。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不離不棄地效忠于君王的，其行為就可能顯示出忠臣類的“本然樣子”。按照象思維，這時候這位臣子的“日常樣子”就是獲得忠臣意義的“象”。但是，這種語言學的語法分析仍然不能說明“象思維”，只有當人們心中有“忠臣”應具有某些行為者，或者有某個具體的人因某些已經深入人心的行為曾被大家認為是“忠臣”，而某人也有類似行為，人們通過比類兩者的“樣子”，確定“某人像忠臣的樣子”這個命題，這才是“象思維”。¹⁷

當問及為什麼說“某人像忠臣”時，“象思維”很難訴諸於語言，而只能意會，是對某人的意象構造的。這種意象可以根據“本然樣子”形成，也可以根據其他忠臣的具體“日常樣子”比類形成。由此有“得象而忘言”和“得意而忘言”之意象之境界。因此，“象思維”融合了不朽的文化與流變的形態，融合了理念的本然樣子和現實的具體樣子。

“樣子”是可以意會的“象”，即“意象”¹⁸。對於個體“日常樣子”而言，是個體自身所展示的或傳達的資訊所構成的具體的意象，是趨近“本然樣子”的程度。“本然樣子”則是是可以意會的蘊涵著事物之理的“象”，是抽象的無具體物的物，歸屬於其代表的某類事物的諸具體事物的“萬象”之“象”。因此，“樣子”意義化過程是因為人們會從“具體樣子”中提取出“象”，然後經由這種“象”形成“意象”，析出意義。

如上文所述，本然是不可言說的，本然的呈現主要靠本然樣子。同樣，在“象思維”的語境中，意義並非靠符號傳遞，而是靠“象”傳遞。如《周易·繫辭傳》載：“夫易者，象也。”

“夫象者，出意者也。”對《周易》之“象”的掌握不是靠教習，而是靠“領悟”，即“悟象”。這種“萬象之象”不可言說。¹⁹

如果說存在“萬象之象”，那就意味著存在一個絕對的“本然樣子”，比如“道”、“太極”、“理”這類可歸為“本然”的所具有的“樣子”。它可以通達整個世界及其意義，如《周易》中的“太極圖”。本文認為，這種“萬象之象”的呈現和感悟是“象思維”最為玄妙和獨特的地方。它表明人能對世界進行總體性的把握。正所謂“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莊子·天下》）

《周易·繫辭傳》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思維”追求本然樣子而將世界高度整合到一個圖式（“象”）之中，而“概念思維”則追求以精確的概念對世界進行刻畫和把握，結果不斷產生差異化的概念（諸多意指符號）而使世界及其意義分化對立。“象”是諸範疇纏繞一起的壓縮物，而對它的把握並不能靠歸納或者演繹，而只能訴諸於其真正的原形，即“道”，依靠“悟道”才能真正“悟象”。而道則是一混沌狀態者，因此，朱熹有“未發之中”的說法：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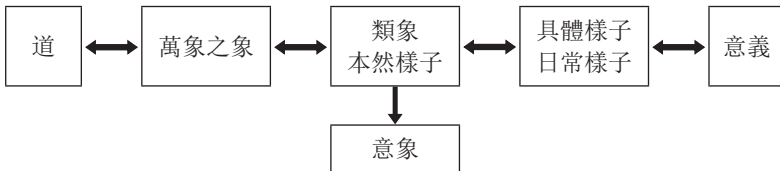
《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裡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個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

對於“具體樣子”、“具體的象”，它們可以有千差萬別，但都可以悟出其“本然樣子”、“萬象之象”或“道”，反之，同理，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易經·雜說》）。比如，從“太極圖”中觀測和領悟具體的“天象”，從“不著一字”之詩中領悟具體的詩，反之，同理。所謂“至樂無聲，至文無字”，這是一種境界，也就是穿透和虛置“具

體樣子”，直接回歸到“本然樣子”。比如，陶潛有無弦琴，每每在酒醉後撫之以寄意。馮友蘭說：“所謂至樂，亦是一無弦琴”，“所謂至文，及‘不著一字’之詩，亦是一張白紙。”但是，這種詩“常人不能讀，必才人乃能讀之；他不但能讀之，且約略能寫出，使人讀之。”²¹也即，對具有這種境界之人，所謂才人，他看具體的詩，看到的不僅是具體的詩文，而且能看到其理，其道。俗語“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表達的就是這個道理。

循上文可推理，在不同的人看來，某具體個體的“日常樣子”必然會對應到不同的“本然樣子”中，也就有日常生活中不同人對同一個人的同一舉止會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同樣，一般的人，對於像陶潛那種直接遁入“至樂無聲”的“本然樣子”的“日常樣子”，常人也難以感受和理解。

綜上，我們可以下列圖示概括“象思維”：



在此圖示中，分為四個領域，道域、象域、意義域和意象域。“象”可以蘊含“樣子”，反之不成立。比如，“太極圖”是“道”的“象”，我們稱之為“萬象之象”，但不是“樣子”，因為它不是對道的規定性，也不是對具體事物的規定性，而是悟道的媒介，雖然也是“象”，但是作為連通“道”與更具體的“象”之間的橋樑，經由它，可以獲得具體的“象”之意義。因此，象域中區分出“樣子”領域，主要是為了表示常人境界下的“象思維”。也就是說，在象域中存在各種層級的“象”或

者“樣子”，每個人物件域的領悟，越趨近於道那端，其境界越高。並且，越趨近道那端的“象”越需要靠“領悟”。

在另一端，象連接意義域。一般認為，象出意，這個思維過程，就是意象，也就有意象域。所有的意象都意味著“道”的存在，也就是意味著最高境界的意象。能悟道者，意味著能直觀萬事萬物之象，領悟天下萬事萬物之意義。而絕大多數常人，只居於圖示中的樣子領域，對某些類的事物的本然樣子有所領悟，對日常生活熟悉的具體樣子有所領悟。用佛教語言來說，就是他們有分別心，分別心未除，就必然有類及其本然樣子的差別，也就有具體樣子和日常樣子的分別。“日常樣子”主要用來說明個體展示出來的樣子，是人的樣子；除此，其它“象”或“樣子”表述的是萬事萬物之象。

在中國傳統社會，“頓悟”、“成佛”、“悟道”、“聖人”等作為最高境界者，一直是人們修身養性的追求目標或參照標準。對“象思維”理論而言，“視域融合”和“符號互動”是有限的，因為，人與人之間存在境界的差異，也就存在“意象”的差別，而後兩者未表明這種含義。²² 比如“參禪”，它講究的是悟性，是一種“意象”活動，隨境界層級越高則越能參透。也就是說，不同的人因為境界不一樣，具有不同的象思維，因而形成不同的意象，因此他們同時面對某具體時空中具體個體的具體樣子時，會提取和形成不同的“象”。

象思維是人的常態思維，“意象”深深嵌入於生活世界。在社會生活中，實際上存在一種蘊含意象思維的“意象互動”，它屬於一種不可完全還原為文本的無聲的交流，是樣子互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比如，費孝通以親子之間的互動為例認為：“在親情之間，特別是在母親和不懂事的孩子之間，也集中體現出這種‘不言而喻’：小孩子太小，有許多感受不會用語言表達，但媽媽憑感覺就明白孩子要表達的意思，這種‘意會’，是人和人

交往的一種重要的狀態，實際上常常是決定性的狀態，它自然應該成為社會學的一個基本的關注點。”²³ 再如，久別重逢的戀人相見，當看到對方形容憔悴時，不僅語言上關心過問，而且神態語氣會隨之調整到關心的樣子上。倘若語言上表示關心，神情上則滿不在乎，那就沒有切中“關心”的本然樣子，就不是最好的樣子，就是不合“理、情、境”。如果對方對“關心”有一個非常理想的“本然樣子”想像，那麼，即使神態語氣上表現出“關心”，但與理想狀態還有距離，也會引起對方不適。這就是“關心”的“意象”。

這種不純粹訴諸語言的“意象互動”，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真實的社會交往形態。實際上，所謂“意氣相投”、“曲高和寡”、“裝模作用”、“弦外之音”、“揣測聖意”、“知音難逢”等，表達的就是這種“意象互動”。以下典故可說明：相傳伯牙善彈琴，鐘子期善聽琴。伯牙彈到志在高山的曲調時，鐘子期就說“峨峨兮若泰山”；彈到志在流水的曲調時，鐘子期又說“洋洋兮若江河”。鐘子期死後，伯牙不再彈琴，以為沒有人能像鐘子期那樣懂得自己的音志。後遂以“知音”比喻對自己非常瞭解的人。

意象互動以意會為特徵，默契和心領神會為基礎，故趨向“本然樣子”，以展示境界為取向。如果雙方境界差異懸殊，一方對另一方的意象或者樣子不能領悟，那麼，就會阻礙溝通，其結果往往給境界低者以壓力和提高境界的動力。

比如，馮友蘭將“無字天書”類的本然樣子看作“聖域”，認為才人才能進入它、領悟它，而聖人則可常駐其中，常人則需要不斷學習才可進入特定類型的“聖域”，如“人倫之至”這種聖域。²⁴ 根據上述“象思維”圖示，意象的最高境界就是“萬象之象”，如果對這個境界都超越，那就是“悟道”。常駐“聖域”者，必是悟道之人，才人可以悟道，應該是“以象悟道”。

以此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互動雖然依靠直接的領悟才能達成彼此行為的理解，但是，直接領悟並非是毫無障礙地順利完成的，不僅存在對事物的具體樣子會有誤讀，更存在對具體個體的日常樣子不能會意。²⁵ 此處表明，意象互動在超越符號互動層面那種由於符號意指的混亂造成的困擾的同時，存在另一種困擾，那就是意象本身的不可領悟。以下典故可說明：

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經由“曲高和寡”典故可闡明幾個重要觀點：第一，如上所述，“悟道”境界有高低，意象互動因而有障礙。第二，除了對本然樣子的領悟有高低之外，對展示本然樣子的意象表現也有境界高低。也即，意象互動必須蘊含著對“象”的領悟和對“象”的表現兩個方面。比如，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這句話必然蘊含著，聖人不僅對人倫之本然樣子必有領悟，而且能以身作則將本然樣子體現於日常樣子。所謂“之至”，必然意味著聖人日常倫理表現的樣子與倫理的本然樣子非常符合，並且可為世人垂範。由此推論第三個觀點，意象互動包含著對自我和他人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行為期待，也就是意味著“本然樣子”的旁觀。就該典故言，這第三個觀點意味著只要是“和曲者”都能夠領悟所和之曲。第四，在趨向“聖人”或“本然樣子”這個制高點下面，存在各種層級的具體的日

常樣子，意象互動雙方所在層級之間的差距越大，意味著境界距離越遠，就該意象物件而言，層級低者要領悟層級高者就越難，意象互動也因此越難。第五，常人雖然不可能皆為“聖人”，但層級低位者，可以以趨向“聖人”為取向，“聖人”也因此可以垂范“常人”。第六，社會群體的整體境界及其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境界最高者的境界，是此，社會有或需要“聖人”、“神人”、“人神”出現。

我們再就茅盾《子夜》十七中的一段話對意象互動做進一步分析：

吳蓀甫聽著，把不住心頭一跳，臉色也有點變了；趕快一陣狂笑掩飾了過去……現在是趙伯韜勉強笑著掩飾他的真正心情了。這也瞞不過吳蓀甫的眼睛，於是吳蓀甫也感到若干勝利的意味……

按朱熹的說法，人之情態處於“未發之中”則為道的狀態。²⁶再進而按老子的說法，情態已發（即已打亂道的混沌狀態），則道中必然顯“象”。這段話中對話雙方各有一次掩飾真正心情的狂（強）笑，這是對人之情態“未發之中”狀態的打斷。第一次，吳蓀甫心跳、色變和狂笑，構成他當時的具體樣子，其中產生的“象”及其意義並未被對方趙伯韜領悟。第二次，趙伯韜強笑，其具體樣子及其產生的“象”和意義卻被吳蓀甫領悟了。此兩次，具體樣子都是狂（強）笑，但互動雙方對對方的笑的样子所取象及形成的意象卻不同。如果按境界之高低論，就此次意象互動，吳蓀甫相比趙伯韜境界高，或許，他更會做樣子，使得樣子中的真象未曾表露；他境界更高，對對方樣子中的真象領悟有加。

對此，我們不能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從符號學角度或從“深描”的角度來分析“狂（強）笑”的含義；也難從“視域融合”

那種一般性的哲學解釋學來理解，因為後者並沒有闡明互動者駕馭自我顯象的能動性，沒有闡明道的存在性，沒有闡明悟性和境界的差別性。視域融合理論只是假設了一種靜態的意象，但人可以“建構視域”，也可以“遮蔽視域”。視域融合、符號互動在抽象客觀的符號學和解釋學意義上闡明人際互動，將具體的人和社會結構遮蔽，其概念本身未能揭示人們領悟符號、視域的個體差異性。意象互動必然是互動者彼此間超越語言和理性的生命歷程的交融。

由此可見，本然樣子處於兩端之間，一端作為其底蘊和前提的理、道和萬象之象，另一端具體樣子和日常樣子作為其具體顯象，總體形成意象思維圖示。意象思維不僅區別於符號思維和視域融合概念，也是意象互動的基礎。意象互動表明人們依託意象進行互動，但由於人們對自身樣子具有自我遮蔽或顯現能力，由於人們之間存在領悟各種意象存在境界高低和差異，使得意象互動存在“曲高和寡”現象。

三 文質彬彬與文質互救：如何通過“樣子”評價社會？

那麼，我們要問，什麼樣的樣子是最好的樣子呢？也即，當一個人情態未發之中時，其若道之混沌狀態，並未顯象，但任何人都必然會流露情態，那麼，怎樣的情態才是最好的呢？我們以一個比喻來形象地表明這個問題：

猶如一棵樹，在未砍伐之前，相對於人們雕飾和利用這棵樹的木材而言，它處於道的混沌狀態，尚未顯象，但是，一旦砍伐下來，人們對其加以雕飾和利用時，則開始顯象。人們可以非常粗糙地刪去其枝葉，將樹幹直接用作搭建茅棚的橫樑，也可以非常精細地雕刻樹幹，將其刻製成一尊佛像。此樹幹隨後的顯象，有其自然的樣子和人為精細雕飾的樣子之別。

這種差別，在中國文化中以“文質論”得以非常詳盡地解讀。自然的樣子稱為“質”，精細雕飾後的樣子稱為“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釋“素”字時說：“凡物之質曰素。……以質未有文也”。

因此，上述“樣子”問題如果套入文質論的話，就變成“文”的樣子最好，還是“質”的樣子最好？²⁷ 或者，如果說質具有一個確定意象（如未經雕飾的樹幹）的話，這個問題就轉變成“文”成什麼樣子及“文”到什麼程度會展示出最好的樣子？再進而，如果說某事物歸屬的類的本然樣子是最好的樣子，並且是約定的樣子，那麼，這個問題又轉變成“文”成什麼樣子及“文”到什麼程度大家覺得最適當，以及在某一時空中人們覺得最適當的“文”的樣子和程度是怎樣？

根據這些問題，我們追蹤“文質論”這條線索進一步查明有關“常人樣子”的建構圖式，並闡明這樣幾個觀點：文質論實質為樣子論，蘊含著意象思維，以道為前提；文質論所集中的各種觀點實際上具有一個大致的概念圖式；觀點的差異和交鋒具有明顯的社會性和時代特徵。

《論語》載“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被認為是文質論的原型。²⁸ 按孔子的意思，人如果以質勝文，則表現粗野、鄙俗，像野人；如果以文勝質，則表現精巧、文雅，像史官；而君子的本然樣子應該是文質彬彬，文和質相和諧的樣子。²⁹ 那麼，何謂“文”，何謂“質”？

“文”首先指紋彩，眾物眾色交錯的狀態。《易傳·繫辭下》載：“物相雜，故曰文。”這裡是指事物的紋彩，比如天文、鳥獸之文。³⁰ 還有社會生活的紋彩，《賁卦·象辭》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裡的文，指的就是社會秩序的外在表現形式，即所謂“五色成文而不亂。”（《左傳》桓公十二年）也就是說，社會的紋彩是經由禮儀等社會制度確定下來的，

或者社會自然形成的表現為個體外在形象的差別。因此，就有了個體的紋彩，人們“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垂文繡，加飾之以珠玉。”（《荀子·正論》）不管是事物、社會生活，還是個體形象，其“文”都表現為外在狀態，包含著色彩和紋理雙重性，可感覺，可識別，色彩規定種，紋理規定類。其次，“文”具有動詞意涵，意指修飾、化育。《論語·憲問》載：“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意思表明，人可以禮樂紋飾、教化，成為成人。在孔子看來，禮樂是人的紋彩，可“文”於人。每個人可按照“文”的程度和側重點不同得到區別，如上文所述的人倫之至者為聖人，還有野人、史官、君子、成人等。此外，不同社會也可按照“文”的程度不同得到區別。董仲舒認為：“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³¹ 陳亮說：“吾考三代之治，忠而質，質而文，非樂相反也，變焉而迭相救也。”³² 質、文成為兩種相對的社會性質表達，並且，按照董仲舒的觀點，歷史的發展是一質一文地往復迭變的。

“質”的本義為未經文飾、雕琢，指“質素”。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釋“素”字時說：“凡物之質曰素。……以質未有文也”。《儀禮·鄉射禮》載：“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桑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³³ 此“質”意為畫獸之頭象的白色底子、赤色底子，相對於“非文飾”，指“質樸、質直”。這些底子，一旦著畫，則為“文”，有了紋理。相應地，社會生活和個體形象如果未經“文”，也就是“質”的狀態。所以，質既表現為相對於文明的粗野，也表現為相對於過度文飾的質樸。對於行為而言，“質”相當於上文所述的“未發之中”的狀態；對於人而言，“質”相當於老子所述的“孩子”狀態；對於社會而言，“質”相當於制度不發達的野蠻狀態。按如此說，事物之質，在於未有“文”，屬於事物的混沌和初始狀態，更接近於“道”的狀態。

“文”與“質”之間的區別實際上並非那麼確切。從本義而言，質之質素也含未曾文的紋理，反之成立，也即，質具有自然、野性狀態下的文。從其引申義和比較含義而言，質樸實際上是比較文雅獲得定義的，它們是相對的，很難有一個確切的判准。“質”實際上相對於人為的“文”而言，進而指相對那些文飾程度更高的東西而言的“文”，即未曾“文”者或文飾程度更低者。因此，文質區別首先要確定“文”。孔子文質論，實際上緣起于週末“文”衰現狀，主要是禮文紊亂。對孔子的文質論，顏元認為：“夫‘文’，不獨詩、書、六藝，凡威儀、辭說、兵、農、水、火、錢、穀、工、虞，可以澡彩吳身，黼黻乾坤者，皆文也。”³⁴以此結合上述自然之物不謂文觀點，我們可以認為，凡文飾身心、文辭和世界的人為之物和行為過程皆為“文”，凡“文”皆有未曾文飾之“質”作為基礎。

文表明人們對自身、文辭和世界外在樣子進行文飾的過程和結果。質則表明未經人們文飾之身心、文辭與世界的原初狀態及其內在品質。在相對意義上，雖然有文，但文之相對粗陋者也可能被稱為質。分析結論三點：文主要集中於外在樣子，質還指內在品質；文必須是人為的，質還包含著天然的；文質互為相對意義。

討論到此，我們只是大致對文質基本義做了介紹，我們還未討論文到什麼程度才謂之最好的樣子這個問題。我們還要進行鋪墊，先討論為何而文？

孔子文質論主要針對東周“文”衰現狀，它集中表現為“禮文”之衰，所謂禮崩樂壞。實際上，文衰並非無文，而是表現為文而不合禮，比如大量的僭禮行為，並非無文或文不足，而是文過。對此，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禮樂是人之文，而仁是禮樂之質，如果沒有仁，禮樂也就導致浮華。“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

雲樂雲，鐘鼓雲乎哉！”（《論語·陽貨》）據劉向《說苑·反質》記載：“孔子占得‘賁’卦，‘喟然而歎息，意不平’，子張問，‘賁’是吉卦，為什麼還要歎氣？孔子回答他：‘賁，非正色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因此，孔子提出文質彬彬則為君子論斷，實際上是對當時文和質的雙重糟蹋後的反思，是文和質的雙重拯救。孔子採取的做法是，質以仁為奠基，文以禮為奠基，最終以三代為依歸恢復社會風尚，實現禮治社會秩序。孔子身體力行，踐行禮文和禮質。

《論語·鄉黨》記載了孔子嚴格踐行有關言行舉止和神情服飾等的禮的規定，實際上就是孔子自己說的“文之以禮樂”。“文之以禮樂”最終使得禮樂得以實現。禮樂需要透過對身心和世界的“文”來實現自身，並因此呈現為社會秩序。據此可認為，孔子之“文”以禮制為取向，但其初始是人格取向的。

而實際上，孔子所批判的文衰，恰好是不循禮制的文。例如，《論語》載：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意思是說，管子私藏巨大財富和過度雇傭傭人，孔子責備他斂財和不節儉，管子效仿君主樹塞門和置空酒杯，孔子責備他不知禮。孔子為何責備，是因為，管子所具有的排場，也就是對“文”，並不合禮制有關文的規定。按照規定，君臣上下等級有別，這種差別在文上面得以體現，比如，君主樹塞門和置空酒杯，臣下就不能效仿，不然就是僭禮，其實就是過度文飾。對諸如此類的現象，孔子憤然說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因此，文在禮制制度下，全然由紋飾的精細程度轉變為文的社會等級制度了，事物之文納入到社會倫理秩序的紋理之中。

從孔子批判當時大量存在的僭越行為看，實際上表明，當時諸侯爭霸，各種僭禮行為主要是顯耀性的，很多是刻意而為的。文對他們而言，並不是以禮制為取向，也不是以人格為取向，而是以功利為取向。但是，這種功利取向恰好迎合了禮制秩序，甚至進一步鞏固了這種秩序本身。比如，有些諸侯行周天子之禮，其行為一方面僭越了禮制，但另一方面卻恰好是行為主體對禮制的確信和實踐，因為他們想通過這種僭越行為表明自己的王霸地位，通過文飾表明自己處於禮制等級結構中的頂端。

一般認為，孔子文質彬彬觀主要在於人格取向，以此品鑒人格，而未曾注意到另一層含義，那就是將文導入社會秩序，文既不能過度而僭越禮制，又不能過於粗陋而不合禮制。因此，文質彬彬既要求人們文飾中由內而外的和諧，又要求個人與社會的和諧，使得文之個體（或人本身）之內在與社會之外在協調起來。

綜合起來，文質論在實踐方面最終指向的是文的程度，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強調，並且將文的程度與社會發展聯繫起來。

“舜法商，禹法夏，湯法質，周法文”，³⁵ 此“四法”在社會性質上“法商”同於“法質”、“法夏”同於“法文”，所以，四法可歸於“質”、“文”兩端。這就有了“文質世運說”。康有為在《春秋董氏學》“文質”條中說：“天下之道，文質盡之。然人智日開，日趨於文。三代之前，據亂而作質也，《春秋》改制，文也。故《春秋》始義法文王，則《春秋》實文統也。但文之中有質，質之中有文，其道遞嬗耳。漢文而晉質，唐文而宋質，明文而國朝質。然皆升平世質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耳。後有萬年，可以孔子此道推之。”³⁶ 按照這種邏輯，人們在實踐中提出“以文救質”或者“以質救文”觀，也就有社會改革為取向的文質論。進而推論，社會改革方案為，如果文勝質則以質救文，如果質勝文則以文救質，這樣才能達到社會層面的“文質彬彬”狀態。

但是，如何判斷社會的文質狀態呢？接下來我們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不管文質取向如何，在實踐中都受應然性和實然性雙重標準評判，最終指向一種理想標準，這種理想標準，似乎沒有得到系統論述。也就是，最好的文是什麼？不管應然還是實然，實際上就是對文質的評判。把握最好的文，可以通過綜合這些評判來加以構建。上文我們得出觀點認為，文和質都是對外在樣子的表達。人們經由外在樣子來評判人的內在品質，或者評判一個社會狀態。對此，我們先局限於禮制中有關文質規定進行介紹。禮制中的文質是什麼？梅珍生認為：³⁷

禮的外在形式，無論是儀式、儀節的規定，還是揖讓的動作儀容，抑或是典禮中的俎豆器具，乃至國家的各種制度，均歸屬於“禮文”的概念。……“禮之質”包括：第一，禮的器具儀式等簡樸狀態；第二，禮規則所體現的精神；第三，禮自身的本質，或內在規定；第四，禮所反映的信仰、願望、情感等意蘊；第五，禮的終極性根源等內涵。

梅珍生將禮的外在形式和內在內容區別為禮文和禮質，認為禮質通過禮文表現出來。然而，在梅珍生的文章中，禮質似乎表現為制度層面下的禮制的內在本質，又似乎表現為踐行禮制的人的內在品質。³⁸

本文將禮文明確為禮制規定下的人對自身、文辭和世界的外在樣子的文飾；將禮質明確為禮制規定下的人自身、文辭和世界的內在本質及其未曾文飾狀態的外在樣子，或者相對更精緻的文飾而言的文的粗陋狀態。這裡的外在樣子包含靜態的儀容和儀仗等，還包括動態的人的言行和儀節等。倘若此外在樣

子未曾“文”或“文”得相對粗陋，則為質，同時“質”還表明人自身、文辭和世界的內在品質，比如上文所述，仁是禮樂之質。如果一個人真正的仁，那麼，這個人實際上已經具有禮樂之質，可謂質有餘，無須禮樂之文，猶如“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禮記·郊特牲》）如果一個人不仁，那麼，禮樂之文就是藻飾，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也就是說，如果不仁，其外在樣子再怎麼與禮制相合，也談不上禮樂。

綜上，一方面文作為外在樣子，即使合乎禮樂制度規定，如果沒有內在的質的仁，那麼，其文則為矯飾，談不上真正的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一個人的外在樣子，即其文的程度和狀態看出這個人的內在品質。實際上表明，質是文的基礎，也是文的歸宿。如果內在品質好則無需文也美，反之則需要文。

至此，我們可以這樣分類：第一，質美無文，如質樸、儉樸、仁；第二，質劣無文，如粗俗、粗野；第三，文質相諧，如文質彬彬、得體；第四，文不副（應有的）質，此項又可分為文過，如僭禮、矯飾、做作、東施效顰；以及文不及，如粗俗、粗野，此項依上述論述，可歸為質這一端。如果將文質相諧、文過之外的三類合併為“質”類，那麼可得三類。結合上文分析，我們大概可以歸納出以下表格：

| | 外在樣子與內在品質 | | | | | | 內在與評價 | | 社會 | |
|----|-----------|----|-------|----|----|------|-------|----|----|---|
| | 儀容 | 儀仗 | 內在品質 | 言行 | 儀節 | 內在品質 | | 評價 | | |
| 文 | 修飾 | 威儀 | 文明、莊重 | 規矩 | 得體 | 文明、義 | | | 華夏 | 周 |
| 質 | 粗俗 | 儉樸 | 野性、質樸 | 粗野 | 簡 | 野蠻、樸 | 仁 | 禮質 | 夷狄 | 夏 |
| 文過 | 矯飾 | 僭禮 | 奢侈、越禮 | 做作 | 繁瑣 | 德之賊 | | | | 秦 |

上述表格大致表明了本文對文質論歸納出來的圖譜。現解釋幾點：①本文認為，“文”特指外在樣子，對禮制而言，包含靜態的儀容、儀仗及動態的言行、儀節之文飾；“質”則指未曾文飾，或者相比文而不足，以及事物內在品質；文必以質為基礎，但文過屬於文。②為保證表格簡明，因此省略了不少內容，只給出了大概的圖譜。③對於外在樣子的文和質，及內在品質的質，都有一定評價。

那麼，什麼是最好的外在樣子？我們以上述表格為基礎，去除那些貶義詞再增加一些內容可得下表：

| | 外在樣子與內在品質 | | | | | | 內在與評價 | | 社會 | |
|---|-----------|----|-------|----|----|------|-------|----|----|---|
| | 儀容 | 儀仗 | 內在品質 | 言行 | 儀節 | 內在品質 | | 評價 | | |
| 文 | 修飾 | 威儀 | 文明、莊重 | 規矩 | 得體 | 文明、義 | | | 華夏 | 周 |
| 質 | 樸素 | 儉樸 | 質樸 | 單純 | 簡 | 樸實 | 仁 | 禮質 | | 夏 |

也就是說，如果“文”，要由外而內體現文明、莊重、義等品質；如果不“文”，則要有外在和內在皆質樸、樸實等品質。那麼，這兩種外在樣子，到底哪種更好？這個問題還需轉化為這樣的問題，即質樸的就是好的，或者好的就是質樸的嗎？我們從老子和孔子之間的文質觀差異來討論這些問題。

四 文質之治與文質世運：如何通過“樣子”建構社會？

老子和孔子各自提出了理想的社會形態，一般認為，孔子重“文”，老子重“質”。筆者認為，他們構建的理想社會形態具有“本然樣子”的意義，可以稱之為“本然社會”。所謂的“本然社會”就是某種理念的社會形態，從這種社會形態本

身而言，是最好的社會，也是最典型的社會。那麼，從社會理論角度看，老子和孔子理想中的具有“本然社會”樣子的社會形態到底如何呢？下面我們接著著重介紹老子的文質觀，然後再稍作比較。

對老子而言，“文”為矯飾，矯飾流行便形成種種約束，限制人性之自然，違反道。故而，老子提倡“見素抱樸”。（《老子·第十九章》）老子說：

“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老子·第三十八章》）

“故至譽無譽。是故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老子·第三十九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踴躍政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老子·第三章》）

“處其厚”是指處身敦朴，“處其實”是指處身樸實。“碌碌”形容玉的華麗，“珞珞”形容石頭的質樸堅實。老子主張質樸，不居淺薄，不居虛華。老子崇尚自然之美、自然之善，主張不顯露足以引起貪念的事物，所以，無需文飾事物，一旦讓人們知道什麼是美的，什麼是善的，就可能引起貪念，就不再美，不再善了。為什麼會這樣呢？老子認為，所有文飾都只會讓人心錯亂，比如，五色蒙蔽人的眼睛，五音堵塞人的耳朵，五味麻痹人的口味，使人失去真正的判斷，因此，真正的美譽是不需要文飾的，只要文飾，就不可信了。

可見，老子主張“見素抱樸”是為了勸導人返樸歸真，回歸自然，罷黜矯揉造作、矯飾虛文，批判那種以仁德之名竊取名義，以禮文之名遮蔽醜惡的現象。因此，在老子看來，外在樣子既有最自然的樣子，也有人為的弄虛作假的樣子，而最為自然的外在樣子，也是最為真實，最為善美的，也是最為道德的。因此，按照老子的觀點可推論，文的自覺雖然可以滿足禮制的規範，卻失卻了真善美的本質，失去了自然的質樸，更是人性自然樣子的迷失。

人性自然樣子也就是道的樣子，是故老子說“古之善為道者……敦兮其若樸”。（《老子·第十五章》）也就是說，傾向于大道複歸的人，就能夠表現出敦朴的自然樣子。這種敦朴的自然樣子即是本然樣子。在老子看來，“朴”之於“道”猶如“不著一字”之詩之於本然樣子，³⁹也即“道常無名，樸”。（《老子·第三十二章》）因此，“樸”就是最好的，趨近於道的樣子，是未曾“名”，也就是未曾“文”的樣子。人如果未曾“文”，其行為就屬於大道。當人們的行為意欲背離大道、背離自然樣子時，就要“鎮之以無名之樸”。（《老子·第三十七章》）

老子在這裡實際上表明，質樸的樣子是未曾“名分”的樣子，而不是那種將事物區分後變得“昭昭”、“察察”的禮制之繁名所確定的樣子。並且表明，“名分”也就是對道的背離和終止，進入“文”的狀態。質樸並不是沒有外在樣子，而是這種外在樣子並沒有得到述說，沒有被賦予真善美和假醜惡這樣的意義。比如，莊子“鼓盆而歌，送妻升遐”，是因為莊子認為生死歸於“氣”。在人的道的狀態下，生死不分，也就無悲喜、哭歌之分。莊子複歸自然樣子，那種習常的樣子，也就是“無名之樸”。倘若按照禮制，莊子應該哭喪。

“無名之樸”也就是那種自然樣子，對於日常行為而言，“是為習常”。（《老子·第五十二章》）它指那種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自然樣子，是習慣而成自然的，以“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和“善行無轍跡”（《老子·第二十七章》）為基礎。“不言”含有不將如何行為言說給他人之意，“無轍跡”含有不留下自己如何行為的痕跡之意，從而使自己的樣子處於道的混沌狀態，處於無“名”無“文”的狀態，複歸自然樣子。即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第二十五章》）倘若每個人都處於無“文”狀態，也就是每個人都處於最好的樣子。如何實現？那就是不留言，不留痕跡，拒絕言傳身教。因此，按照老子的設計，需要將自然樣子之外的其它樣子及其意義、意象都遮蔽起來，表明任何外在樣子皆可直接歸諸於道，即朴，即自然樣子，無名分，無意義意象。⁴⁰

那麼，樸到底是什麼樣子呢？老子給我們留下的印象似乎事物之樸的狀態不可琢磨，即所謂“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然而，我們從實現樸的樣子的具體做法反推，就大概可知曉，樸的樣子並非拒絕人的作用力的樣子，尤其不是那種認為老子主張愚民政策的論斷。比如，一棵樹砍伐下來未經雕飾的毛坯可以稱為樸，對樹幹雕飾經過之後的各種精細程度不同的物件也可以稱為樸，界定樸的關鍵就在於對這些毛坯、物件並不賦予其美、善、價值、技藝等的人為區分，並且最為關鍵的在於人們對樹幹進行雕飾與否及雕飾到什麼程度是習常所致，也就是行為的自然而然。也就是說，行為出於天性，物件保留了天性，皆歸於“無名”，即所謂“道常無名”，然後才成其為樸。朴的樣子是無名分的樣子，也就是道的樣子。但可以肯定，“無名”並非某事物

沒有名稱，而是沒有對該事物進行美善等區分和附加的所指。下面我們以方東美“道相”論⁴¹進一步佐證：

“就‘道相’而言，道之屬性與涵德，可分兩類，屬於天然者，屬於人為者，前者涵一切天德，屬於道，只合就永恆面而觀之，計得：（1）道之全體大用，在無界中，即用顯體；在有界中，即體顯用；（2）‘無為而無不為’；（3）‘為而不恃’；（4）‘以無事取天下’；（5）‘長而不宰’；（6）‘生而不有’；（7）‘功成而弗居’。反之，道之人為屬性，即來自處以個人主觀之觀點，而妄加臆測，以人類拙劣之語言而構盡之、表達之者。”“就‘道征’而言，凡此高明至德，顯發之而為天的，原屬道。而聖人者、道之具體而征者也，乃道體之當下呈現，是謂‘道成肉身’。”

在這裡，東方美肯定了天然之道相和至德至聖者之對道的表徵，而對人為語言文飾的道相則斥之為妄加臆測。因此，語言文飾之道相也就不屬於道的自然樣子，不屬於樸。但我們要在東方美的道相、道征基礎上增加處於道狀態下的人的行為結果，如自然而然的改造世界的產物，也作為道征，即樸。這樣我們就可以將老子的道的自然樣子表徵出來，包含東方美的天然者道相、至聖至德的道征，以及任何人自然狀態下行為結果的道得。

綜上，依據對老子的分析，我們可結論：樸是最好的樣子，對事物發展中破壞這種質樸樣子的力量則“鎮之以無名之樸”，具體做法就是不名分、不美言、不留言、不留痕跡、不言傳身教、不貴難得之貨等。

老子的樸的樣子意指無“言飾”，而非無“紋飾”。

這樣推理可得，要真正複歸世界的樸的最好的樣子，人要首先入樸的狀態，也就是入道，即不名分、不美言、不留言、不

留痕跡、不言傳身教、不貴難得之貨等。按照上文歸納的馮友蘭的觀點可知人有境界之高低者，故不可能每個人都能達到道的境界。甚至可以反過來說，如老子、馮友蘭等這類在認知上達到如此高境界者，也就是能悟道、悟理之人，其對世界的名分即區別心也是境界最高者，實際上也就離真正的道的惚兮恍兮的混沌狀態最遠者。⁴²

與老子相比，孔子重“文”。上文對孔子文質觀有所論說，這裡只做簡要概括。

孔子也講道，並且也從形而上學論道，如孔子認為：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中庸》）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中庸》）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為大也。（《中庸》）

與老子偏重於天性道相相異，孔子偏重於上述東方美道相論中的人為道相和道征。

第一，孔子認為，道孕育萬物自有其理，人若要順應道，就得順其天命，也就是表徵天命，這於老子論道處於混沌狀態正好相反。比如孔子論人道是說：“上治祖彌，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也。”（《禮記·大傳》）親親尊尊、昆弟合族即是人道，也是

道，自然之理，社會自然之倫理。這裡的理不是形上學意義上的道理，而是與混沌狀態相對應的秩序、紋理。比如，孔子說：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孔子認為兒女為父母守孝三年不是禮而是仁心的要求，是自然之理，即是人道。

第二，孔子強調人的積極作用，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孔子不僅要求表徵道、為道、宏道，“士不可以不弘毅”，“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而且認為可以學道、知道、得道，“君子學以致其道”。孔子講道，主要講人道，並且認為，天道也要由人道表徵，也就是說，人道本身就是天道的外在樣子。如上，老子認為大道具具有本體論特徵，是始基，並且不可知。

第三，在human道中，孔子特別強調仁，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仁是人的內在的質，是human道，在此，孔子實際上承認了human道具有仁與不仁的兩重性，正因為如此，才需要文之以禮樂，以防止human道之不仁之質的可能性。構成孔子學說的人的內在的質不僅有仁，還有義、禮、智、信、溫、良、恭、謙、順、忠、勇、善、敏等。可見，孔子對人的內在的質作出了詳細的類型化，給予名分。這與老子宣導無名分相反，老子批判這種為仁不仁等人的內在的質的名分，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莊子“大仁不仁”，（《莊子·齊物論》“至仁無親”（《莊子·庚桑楚》對此作了進一步表達。老子擔心外在的仁義之類成為作惡的手段和藉口，故而宣導回歸大道，大道就是至仁，就是不仁、無親，從而擺脫人與人之間的忠孝倫理關係，回歸人性的自然樣子。

第四，孔子認為表徵人的內在的質需要配合外在的文飾，認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

語》)如何文飾?孔子說“文之以禮樂”,也就是說,人可以通過禮樂來宏人道。⁴³反過來,既然禮樂可以文人道、宏人道,也就可以表徵人道,猶如人道表徵天道。孔子也就最終將拯救大道天道淪喪的希望寄託于禮樂制度。這種禮樂即是文。禮樂之文承擔著雙重功能,一是文人道,二是表徵人道,前者指向人的內在的質,即人性,由外向內;後者指向蘊含天道的人文倫理和社會秩序,由內向外。如上,老子批判外在的禮樂文飾。

第五,孔子的質樸雖然和老子的質樸一樣,含有自然狀態的樣子意涵,但其主要是相對於禮樂文飾而言,未曾禮樂文飾或文飾程度相較粗陋者,就為質樸,有禮樂之文,以文為參照,而老子的樸僅指混沌狀態下的自然樣子,或者無言飾的自然行為結果,無文。

綜上表明孔子以人為道相為核心,將人為途徑賦于禮樂,透過禮樂來表徵人道,並最終表徵大道天道,也就是表徵人與社會的自然樣子。⁴⁴

因此,對孔子而言,符合表徵人道,符合禮樂的外在樣子是最好的樣子。

當然,這種自然樣子,孔子認為是可由人文飾的,也即賦予了意象和意義。鑒於此,我們將其作為本然樣子看待,與老子的自然樣子區別開來。並且進而認為,孔子之天道是混沌已開的局面,具有周易陰陽圖之特徵,屬於萬象之象。對人道而言,這個萬象之象可概括為仁與不仁這種對應圖式。

雖然老子和孔子對於什麼是最好的樣子所持觀點迥異,存在顯明的文質觀差別,但是,倘若不懂文之意,即使有文,也與樸無異,再倘若文之意為境界高之所闡發的特別心聲,那麼其文就更與樸無異了,上文“曲高和寡”的例子可說明這點,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命題,“文之至若樸”。這似乎為辯證法提供了案例,可是有差別,朴是無文無識,而文之至是有文無

識，只是一般人或者他者難以名狀。因此，對於現實社會生活而言，重要的恰好不是文與質這兩個極端的重要性問題，而是其中間領域的性狀和變化問題。比如，對禮崩樂壞的東周社會，孔子宣導文之以禮樂，商鞅實行文之以刑法。荀子說：“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荀子的化性起偽觀實際上將老子和孔子的文質觀融合起來了。這也表明，文質之間可以互相轉化。

從邏輯上看，理想的做法是文質互救，文勝則以文救質，質勝則以質救文。司馬遷寫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迴圈，終而複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使人不倦，得天統矣。”⁴⁵ 此處可見司馬遷的文質互救觀。

文質世運論和文質互救論至漢代得到發展。董仲舒認為“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⁴⁶ 表明歷史在文質之間更迭發展。康有為甚至認為：“天下之道，文質盡之。”⁴⁷ 文質論對認識“民集群的形態與過程”起碼有兩項啟發：統治者可以通過變革文質即干預“樣子”干預社會發展；但是，當統治者強調質時，普通百姓可能滋生野性，當統治者強調文時，普通百姓就可能文過而致偽，“民”在順應治道的同時也在背離治道。要注意的是，背離治道的不只是與治道相反的力量，還有治道之用的過猶不及，比如，周朝治道以文，結果百姓文過起偽，文之治道最終效率式微，漢初轉而以質。同理，治道變革並非正在實行治道不被遵守，反而因為被過度遵守。借用韋伯的話語來說，某治道合法性越來越強，但有效性卻越來越弱，以至其合理性越來越差。這說明，任何治道之效力具有週期性。治道的合法性、有效性、合理性具有不同的週期性規律。因此，什麼是最好的“樣子”，從治道角度看，是時空性和實踐性的。

五 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馮友蘭“樣子”範疇融貫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意象”和“文質”思想，最終將“意會”、“意象”和“文質”範疇統一到“樣子”範疇，深挖“樣子”具有的社會學意義。通過構建“樣子”範疇，將形而上學的道和理即本然樣子與具體樣子連接起來，將悟道等人生境界與意象互動和社會關係連接起來，使得樣子成為通達最為玄妙的“道”“理”世界和最為具體的生活世界的重要仲介。總之，人們認識世界從樣子入手，社會交往從樣子入手，改造世界也總是在樣子上進行，樣子既可通達道，也可通達社會生活。籌畫樣子就是籌畫自我、籌畫生活或者籌畫社會；反之，籌畫自我、籌畫生活、籌畫社會就是籌畫樣子。

為更好定位本研究成果及其價值，下面圍繞費孝通“意會”思想，以及趙鼎新“道家時間”理論展開一定的討論。

費孝通將“人和人交往過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的這種境界”視為非語言和邏輯可說清楚的“意會”領域。⁴⁸不可言說的“意會”雖然沒有訴諸語言，沒有言說出來，但日常互動者之間在“感覺上甚至比說出來還清楚”⁴⁹。遺憾的是，費孝通認為，人際之間像“意會”這樣的“交流”方式，雖然是社會學最基本的研究領域，但又始終沒有說清楚。“意會”有什麼社會學意義？顯然，不訴諸於語言文字，那麼，訴諸於什麼進行交往互動呢？也就是說，言者“意在言外”之意落到何處呢？聽者“意會”會到何處呢？諸多研究表明了這樣一個觀點，“象與象思維”是中國文化之根。⁵⁰多數研究將中國象思維與符號學和胡塞爾的先驗範疇現象學等聯繫起來，並以之比較理性和邏輯思維進行研究。“從象思維看，人的基本處境不是符號和意義世界，而是不斷顯象的世界，先有象，然後才觀象取意，將豐富的象抽象化為記號，如象形文字、八卦等。”⁵¹也就是說，不管

“意會”還是“意象”，均指向意向的物件，這個物件在沒有訴諸于語言符號時，以某種模糊的形象或者樣子存在。“意會”“意象”只有統一到“樣子”範疇，才能客觀化自身並獲得連接世界的意義。故言者之“意在言外”與聽者之“意會”最終落到“樣子”之上。意象互動並非無物之互動。

趙鼎新從老子思想中概括道家時間觀，以求建立具有超強社會經驗現象覆蓋性且能超越西方諸多時間理論的解釋機制。該機制認為：任何性質的社會組織、思想和制度，隨著它們變得強大，削弱它們的社會力量 and 社會機制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⁵² 也即，歷史發展中“強勢”因素的發展必然“強化”削弱其自身的其他因素，從而反過來克制和易變自身。按邏輯推理，該史觀必然啟發歷史實踐走向“中庸之道”，但是，趙鼎新認為儒家法家思想均難建立超越西方時間觀的理論。實際上，趙鼎新所述道家時間觀不僅僅體現於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道家。筆者認為，一是完全可以直接用老子的“道”或者“名”來建立覆蓋經驗世界的解釋機制，而不只是從“強趨勢”和“弱趨勢”互相生成維度探究宏觀歷史變遷機制；二是更應該將先秦思想作為整體予以考察，並能動性的以之與西方思想進行對話，而不局限於局部理論。這樣，我們不僅能觀察到強弱轉化的趨勢，而且能將該趨勢放置在從樣子到名分，從混沌到秩序這種結構化之下。對此，筆者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一是通過梳理鄭杭生先生的社會運行思想，提煉出融貫西方社會學與中國古代群學思想的“民-群”視角理論範式；二是通過梳理先秦思想，闡明“樣子”與“名分”兩大範疇，以建構融貫西方社會思想與中國思想具有超強經驗覆蓋性的基礎概念和理論。

比如，在筆者看來，西方“民主”作為民集群的一種制度，促進了政治權力從混沌狀態更加有序化，具有“名分使群”的功能。但是，隨著“民主”覆蓋的“民”從寡頭到精英到大眾之

時，其主體覆蓋性完成，與此同時，民主政治逐漸向民主治理發展，當前，其公共事務覆蓋性也逐漸趨於完成。當所有人具有“民主”權利時，“民主”就不再具有分群的效力，也就難以實現“名分使群”的功能。“名分使群”機制表達為：“名分”具有分群效應，分群“名分”逐漸覆蓋到其可覆蓋之人甚或大眾化之時，其分群效力式微。

至此，筆者考察中國傳統社會思想並以至融貫西方社會學，初步梳理了“民-群”“視角、樣子論、意象互動論、文質世運論、名分論、名分使群論、名分秩序論，旨在依託中國傳統思想和話語體系揭示民集群即社會何以可能的深層邏輯。總結論：社會是民集群的形態與過程。社會秩序實為一陰一陽“名分”秩序，社會秩序變遷服從陰陽易變機制。民集群的形態服從“名分”秩序，民集群的過程服從陰陽易變之道，民集群的實踐邏輯為意象思維和意象互動。故，名分社會通過“樣子”顯現，名分秩序通過“樣子”建構。樣子到名分表達了社會從混沌到秩序。名分使群實為樣子使群。干預群即使群可通過干預樣子或進而干預名分實現自身，表達為通過“樣子”或“名分”實現對民與民之間關係即社會關係的聯通與阻斷。

注釋

- 1 陳玉生，《理論自覺的思想資源、本體創新與價值關懷——以社會運理理論為例》，《學習與實踐》第3期（2020）。
- 2 陳玉生，《東周“名分”思想建構——作為“名分社會”的分析範式》，《社會理論學報》第十四卷第二期（2011）。陳玉生，《社會名分秩序何以可能——先秦“天地名分”思想的社會實踐邏輯》，《社會理論學報》第十五卷第二期（2012）。
- 3 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3）。

- 4 陳玉生,《“面子”理論批判與“樣子”範疇建構》,《社會理論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2016)。
- 5 陳玉生,《“面子”理論批判與“樣子”範疇建構》,《社會理論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2016)。
- 6 陳玉生,《理論自覺的思想資源、本體創新與價值關懷——以社會運行理論為例》,《學習與實踐》第3期(2020)。
- 7 陳玉生,《東周“名分”思想建構——作為“名分社會”的分析範式》,《社會理論學報》第十四卷第二期(2011)。
- 8 陳玉生,《社會名分秩序何以可能——先秦“天地名分”思想的社會實踐邏輯》,《社會理論學報》第十五卷第二期(2012)。
- 9 馮友蘭,〈新理學〉,載於《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馮友蘭卷(上)》,劉夢溪主編(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69-173。
- 10 馮友蘭,〈新理學〉,載於《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馮友蘭卷(上)》,劉夢溪主編(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69-173。
- 11 但是,儒家強調的修養與戈夫曼個體自覺自為地以取悅他人為目的的印象管理不同,它們之間在管理對象、管理主體和管理目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別。
- 12 王樹人,《中國哲學與文化之根——“象”與“象思維”引論》,《河北學刊》第9期(2007);吳懷祺,《〈周易〉的意象思維與歷史解喻》,《史學史研究》第3期(2009)。
- 13 因思之把握內涵及所用語言不同,“象思維”與概念思維在思維方式上也有明顯的不同特點。其一,“象思維”富於詩意聯想,具有超越現實和動態之特點。而概念思維則是對象化規定,具有執著現實和靜態之特點。其二,“象思維”的詩意聯想具有混沌性,表現為無規則、無序、隨機、自組織等。概念思維之對象化規定,則具有邏輯性,表現為有規則、有序,從前見或既定前提出發,能合乎邏輯地推出規定系統。其三,“象思維”在“象之流動與轉化”中進行,表現為比類,包括詩意比興、象征、隱喻等。概念思維則在概念規定中進行,表現為定義、判斷、推理、分析、綜合以及邏輯演算與整合成公理系統等。其四,“象思維”在詩意聯想中,趨向“天人合一”或主客一體之體悟。概念思維在邏輯規定中,堅守主客二元,走向主體性與客觀性之確定。參見王樹人《中國哲學與文化之根——“象”與“象思維”引論》,同上。
- 14 如羅蘭·巴特認為:“可以在每一個有著明確(世事)所指的表述中找到這四種意指系統的嚴謹形式:(1)真實服飾符碼;(2)書寫服飾符碼,或術語系統;(3)流行的含蓄意指;(4)修辭系統。”參

- 見羅蘭·巴特：《流行體系：符號學與服飾符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1。
- 15 參見李友亮，《關於古代文論中“形”與“象”的考辯》，《文學評論》第4期（2002）。
- 16 胡塞爾採取懸置自然主義思維方式獲得範疇直觀的方法類似於老子此處提供的方法。同時借用海德格爾的概念，老子此處的“有”相當於“存有”。當然，老子提供的觀道悟道識道的辦法有多種，比如以水作為道的隱喻就是其中之一，即隱喻、比類等方法。在我的一篇文章裏，將諸多這種方法定義為剩餘範疇知識論。
- 17 這種“象思維”與“三段論”那種嚴格的邏輯形式推理不同，而是以具體的感悟和印象為依據，也與“這位女人有奶”可以轉義為命題“這位女人生育過”這種“有奶”象征“生育”的象征手法不同，因為它不是對概念進行形式化演繹，而是依據大家的約定和日常觀念進行比類，它不是嚴格的、科學的，而是具體的。比如，某人曾經看到一個紅頭發的人，大家叫他“紅毛怪”，今天看到類似樣子的人，他也將其歸類為“紅毛怪”，僅就這個思維過程，則與前兩者類似，但“象思維”重點不在於得出這樣的結論——“紅頭發的人是紅毛怪”或“紅頭發象征紅毛怪”——而在於“這個人就像上次那個（或大家說的）紅毛怪一樣”這樣的印象。這種印象並非邏輯結論，而是意象。此外，象本身同時具有分析模型的作用，在方法論上，它猶如理想型、框架和範式，但不是由明確的概念和命題所組成的分析系統，而是可比類的參考樣子，比如八卦圖象。
- 18 “意象”與“意指符號”不同，後者的符號是明確的，而前者的象是模糊的，因此，“象思維”不僅在於“意”的不可言傳，更在於“象”的不明確，它靠人們的“悟”和“會意”。
- 19 如八卦圖，其間蘊含的天地萬物之象及其復雜的意義是無法言說的，對這個圖的掌握需要悟性。每個人或同一個人不同時期由於性情不同而所能領悟到的萬物之象及其復雜意義是有差別的。
- 20 《朱子語類》卷67，《綱領下·讀易之法》第5冊，1660。
- 21 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馮友蘭卷（上）》，170。
- 22 “象思維”包含了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的範疇，但後者主要限於理解活動本身及其效果史，沒有根基，前者卻確立了“道”的根基，蘊含著“本然樣子”。個體因此有明確的自我“有限性”意識，意識到存在不可理解的領域。伽達默爾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去客觀地闡述理解活動本身。至於“符號互動”理論，如上文所述，它與象思維相比，屬於更經驗和更理性的層次。

- 23 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3）。
- 24 參見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馮友蘭卷（上）》，195–196。
- 25 就這點，我們認為，“意會”與舒茨有關“領會”概念存在差別，後者假定日常生活世界有關“意識脈絡”、“時間脈絡”和“行為脈絡”的無障礙湧動；而前者假定天書的存在，即常人無法或尚未達到的“聖域”，它猶如黑洞，打斷或窒息了諸多個體的“意識流”。對“聖域”，常人不可領悟，也就沒有常人的意識脈絡交織其中。因此，“領會”及“符號互動”理論的個體無差異性假設顯然不合常理和常識。
- 26 《易》初末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個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朱子語類》卷67，《綱領下·讀易之法》第5冊，1660。
- 27 本文一直用“最好的”三個字來修飾本然樣子，它表明的實際意義是最適當的、最普遍地被約定和接受了有關某事物歸屬的類的理，因此，對文質論而言，就變成文還是質在實際上最合乎理。
- 28 黃前程，《文質論：中國傳統治道的一個視角》，《廣東社會科學》第6期（2010）。
- 29 邢昺疏：“質勝文則野者，謂人若質多勝於文則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者，言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也。……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言文華、質樸相半彬彬然，然後可為君子也”。（參見：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註疏》，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附校刊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2479。
- 30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賁卦·象辭》）“觀鳥獸之文。”（《系辭下》）
- 31 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蘇輿著，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205。
- 32 《陳亮集》卷之十八《漢論·章帝》，204。
- 33 鄭玄註，賈公彥疏，《儀禮註疏》，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附校刊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1010。
- 34 《四書正誤雍也》，《顏元集》，190，轉引自楊念群《從“文質”之辯看清初帝王與士林思想的趨同與合流》，《清史研究》，2008年5月。
- 35 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蘇輿著，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212。
- 36 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90），122–123。

- 37 梅珍生,《晚周禮的文質論》,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2-3。
- 38 且看這幾句話:“其實,把它看作禮的形式,它更恰當地表現了禮中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敬、忠、信、仁、義、智、勇、孝、惠、讓,要依賴‘文’表現出來。沒有這些內在的德性,文就會變成虛文。”
“文質並不是天然地表現出合一的傾向,而是常常表現為相互背離,一種情況是踐禮中,禮文越繁富,人的活動離禮的根本精神越遠;另一種情況則是禮文越簡略,對禮意的表達越充分。”本文認為,禮的根本精神如果作為禮制制度的精神,應該是禮治,而所謂“內在的德性”是指禮治下的人的內在品質。
- 39 馮友蘭在闡明藝術也具有“理”時,提到“本然樣子”概念。“本然”意指藝術作品的理,“樣子”相當於“腔子”和“套子”,意指“不是作品底作品”。“在藝術上,對於每一個題材,在一種工具及一種風格之下,都特有一個本然樣子。”“我們所說‘不是作品底作品’,亦是虛底,此即是說,它不是實際底。不過腔子又有套子之義;套子在藝術上不是一個好名詞。藝術作品最不好底是套濫套。朱子所說腔子,雖不是指濫套說,但此名可予人不好底印象。所以我們以下用樣子一名,以指我們所謂‘不是作品底作品’。”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馮友蘭卷(上)》,167。
- 40 可用陶源明的詩句作闡明其含義:“此還有真意,已辨已忘言。”參見《陶淵明集·飲酒二十首》(北京:中華書局,1979)第1版。
- 41 方東美,《生生之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0),297。
- 42 孔子向老子問禮,被老子說了一番道理之後,他慨嘆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可見老子精通周禮。
- 43 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孔子此處所說之文,朱子註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論語集註·子罕》)朱熹:《四書集注》,齊魯書社,1992。
- 44 孔子文質論似乎具有符號學的意涵,文飾之物為禮樂制度所闡明的符號及其意義系統。實際上與符號學完全不同,符號學只關注表層指符和意義系統,而孔子之文以質為基礎,強調內在的質的存在和前提,即使相同的外在樣子,如果存在內在的品質的差異,會給人以完全不同的評價,展現完全不同的意義。這也是意象思維的特點,將具體樣子納入本然樣子進行思考,最高境界者直指萬象之象和道的領域,而不至於為表面的指符系統所迷惑。

- 45 司馬遷，《高祖本紀》，《史記》，簡本字本（北京：中華書局，2005），277。
- 46 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蘇輿著，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205。
- 47 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90），122。
- 48 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3）。
- 49 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3）。
- 50 王樹人，《中國哲學與文化之根——“象”與“象思維”引論》，《河北學刊》第9期（2007）；吳懷祺，《〈周易〉的意象思維與歷史解喻》，《史學史研究》第3期（2009）。
- 51 陳玉生，《“面子”理論批判與“樣子”範疇建構》，《社會理論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2016），251-272。
- 52 趙鼎新，《時間、時間性與智慧：歷史社會學的真諦》，《社會學評論》第1期（2019）。

《社會理論學報》編輯部
八方文化創作室

社會理論學報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一年兩期

主 編 謝立中

執行主編 孫飛宇

主辦者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出版者 《社會理論學報》編輯部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八方文化創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屬機構)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228

國際刊號 1099-4882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Fujian Tribune
福建社会科学学院主办



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福建省品牌期刊

6
VOLUME

[2021]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月刊)
2021年第6期(总第349期)
2021年7月5日出版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人民就是江山”: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百年归结
与时代宣示

/ 陈祥健 / 5

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百年变迁

/ 胡岳岷 / 11

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经验探要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 刘义圣 赵东喜 许彩玲 / 25

[文化产业与文化研究](福建省名栏目)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融合:现实需要、发展基础
和优化路径

/ 周建新 王 青 / 36

基于心理账户理论的文化消费行为机理及其因应策略

/ 陈 庚 周东阳 / 46

算法推荐下的公共议题传播

/ 刘 晶 潘南君 / 57

[经济研究]

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间财政体制与我国地方债务研究

/ 陈念东 曹海涛 / 66

制度竞争视角下法律多元演化的经济分析

/ 肖 恒 / 80

国际税收竞争“市场观”的内涵、评价与启示

/ 洪菡琰 / 89

6

VOLUME

[2021]

封面设计:米兰

〔 历史研究 〕

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新探(1946—1948)

/ 杨 豪 / 99

论插图与建阳刊小说的传播及接受

——以《三国志演义》为例

/ 胡小梅 / 112

〔 文学研究 〕

“路空文隐喻”阐释与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观

——奇幻电影《刺杀小说家》思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1248/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1-8402

国内总发行:

福州市邮政局

邮发代号:

34-3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BM867

电话:

0591-83791487

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柳河路18号

邮编:

350001

出版日期:

7月5日

印刷:

鸿胜印务技术有限公司

定价:

30.00元

本刊投稿平台:

<http://fjw.cbpt.cnki.net>

〔 哲学研究 〕

21世纪以来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及其启示

/ 吴 宁 宁甜甜 / 149

信念是理解的构成条件吗?

/ 郑辉荣 / 158

〔 社会探讨 〕

过渡社会:“民-群”视角下的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研究

/ 陈玉生 / 167

我国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研究

/ 孙锦露 / 181

事权内部控制视角下行政执法管控优化研究

/ 王文蕾 闫天池 / 192

本期执行编辑:陈燕

过渡社会:“民一群”视角下的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研究

陈玉生

摘要:将涂尔干心理主义视角下的现代化导致社会失范或政治动乱的观点安置于“变在论”等理论中检讨后阐明:社会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即“过渡社会”是常态现象;过渡社会蕴含着变在文化和过渡制度,而不必然导致社会失范。随后,将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经验现象纳入“民-群”视角下考察后发现:百年翟城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程中各历史时期的使命,这些使命操作化为“社会想象”后嵌入翟城村并物化自身;社会想象嵌入导致翟城村持续处于过渡社会状态,社会目标、社会动力、制度规范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并相互协调促进;过渡社会遵循“民力为本,忠诚为用”的“变在”逻辑。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处于过渡社会状态中,过渡社会由于现代化的紧迫性不断将个体吸纳到历史使命中,并相应形成过渡社会建制。

关键词:过渡社会;民力;“民一群”视角;社会动员;“变在”逻辑

作者简介:陈玉生,社会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6-0167-14

一、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学术界开始思考“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①“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为何既‘大’且‘强’”^②等问题。赵鼎新、李怀印以中华帝国的“强国家传统”和发达国家溢出的“同构效应”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李友梅、文军等学者则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乡村变革研究:翟城村百年变迁”(20FSHB028)。

① 赵鼎新:《路径不依赖、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学海》2016年第2期。

② 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吁立足中国社会变迁创新转型社会学,为世界社会理论贡献中国智慧。这类研究虽然在范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研究旨趣均指向解释中国近现代进程和社会变迁;二是均以“传统与现代”作为理论预设;三是将政治性与社会性分置对立。

但是,笔者尝试运用上述理论解释翟城村近百年历经的多次由外力发动的社会巨变时,遇到困难。首先,在社会变迁的形态上,翟城村多次社会变迁现象很难定义为“转型社会”,因为并非所有变迁都表现为传统向现代转型。但是,翟城村确实多次出现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转变,本文因此将其定义为相对宽泛的“过渡社会”。其次,在社会变迁的逻辑上,“强国家传统”下政权对社会具有很强的“嵌入自主性”理论同样遇到困难,很难解释为什么外来力量介入翟城村发动民众时,总是需要利用地方社会关系网络,运用社会动员策略,甚至采用运动、革命等激进措施。但是,外来力量确实多次嵌入村庄并且几乎每次都嵌入成功,引发村庄巨变,本文因此构建“民一群”视角,在发动民众的过程中考察国家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分析外力介入村庄之前和之后的逻辑。由此,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形成:以“民一群”视角观察过渡社会现象,发现过渡社会逻辑。

那么,研究“过渡社会”现象为何要用“民一群”视角,而不用“国家—社会”“制度—生活”范式呢?因为这些范式同样将权力和秩序、国家与社会、“政治性”与“社会性”对立起来,难以揭示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的根本逻辑。黄宗智先生认为,在中国的思维中,国家和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像现代西方主要理论所设定那样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实体,而是紧密缠结、互动、相互塑造的既二元又合一的体系;在两者长期互动中,形成了半正式的第三领域。^①在“民一群”视角下,国家、社会乃至第三领域这些实体显然都只是由“民”主体所构成“群”。“民一群”视角关注“群”实体与“民”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对社会现象涉及的实体的主体性及主体构成的实体性进行双重透视,并可以分析实体的层次性,比如国际组织、国家、政府、社区、家庭等。^②透过“民一群”视角,可以观察不同主体在不同实体之间的构成性、转换性和化育性,以及观察不同实体之间的互构性、过渡性和系统性,从而揭示社会变迁实为“民集群”的过程和效应,而不只是通向现代化或西方化的“朝圣”过程。

那么,什么是“过渡社会”?过渡社会(现代化)的表现形态如何,运行逻辑如何?用“民一群”视角分析“过渡社会”,立足活生生的“民”的立场来探究“群”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引起的社会变迁,可洗净上述理论在分析社会变迁时留下的“泥沼”,直面“群”实体(国家及其村落等)在一次次重大历史变革期间,“民”主体(普通百姓、精英和统治者等)如何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参与到变革中并推进和促成了变革的完型。为此,本文首先以涂尔干心理主义视角下的现代化和社会动员理论为切入点,阐明“传统与现代”理论范式的张力与“过渡社会”的含义;接着采取“民一群”视角分析百年翟城村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展的内在和外在逻辑,发现“民力为本、忠诚为用”是过渡社会的变在逻辑。

① 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黄宗智:《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② 陈玉生:《理论自觉的思想资源、本体创新与价值关怀——以社会运行理论为例》,《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3期。

二、过渡社会与“变在”逻辑：对涂尔干心理主义视角的反思

涂尔干研究表明,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旧的社会规范被抛弃,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建立,个体因此处于无规范状态,其行为失去规范参考和指引,社会团结纽带处于断裂状态,导致社会失范。赵鼎新认为,涂尔干本人虽然没有直接研究过社会运动或革命,但其理论对分析社会运动是有启发的,许多后来的社会学家在分析运动和革命时一般都会从由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入手。^①

实际上,最早提出社会动员概念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就认为,现代化转型对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带来全面影响及深刻转变,社会动员是人们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②可见,社会动员被界定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人们心理变化的机制。米格代尔采用了多伊奇的社会动员概念,认为社会动员是指旧的社会、经济的和心理上的忠诚感的崩溃;而现代化是指实际接受新的忠诚和现代生活方式。^③亨廷顿认为,社会动员是“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④亨廷顿将社会变迁作为社会动员的函数,而社会动员作为政治动乱的函数,社会变迁诱发政治动乱。上述社会变迁理论有三个特征:采取心理主义视角,秉持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线性史观,关注其诱导社会失范或政治动乱的效应。我们据此称其为“涂尔干心理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变迁理论。

但是,从逻辑上看,一方面,社会动员既可以动员人们放弃传统观念,也可以动员其接受传统观念,甚或接受独裁者意志,如纳粹意识形态;反之,现代观念相对传统观念而言具有风险性和破坏性,同样也会诱发传统观念的抵御和抗逆并导致社会动员。另一方面,现代化总体进程中,传统和现代也许是此消彼长的,但在具体时空中,传统和现代是互构的,很难分辨清楚孰优孰劣,也并不能说这个过程就会导致混乱。可见,现代化总体上被认为是农业社会传统因素减少与工业社会现代因素增长的过程。但是,这个总体过程包含着无数微观社会(诸群)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也即包含无数“过渡社会”。

过渡社会期间不仅有规范和需要规范,还能产生规范和更新规范,以便整合民众适应社会过渡状态和实现社会理想目标。首先,在微观层面,过渡社会可以是非常制度化的。人类学家特纳用“阈限”定义社会时空转换的中间状态,比如,部落在新旧首领更替之时就处于“阈限”状态,在这个过程,新首领要经受部落成员对他的辱骂、吐口水、关禁闭等,历经一番折磨之后才真正获得权威,人们对他恭恭敬敬。^⑤这个过程包含着“通过仪式”,虽然处于过渡社会状态,但并非没有制度,而是有一套过渡社会制度。其次,在宏观层面,国家(或文化群体)在

①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② Karl W.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6, 1961: 501.

③ 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 页。

⑤ 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社会变迁中同样存在过渡社会制度。比如,冯仕政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赶超型现代化目标,但国家常规化治理方式又难以实现这种目标时,会通过“革命教化政体”规训和动员群众和官僚,动员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①赵鼎新研究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历程时阐述了社会运动体制化的现象。^②体制化的社会运动主要指工会运动之类,已经纳入政治体系和法律规制之中,合法化了。因此,过渡社会并不必然出现混乱或失范。默顿修正了涂尔干的心理学假设,以规范冲突而不是规范缺失来定义社会失范。默顿认为,社会文化塑造了人们的行为目标,但人们无法采取制度化的合法手段实现这些目标时,失范就产生了。当面对现代化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规范冲突时,人们可以通过遵从、革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或造反等不同方式来适应。^③

在过渡社会中,人类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不仅将变化制度化和适应制度化,还会在持续变迁中生成“变在文化”。那么,怎么理解“变在文化”呢?中国古代有一种治乱兴衰的历史观。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六韬》也说:“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这些都是治乱观的一个经典表达。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郑杭生先生沿着严复的思路,形成了良性、中性、恶性社会运行的理论。^④赵汀阳认为:“治乱思维所表达的正是一种作为中间感的历史感,而只有基于永远的中间感才可能理解活的历史。假如按照进步论所预知的历史剧本去理解历史,这种预知的结局感就好像是说,我们不应该相信时间,而应该相信钟表,如果钟表停了,就无事可做了。”^⑤赵汀阳甚至称中国文化的根本属性就是“变在”(becoming)文化,与西方“存在”(being)文化有差别。他认为,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变在”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本质的文明。^⑥

过渡社会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变在”逻辑,变在文化是社会变在逻辑的表征,中国治乱兴衰史观是社会变在逻辑的阐述,中国历史上大量社会变革和王朝更迭是变在逻辑的具体实践。从国家的角度看,国家通常为实现 强国富民目标对文化制度规范适时进行理性变革,以突破“百姓日变而不自知”定律。直观一下中国历史,因文化转型导致王朝更迭的比较少,王朝更迭导致文化变迁的也比较少,倒是王朝发展过程中自觉发动文化变革的比较多,比如,商鞅变法,汉初无为而治,随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从这些现象看,王朝相对稳定时,为强国富民,更倾向于变革制度。中国当代改革开放进程中同样遵循变在逻辑。渠敬东提出“发展双轨制”,“双轨制”的一条是统合轨,另一条是活力轨。^⑦发展双轨制是社会变在逻辑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将“变”与“不变”结合起来,以“不变”保障社会有序、防止社会失范;以“变”

① 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 期。

②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③ 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郑杭生:《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⑤ 赵汀阳:《历史观:一种文化还是一种知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

⑥ 赵汀阳:《作为方法论的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⑦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

释放社会活力,突破“百姓日变而不自知”定律。

综上,“涂尔干心理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变迁理论表明,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传统的忠诚崩溃,对现代的忠诚尚未建立,所以会引发社会失范;与此同时,现代化导致社会动员,以便促进对现代的忠诚的建立,但这可能引发政治动乱。总之,现代化伴随着社会失范或政治动乱风险。但实际上,过渡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蕴含着调适自身的过渡社会制度与“变在文化”。

三、“忠诚”为用: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在过渡社会中存在传统因素的抑制和现代因素的增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对传统和现代的“忠诚”同样也此消彼长呢?对此,我们以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为例证予以讨论。

翟城村自 1902 年开展村治实验时起,历经平民教育实验、抗日战争洗礼、土地改革运动、集体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村庄规划建设、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和乡村自治等重大事件。每起重大事件均推动翟城村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转变,可以说,翟城村百年一直处于“过渡社会”状态。

1902 年,村绅米春明推动翟城村早期村治实验。对于村治实验蓝图,最初,米春明融合了颜李学和蓝田吕氏乡约,后来,米迪刚又引入日本町村制度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井田制度。可见,它并没有直接移植现代西方制度,而是主要回归传统。那么,翟城村为何实施村治实验呢?这主要缘于清末新政和民初政治。但是,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只给出基层治理变革的战略目标,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和措施,基层社会只能进行制度创新,这才有了村绅想象的空间。但是,村绅创作的村治蓝图仍然需要得到村落精英们的认同并转化成村落集体意识才能得以实践化。这个转化路径与乡村社会伦理秩序相互吻合。由于翟城村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结构的基本骨架就是集中体现伦理秩序的家族组织,从而使得村治想象向集体意识转化的路径与村落权力结构也相当协调一致,村治蓝图基本上没有遇到道德伦理与权力网络方面的阻碍,也就很容易得到认同并付诸实践。可见,早期翟城村村治实验从村治规划到组织实施,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主要依托传统家族势力和伦理秩序,是在“传统”中化育“现代”的典型代表。

1926 年,晏阳初受米迪刚邀请,进入翟城村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以“愚穷弱私”诊断中国社会,开出旨在开发“四力”的平民教育方子。为此,晏阳初倡导和践行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等理念,发动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将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移植到翟城村。那么,这种制度移植的过程和效果如何呢?开展初期,村民对外来人员非常警惕,知识分子进村只能通过先接触村长村佐和小学校老师这种迂回方式才能实现。实施过程中,为改良基层社会,结合西方现代治理制度和传统学治主义精神,打造政教合一的治理模式。继续深入时,因触及地方利益而遇到传统社会力量的阻扰,最后不得不夺取定县政权,重建县政。最终,定县县政建设实验在平民识字教育、公共卫生事业、农业技术改进等基础上登上历史舞

台。可见,平教运动在受制传统、利用传统、突围传统中艰难前行。

1937 年,翟城村平民教育实验终止,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时期,翟城村交织着日军、日伪政权、汉奸、抗日地下共产党员、抗日游击队等各种力量,进入半军事化组织状态。日军对翟城村进行军事控制,甚至采取屠村等极端恐怖手段,制造翟城村史上重大的“6·2 惨案”,以使翟城村从“堡垒村”转换成“爱护村”,迫使村民接受日军统治。为达目的,日军一是以暴力来强制村民接受日军思想教育,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二是掠夺人力和物力资源,迫使村民给养日军军队。日军暴力行为将村民推向奴役状态,显然不符合心理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动员与现代化,超出了忠诚于传统还是现代的理论范畴,开了历史的倒车。

抗日战争结束后,翟城村迎来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既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更要凝聚革命力量。土地改革主要采取阶级斗争方式,其中诉苦是引导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对翟城村土地改革进行分析发现,诉苦包含引苦、忆苦、述苦、释苦、算账与归罪等一系列过程和一套方法,目的在于启发人们对自身苦情的感觉,从而形成阶级意识、国家意识和翻身意识;诉苦内容主要包括穷人苦情、穷人日常行为及穷人之间的各种恩恩怨怨等,它们往往是日常生活中具体生动的实例。可见,诉苦充分利用了村庄文化记忆和村民情感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期间,翟城村上演了集体化运动和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主要围绕革命与生产两大历史主题展开,一方面村民被划分为好与坏、革命与反革命、劳动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富裕与贫穷等对立的群体,阶级意识更加敏感;另一方面破四旧等,使得村民对传统封建文化加以抵制,对传统的忠诚在不断的运动中溃败。但这个时期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心理变革,更包括集体化生产运动和革命斗争运动,是集体行动和群众集体力量的充分展示。

改革开放后,村庄规划和村委选举是翟城村村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两件事。其间,传统和现代并非相互抵触,而是现代性因素在传统中运用。比如,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竞选人挨家挨户进行选举动员(请票)、与其他竞选人进行较量、接受选民的评判等,犹如经历一次特纳所说的地位提升的“通过仪式”。竞选人主要采取策略性的话语包装竞选行为,运用功利性的社会动员方式赢得村民支持。可见,参选活动很有现代选举的意味。但是,一些竞选人还采取诋毁其他竞选人、包装自我形象、散布小道消息、大字报等方式,主要依托家族、区位和派性等传统社会结构来编织自己的选举动员网络。可见,传统在现代中被利用。

综上,百年翟城村自 1902 年村治实验时起一直受外力影响和驱动,这种结构性被动地位也从未真正扭转过来,其现代化仍然是未竟之业。同时,翟城村在一起起事件中,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不断变迁,村民日常生活方式和心理意识形态不断变革。可以说,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既有对传统的忠诚的崩溃和对现代的忠诚的建立,也有对传统的忠诚的恢复重建和对现代的逆反倒退。翟城村村民在各重大历史事件中忠诚于哪些传统性因素或现代性因素,并非只是自然过程,而是外力强加。我们看到,在过渡社会,传统对于村民尚未崩溃,又被外力导入新的社会想象;村民为完成想象社会不断转换行为模式,采取集体行动。居民对传统与现代的忠诚不是崩溃,而是在外力作用下不断被重构和被利用。对此,我们称之为“忠诚为用”。

那么,“忠诚为用”在翟城村百年变迁中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在多次重大事件中,那就是随外力输入的变革村庄的社会想象,以及实现社会想象的路径和方案。对外力介入村庄的路径,学术界发明了乡村实验、(文字)下乡、进村、项目进村、基层政权建设、试点、基层创新、制度移植、嵌入等许多描述性概念;对外力介入村庄的社会想象,学术界同样发明了乡约制度、学治主义、保甲制、阶级斗争、革命教化政体、社会治理体制、居委会体制、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力的动员网络等许多描述性概念。“忠诚为用”就体现在村民对外力介入路径和嵌入蓝图的认识和情感。为了获得村民的“忠诚”,外来精英力量总是要在乡村造势,让村民接受一番精神的洗礼。这个洗礼过程就是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利用和建构,笔者称之为“意识表达框架”。^①

“意识表达框架”是外力介入村庄的必备利器和钻头。在各重大事件中,意识表达框架简单而言就是各历史时期的(精英)社会想象,及其嵌入到翟城村和村民中的主要观念意识和话语,它不仅关联(翟城村的)传统和现代,更直接指向(精英构思的)社会形态,还关联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史。意识表达框架的实现意味着对传统、现代、未来想象、日常生活中人们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忠诚的利用和建构。意识表达框架既要利用传统,尊重村民既有文化观念;也可能嵌入现代因素,将其转化成村民能够理解的话语表达;最终的结果是传统混合现代后构建出来的有关未来图景的“社会想象”。至于社会变迁是否引发社会失范和政治动乱,与(精英)社会想象和(村民)未来“忠诚”关联更大。因此,“忠诚”表现为对外力主导的意在变革村庄的举措和体制的接受程度,最终指向人们对未来“社会想象”要思要做的事情本身。

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实际上由一起起事件构成,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可谓一步一个坎,各种外来力量粉墨登场,根本不允许村民对传统慢慢革除,对现代慢慢吸收。采取现实主义视角看,翟城村百年变迁是被动适应的过程,是不断变现外来社会想象的过程。可以说,百年翟城村没有“现代”的蜜月,只有阶段性“社会想象”的苟且。这就是过渡社会,不是朝圣的过程,而是不断要求实现自身的想象。

那么,“社会想象”是如何实现自身的呢?如果将百年来前后相继嵌入或试图嵌入到翟城村的各种“社会想象”视为目标产品,那么翟城村就是加工厂,村民就是工人。翟城村早期村治实验,直接资金、用房等物资资源主要通过改革村内原有花炮会等社会组织,盘活而来,地方政府后期给予了一定补助和奖励;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则纯粹暴力征缴人财物力;土改工作组一进村就开始访贫问苦,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运动;集体化运动已经是行政性任务,村民根据上级指示行事;至村庄规划和村委选举等事件,同样是村民在既有资源基础上完成。可见,外来者几乎只带着“社会想象”进村,没带来像产品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就发动了各重大历史事件。翟城村整个百年社会变迁,外来社会想象的实现主要依靠村民集体形成的社会力量。从表象看,这一起起重大事件似乎就是一起起“话语事件”,遵循了“以言行事”逻辑。

因此,“社会想象”实践自身需要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力量。比如,陈筑山撰文指出,平教会县政建设实验的使命就是要研究有推动建设能力的制度和方案,达到培养民力,移风易俗,

① 陈玉生:《转型社会中的农村社会动员——以河北定县翟城村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改造基本政治的目标,进而以政权力量为依托向全国推广。^①晏阳初在晚年回到“晏阳初旧居”时这样题词:“平教乡建是方法,发扬民力是目的”^②。我们将这种旨在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想象的现象,称之为“民力”为本。

四、“民力”为本: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的外在逻辑

那么,外来社会想象导引下发展和发动的社会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是如何发展和发动的呢?

社会力量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发展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培育社会力量,侧重增量,比如平民教育、改良风俗、农业科技普及等,都属于这样的方式;另一种是发动的方式,快速聚集动员整合资源,侧重存量转移、重组和优化,比如社会动员、社会运动、征缴、统筹等。翟城村早期村治实验和平民教育实验期间,主要采取发展社会力量的方式,如通过新学堂以新民,通过引进西方农业技术以增强农业生产力,通过宣传和教授医疗卫生知识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等。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甚至采取暴力征缴,日军要什么给什么,村民因此吃野菜、啃树叶;土地改革时期,村民斗地主,分田地,将村庄土地等资源重新配置,这期间主要是发动的方式。毛泽东时期集体化运动,目的就是培养和整合村庄集体力量;改革开放后,翟城村分田到户,搞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总的发展基调是释放社会活力,这就是民力。“民力”不仅是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的基础,更是各重大事件致力的根本目标。

那么,“民力”是什么呢?在中国,“民”思想自古有之。《韩非子·诡使篇》记载:“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荀悦《汉纪·武帝纪》记载:“当武帝之时,赋役烦众,民力雕弊。”可见,“民力”与赋役相关,蕴含于国家范畴。商鞅甚至论断:“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第二十》)商鞅主张以弱民来强国。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可见,民力、弱民、民本等思想虽在民力涵养化育方式上不同,但皆意在强国。孟子说:“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降雨,民大悦。”(《孟子·滕文公下》)中国古代之“国”实乃“家”“国”“天下”之分的国。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民”有天下意识而无国家意识,国乃“得民心、专民力”者掌取之天下之国;国家意识实为天下意识,国实为天下万“民”归心的表征,故务国必务民。这是中国古代的国家思想和“民”意识。

清末,“民”意识再一次被强化,“‘民’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和主人、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思想界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③这次“民”意识虽同样关注“民心民力”,却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得民心、专民力”之“民”意识的批判继承和重新建构。笔者因循上文分析,姑且称之为“民力为本,忠诚为用”。

① 陈筑山:《从县政建设的使命说到定县的县政》,《民间》1935年第2卷第21期。

② 晏阳初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6页。

③ 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民力思想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彼时,梁启超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①但是,梁启超认为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导致国民的顺民性格等劣根性,诸如奴性、卑屈、依赖、怯懦、为我、涣散、保守、无争、独善其身、爱国心薄弱等等,故提出要革除国民品格中的劣根性,以做新民。所谓“新民”,是指有公德意识、国家思想、权利和义务观念,自尊、自治、自由的国民。严复诊断当时中国社会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倘若任由此种状况发展,中华民族将“无以自存,无以遗种”,故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著名主张。^②

严复、梁启超等人在清末时提出的国民性和人种改造思想,为中国近代的人格重塑奠定了理论基础。“五四”运动前期,陈独秀“敬告青年”要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③毛泽东认为中国落后挨打主要缘由是国民愚昧落后,道德败坏,“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④

那么,清末民初为何会发现“国民”问题?霍布斯鲍姆认为,我们之所以接受国家认同的召唤,是因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这个过渡性的国家组织能凝聚大众,安内攘外。^⑤实际上,民族国家和国民都是现代的发明。在严复看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⑥,民力是一国一族强弱的重要标志,因此提出的“三民”说,旨在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以“强国保种”,救亡图存。孙中山早期提出三民主义,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清末,精英阶层从关注器物、制度转向探讨国民,发掘了“民”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人们从关注中西器物对比、政治制度对比,转向中西国民性之间的对比,猛然发现国民性之劣性甚多,究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因而提出新文化思想,并提出了许多国民性改造方案,如严复提出中华民族“强种”的具体措施,如禁鸦片、禁缠足、禁早婚、禁酒,提倡节欲、晚婚、女学、杂婚、自由结婚等,主张人人平等,人人自主,改变奴隶地位。这个思想认识的转变,开启了中国救亡运动,推动了革命运动,激发了启蒙运动,为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土地改革等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做了思想准备,奠定了框架,开辟了道路。几乎所有随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与“国民”问题有关。

总体而言,清末以来的“民”意识主要涉及四项内容:“民”的历史意义;“民”的诊断;“民”的改造;“民”改造后的效应。因对这几方面的认识不同,引发了中国近现代不同的思想争论和历史实践。以下主要围绕与翟城村社会变迁有关的内容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对“民”的历史意义,清末之后几乎形成共识。比如,严复说:“有火器者遂能战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新民说》,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 王木式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0—27 页。

③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5 页。

⑤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⑥ 王木式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8 页。

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①意指不能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形式,关键是要提高民力。梁启超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②,明确提出新民优先于新政。当然,也有持相反观点的,认为新民对于强国而言,速度慢,所以先新政。这就出现了新政优先还是新民优先的争论。

第二,对民力之所用,人们因对社会诊断和社会想象出现分歧,有关民力发掘的路径也出现分歧,其中最典型思想就是“立国论”。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明确主张“以工立国”。^③王韬主张中国应该“恃商为国本”,因为强盛的“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士亦至焉”。薛福成认为:“商握四民之纲。”郑观应还提出了“商战”,强调“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那时,恽代英、吴景超、杨明斋、张培刚等人仍然主张“以工立国”。但是,当时占人口 90% 以上的农村极度凋敝,因此,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主张“以农立国”,强调要通过振兴农业来发展工业。当然,那时还出现调和派、革新制度派等。^④

第三,主张“以农立国”者又分“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因为诊断结果不同,处方也不同,社会想象也因此不同。共产党人在农村搞革命,通过阶级斗争和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建设,将农民动员起来,并进而包围城市。而一些主张以农立国之改良主义者,又分化出“学治主义”“实验主义”等;其中实验主义有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他们施行不同的模式。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把乡下现代化;另一个是要在乡下现代化的基础上复苏中国文化。梁先生既主张现代化又希望将其结合到中国文化复苏的担当中。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⑤

梁漱溟对现代和传统两头都想兼顾,似乎存在悖论,因为按照上述涂尔干等人的线性史观,传统是要迈向现代的。梁漱溟为何如此倡导?与其社会想象和社会诊断有关。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存在“愚穷弱私”,梁漱溟认为这个判断不错,但只看到了现象,而没有找到原因。原因在哪里?梁漱溟认为是文化。但梁漱溟并不主张对文化进行革命,而是要改良。他提出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伦理本位,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是梁漱溟想兼顾的传统基础。梁漱溟引入西方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办学习班等,将教育与农民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我们从梁漱溟后来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看出,他与米春明父子一样,倡导一种学治主义。

第四,虽然“国民”问题实践路径多元复杂,但“新国民”“军国民”两种发展路径交织一起,其核心是“民力”。为何“民力”是核心?首先,“国民”问题的深层原因就是中国面临亡国灭种

① 王木式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99 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1902 年版,第 2 页。

③ 张霞:《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

④ 徐勇:《中国发展道路:从“以农立国”到“统筹城乡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

⑤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危险;其次,只有唤起“国民”力量才能救亡图存。因此,严复、梁启超等人充分认识到“群学思想”的重要性,认为民族国家是“群”的最高形态。严复“民德”思想就是要解决“群”的问题,表面看是公德心问题,实际上指向民族团结问题,即“团结就是力量”问题。严复“民智”思想同样指向民力。晏阳初发展了严复等人思想,对当时“国民问题”诊断为“愚穷弱私”,即缺乏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认为只有“四力兼备的人才叫做新民”^①。但是,这种改良主义的新国民思想遇到困境,张艺英、温铁军认为:“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和四川新都开展的以‘制度改革’先行的乡村改造实验,最终以失败结束”,“晏阳初认为失败原因在于新的政治势力未能战胜传统的恶势力,故提出从事社会改造的新四力:文化力、经济力、政治力、武力”。^②总体而言,“民力”成为目标本身,不管改良还是革命、新国民还是军国民,主要是发掘民力的方式方法问题。

通过上述历史上关于“民力”思想的分析后,现在回头看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清末民初时期诸多思想论战,如以农立国、以工立国,改良主义、革命主义等,都在翟城村不同时期上演过和实践过。这最少得出两个启示:首先,一个微观的村庄,它难以同时承载诸多思想的实践,在同一时期很难同时实践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但是在广阔的中国领土上,情况就不同,精英阶层在不同农村区域开展了各种模式的乡村建设和变革,此项运动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阎锡山等人。其次,百年翟城村史诸多社会变迁都是外力所致。如上文所示,从涂尔干到亨廷顿等西方学者,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在抽象层面论证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影响,但一旦剖析到具体的案例,我们发现,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命题或无止境的目标,但路径的选择和实践过程却千差万别。总之,宏观社会想象依靠民力实践自身,必然影响民力思想。

那么,宏大社会想象如何传递到微观的村庄,并转化为村庄社会想象的呢?翟城村百年历史是否可以用一种宏观社会想象来加以概括呢?再进而,中国近现代宏大社会想象是否可概括为现代化想象呢?显然,日本侵华战争中,殖民命题压倒现代化命题;土改时期,政权命题压倒现代化命题;翟城村选举动员中,权力逻辑压倒现代化逻辑。可见,翟城村庄历史变迁的脉络不仅包括现代化,更包括多元主题。比如,杜威生活教育理念、列宁阶级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等,在中国都实践过;在翟城村这个有限的时空中,这些理论也被实践过,只是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段。可见,宏大叙事和社会规划会传递到微观层面,但与微观实践方案和社会想象有许多差别。比如,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改革中,世界上存在的各种主要政治体制模式几乎都探讨过,甚至尝试过,如君主立宪、共和制、人民民主专政等。这些理念贯彻落实到基层,更是花样百出。不过,诸多的微观社会想象及其实践,同样可能汇聚成宏大历史蓝图和社会想象。显然,许多精英意志难以在宏观层面实践,但找到一些实验场是不难的,如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的乡村建设实验都不是全国性的,即使在全国层面成立平民教育总会,其作用范围和实践领域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这些微观层面的实验却共同构成了

① 四川省政协、巴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2 页。

② 张艺英、温铁军:《从平民教育、县政实验到土地改革——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改造”道路》,《开放时代》2018 年第 3 期。

一个时代的主题。

这些事实说明,在社会巨大变革过程中,确实存在缺失统一价值观和政治规范的引领问题,各种力量不断博弈,各种势力长期存在,甚至导致革命战争和军阀割据。一旦出现战争,社会想象必然服务民力聚集,服从战争逻辑。这样就有了军国民的思想和想象。辛亥革命时期就孕育了民主革命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更是需要军国民思想,土地改革中同样结合了阶级教育和革命战争双重因子。那么,如何在民众中播下革命种子,唤起革命力量呢?为此,被历史遗忘多年的墨家游侠思想被重新发现,登上近代历史舞台发挥作用,作为近代被唤起的中国文化中的革命精神的基因。这说明有了社会想象之后,意识形态成了凝聚民力的手段。

综上,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与国家发展变迁命脉相连。翟城村一起起重大事件的演进就是国家一起起重大事件的反映。翟城村因各重大事件持续处于过渡社会状态,中国近现代同样因各重大事件持续处于过渡社会状态。综观中国近现代恢弘历史,表达的就是无数翟城村这样村庄社会变迁汇聚成国家社会变迁的洪流。随着时代的发展,“民力”主题化并成为历史变迁的推动力量和历史目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史为例进行经验研究发现,百年翟城村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其发生缘由和背景不尽相同,在目标、使命以及在思想基础、手段和实践路径上也存在差异。根据上文对各个时期有关重大事件进行分析梳理成下列表格(如表 1 所示)。

表 1 翟城村百年社会变迁周期及其相关因素分析表

| 时期 | 重大事件 | 缘由与背景 (国家视角) | 目标 (民视角) | 使命 | 主要思想 | 手段 | 路径 |
|-------------|---------------|-----------------|-------------|----|--------------|--------|--------|
| 1902—1911 年 | 早期村治实验 | 清末新政 | 新民 | 启蒙 | 颜李学 | 村治运动 | 乡约制度 |
| 1911—1926 年 | 后期村治实验 | 民初地方自治 | 新民 | | 学治主义 | 地方自治运动 | 日本町村制度 |
| 1926—1937 年 | 乡建实验 | 践行以农立国 | 平民(公民) | | 实验主义 | 平民教育运动 | 乡村建设 |
| 1937—1945 年 | 抗日战争 | 救亡图存 | 军国民 | 救亡 | 民族主义 | 大众动员 | 乡村军事化 |
| 1945—1949 年 | 土地改革 | 国内战争 | 军国民人民 | 革命 | 马克思主义 | 阶级斗争 | 政治动员 |
| 1949—1978 年 | 集体化运动 政治运动 | 革命与生产 | 人民 | | 社会主义 革命思想 | 政治运动 | 集体主义 |
| 1978 年至今 | 村庄规划 村委选举 | 经济社会发展 | 人民 | | 国家治理 | 改革与营造 | 农村建设 |

翟城村经验显示,第一,近现代进程中,传统总是被利用,嵌入的新因素也并非总是现代性的,还再生产了如蓝田吕氏乡约这样的传统因素;第二,几乎所有重大变迁事件都是外力(精英)主导完成的,并且不是慢慢的自然进程,而是带有历史紧迫性的人为干预进程。这与涂尔干心理主义现代化研究的预设正好相反。故,涂尔干心理主义现代化研究因缺少国家视角,可能对英、法等原生现代性国家的现代化(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具有解释力,而对中国这样的被动现代化国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以及更宽泛意义的社会变迁的过渡状态出

现的现象,不管从逻辑上还是历史经验上,都难以做出合理解释。

为解释经验现象,我们的研究实际上对多重范式(视角)进行了转换。第一,将涂尔干心理主义视角下的现代化与社会动员研究加入国家视角,我们会发现,涂尔干社会失范理论更适合分析原生现代性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的行为模式,也可能出现失范现象;对于中国这样的被动现代化国家不具有解释力。第二,将涂尔干心理主义视角下的社会个体分析转换成国家视角下对“民”的分析,将看到中国现代进程中,社会大众并非只是作为社会个体去自发适应社会内部自发生成的现代化文化制度规范,而是首先要面对民族国家独立富强的历史使命及其相应的精英意志,被动适应社会动员和整合,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不同意识形态、社会想象和集体行动的号令和召唤。第三,作为“民”的范式,不只是简单地通过启蒙将社会大众化育成为现代化的“公民”,而是在不同时期被建构成新民、公民、军国民、人民等。第四,民族国家召唤下对“民”的社会动员,分析框架不仅仅是对传统或现代的“忠诚”,更为重要的是“民力”,“民力为本”“忠诚为用”既是中国国家与社会现代进程的双轨逻辑,也是社会动员的历史使命。第五,在历史话语中,启蒙表征了“忠诚”逻辑,救亡、革命、发展表征了“民力”逻辑,两者通常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但从翟城村更为微观的历史进程看,这二者是缠绕在一起的,共同诠释了社会动员的根本属性。

通过范式转换,我们对翟城村百年变迁的历史经验形成了这样的故事线(或结论):首先,在翟城村百年历史中,历经多次重大事件并因此导致村庄发生较大社会变迁,致使村庄不断处于变迁的社会过渡状态,故翟城村不是涂尔干心理主义视角下的传统到现代的普通的线性的社会转型。其次,各重大事件基本由外部力量和社会精英推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精英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号召下,践行国家意志,并在国家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挥社会想象,勾勒翟城村发展蓝图,并将其转化成村民能够接受的,包含着传统和现代多元文化特点的意识表达框架,嵌入到村庄,化育为村民意识和行为秩序,故不断的社会过渡状态是由外力强加并规范指引下完成的,甚至是进入践行民族国家历史使命和精英意志的集体行动状态,不是涂尔干心理主义视角假设下的那种无规范状态。再次,集体行动贯穿着“国家意志—精英意识表达框架—村民意识”这样的集体意识形成路径。集体意识和行动通过社会动员来表征和建构,社会动员将有关人们对传统和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忠诚,加以灵活利用,故是外来意识(精英社会想象)的嵌入和传统的再生产,传统并没有废弃。最后,社会动员效用是村民对精英社会想象的“忠诚”,“忠诚”的效用是村民付诸行动实现精英社会想象,故“民力”是最为根本的。我们将这个故事线抽象出核心范畴为“民力为本,忠诚为用”。总结论是:对于分析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动员不是自发过程,而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机制,其效应既包括现代化,也包括逆现代化,故社会动员与现代化不表现为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在国家的视角下,社会动员的根本属性是“民力”,现代化的根本属性是“强国”。

综上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表明,现代化进程中蕴含着各种形态的过渡社会;各种形态的过渡社会总体遵循“民力为本,忠诚为用”的“变在”逻辑;社会目标、社会动力、制度规范在过渡社会中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并相互协调促进。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引申讨论一下“救亡—启蒙”话题。李泽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救

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的著名观点,认为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了。^①对此观点,附议者和反驳者至今争论不断,在此不加详述。仅指出,从逻辑角度和现实主义视角看,近现代中国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均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为目标,为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就必须依靠对民众的社会动员;动员民众必然蕴含着重塑集体意识(如现代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国家意识、民主意识等)与发起集体行动(如接受新式教育、罢工罢课、土地革命、选举投票等)。因此,结构化中国民众的近现代历史,不是救亡或启蒙两条接替出现的历史主线,而是民力(集体行动)和忠诚(集体意识)两条缠绕在一起的历史线索,其中“民力”是主线,“忠诚”是辅线。如果民力和忠诚不是对立的,那么,救亡和启蒙的对立性实在没有基础。

因此我们认为,在“民一群”视角下,“民力”是中国清末后贯穿至今的近现代的一条主线;“救亡”是“民力”的阶段性任务;而“启蒙”只是“民力”化育的一种选择性策略,并非历史任务。对有些学者,“启蒙”则仅限于西方自由民主意识;本文回到事情本身,将其置换为“忠诚”,以便转换其适用范围;但“启蒙”也好,“忠诚”也罢,皆服从“民力”主线。因此,“忠诚”围绕“民力”主线展开,“民力”主线要做的文章是“立国强国”,“立国强国”始终是中国近现代的主题。

总体而言,相对“国家—社会”和“启蒙—革命”等范式,“民一群”视角开启了更宽广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近现代进程(或过渡社会“变在”逻辑),能兼顾“国”在“国际”的处境和“国”对“民”的召唤,能更充分分析“国”对“国家处境”(或现代化)的应对策略和“国”对“民”的动员整合模式,能透视全球性现代性因素如何经由社会精英和主体在国际、国家、村庄等实体中布展的过程,使研究回到事情本身。也正因为引入“民一群”视角,才能从“民”角度发掘的“忠诚”范畴,并以之转换从“精英”角度发现的“启蒙”范畴。

当然,人类社会“变在”逻辑是恒常逻辑,当加入人为因素推动历史“变在”时,风险同样存在。比如,斯科特通过揭示近代以来那些乌托邦式的社会大工程项目的失败,批判了一种“极端现代主义”的信念,并倡导放弃国家“控制”的逻辑,提倡“改善”的逻辑。^②不过,不管“控制”还是“改善”的逻辑,都是人为“变在”逻辑。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我们也许会反驳,斯科特倡导“改善”的逻辑可适用于国际和平状态下的国家创建和治理,但在外部压力下,渐进式的改善逻辑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动员和整合民力的紧迫性。“失范理论”和“改善逻辑”一样,忽略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结构压力和历史紧迫性。可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就像翟城村史一样必然由一起起重大事件构成,由无数不同时空下形成的宏观微观的过渡社会图景构成,而民及民力是这些事件和图景中最重要元素。综上可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处于过渡社会状态中,过渡社会由于现代化的紧迫性不断将个体吸纳到历史使命中,并相应形成过渡社会建制。

(责任编辑:孙菲)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 页;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走我自己的路》(增订本),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 页。

② 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福建论坛
Fujian Tribune

ISSN 1671-8402



微信公众号

ISSN 1671-8402
CN 35-1248/C

定价：30.00元

学习与实践

STUDY AND PRACTICE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3
2020

学习与实践

STUDY AND PRACTICE

2020年第3期

总第433期·月刊

目录

STUDY AND PRACTICE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2篇)

论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 卢现祥 罗小芳 5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徐双敏 18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新时代拓展 马晓妍 何任伟 洪 军 28

经 济

“同地同权”能否促进农户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农村住房拆迁的实证研究 程承坪 曹 扬 36

智能制造产业基础能力的微观解析及其政策含义 韩江波 48

农民工医疗保险需求强度与参保行为:对背离现象的解释 任 辉 任巧巧 61

公共管理

基层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成因探讨与根除对策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研究 徐 行 王娜娜 76

“智能+”场域条件下在线政务服务创新研究 王 谦 刘大玉 陈 放 85

社 会

社会互构论的方法论预设及其学术意义 杨发祥 王镜新 92

理论自觉的思想资源、本体创新与价值关怀

——以社会运行理论为例 陈玉生 101

文化堕距视阈下黑恶势力的根植环境治理 肖 竹 111

哲学与文化

现代性道德秩序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付 洪 舒高磊 119

微时代的舆论特点及新闻应急处置体系构建 马 庆 邓慕秋 130

消费文化语境与网络文学生产的新变

——基于注意力经济视角的分析 李敏锐 135

学术顾问:李 扬 李 强

吕忠梅 赵凌云

马 敏

社 长:李立华

主 编:袁超越

执行主编:刘江涛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0730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05/C

主管主办: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出 版:学习与实践杂志社

电子邮箱:xxysj123@126.com

电 话:(027)82350700

印 刷:武汉市天星美润设计印务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武工商字01-32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邮发代号:38-95

地 址:武汉市汉口发展大道495号

邮政编码:430019

理论自觉的思想资源、本体创新与价值关怀*

——以社会运行理论为例

陈玉生

摘要:本文主要以郑杭生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为考察对象,研究“社会运行理论”如何融贯群学与社会学。研究表明,郑杭生先生继承和发展了严复有关“民群变端”与“惟修惟和”的群学精神,并将其范畴化理论化为“社会运行理论”;进而通过“杭生三问”(社会学的“元问题-总问题-具体问题”)等将“社会运行理论”融贯群学和西方社会学。社会运行理论克服了西方社会理论以“抽象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弊端,直面“自然人”和可经验的具体的“群”,构建“个人与社会”双重视角(“民-群”范式),将社会学统一到“民群”及其“变端”即“社会运行”的研究上来;同时,为社会学奠定了“新型现代性、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价值基础。

关键词:群学 社会运行理论 “民-群”范式 群体变迁 惟修惟和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0)03-0101-10

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0.03.010

郑杭生先生(以下简称郑先生)先后创立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提出了一些中层理论。郭星华认为,先生的社会学学术之路可分为早期(1981~1993)、中期(1994~2006)和晚期(2007~2014)三阶段。^[1]陈玉生也指出,郑先生学术思想在2001~2003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2]虽然有阶段性,但郑先生的主要社会学理论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杨发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历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理论探索、应用和拓展的过程,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传承和梯次推进、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3]郑先生认为,社会运行论是基础,转型论是深化,本土论是追求和方法论,社

会互构论是进一步升华总结^[4],实践结构论是在上述四个社会学理论基础上迈出的新步伐^[5]。洪大用、黄家亮借用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范畴描述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结构,并指出“纵观社会运行学派的成长、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它与中国社会运行实践的密切互动”。^[6]可见,社会运行理论是逐步展开的过程,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社会运行”本身。

本文主要以郑先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为考察对象,阐明其社会理论中蕴含的“社会运行”这条主线,以及社会运行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结合处。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社会运行”范畴是如何构建的,有什么特征,郑先生

如何将“社会运行”范畴嵌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并对后者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突破?

一、“民群变端”与“惟修惟和”:理论自觉的传统思想资源

社会学家通常对“社会”有所想象,这种想象会直接影响到其理论阐述。比如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设想为“水波纹”和“差序格局”;韦伯阐明“科层制”作为现代社会组织的一种典型类型。“社会”想象体现了一位社会学家的精神气质及其理论情怀。与大多数社会学家将社会设想为相对静态的形态不同,郑先生想象的社会原型受严复关于社会的“治乱兴衰”思想影响,表征的是社会时空的发展和转换。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7]严复在《译余赘语》中说:“《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8]

严复引用了《尚书·大禹谟》中的“正德、利用、厚生”为社会学立命。其全句为: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尚书·大禹谟》)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政治和治理的观念,其中对自然物的生产强调“惟修”即休养生息,对与人类有关的社会关系强调“惟和”即和谐有序。

综上所述,第一,严复从荀子思想中确立了“群学”的研究对象。在严复看来,任何人都离不开群,群有不同类型;“社会”是群的一种,属于有

法之群。对群的研究即群学,在于用科学方法研究“群的变化”即“察民群之变端”,以阐明过去和预测未来。第二,严复从《尚书》中确立了群学研究的价值定位。群学研究的旨趣在于功用和治理,即要阐明社会治乱、盛衰的原因,实现休养生息与和谐有序的社会的目的即“惟修惟和”。

大部分人注意到严复关于群的论述及其荀子思想渊源,但郑先生同时注意到严复关于社会运行的论述及其《尚书》的思想渊源。郑先生对社会运行的第一个分析框架,就是“治乱兴衰”思想史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三个分析维度:“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三个维度分别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两个角度对社会运行进行分析,构成一个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显然不是解释性的,而是评判性的,呼应了《尚书》中关于“惟修惟和”的论述,是对社会运行的状况进行诊断的概念工具。

郑先生以社会运行定义的社会学在理论逻辑上要研究三个层面问题:诊断社会运行,解释社会运行,指明社会良性运行取向。综观郑先生著述,也正是围绕这三个层面问题开展研究的。20世纪80、90年代,郑先生认为社会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进入新世纪,先生又将现代划分为旧式现代性和新型现代性,认为中国社会朝向新型现代性转型。这两次社会转型分析,皆具体指明了社会转型的处境,比如在实践结构论中,郑先生提出当今中国八种代表性的新趋势,这些趋势可以认为是社会转型条件和机制的具体表现。

郑先生为何会追随严复思想,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呢?先生将“文化大革命”视为“刻骨铭心的教训”,同时对“改革开放”给与了充分的肯定。郑先生在现实处境中实际上体悟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兴衰成败的变迁规律,并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在课堂上,先生将某种感受描述为“切”肤之痛。正因如此,郑先生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

历史使命感和中国士人的担当精神,其社会想象直接指向美好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与韦伯对西方社会中孕育出来的“科层制”等现代理性社会充满欣喜与对未来人类可能被“关在笼子里舞蹈”而担忧那种情感不同,郑先生表现出对社会恶性运行的厌恶和良性运行的渴望,是对“过去”的沉思和“现代”的责任。先生不只是一定要认识这个社会,而且要对社会积极有为。

因而,“察民群之变端”与“惟修惟和”旨趣是社会运行学派精神气质的基础。

二、“群学”理论化与“社会运行”范畴化:理论自觉的本体创新

那么,社会运行和社会运行状况评价在既有社会学理论(或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得到阐述呢?如果没有或阐述得不够,是否应该纳入社会学视野中,中国社会学是否应该重视本土的该社会思想的研究?

(一)“杭生三问”:社会运行理论嵌入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楔子

为了将“社会运行”范畴安顿到社会学知识图谱中,郑先生对社会学提出三个层次的问题^[9]。首先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先生将其作为社会哲学的元问题层次;其次是社会学的对象问题,即社会良性运行和协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问题,先生将其作为社会学的总问题层次;最后是社会学的范畴体系问题,即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规范、社会设置、社区等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范畴和内容涉及的具体问题,先生将其作为社会学的分问题层次。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三个层面的问题,本文称其为“社会学三问”或“杭生三问”。

“杭生三问”实际上是社会学的社会学问题,

事关社会学自身的“立法”。先生认为,社会学“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基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10]

先生在对西方社会学二元范式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反思后,将社会学元问题收敛为“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郑先生阐述道:社会学的元事实就是现实存在的众多个人和作为现代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社会,“个人”和“社会”正是具有元意义的根本性事实,是社会学的“阿基米德点”——构成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以及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支撑或依托。^[11]社会互构论对此进行了深刻研究。

在“元问题”之下是“总问题”。正是在这个“总问题”上,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未能处理好,留下了裂缝,郑先生因此在其中打入了一个意义非凡的“楔子”——“社会运行”。这个“楔子”不仅打通了西方社会学宏观与微观、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等二元范式的对立领域,而且打通了西方社会学知识联通中国传统“治乱兴衰”等思想的路径。在此基础上,“社会运行”概念实现了对阐明社会现象、实现价值追求、指引科学活动等的覆盖性。

对“具体问题”,先生认为随社会实践的变化,人们可以形成不同的论断。大部分西方社会学具体理论研究都是基于具体问题,并因此形成大量社会学范畴。先生将这些范畴统一到社会运行理论中,并与其学术团队一起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此并不赘述。

总之,郑先生以社会运行范畴定义社会学,并没有重建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而是采取了非常务

实和包容的态度,衔接和整合了既有社会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分支社会学,深刻揭示了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属性。郑先生非常智慧的地方就是通过“杭生三问”阐明了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裂缝,并用具有中国传统思想底蕴的社会运行范畴进行充实,打开了中西方社会思想联通的渠道。

(二)“群学”研究:确立“自然人”(“民”)分析单位与“民-群”研究范式

“杭生三问”中第一层次问题触及社会哲学,属于社会学的元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是阐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派、属性、主要内容的基础,也是指导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基础。^[12]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阐明社会学研究对象时,就已经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放在社会哲学层面,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看待。先生认为,社会学元理论是关于个人和社会的现代性特征,以及阐释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的动态结构关系不断展开和变迁过程的知识系统;^[13]现代性的目标及其走势对社会学研究理路和学理框架,具有根本性的影响。^[14]

那么,如何理解“个人与社会关系”?郑先生认为:“一方面,每个群体、组织、阶级、社区本身,实际上就是个人与该小社会的统一,在该群体、组织、阶级、社区等中个人与该小社会相互发生作用。另一方面,该群体、组织、阶级、社区等各自的一个个成员,又通过本群体、组织、阶级、社区等,与其他群体、组织、阶级、社区等,也就是不同的小社会或大社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15]可见,郑先生在个人与社会关系论述中,“社会”主要指由“个人”按一定规范组成的结合形式,如群体、组织、阶级、社区等。因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个人与个人结合成的社会发生的相互作用,同时个人穿梭和分布于不同的“社会”而引发的不同的小社会或大社会之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不是以“行动者”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元事实?对此,郑先生阐述道:因为在社会学研究

中,行动者既可以是集体行动者也可以是个体行动者,集体行动者如“职业群体”、“民族”、“阶层”、“阶级”等,在一定意义上还包括“家庭”、“组织”、“社区”、“国家”,即包括“个人”的各种集合形式。个体行动者,除了可以指“一个人”,还可以指“某一种职业群体”、“某一个民族”、“某一个阶层”、“某一个阶级”,或“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国家”等。^[16]可见,先生所指“个人”实际上就是“自然人”,而“社会”则是由自然人结合而成的各类“群体”或“集合体”。郑先生此处确实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含混之处,在理论上重新确立了自然人的地位。“行动者”因为还可能被分解为“自然人”,并不具有元事实性质。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个人与社会”关系指称的就是“(自然)人与群”关系,本文为了表述方便和对应群学思想,提出“民-群”范式。那么,笔者为何要做这个转换,提出“民-群”范式?首先,先生阐述个人与社会关系主要是在元理论层面,使得该分析框架直接用于经验研究会有一些困扰;其次,“社会”含义比较复杂,先生所指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实际上包含着“国家”,难以区别“国家-社会”等范式。转换后,“民-群”范式能够对应杭生三问的具体问题,在分问题层次直接运用于经验现象研究。“民-群”范式区别于“国家-社会”等范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群”就是社会的实体,相对于单个“人”的主体,两者之间并非如国家对立社会,而是“民”主体构成“群”实体并关联诸“群”。

社会运行学派建基于严复的群学思想,将“社会”范畴对应到“群”范畴,如果群有大、中、小群之分或宏观、中观、微观之分的话,那么,社会运行理论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中微观的解释力。“群”在古今中外思想中是可以直观可以经验可以言说的现象,比如家族、社、国家,外戚、宦官、种姓、黑五类、法律人等,现代“国家”的创制,就是“群”的一种新

形式的发明。理解“社会运行理论”转换到“群”思想基础上,理解“群”的变化与运行,这就是群学,一门关于群的创制和发展,群的结构和关系,群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各种关系等方面的学问。“群学”在中国古代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比如,严复实际上已经注意到国家作为群的重要意义,所以他说“最重之义,极于成国”^[17]。

综上,“民-群”范式为社会运行理论运用于经验现象研究,在操作层面融贯群学和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方案。

(三)“社会运行”研究:确立“群学”视角

社会运行理论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群学”,社会学无非是围绕群及群的变化进行研究的,“社会”首先指明的是“群”,“群”实为社会学的“定海神针”。比如,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认为是自我主义的社会,这些就是关于传统中国这个“群”的深层特征的阐述。由于近现代发展,现代科层制组织、社团、核心家庭、社区、城市等新的群形式不断嵌入,传统中国这个群也相应地产生社会变迁。

从“群”的角度看社会学基本概念,我们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民”化育与形象,如社会化、身份、角色等,是自然人的各种指称及其生成过程;第二类就是上述个人社会化之后形成的“群形态”,如家族、社等,是抽象社会中的自然人的结合形式和充实对象;第三类是相关个人和群的表征“群特征”的角色冲突、文化规制、社会体制、社会设置、功能结构、社会分层、社会网络、社会整合、冲突纠纷、问题困境等范畴,是各类“群”属性的承担者;第四类就是“群运行”现象本身,涉及社会化、社会运动、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变迁发展、社会建构、社会转型、社会工程、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等概念,要辨明群在时间维度上的现象。比如,先生认为:“社会学思考的范畴是现代社会的性状和变迁,重点则是对当代社会进行研究”^[18]。按此推

演,社会运行理论是关于群形态、群特征和群运行规律的知识体系。

比如,法律社会学就是如此。首先,霍布斯等人倡导自然法,无非阐明人类社会群的组织形态,即创制“国家”这种生活形式;随后法社会学又历经历史主义法学、现实主义法学、行为主义法学、组织社会学法学、日常生活视角下的法学等历程。但是,法社会学无非首先探讨法律人,围绕与法律现象有关的职业群体和社会群体,以及群体形态和类型,如法官、律师、控辩双方当事人、警察、检察官、原被告、证人、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法学家等;然后阐明法律社会或因法律关联起来的群体的特征,包括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意识、纠纷解决模式、法治等;最后阐明法律社会的发生学,如法院的产生、从身份到契约社会的变迁、法律控制与道德控制等。

西方社会学没有“群”的理论自觉,其中虽然有初级群体、社会组织、家庭、社区、政党、国家等“群的范畴”,但其基本的学术问题主要是“行动何以可能”、“秩序何以可能”,将研究对象放在“抽象的社会”秩序、“抽象的社会”行动、“抽象的社会”事实等方面。为什么要加一个“抽象的”限定词呢?就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并非如中国思想史中描述的“群”那样是“实体的”和“可经验的”。

“社会运行”这个打入西方社会学的楔子,实际上使“抽象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立马鲜活生动起来了。社会运行学派首先要辨明的就是群的“社会”现象本身。“杭生三问”中第三层次的问题覆盖到社会学的基本范畴系统,从个人社会化到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设置等,实际上也相应覆盖到这些范畴对应的社会现象。通过“民-群”范式,为社会学研究群发展规律和预测群发展变化提供了一种可能,而不只是预测行动者的行动和控制行动的秩序。

三、“明既往，测方来”：理论自觉的价值关怀

社会运行理论明确强调了价值立场，从群学角度看，就是要认识群、改造群。如上所述，“察民群之变端”与“惟修惟和”旨趣就是社会运行学派精神气质的基础。那么，社会运行理论到底确立了哪些核心的价值立场？

针对批评者指认其社会学概念存在“人类中心的色彩”和“将价值判断引入经验科学”等问题，郑先生在“答我的一些批评者”一文中明确指出：“广义地说，社会学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本来就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批评者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价值中立’不仅不能达到科学性，还会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在我看来，科学性只有通过实事求是才能达到。”^[19]从先生的话可推断，第一，社会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价值中立；第二，明确价值立场，不影响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笔者在研究韦伯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献时也表达了类似意思^[20]：社会科学活动过程中在确立研究对象、分析概念及适用研究结果时，都必然带有价值观，只有将收集到的经验材料即经验现象比对理想类型概念或范式时，这个比对过程，是可以比较高度的程序化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实现价值中立。郑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学所研究的在本质上就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对此，笔者溯源郑先生社会学价值立场发现，最少有以下三个非常明确的具有非凡意义的观点。

（一）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社会学对社会（群）发展形势的诊断

社会运行理论一方面强调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取向，另一方面强调要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故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结合起来，革除西方二元对

立思想。早期，郑先生汲取了“价值中立”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强调了真理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科学性与革命性之间既相区别又相统一的观点。^[21]1990年代末，先生提出的“杭生三问”与社会学经典设问“社会行动何以可能”、“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不同，不仅关涉社会学研究对象即本体论，而且关涉社会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指明了社会学研究中必须坚持的个人与社会双重视角及社会学传统中形成的范畴体系与学科范式。

20世纪80年代初期，郑先生提出社会运行论之时就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治乱兴衰历史及观念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读；然后又用在治乱兴衰历史观基础上发明的评判社会运行状况的“良性、中性、恶性”社会运行理论诊断中国近现代历史，并对其进行类型化和阶段化划分。郑先生敏锐地阐明了社会在发展和运行过程中，在时空演进过程中，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有健康、亚健康 and 疾病三种状态。

郑先生将中国社会“治乱兴衰”作为理论原型引入社会学并升华为社会学基本理论逻辑时，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要建立的社会学，就是要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22]。可知，郑先生研究社会的“治乱兴衰”，既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同时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作为价值取向。

先生指出：这样的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社会进步的社会科学，它在推进社会全面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社会稳定看，社会学既正面研究社会保持稳定、有序运行的机制和条件，又研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导致社会动乱、造成社会问题的种种障碍因素，其中非经济的障碍因素占有很大比例，在保持社会良性稳定中，社会学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社会改革看，改革越深入，非经济因素越重要、越突

出,往往成为改革深入的瓶颈,研究如何减少改革的社会代价,增加改革的社会效益,是社会学必须作出的回答。^[23]

郑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社会运行理论要回应社会意识形态是显然的,但这并未妨碍该理论的学术和实践意义。郑先生呼唤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责任,为此对韦伯的价值中立观进行了批判和反思。郑先生的策略既不是倡导宏大的社会工程,也不是固守于单纯的社会认知和解释,而是要做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立法者”。这既是先生躬行的角色,也是先生对社会学的正名。

(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学对社会(群)目标实现状况的诊断

严复给社会学指示的方向表明,社会学要统一到“群”的范畴下来,坚持群的惟修惟和;郑先生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社会进步。惟修惟和实质上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做了规定,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大化实质上是对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做了规定。社会运行学派提出了干预社会运行的理论可能和路径。比如,在阐明社会运行理论时,如何确定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呢,社会运行学派认为要“以明确的社会目标作为整个指标体系的出发点”。^[24]

“所谓社会目标,是指某一社会体系根据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所确定的该体系发挥功能的要求和期望达到的状态。确定特定的社会目标,是建立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第一步。”“社会发展并非是一个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于人的过程,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是社会发展中心,还在更高的层次上表明,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或最终目标。作为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的人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实质上就是符合人的本质和需要的发展,集中到一点,即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活动、人

的社会生活、人的个性发展作为基本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表现的,因而,这个基本方面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一级子目标。”^[25]

因此可以说,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不是目标,而是手段或工具,真正的目标是“自然人”,是有关自然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运行是否良性,社会发展是否协调,最终要以是否符合“自然人的全面发展”为判断标准。如何确定人的全面发展的测量指标,社会运行学派建立了三层结构:人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活动,人的社会生活活动,人的个性发展活动。^[26]社会运行学派正是通过评判社会运行状况等,最终确立社会学的灵魂。

对社会运行做出规定性之后,是否可以对社会运行状况做出评价?郑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了良性、中性、恶性社会运行的分析框架;二是与李强、李路路等人建立了社会运行指标体系,测量社会运行状况。在《社会指标理论研究》前言中,郑先生这样写道:

“我们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既有一般的原因,又有特殊的原因。一般的原因是,我们认识到社会指标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社会指标及其体系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又是发展社会学的必要途径。特殊的原因是,我们提出的关于社会学的一种新的观点——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不仅需要定性的说明和论证,而且也需要定量的描述和解释,很显然,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研究有助于做到这一点。”^[27]

社会运行学派指认“社会指标体系是一套可操作的概念系统,人们运用它们描述与评价社会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学范畴和概念的具体体现”,“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从总体上就是或者着重从正面探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或者着重从反面探讨如何消除妨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因素。”^[28]这些认识说明,社会运

行学派通过建构社会指标体系,将社会学基本范畴与社会运行状况结合起来,标注清楚社会学知识与人类实践的对应关系和对应领域。

在这个时期,我们同时看到社会运行学派为了构建科学的社会指标体系,不仅要测量社会运行状况,而且要阐明社会运行规律。那么,他们是怎样想象社会的呢?他们认为:“可以纵向地将社会系统分为个人(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社会群体(初级群体和社会组织)、社区等等层次系统,也可以横向地将社会分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等系统。”^[29]

(三)新型现代性:社会学对社会(群)发展取向的诊断

郑先生在早期定义社会学时,将社会主义社会安置到社会学研究中来,认为“我们现在要建立的社会学,就是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自己的对象的。”^[30]“特殊地说,社会主义社会学即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它以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31]随后在一篇研究韦伯的文章中,先生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32]。

针对实现和通向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过程,先生又提出了社会转型概念。先生说“‘转型社会’概念的提出是有其现实根据的。这一根据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过程发展的特殊性。从最一般意义上说,便是它那种既已开始从传统中脱壳,又未发展成完全现代性质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特征。”^[33]

对社会转型,先生在两个时期有两种表达,第一种表达如上指中国在社会变迁、在通向社会主义现代社会过程中,要历经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第二种表达是在新世纪,先生又指认“现代性形成了两大流向:西方旧式现代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现代性”^[34],并指出中国将从“旧式现

代性”转向“新型现代性”。与此同时,先生批评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错误认识:“最突出的一类是把社会转型理解为所谓‘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或向‘后社会主义转变’等,这是基于错误政治立场的滥用。”^[35]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和新型现代性成为郑先生预设的社会学理论目标和社会实践目标,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那么,怎么理解新型现代性?先生在早期看到现代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强大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民族国家甚至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要素之一。但是,在中国,由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国家的扩张采取了激进的、全面的(指其机构与职能)、孤军深入的(指其权力没有文化所赋予的合法性)形式,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尖锐对立。最后结局是近代国家的崩溃和在新的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国家重组。”^[36]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变迁,先生针对现代与全球化的关系:“对现代性过程的三个重要阶段上的社会学理论形态——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学、民主社会与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现代性遭遇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进行了分析,对 sociology 理论范域的多变形态进行了探讨”,发现“现代性不断超越本土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制约、步入全球时代所引起的日益激烈的社会变迁和反响。”^[37]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性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先生说,现代性两大基本目标——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以及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的失衡与失谐,人类对人为工程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自我解放的追求,进而社会工程的实施压倒了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至于“人为性”比“价值性”更具根本意义,取代了现代性的目的本身,对这一历史进程产生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力量。与现代性人为倾向的趋强相一致,人将理想未来建立在与自然相抗争的基础上。这种旧式现代性理念的支配,必然导致人与自然、

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谐和危机。^[38]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负面后果日益明显,现代性理论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另一个方向则是对现代性的理论反思。^[39]但是这两个方向都存在不足,于是,先生提出新型现代性。

先生认为,“新型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它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了肯定式的积极拓展,提出了与旧式现代性相对的“新型现代性”这一理论术语。^[40]“我国社会转型究竟是走向新型社会主义,还是后共产主义国家,这实质上涉及的是一个转型向度和转型时序的问题。”^[41]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42]

四、结论

郑先生将从中国社会思想史和历史中继承来的“群学”思想,范畴化理论化为“社会运行理论”,在尊重原有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在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中打入“社会运行”这个楔子,通过社会运行理论融贯群学和西方社会学。

本文的主要努力就在于梳理该融贯过程,为群学研究指明出路,构建具有经验分析能力的操作化的“民-群”范式。首先,“社会运行理论”继承了“群学”关于“民群变端”和“惟修惟和”两大精神支柱,将其嵌入到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中;并经由“杭生三问”的学术研究融贯了“群学”与“社会学”。其次,在“民群变端”的“民群”研究上,“社会运行理论”给社会学确立了“群学”视角,确立了透视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群”及其构成单元的“自然人”的两维视野,实际上建立了“自然人-群(初级群体、次级群体,家庭、社区、国家,社会集团、社会共同体等)”分析范式。这个分析范式可以让我们

直观到各种类型的“群”以及穿梭于群之中之间的“人”,克服了西方社会学长期只见“社会秩序、社会事实、社会行动、结构功能、场域-惯习等”而不见具体的“人”和各类“群”的弊端,试图克服西方社会学长期存在的“微观-宏观”二元对立思维的缺陷。再次,在“民群变端”的“变端”研究上,“社会运行理论”继承了“惟修惟和”思路,安置了至少三大价值定位(新型现代性、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明确了社会学研究的立场问题,赋予社会学精神品质和责任担当。最后,“社会运行理论”统一了“民群变端”和“惟修惟和”两大精神支柱,明确指出“社会运行”研究(即“民群”与“民群变端”研究)不可能摆脱价值取向(如“惟修惟和”),试图克服西方社会学长期存在的“主观-客观”二元对立思维的缺陷。

最后,我们希望社会学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各类“群”上面,甄别清楚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类群,指出群运行形态和规律,能预测群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干预方案。

注释:

- [1]郭星华:《创建中国学派 倡导理论自觉——纪念恩师郑杭生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 [2]陈玉生:《弘道至善:郑杭生先生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思想与情怀》,载张建明、冯仕政:《家国情怀知行合一:纪念郑杭生先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97~302页。
- [3]杨发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历程及其内在关联》,《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 [4][39][40][41]郑杭生、童潇:《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之路——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 [5]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6]洪大用、黄家亮:《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
- [7]严复:《译群学肄言序》,载(英)斯宾塞著:《群学肄言》,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VII页。
- [8][17]严复:《译余赘语》,载(英)斯宾塞著:《群学肄言》,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X页,第XI页。
- [9][15][21]郑杭生:《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93页、第85~86页、第78~79页。
- [10]郑杭生:《孙本文先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 [11][13][16][18]郑杭生、杨敏:《论社会学元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逻辑结构要素和特定历史过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 [12]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 [14][34][38]郑杭生、杨敏:《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 [19]郑杭生:《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 [20]陈玉生:《“人文科学”知识的技术实现与德性规范——韦伯人文科学学说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 [22]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 [23]郑杭生:《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 [24][26][27][28][29]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社会指标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第174页,序言,第124页,第124页。
- [25]郑杭生、李路路、李强:《试论“以人中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
- [30]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 [31]郑杭生、李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的几个问题》,《上海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2期。
- [32][33]郑杭生、朱晓权:《论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晚期运用——社会结构分析和它对认识“转型社会”的一点启示》,《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 [35]郑杭生:《关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思想战线》,1997年第2期。
- [36]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 [37]郑杭生、杨敏:《现代性过程与社会学理论的个性——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 [42]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郑杭生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研究”(15ASH00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发展规划2017年度广州市服务型政府绩效管理重点研究基地课题(2017GZJD11)。
- 作者简介: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42。
- (责任编辑:陶秀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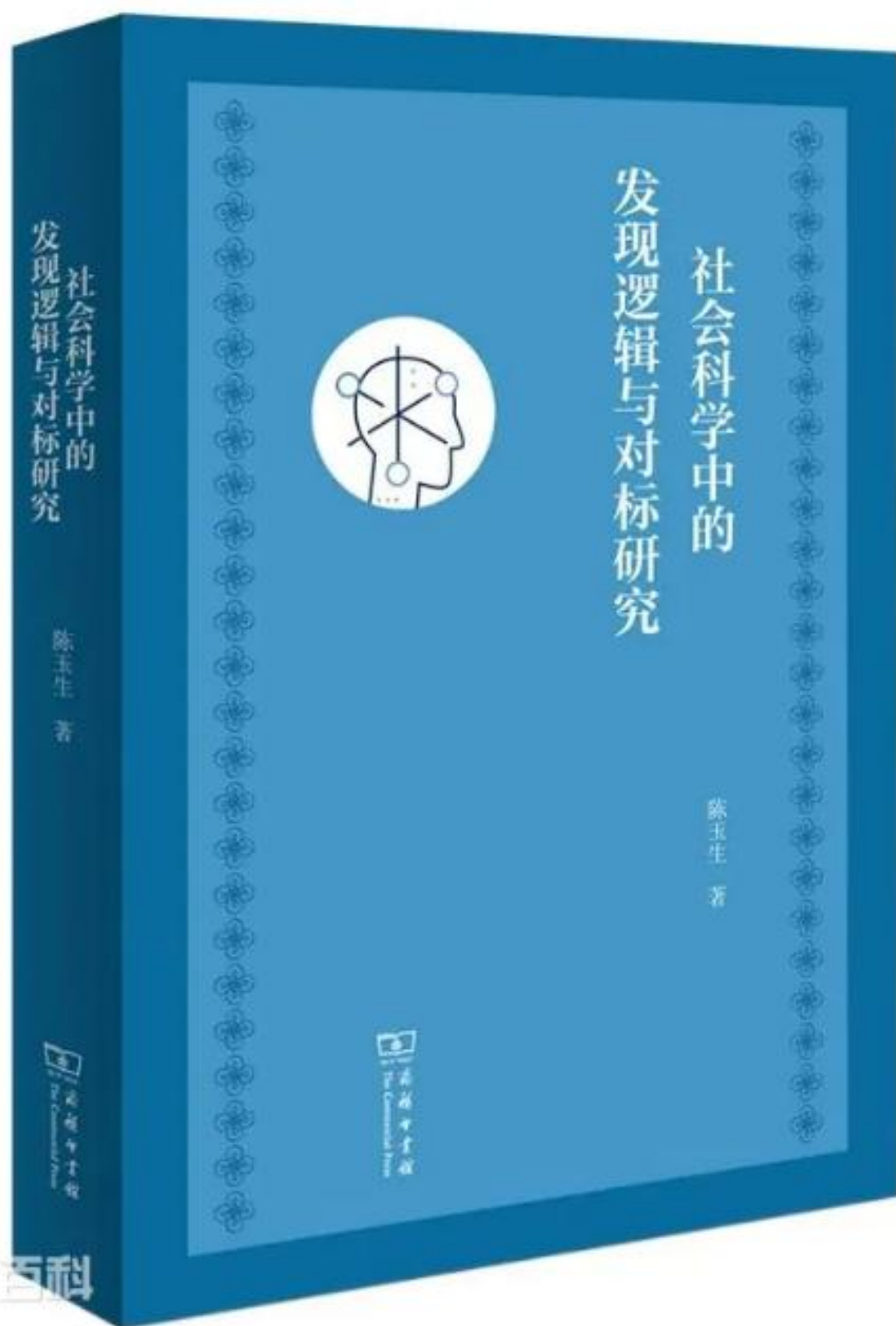
《学习与实践》杂志（月刊）

ISSN 1004-0730



刊号: ISSN1004—0730
CN42—1005/C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201004000061
定价: 15.00元



第一章 社会世界之旅——

“太太的红裙子”引发的学术思考 1

一、从经验到问题：“太太的红裙子”引起的思考 1

二、从感知到范畴：如何描述“太太的红裙子” 2

三、从行为现象到文化现象：太太为什么穿红裙子 6

四、从文化现象到心理现象：太太为什么穿红裙子 16

第二章 超越二元论——

布迪厄以“身体”开启生成结构主义 25

一、起点：反思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26

1. 结构主义分析 29

2. 现象学分析 32

二、超越：开启“身体”第三层面 36

三、余论：“中庸”的还是“社会性”的 44

第三章 还原、描述与回到社会现象——

社会现象学方法建构与勘查 48

一、社会现象学方法建构 49

| | |
|----------------------------|----|
| 1. 现象学现象 | 49 |
| 2. 现象学普遍的信念基础：回到事情本身、还原与描述 | 52 |
| 3. 社会现象：基于现象学方法的社会研究 | 57 |
| 二、社会现象学研究勘查：舒茨、加芬克尔、福柯与布迪厄 | 65 |
| 1. 回到生活世界：科学思维与日常思维 | 65 |
| 2. 直观生活世界：直观方法建构与社会现象描述 | 71 |
| 3. 历史先验：知识考古学与历史现象显现 | 77 |
| 4. 身体与实践：关系性思维方式与反思社会学 | 86 |
| 三、结论与讨论：重建和重估社会现象学方法 | 92 |

第四章 剩余范畴——

社会科学处境与社会发现方法 98

| | |
|--------------------|-----|
| 一、剩余范畴及其社会性 | 98 |
| 二、社会科学中的剩余范畴 | 109 |
| 1. “社会学”概念的剩余范畴 | 109 |
| 2. 实证与剩余范畴 | 116 |
| 3. 范式与剩余范畴 | 123 |
| 4. 理想类型、历史个体及其剩余范畴 | 125 |
| 5. 理论概念与剩余范畴 | 129 |
| 6. 理论框架与剩余范畴 | 133 |
| 三、社会世界的剩余范畴 | 139 |
| 1. 历史中的剩余范畴 | 139 |

| | |
|-------------------------------|-----|
| 4. 继续说与重新说：创新发现从学术问题开始 | 215 |
| 五、创新发现过程：导赏、表征和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 | 216 |
| 1. 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 | 217 |
| 2. 以名责实：“导赏”社会世界的方法 | 218 |
| 3. 循证考据：“表征”社会世界的方法 | 219 |
| 4. 技术检验：“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 | 221 |
| 六、对标研究：“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 | 222 |
| 1. 证据化、文本化、理论化：对标研究的前提条件 | 223 |
| 2. 对标研究的特征 | 224 |
| 3. 科学判断中的对标研究 | 225 |
| 4. 对标研究的思维逻辑 | 227 |
| 5. 对标研究统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可能 | 230 |
| 七、实现科学性：对标研究的规范与限制 | 232 |
| 1. 对标研究与科学性追求 | 232 |
| 2. 理念与经验在对标研究中的表现形态 | 233 |
| 3. 形式主义、唯理论、符合论：对标研究及其需要警惕的方面 | 235 |
| 4. 创新发现的评价维度 | 238 |
| 八、结论与讨论 | 241 |

第六章 “人文科学”知识的技术实现和德性规范——韦伯人文科学学说分析

| | |
|---------------------|-----|
| 一、人文科学及其处境、合法性和意义问题 | 246 |
|---------------------|-----|

二、韦伯
1. 从
人
2. 文
3. 理
4. 伦
三、结论

目录

| | |
|----------------------------------|-----|
| 二、韦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四步解析 | 254 |
| 1. 从先验前提到文化现象：实在论和知识论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起点 | 254 |
| 2. 文化意义、科学兴趣：科学对象与学科界限 | 260 |
| 3. 理想类型与因果联结解释：科学性的技术保障 | 264 |
| 4. 价值中立、理智诚实与责任伦理：科学成果适用的德性要求 | 273 |
| 三、结论 | 277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科学中的发现逻辑与对标研究 / 陈玉生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ISBN 978 - 7 - 100 - 21677 - 7

I. ①社…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方法论—
研究 IV. ①C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171388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社会科学中的发现逻辑与对标研究

陈玉生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21677 - 7

202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2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9½

定价: 120.00元

新时代成乡基层治理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分群治理理论

陈玉生◎著

Grouping-Governance Theory

分群治理理论

Grouping-Governance Theory

陈玉生◎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封面设计：田 简

定价：88.00元

☆ 欢迎登录中国农业出版社网站：http://www.cagp.com.cn

☆ 欢迎拨打中国农业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热线：010-36194913，45003256

☆ 图书邮购：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文献部邮购。

中国农业出版社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 欢迎扫描封面附赠，cagp@163.com

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第一章 “民一群”视角下的集群与分群 | 8 |
| 一、西方社会学阴影中的“社会” | 8 |
| 二、“群学”思想中的“社会” | 11 |
| 三、“民一群”视角：集群规模、形式与纽带 | 17 |
| 四、哈贝马斯的世界宪政方案 | 21 |
| 五、天下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 25 |
| 第二章 社会分化中的集群与分群 | 30 |
| 一、社会极化：集群中的阶层分化 | 30 |
| 二、权利关系：集群中的阶层矛盾 | 38 |
| 三、极端主义：集群中的矛盾极端化 | 52 |
| 四、社会分化现实与大同世界理想 | 56 |
| 第三章 社会治理中的集群与分群 | 59 |
| 一、社会治理的科学问题 | 59 |
| 二、三种社会治理典型 | 60 |
| 三、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 | 65 |
| 四、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 70 |
| 五、社会治理学的意义 | 77 |
| 第四章 治理主体中的集群与分群 | 80 |
| 一、三种理论范式：治理主体如何集群 | 80 |
| 二、三种理论范式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 87 |
| 三、三种范式的特征与批判性检视 | 93 |
| 四、中国社会治理理论范式创新 | 95 |

| | |
|--------------------------|-----|
| 五、从社会治理到社会体制 | 98 |
| 第五章 社会体制中的集群与分群 | 103 |
| 一、制度化集群：社会体制理论范式 | 103 |
| 二、社区体制与社会治理 | 108 |
| 三、多元治理主体体制与社会治理 | 115 |
| 四、社会服务体制与社会治理 | 119 |
| 五、社会体制改革的双重价值取向 | 121 |
| 第六章 制度变迁中的集群与分群 | 127 |
| 一、农户集群与农户家庭联结问题 | 129 |
| 二、家庭联结的研究与不足 | 131 |
| 三、“民一群”视角下家庭联结分析框架 | 133 |
| 四、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户家庭联结 | 136 |
| 五、“农户+”多元联结与合约联结 | 143 |
| 六、家庭联结合约制与制度创新路径 | 147 |
| 第七章 社会参与中的集群与分群 | 153 |
| 一、社会参与问题及其理论探究 | 153 |
| 二、社会参与层次与空间参与假说 | 158 |
| 三、空间集群与空间分群 | 162 |
| 四、集群的收敛逻辑与社会参与层次 | 166 |
| 五、集群分群形式结构：社会参与层次 | 174 |
| 第八章 过渡社会中的集群与分群 | 177 |
| 一、社会性的公共化与公共性的社会化 | 177 |
| 二、以“民一群”视角观世界 | 182 |
| 三、集群形态的可见性 | 189 |
| 四、集群过程的可见性 | 192 |
| 五、使群之策：联通 VS 分化 | 198 |
| 结论：分群治理的逻辑 | 200 |
| 后记 | 205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群治理论 / 陈玉生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4. 3

(新时代城乡基层治理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9 - 31806 - 9

I. ①分…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管理—理论研究
IV. ①C916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4) 第 054817 号

分群治理论

FENQUN ZHILILUN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编: 100125

责任编辑: 边 疆

版式设计: 王 晨 责任校对: 吴丽婷

印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2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2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42 千字

定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59195115 010-59194918

光明社科文库

法律与社会书系

社会工作行业与专业发展



·法律与社会书系·

社会工作行业与专业发展

陈玉生 胡文辉 李珏雯 编著

陈玉生 胡文辉 李珏雯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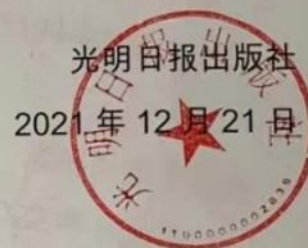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证 明

陈玉生同志等科研成果《社会工作行业与专业发展》
2020年6月入选我社《光明社科文库》资助出版计划。

特此证明



目 录

CONTENTS

总论 宏观社会工作与微观社会工作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看社会工作本土化创新与发展 1

第一节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概略 1

第二节 宏观与微观社会工作:基于广东经验分析社会工作发展的十个面相
..... 4

第三节 系统与环境:基于广州经验分析社会工作的服务关系建设 10

上篇 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研究

第一章 社会工作功能定位:角色理论视角下的青少年服务个案内容分析 ... 25

第一节 结构之功能与实务之角色:社会工作定位的理论探讨 25

第二节 社工角色期待与角色扮演:78 个青少年服务个案的定性内容分析
..... 29

第三节 社工角色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43

第四节 社工角色调适 54

第五节 结论 63

第二章 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区域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68

第一节 区域与场域:社会工作发展研究的视角与范式 68

第二节 场域分化:潮汕地区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及其类型化 74

第三节 场域构型:潮汕地区社工机构营造及其策略分析 81

第四节 场域环境:潮汕地区社工机构持续性发展的策略分析 96

第五节 结论与反思 100

第三章 社会工作平台建设:双边平台理论视角下的社工平台发展研究 110

第一节 双边平台理论:社会工作平台研究范式构建 110

1

| | | |
|-----|---------------------------------------|-----|
| 第二节 | 平台供给:南海区社会工作平台发展情况分析 | 119 |
| 第三节 | 平台效用:南海区社会工作平台与服务关系及服务策略分析 | 133 |
| 第四节 | 平台战略:南海区社会工作平台发展策略 | 148 |
| 第五节 | 结论与建议 | 155 |
| 第四章 | 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内外影响力范式下社工职业稳定的定量研究 | 161 |
| 第一节 | 社会工作者职业稳定性、主观幸福感、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 | 161 |
| 第二节 | 概念界定、理论范式与研究假设 | 165 |
| 第三节 | 实证分析 | 170 |
| 第四节 | 研究结果、总结与启示 | 181 |
| 第五章 | 社会工作能力建设:赋能理论视角下的社工专业支持研究 | 191 |
| 第一节 | 社工专业支持形式、内容与效应:赋能理论视角下的分析框架构建 | 192 |
| 第二节 | 专业支持形式:Q镇社区动员项目案例分析 | 197 |
| 第三节 | 社工专业支持内容与效应:赋能理论视角下Q镇社区动员项目案例分析 | 200 |
| 第四节 | 结论 | 215 |

下篇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研究

| | | |
|-----|---------------------------|-----|
| 第六章 | 掌握专业技能:社会工作小组动力干预研究 | 223 |
| 第一节 | 小组动力理论 | 224 |
| 第二节 | 动力培育:小组初期的动力关系塑造 | 228 |
| 第三节 | 动力评估:小组发展中的动力障碍因素分析 | 234 |
| 第四节 | 动力干预:基于个体成长的小组动力引导 | 237 |
| 第五节 | 结论与反思 | 242 |
| 第七章 | 服务社会群体:农村老年人社工服务研究 | 253 |
| 第一节 | 社会支持及其对农村养老的意义 | 253 |
| 第二节 | 老年人非正式社会支持分析 | 255 |
| 第三节 | 老年人正式社会支持分析 | 263 |
| 第四节 | 社会工作服务的困境 | 267 |
| 第五节 | 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对策 | 269 |
| 第六节 | 结论 | 271 |

| | |
|---|-----|
| 第八章 整合社会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研究 | 276 |
| 第一节 助人自助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 276 |
| 第二节 实现助人的五要素:创容小组培育过程分析 | 280 |
| 第三节 实现自助的横向策略:创容小组培育策略分析 | 289 |
| 第四节 自助模式:“助人自助”理念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本土化新路径 | 295 |
| 第五节 结论 | 300 |
| 第九章 执行政策规划:社区营造周期研究 | 304 |
| 第一节 资产为本与周期理论:社区营造研究的新思路 | 304 |
| 第二节 S 村社区营造的周期分析 | 309 |
| 第三节 社区营造周期:分析框架构建 | 321 |
| 第四节 结论 | 325 |
| 第十章 管理服务项目:社工项目质量管理研究 | 330 |
| 第一节 PDCA 与质量控制体系 | 330 |
| 第二节 “P-C”质量控制体系建构:引入 CIPP 改进 PDCA | 335 |
| 第三节 “P-C”质量控制体系的研发过程:G 项目案例周期分析 | 343 |
| 第四节 “P-C”质量控制体系实务评价 | 353 |
| 第五节 结论 | 355 |
| 后 记 | 359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工作行业与专业发展 / 陈玉生, 胡文辉, 李瑶
葵编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 2
ISBN 978-7-5194-6466-0

I. ①社… II. ①陈… ②胡… ③李… III. ①社会工
作—案例—中国 IV. ①D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36665 号

社会工作行业与专业发展

SHEHUI GONGZUO HANGYE YU ZHUANYE FAZHAN

编 著: 陈玉生 胡文辉 李瑶葵

责任编辑: 刘兴华

责任校对: 刘浩平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电 话: 010-63169890 (咨询), 010-63131930 (邮购)

传 真: 010-63131930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rb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3131930

开 本: 170mm × 240mm

字 数: 413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2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6466-0

定 价: 9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

奖励证书

为表彰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获得者，特颁发此证书。

成果名称：细事细治——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
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成果形式：论文

奖励等级：二等奖

获奖者：陈玉生

粤府证〔2024〕179

证书号：2023-B-2-179



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室

证 明

华南农业大学：

贵校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农工党广东省社会与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陈玉生撰写的决策咨询报告《关于出台〈社会应急法〉 增强对人民群众的应急保护能力的建议》获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广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光瑜同志批示采用，作为委员提案提交 2020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特此证明。



（联系人：李彦 13416130562）

关于第十七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评审结果的公示

各高等学校团委：

经学生自主申报、高校团委推荐、作品资格审查、专家评委评审、省级团委审核，现将第十七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评审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3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2 日。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组委会秘书处（团省委学校部）反映，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个人名义反映的，需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反映的，需提供单位名称（加盖公章）、联系人、联系方式。公示期内未反映问题的高校，视为对公示内容无异议。

请各高校团委对本校拟授奖作品信息进行核对（拟授奖作品名单详见附件 1），具体要求如下：

1.拟授奖作品的作品名称，作者成员、指导老师的姓名、顺序，均以微信小程序“第十八届‘挑战杯’”上高校最后推报至组委会的信息为准，作者成员、指导老师只可在此基础上删减，不可新增或调整顺序。

2.如需勘误，须以学校为单位，由学校团委统一填写信息勘误表（附件 2），加盖校团委公章，于 10 月 13 日中午 12:00 前，将 Word 和 PDF 扫描件通过下方二维码提交，纸质版同步寄送至团省委学校部（邮寄信息见联系人处）。其中涉及人员勘误

的须提供身份证/学生证复印件，以及校团委开具的情况说明。
逾期未提交勘误申请的，将不予修改。



附件：1.第十七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拟授奖作品名单
2.高校拟授奖作品信息勘误表

联系人：陈柱飞、杜澍鑫

联系方式：020—87185614

工作邮箱：tsw_xxb@gd.gov.cn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一号团省委学校部

第十七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委会
2023年10月8日

| 序号 | 学校 | 作品名称 | 作者成员 | 指导老师 | 拟授 奖项 | 项目类型 |
|----|--------|---|--|-------------|----------|------|
| 28 | 暨南大学 | 寻访美丽乡村华章、传播中国振兴成果——港澳台侨青年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现状调研及国际传播实践 | 郑 凝 黄凯霖 蒋佳轩 关晋安 姚悦泓 洪羽林 龙艺夏 戴嘉怡 相 铮 叶雨昕 | 林小愉 蔡心仪 | 一等奖 | 红色专项 |
| 29 | 华南农业大学 | 红色资源思政教育有效实现的路径研究 ——以广东省隆都镇三村为例 | 张梓涵 黄婉莹 卢晨燕 陈柔蕊 黄相楦 黄璐瑶 | 陈玉生 郑浩生 | 一等奖 | 红色专项 |
| 30 | 华南师范大学 | 抗战时期世界共产党人笔下的中共故事 ——基于记忆史视角下的青年化阐释 | 赵怡鑫 周诗雯 陈辉林 柏昀喏 李梓楠 李海洋 黄思婷 梁林昊 | 胡国胜 曾 李 金春姬 | 一等奖 | 红色专项 |
| 31 | 华南师范大学 | 金山红韵促振兴： 清远市金坑村“连南瑶乡第一面红旗”的传承与传播策略 | 胡绮琦 揭琳娜 范锦宜 郑佑苗 唐欣悦 颜小雅 刘国铸 王 楠 | 凌 逾 李浩文 | 一等奖 | 红色专项 |
| 32 | 华南师范大学 | 转折之地、跨越发展 ——重走“四渡赤水”革命老区的调研报告 | 曹 野 黄文慧 郑乐怡 宋禹希 蔡泽耀 袁宏璋 田 怡 | 李 鹏 黄金凤 | 一等奖 | 红色专项 |
| 33 | 华南师范大学 | 智慧同行、五育并举 ——本土红色文化智慧学习模式构建与实证研究 | 章根堂 陈冬霞 杨得慈 黄晓惠 徐爱华 王倩淳 胡国源 刘照冈 欧阳颖 黎妙诗 | 王 莉 蒋建农 | 一等奖 | 红色专项 |
| 34 | 华南师范大学 | “平语近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阅读情况调研 ——以48所广东高校大学生为例 | 赖亨霖 黄依扬 梁可颐 胡本嫒 李果悦 陈相泳 林涵诗 | 胡国胜 周建伟 沈志刚 | 一等奖 | 红色专项 |
| 35 | 华南师范大学 | 红绿赋能“镇”出发：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研究 ——以广东省肇庆市范镇黄田镇为例 | 陈蕾如 马健彤 周 莹 郭子萱 董志元 伍星兴 邹子威 吴江峰 胡文杰 钟天启 | 林秀丽 | 一等奖 | 红色专项 |
| 36 | 华南师范大学 | 星火“绘”乡土、共处富“墙”路： 基于联动与多模态数据的红色墙绘空间感知与社会动员研究 | 潘志超 陈博睿 刘 飞 劳家荣 林晓扬 黄子柔 温嘉茹 陈怡思 李小溪 郭大豪 | 王 敏 | 一等奖 | 红色专项 |



证书编号: A03419-5/5

获奖证书

第三届“全国MSW研究生案例大赛”

优秀奖



参赛案例：“竹”福邻里，“编”汇关爱——社会工作
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例分析

团队成员：黄滢滢，卢君女，苏晶晶，李文豪，余超龙

指导教师：陈玉生

参赛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院校联席会议

第二届
2024年1月25日

案例大赛组委会

获奖证书

蔡海燕 黄滢滢 谭金凤：

您的论文《乡村治理中村级社工站的嵌入路径与自主策略研究》荣获“第十五届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暨第八届研究生论坛”征文大赛

硕士研究生组 二等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指导老师：陈玉生

证书编号：202308-M2-13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九日

获奖证书

CERTIFICATE OF AWARD

华南农业大学 陈江颖 卢君女：

你的论文《基于扎根理论的直聘社会工作者弱服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荣获“第十六届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暨第九届社会工作研究生论坛”征文大赛

硕士组 二等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指导老师：陈玉生

证书编号：2024-M2-01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China Association for Social Work Education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城市治理案例挑战大赛（2021）
The 7th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ase Study Competition of
City Governance (2021)

获奖证书

有机卷心菜队：

李曼雅、刘丹华、赵林雪、曹雅琴 同学在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城市治理案例挑战大赛（2021）
中表现突出，团队荣获

二等奖

指导老师：陈玉生

特颁此证，以兹鼓励。

上海交通大学
二〇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获奖证明

30 号“灵魂干饭冲就队”的指导老师陈玉生和队员黎心韵、温依庭、冯沅楠、黄子敏、金淑佳、俞二熙、黄嘉玲的作品《价值共享与组织联通：基层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体特征及其生成逻辑研究——以顺德 M 社区为例》于 2021 年 5 月 23 日在中山大学第十四届“政务关注”省级社会调研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特此证明

联系人:秦玥老师

(020)393323257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

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

共青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委员会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代章）





荣誉证书



123号“发际线与我作队”的指导老师陈玉生、叶涯剑和队员吴铭洵、黎英鹏、牛一帆、吕晓澄、范嘉明的作品《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青年志愿讲解员作用机制研究——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为例》在中山大学第十三届“政务关注”省级社会调研大赛之“凝聚共同体之力，构筑大湾区之强”中荣获

三等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中心



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



共青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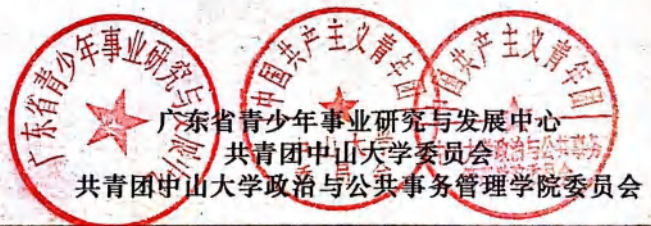


荣誉 证书

40号“青铜锈铁”的指导老师陈玉生、周正和队员黄科捷、刘京雨、吕晓澄、苏虹晓、黎英鹏、李伟梁的作品《公共生活网络化：新型社区媒体的智慧应用及合法性危机——广州青年艺术家XS社区媒体项目研究》在中山大学第十二届“政务关注”社会调研比赛之“汇聚时代青年之力，点亮智慧社会之光”中荣获

三等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荣誉证书

HONORARY CERTIFICATE



48号“求索队”的指导老师陈玉生和队员黄佳敏、符韵如、李彤彤、陈琳瑜、李润佳、陈思畅、李思静的作品《社会网络和创新创业效能感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在中山大学第十一届“政务关注”社会调研比赛之“执青年创新之笔，绘时代美好蓝图”中荣获

三等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中心

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

共青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委员会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委员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



荣誉证书

展激情之青春 秀社工之风采

唐朝南、梁垲钦、何馨雅、张慧芳（指导老师：陈玉生）：

你们代表华南农业大学在第一届“积途杯”全国医务社会工作实务技能大赛初赛
表现优异，荣获

一等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证书编号：LY20230719230202-casw-yw

广东医科大学

上海积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九月

荣誉证书

展激情之青春 秀社工之风采

学校名称：华南农业大学

指导老师：陈玉生

参赛学生：唐朝南 梁培钦 何馨雅

在由广东省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协会和上海积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首届“陆由杯”广东省高校大学生社会工作实务技能大赛中表现优异，荣获 **二等奖**。

广东省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协会 上海积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六月

二〇二三年六月

荣誉证书

参赛院校：华南农业大学

参赛学生：李碧怡 谭靖雯 梁赛阳

指导老师：陈玉生

在由广东省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协会主办、上海积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陆由云平台提供技术支持的2024年第二届“陆由杯”广东省高校大学生社会工作实务技能大赛(本科组)中，荣获 **一等奖**

特颁此证，以资鼓励。

广东省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协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

荣誉证书

青铜锈铁队伍：

在第十三届广东省社会管理调研大赛中表现优异，荣获

二等奖

队伍成员：黄科捷、吕晓澄、刘京雨、苏虹晓、李伟梁、黎英鹏

指导老师：陈玉生、周正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广东省社会管理研究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